



中菲關係與

菲律賓濱華僑

陳台民著

23.4442
287

中菲關係與菲律賓華僑

陳台民著 □

wt614/15



朝陽出版社 □

48399



責任編輯 唐一國
裝幀設計 黎錦榮

書名 中菲關係與菲律賓華僑

作者 陳台民

出版者 朝陽出版社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十號十二樓

CHAO YANG PUBLISHING CO.

11th Floor, 10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kong.

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CO. (HK)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kong

印刷 雅歷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業發街四號十五樓

版次 一九八五年六月香港第二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大三十二開(202×138mm)七四八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04-0342-8

© 1985 Chao Yang Publishing Co.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kong

序言

梁上苑

香港朝陽出版社即將重印出版故友陳台民先生的遺著《中菲關係與菲律賓華僑》一書，要我寫一序言，這是義不容辭的。當前有關菲律賓（亦譯菲律賓濱）華僑問題的書籍，寥若晨星，能夠看見這部著作重印出版，確是值得慶賀。

陳台民（一九二七—一九八三）出生於馬尼拉一個富有家庭，父為陳榮漁先生，母為蘇淑清女士。陳榮漁先生是愛國商人，戰前曾任菲律賓華僑抗敵後援會委員。日本佔領菲律賓期間，陳台民中途輟學，積極參加地下抗日鬥爭活動，經歷了嚴峻的考驗。戰後他繼續唸書，一九五〇年畢業於亞南遜大學化學工程系。他對中菲關係史和菲華社會問題頗有研究，一九五八年開始撰寫《中菲關係與菲律賓華僑》，陸續在馬尼拉《華僑商報》發表。六十年代初他在香港出版了兩本著作：《菲律賓華僑史話》和《菲律賓神話寓言故事》，同時將報上連載的《中菲關係與菲律賓華僑》編為第一冊和第二冊在馬尼拉出版。

一九六二年發生《華僑商報》案，該報社長和總編輯于長城、于長庚兄弟同編輯部人員一起被捕，當時陳台民任職該報，也遭受搜查和拘禁。此後他長期服務銀行界，曾兩度因心臟病發作，在家療養。一九八一年六月馬尼拉華文《世界日報》創辦出版，他受聘擔任國際新聞版的編輯，不久即負起總編輯

的重任。他用「夏朱」的筆名撰寫評論，廣引論據，見解精湛，文筆流暢，頗受讀者讚賞。雖然健康不好，仍強撐病體忘我工作，他的苦幹精神令人欽佩。正當大有作為的年華，不幸於一九八三年五月三十日因心臟病猝發而撒手塵寰，終年五十六歲。他的逝世顯然是華僑史學界的重大損失。

陳台民開始研究菲華僑史時，還是一位青年，但他博覽羣書，旁徵側引，條分縷析，常能提出一些精闢獨到的見解。關於麻逸國的考證，即為一例。一九五八年在描東岸省加拉沓社再次掘出大批中國古代陶器的時候，他就這樣說過：「加拉沓是一個濱海的社鎮，會不會是早期和中國通商的港口，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中國古籍《諸蕃記》（趙汝适撰）記載一個國家，叫做麻逸，很多學者都指麻逸為岷都洛島。我一開始接觸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就很不以為然。因為岷都洛不管是過去或現在，都是菲律賓濱一個比較落後的地方，位置又不見得有什麼特色，這樣的一個地方，那麼早便和中國建立大量的貿易關係，似乎甚不合理。船舶一出岷里拉灣，甲米地省以南的第一個省份便是描東岸，況且，描東岸剛剛和岷都洛相望。很有可能當時的中國人，就把描東岸至岷都洛這一帶的地區，稱為麻逸，也許當時這個地區本身就是一個小王國。」（陳台民著，《菲律賓華僑史話》第十九至二十頁）

以後他在本書裏又說：「據我的意見，綜合《諸蕃記》中對（麻逸和三嶼）這兩個地區的記載，配合起來，應該是泛指自北呂宋，沿呂宋西岸及其岸外島嶼一直到巴厘灣，再由岷都洛橫越北未鄉耶，展沿至呂宋東部的蒲里嚕羣島這個廣大地區而言的。」（見本書第一冊第十九頁）。他的觀點正確與否，姑不置論，但他敢於提出看法，這種獨立思考的精神是值得學習的。

這幾年我看過好些論述中菲關係發展的書籍，其中參考資料的互相引用和摘抄，自是免不了的現

象。陳台民在本書中的論述，引證各方材料極爲豐富，又能根據當時形勢作出分析。例如西班牙佔領菲律賓以後，便有侵略中國的野心，西駐菲總督山地一五七五年給國王腓立二世的報告書，不僅對中國人極盡誹謗侮辱之能事，甚至發出狂言，認爲只要有「四千至六千人，配備着槍矛和槍、船艦、炮和所需彈藥」，便足以征服中國。各書對此都有記載，但對其不能實現的原因，却有不同的看法。

劉芝田在《中菲關係史》一書中寫道：「西王究竟是一個聰明之主，當他收到這些妄想征服中國的建議時，態度非常慎重，只一笑置之。」接着又說：「可是菲律賓比二世始終力主慎重，對於這些請求，皆一概禁止，西國軍人征服中國之議，此後就沒有人再提起。」（劉芝田：《中菲關係史》第三八六、三八八頁）。這種說法顯然把問題看得太簡單化了。

陳台民對此却從當時歐洲形勢和西班牙內部問題進行分析，認爲「在歐洲戰爭（西班牙與荷蘭的戰爭）的長期持續，西班牙國內的動亂和經濟困難的情況之下，腓立二世對侵略中國的行動當然有所顧忌。」（見本書第一冊第二二八頁）。他還提出一五八八年「無敵艦隊」征英慘敗，已使西班牙由夢想建立亞洲大帝國的歐洲霸主，變成一個腐爛沒落的封建王朝，所以「在無敵艦隊慘敗之前，西班牙侵略中國的計劃，是一個切實準備執行的計劃……慘敗以後，西班牙對中國的侵略大多只是紙上談兵。」（見本書第一冊第一九四至一九五頁）。我認爲他的論斷是較有說服力的。

本書之所以能夠提出這些鮮明的觀點，也就是運用唯物辯證主義去說明矛盾各方的關係，我想這才是研究歷史的方法。陳台民更具體指出：「我們在探討這個（西班牙佔領）時期以後的中菲關係，不能不注意到菲律賓當時的宗主國，西班牙本國的社會發展及其民族特性，因爲這是在菲律賓所施行的一切

政策的根源。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中國各時期的社會狀況，這樣才能了解中菲關係發展的歷史背景，才有可能分析菲律賓華僑地位的社會和歷史的根源。」（見本書第一冊第五十八頁）。我完全同意他的說法。

一六〇三年十月發生西班牙當局第一次大屠殺華僑，半個月內被殺華僑計有二萬四千人。中國和西班牙史籍對此均有記載，其中關於被處死的僑領永江（FENG KANG，亦譯作黃江），西班牙當局和史家說他是起義的領袖，劉芝田等也同意這種說法。陳台民却另有見解，他在本書中提出三點理由：其一，永江是富有的華僑，被委為華僑八連市場總管，並曾受洗為天主教徒，準備作為移民在菲長期居留，這種人不可能領導起義來反抗統治者。其二，西班牙當局正在懷疑華僑密謀起義時，永江却領導華僑捐款獻工，幫助當局構築防禦工事。其三，當華僑已集合起來發動起義的時候，永江漏夜向西總督報告，使其有所準備。因此陳台民認為，不能想像永江是發動起義的人物；儘管他被處死分屍，「並不能洗刷他一生對西班牙當局的效忠。」（見本書第二冊第三一七至三二〇頁）。

除了上述事例，本書還有不少值得稱道的論點，概括說來有如下幾項：一、「西班牙統治初期的菲律賓，不但成為中國輕工業的傾銷地，而且成為中國輕工業向墨西哥的轉運站。」二、「長期的中菲貿易，使菲律賓華僑老早便集結了龐大的商業資本累積。」三、「西班牙在菲律賓基本上採取排斥和限制華僑的政策，這是在當時沒有辦法嚴格切實地執行的政策。」四、「在西班牙史籍和檔案中發現「西班牙人曾經盤踞過中國的賓那港（EL PINAR）」，但一切有關書籍都未詳載。五、詳細分析了「華僑商業資本社會在菲律賓形成並長期存在的根源」等等。

本書最大的特點是大量引用了西班牙方面的史料，範圍很廣，包括史籍、文獻、檔案、記載、信函、敕令和報告書，有關的法令、供詞、證言、誓書等等。顯然可以看出，陳台民在搜集整理資料方面是下了苦功的。然而，最大的特點又變成最大的缺點，素材太多必然成爲沉重的包袱，佔的篇幅過多，繁瑣重複，讀起來有不勝其煩之感。例如第一冊第六章「一封大主教的信」，就佔了整整一章三十六頁。第二冊引用了更多的敕令、法令、禁令、報告書、意見書、請願書、備忘錄等等。我想，假如能夠刪去一些繁文贅詞，只留下必要的引證，本書就會顯得更加精彩。

最近，我碰見原《華僑商報》社長于長城先生，談起了陳台民這本書。他說此書原在該報連載，發表後隨即將版面排成書本模式，另外加印一些份數而裝訂成冊。二十多年前在馬尼拉那樣困難的中文排印條件下，只有採用這種辦法才能出書。我猜想，陳台民可能爲了讓更多的資料在報上披露，才會這麼寫的，想不到印成書本之後就無法修改了。

承香港朝陽出版社不棄，千里來鴻，囑寫前言，因就所知，略抒己見，是爲序。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於北京

（本文作者梁上苑先生現爲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特約研究員）

第一册

第一冊 目錄

前 言	(一)		
第一章 明朝以前的中菲關係	(七)		
晉朝的僧人法顯(七)	崑崙國(八)	室利佛逝王國(九)	唐
宋時代的廣泉(一三)	對麻逸國最早的記載(一四)	諸蕃誌(一五)	
宋時的麻逸國(一七)	宋時的三嶼(一八)	元朝的征討爪哇	
(二〇)	島夷誌略(二一)	元時的麻逸國(二一)	元時的三嶼
(二二)	元時的蘇祿(二四)	元時的泉州(二六)	中國對阿
刺伯商人的態度(二八)	蒲壽庚(二九)	總結(三一)	
第二章 明朝初期的中菲關係	(三十五)		
中國經濟中心的南移(三五)	明初的對外政策(三六)	中菲大量貿易	
(四〇)	南洋的新形勢(四一)	鄭和七下西洋(四二)	明初
的呂宋和未獅耶(四四)	移民的開始(四八)	明初的蘇祿(五〇)	

- ……白本頭（五四）
- 第三章 中國和西班牙在菲的最初接觸……（五十七）
- 歐洲和西班牙（五八）……明朝中國（六六）……葡萄牙人東來（七〇）……
- ……倭寇與海賊（七二）……最初交鋒（七五）……對華僑最初的態度（八一）
- 第四章 林鳳征菲及其對中菲關係的影響……（八十七）
- 弱小民族的起源（八七）……準備侵略中國（八八）……中國沿海的海賊（九〇）……
- 林鳳不是林道乾（九五）……林鳳征菲的動機（九六）……怡保
- 戈遭遇戰（九九）……第一度攻城（一〇〇）……菲律賓濱人民起義響應（一〇四）……
- 華僑敗類申實（一〇八）……第二度攻城（一〇九）……退往蜂
- 牙絲蘭（一一二）……王望高使菲經過（一二〇）……對中菲關係的影響（一二九）……
- 繼續主張侵略中國（一三二）
- 第五章 西班牙當局的初期對華政策……（一三七）
- 爲什麼不侵略中國（一三七）……八連的建立（一三八）……輸入的中國商品
- （一四五）……與墨西哥的貿易（一四九）……西班牙代表會議請願書（一五五）……
- 禁止華僑經營零售業（一五七）……侵略中國的詳細計劃（一六三）
- ……『無敵艦隊』的慘敗（一八九）……使華僑西班牙化（一九六）……

赴中國傳天主教(二〇四)……………	明朝中國限裏的佛朗機(二二二)……………	日本第
一次侵略朝鮮(二二〇)……………	總結(二二八)	
第六章 一封大主教信……………		(二三九)
第七章 拉示馬仁迎示總督與華僑英雄潘和五……………		(二七五)
禁止土著穿用中國織物(二七六)……………	企圖控制澳門(三〇四)……………	反對中菲
貿易及排華(三一六)……………	貿易政策的檢討(三二七)……………	日本威脅呂宋(三
三四)……………	遠征與被殺(三四〇)……………	一個華僑的供證(三五九)……………
豐		
臣秀吉再來信(三七二)……………	拉示馬仁迎示執政期的總結(三七四)	

前言

中國和菲律賓的關係，有着非常悠久的歷史，從有史籍可考的時代算起，便已經是千年以上了。但是在這麼悠久的年代中，有關南洋諸島嶼的記載，在中國，只是散見於歷朝的史籍，和文人的筆記中。一向來，中國對南洋的諸島嶼，並沒有加以够大的注意。

當阿刺伯人開始由海道與中國交通的時候，他們由印度洋經過南洋諸島嶼，而抵達中國大陸，由中國返回中亞細亞的歸途中，也要再經過這些島嶼。因此，除了個別的零星接觸外，中國與南洋諸島嶼較具規模的關係，首先是通過阿刺伯人而建立的。

我之所以在這裏應用南洋諸島嶼這個名詞，而不用南洋羣島，是因為當我們提到南洋羣島的時候，它的範圍是要包括中南半島的，而中南半島和中國在很早的時候，就有了特別密切的關係。

歷史上中國文化向南發展的路線，並不是由中國本土入海南傳的，而是沿着中南半島南下，再自東京灣由海道傳至南洋諸島嶼。先入蘇門答臘和爪哇，再向北經婆羅洲傳入蘇祿，一直向北擴展至未獅耶和呂宋。

從中國史籍的記載考察起來，中國與目前稱爲菲律賓這個地區的關係，甚至比中國與台灣的關係（這

只是指過去的歷史，目前我們當然都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建立得更早。當三嶼（今菲律賓）人認為到過中國是無上的光榮時，台灣還是一個洪荒的島嶼。

經過印度洋而來的印度文化和阿剌伯文化，也是首先傳至蘇門答臘和爪哇，然後再循與中國文化同一的途徑，向北傳佈。由於中國和阿剌伯長期的交通關係，當阿剌伯人向南洋諸島嶼發展時，在某種程度上，也刺激了中國人向南洋諸島嶼的發展。

因此如果要比較完整深刻地研究古代的中菲關係，除了歷代的史籍之外，必須首先對歷代文人關於南洋諸島嶼的筆記，福建廣東沿海諸地的府志和縣志，中南半島的史籍，阿剌伯人與中國海上交通的記載，加以一番搜集整理。這是一項繁重而無法避免的工作。

整理古代中菲關係的歷史的時候，無論如何總要接觸到菲律賓歷史的分期問題，和西班牙尚未到來以前菲律賓社會性質的問題，這些問題直到現在不但還沒有定論，而且還沒有經過適當程度的論辯。

南洋諸島嶼中的古國如：室利佛逝（三佛齊），滿者伯夷和馬六甲等，在目前的世界史上還是無名無目的。如果對這些古國無法作出一些適切的結論，古代菲律賓的各種歷史問題，都很難入手。

在這些古國之中，室利佛逝（Sri-Vishaya）和菲律賓有最密切的關係。研究古代菲律賓歷史的時候，不能不由室利佛逝的歷史入手。

由於前面所指出的，菲律賓歷史的分期問題，直到現在還沒有解決，這裏所提及的古代菲律賓歷史，一般地是泛指西班牙尚未到來以前的菲律賓歷史。從中國史籍星散的記載看來，這個時期的菲律賓歷史，

仍舊可以分爲不同的發展階段，不過現在還沒有充份的資料可以討論。

菲律賓最近的考古發掘工作，有了不少的成績，有許多中國瓷器被掘出，當這些瓷器被分析研究之後，將爲古代中菲關係的歷史，提供進一步的研究資料。

我們現在不能確斷，中國人從什麼時候開始，才在菲律賓聚居。但是我們可以正確地作出結論說：當西方國家開始佔領菲律賓的時候，在菲律賓居住的中國人的地位，便立刻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

由於當時的西班牙社會帶着強烈的封建性質，以及它和其他的殖民地宗主國比較起來，有着更濃厚的宗教熱忱，使菲律賓華僑，有着與南洋羣島其他地方不同的特殊僑情。

如果菲律賓的宗主國，是一個像英國或荷蘭這一類的工業先進國，像菲律賓這樣一個人口稀少的國家，在工業先進國家榨取原料的壓力下，當然需要大量的人力，結果，將會爲菲律賓華僑社會，帶來與今日全然不同的面貌。

但是，西班牙在歐洲比較上是一個落後的國家，因此，西班牙統治初期的菲律賓，不但成爲中國輕工業產品的傾銷地，而且成爲中國輕工業向墨西哥傾銷的轉運站。在這個時期，中國和西班牙統治下的菲律賓比較起來，是先進的，資本主義開始萌芽的國家。當時來到菲律賓推銷中國商品的中國商人，可以說是當時中國社會的一種進步勢力，這羣出外的中國商人，和國內的輕工業及手工業，同樣地受到中國封建勢力殘酷的摧殘和逼害。

要研究這個時期的中菲關係，不但要注意中國和西班牙的典籍，而且要注意墨西哥和菲律賓貿易的典

籍。

由於到菲律賓來的中國人，大多數是來自大陸上較偏僻的福建省，福建在中國文化史上，不但從來沒有佔過一席重要的地位，而且一向來，便與中國文化運動的中心很隔膜，因此，中國文化一向來便沒有對菲律賓發生過基本影響。雖然，我們不能說菲律賓文化沒有中國文化的烙印，但是這些大都是在無意中傳入的，而且都不是會在菲律賓人的生活發生基本作用的。

這羣在文化上相當落後的中國人，來到菲律賓以後，仍舊死抱住殘缺保守的舊禮教，甚至在近百年來中國革命的火所淘汰掉的中國文化陳滓，在華僑社會中依然被誤認爲是中國文化的精髓。這種思想惰性的毒素，對華僑社會是很有害的，它使華僑社會與先進的西方文化對照之下，不但相形見絀，而且顯得很固執和愚昧；並且使華僑社會在政治上，和在社會發展上缺乏應有的敏感性，處處表現出頑拗和自大。

作爲亞洲的近鄰，而且同是力求擺脫殖民地半殖民地枷鎖、爭取獨立自主的國家，中國文化在菲律賓獨立革命運動中，缺乏應有的影響。不管是西班牙或美國統治時代的獨立運動，都被多數的菲律賓智識份子，歸功於西方開明民主思潮的啓發。

因此，在菲律賓的任何文化部門，都很少看到以亞洲國家爲立場的體系。

儘管，菲律賓華僑在文化上帶着極嚴重的落後性，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甚至代表着中國文化的腐朽部份，但是，他們在帝國主義慘無人道的逼害和屠殺之下，表現出可怕的堅忍和韌性；在被中國封建王朝認爲是「無賴之徒」和「不安本分之人」的鄙視下，仍然帶着驚人的向心力。在受到異族的逼害屠殺之後，

還要被本國的統治者責斥摧殘，而依舊保持着對其祖國不二之忠誠的民族，在整部世界史上，恐怕只有南洋羣島的華僑。

這種驚人的向心力，使菲律賓華僑成爲抗日戰爭熱誠的支持者；但是他們的保守性，却使他們對辛亥革命、北伐革命等重大的革命運動，沒有什麼突出的貢獻。

除了偶然途經這羣島嶼的中國人之外，最初到菲律賓來的中國人，是爲了貿易而來的，便是使中國所生產的商品與菲律賓交易，這項貿易對當時中國的工業發展，是有實際幫助的。

後來，在中國封建王朝的苛政壓迫之下，有些沿海的中國人，開始向南洋諸島嶼移居，他們在菲律賓，成爲最重要的手工業者和技匠。他們雖然大都是中國大陸的農民，但是他們來到菲律賓以後，却不再務農爲業。這是中國移民和歐洲人向美洲及澳洲移民時最大不同的地方，也顯然可以看出，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在菲律賓永久定居的意慾。

作爲菲律賓的宗主國，西班牙本國社會的發展，對菲律賓是會發生極重大的作用的。西班牙本國的政治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的程度上，決定了它對菲律賓的統治政策，同時也決定了它對菲律賓華僑的態度。因此，研究西班牙統治時代的中菲關係和華僑問題，是不可以和西班牙本國社會的發展分隔開來的。

瞭解西班牙對菲政策的背景，可以使我們對西班牙在菲律賓的華僑政策，有較深入的認識。

十九世紀的末期，歐洲和美洲的工業品，開始大量地湧進菲律賓，到了這個時候，菲律賓華僑便由先前的推銷中國商品，和當手工業和輕工業者的地位，蛻化而成爲西方工業的代理人。

一向被認為是大勇者之鄉的美國，到了這個時候，也開始由全世界愛好民主自由的人民的所嚮往的樂園，轉變而為向外擴張的帝國主義，古巴和菲律賓的主人，便在這個時候由西班牙轉為美國。

研究華僑問題，必須由菲律賓社會歷史的發展加以考察，才能作全面的理解。

近百年來，中國本身不斷地發生急劇的變化，在這個中國動亂的大時代中，菲律賓華僑幾乎是一直支持着任何一項能够使中國強大的趨向。中國近代史上的每一件大事，都無可避免地會在菲律賓的華僑社會起一定的作用，同時也無可避免地，影響了宗主國對菲律賓華僑的政策。

現在我們探討歷來的中菲關係和菲律賓華僑的諸問題，希望能夠對今後的中菲關係和華僑社會的發展投下一些亮光。

今天，亞非集團正在抬頭，他們在國際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地位逐日提高，亞洲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也與日俱增。因此，以正確的觀點來解決南洋史上的諸問題，在學術上成爲一樁急不容緩的工作。

中國與南洋羣島有着千年以上的關係，這一段關係長期地爲帝國主義的御用學者所歪曲，如果沒有在客觀的立場上，把這一段關係重新加以分析和估定，真正的南洋史（或東南亞歷史），是很難寫出的。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南洋各地的文人，能够在南洋羣島諸民族的立場上，建立一個南洋史的體系。

第一章 明朝以前的中菲關係

從考古學上和人類學上講，遠在新石器時代，居住在目前稱爲中國的亞洲大陸的人類，便開始移居到南洋羣島來。有些學者還認爲南洋羣島的新石器文明，是由目前稱爲中國的亞洲大陸傳佈而來的。

不過，這是考古學範圍內的問題，我們只是在這裏稍爲一提。同時，我們應該指出，當時在目前稱爲中國的亞洲大陸上住居的人類，還不能被稱爲是中國人，因爲在那個時候，中國這個國家還沒有建立。

雖然如此，我們却不能不注意，人類在蒙昧時代的文化初曙期，中華民族和東南亞諸民族的血緣關係。今日中華民族和東南亞諸民族，同爲考古學上有名的「北京人」的後代，直到現在，仍舊是人類學上最有力的假設。

然而，這個問題還需要人類學和考古學進一步的研究，以及中國西南部和東南亞地區進一步的考古發掘，才能得到最終的證明。

晉朝的僧人法顯 現在我們就有籍可稽的時代開始，略述歷史上的中菲關係。

晉朝有一位佛教僧人，名字叫做法顯，在晉隆安三年（公元三九九年），由陸路出國到印度取經，再由海道乘船回國。佛國記（亦名法顯傳或法顯行傳）有一段記載說：

「得好信風，東下二日，便值大風，船漏水入，商欲趨小船，小船上人恐人來多，即斫繩斷。商人大怖，命在須臾，恐船水漏，即取財貨擲落水中；法顯亦以軍持及澡漈并餘物棄擲海中，但恐商人擲去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地衆僧，我遠行求法，願威神歸流，得到所止。如是大風晝夜十三日，到一島邊，潮退後，見船漏處即補塞之。於是復前，海中多有抄賊，遇轍無全。大海瀾漫無邊，不識東西，唯望日月星宿而進，若陰雨時，爲逐風去。亦無准。當夜闇時，但見大浪相搏，晃然火色電光水性怪異之屬，商人荒遽，不知那向，海深無底，又無下石柱處。至天明已，乃知東西。還復望正而進，若值伏石，則無活路。如是九十日許，乃到一國，名耶婆提（Yavadvipa）。」這裏的耶婆提有人認爲是現在的爪哇，有人則認爲是蘇門答臘，現在我們暫時不去討論耶婆提究爲爪哇，抑或是蘇門答臘的考證問題。不論耶婆提是爪哇或蘇門答臘，當時法顯自獅子國（錫蘭）乘船向東航行，在這條航程上，在爪哇或蘇門答臘附近，可能遇到颶風的島嶼，只有目前被稱爲菲律賓的這個羣島。Austin Craig在「一八九八年以前菲律賓的發展」(Philippine Progress Prior to 1898. Manila, 1916)一書中，便以這個理由，斷定法顯確曾到過菲律賓。

我們不知道抄錄中的「商人大怖」，「但恐商人擲去經像」，所指的商人究竟是阿剌伯商人、印度商人、或中國商人。

峴 崙 國 到了唐朝，中國與南洋諸島嶼的關係，已經有了相當的發展。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一中記載稱：

「從西數之有婆魯師洲、未羅遊洲、即今尸利佛逝國是（又名室利佛逝或三佛齊），莫訶信洲、訶陵洲、盆盆洲、婆里洲、掘倫洲、佛逝補羅洲、阿善洲、末迦漫洲、又有小洲，不能具錄。」
同書同卷又云：

「掘倫初至交廣，遣使總喚峴崙國焉，唯此峴崙，頭捲體黑，自餘諸國與神州不殊，赤脚敢曼總是其式，廣如南海錄中具述。」
舊唐書卷一九七林邑傳中記載稱：

「自林邑以南，捲髮黑身，通號峴崙。」

唐朝的典籍書札通常把亞洲大陸上，南洋諸島嶼中的尼格道人（*Negritos* 或 *Aetas*），一般地稱為峴崙奴。因此峴崙國應該是泛指為尼格道人所居住的南洋諸島嶼。

現在還沒有人知道唐人為什麼把尼格道人稱為峴崙奴。這個名稱和峴崙山有沒有關係，還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一八三〇年，法國巴黎地理學會曾經懸賞徵文請人證明「中國人所稱之峴崙山脈中確曾有小黑人」。但是一百多年來，還沒有人獲得這項獎金。

室利佛逝王國 唐朝和宋朝的時候，南洋諸島嶼是以室利佛逝王國為中心的，新唐書卷一四七室利佛逝傳記載稱：

「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過軍徒弄山二千里，地東西千里，南北四千里，而遠有城十四，以二國分摠……其王號曷蜜多威亨，至開元間（七一三——七四一），數遣使者朝表……」

菲律賓叢史 (Pictorial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s by Reyes, Santamaria, Beyer, De Veyra) 中記載稱：

「在八世紀結束以前，室利佛逝 (Sri-Vishayan) 的勢力和統治已經確定了。它伸展至整個的馬來半島，包括蘇門答臘的大部份，和暹羅的一部份，甚至遠達爪哇的中部。它的屬國的確實數目未被知悉，但是其中發展至很重要的地位的有四：Bandjarmasin, Sukadana, Sarawak 的南部地區和渤泥 (Brunei)。Bandjarmasin 和渤泥派出支系到菲律賓來，並迅速地和我們有進取心的祖先混合，為我生氣勃勃的民族場面，提供新的彩色。」

室利佛逝基本上是一個在印度文化影響下的王國，它的勢力在十一世紀的時候達到最高峯，在一三七七年崩潰。宋史卷四八九三佛齊傳記載稱：

「三佛齊國蓋南蠻之別種，與占城為隣，居真臘、閩婆之間，所管十五州。」

我們不知道唐史中的「遠有城十四」，和宋史中的「所管十五州」，所指的到底是什麼地方，但是當時的南洋羣島，有相當廣大的地區，處於室利佛逝 (三佛齊) 的直接或間接控制下，是完全不成疑問的。室利佛逝除了唐史所記載的「開元間數遣使者朝表」之外，宋史卷四八九中還稱其「國中文字用梵書，以王指環為印，亦有中國文字上章表。」宋史中對三佛齊朝貢中國的記載，也比唐史更加詳細，現在略而不列。

馮承鈞所著中國南洋交通史 (六四頁) 中說：「宋代私人撰述所言南海最詳者，則為周去非之嶺外代

答。去非字直夫，永嘉人，卷首自序題淳熙戊戌冬十月五日，則成書時在一一七八年矣。」

周去非在嶺外代答卷二，三佛齊國條中記載稱：

「三佛齊國在南海之中，諸蕃水道之要衝也，東自閩粵諸國，西自大食故臨諸國，無不由其境而流入中國者。」

由此可見在當時，不管是中國與南洋諸島嶼的交通，或阿刺伯由海道與中國的交通，都要以三佛齊為必經之地。

三佛齊的西名是 *Sri-Vishaya*。它實際上是一個民族的名稱，宋猶耶一直到現在，仍舊是菲律賓中部未獅耶羣島上的居民的名稱，它們是菲律賓今日最重要的族人之一。

不但如此，今日的婆羅洲，仍舊有三十萬的 *Vitayan* 族人居住着。

在宋朝的時候未獅耶族的分佈，甚至向北遠達台灣。趙汝适所著的諸蕃志中，有毗舍耶國條，記載稱：「毗舍耶，語言不通，商販不及，袒裸野瞧，殆畜類也。泉有海島曰彭湖，隸晉江縣，與其國密邇，煙火相望，時至寇掠。其來不測，多罹生噉之害，居民苦之。淳熙間（一一七四—一一八九），國之酋豪華常率數百輩猝至泉之水沃圍頭等村，恣行兇暴，賊人無數，淫其婦女，已而殺之。喜鉄器及匙筋。人閉戶則免，伺剽其門圍而去。擲以匙筋則俯拾之，可緩數步。官軍擒捕，見鉄騎則覘其甲，駢首就戮而不知悔。臨敵用標鎗，繫繩數丈為操縱，蓋愛其鉄不忍棄也。不駕舟棹，惟以竹筏從事，可摺疊如屏風，急則羣舁之泗水而遁。」

宋史卷四九一流求（即今台灣）傳記載稱：

「流求國在泉州之東，有海島曰澎湖，烟火相望，其國墾柵三重，環以流水，植棘爲藩，以刀稍弓矢劍鼓爲兵器，朧月盈虧以紀時，無他奇貨，商賈不通，厥土沃壤無賦歛，有事則均稅。旁有毗舍耶國，語言不通，（下與諸蕃志同，略。）」

由上面的記載看來，宋時台灣至少有一部份，確爲未獠耶族人所居。

我們在研究南洋諸島嶼的古代歷史的時候，斷斷不能以後來西方國家所作的政治區域的劃分爲標準。而應該着重注意南洋諸島嶼的民族的實際分佈情況。

三佛齊這個民族，在蘇門答臘因爲在與印度、阿剌伯和中國等三種文化的交流下，成爲其民族中最先進的部份。這三種文化以印度文化最佔優勢，在印度文化影響下，三佛齊王國建立的時候，便以蘇門答臘爲中心。

現在被稱爲菲律賓的這羣島嶼，當時也是以蘇祿和峇蘭佬南部，爲最先進的部份，而未獠耶和呂宋，則爲比較落後的地區。

北方的台灣，因爲遠離三佛齊的中心蘇門答臘，中國文化亦尙未渡海而來，因此當時在台灣的未獠耶族，是最落後的原始未獠耶族，他們「袒裸盱眙，殆畜類也」。

室利佛逝王國在唐代的時候，雖然即已慕名來朝。但是唐朝的中國人到室利佛逝的不會太多，因爲在唐朝出國的中國人，大部份都是求經的僧人。中國通過阿剌伯商人與室利佛逝進行貿易，然後再由室利佛

逝（指蘇門答臘）轉入今日被稱為菲律賓的這羣島嶼，由於這羣島嶼（蘇祿除外）的落後性，除了偶然的接觸之外，從經濟的觀點上，無論是中國人或阿刺伯商人，都不會與這羣島嶼建立經常的貿易關係。

未獅耶和呂宋（特別是未獅耶）可能與室利佛逝的中心蘇門答臘有着鬆弛的從屬關係，不過由當時的交通工具，和可能建立的政治組織看來，一種嚴密的統治制度，是不能在蘇門答臘和未獅耶、呂宋之間建立的。

唐宋時代的廣、泉 唐朝對外海道交通最繁盛的港口要算廣州。舊唐書卷一三一李勉傳記載曰：

「李勉拜嶺南節度使，廉潔不暴征，……西南夷舶，歲至四十椀，公私以濟。」

同書卷八九王方慶傳記載曰：

「廣州地際南海，每歲有崑崙乘舶，以珍物與中國交市。」

前面已經指出過，崑崙在當時仍是尼格道人（Negrito）所聚居的南洋諸島嶼的總稱。

我曾經說過，在唐朝經營與南洋諸島嶼之貿易的中國商人不會太多，當時的這種貿易關係，大多是通過阿刺伯商人建立的。這些外國商人，特別是較富有者，常常在廣州作長期居留，蘇轍龍川略誌卷五十記載曰：

「番商押陞羅者，居廣州數十年矣，家資數百萬緡。」

不過在當時在福建居住的阿刺伯商人亦已不少，全唐文卷七五，太和八年（八三四）文宗諭曰：

「福建蕃客，宜委節度使常加存問。」

這裏所指的蕃客，並不是過番的中國人，而是指在中國居留的外國商人。當時在福建居留的外國商人，毫無疑問地是以泉州為中心的。

到了宋朝，泉州逐漸興起，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宋史卷一八六食貨誌記載曰：

「太平興國（九七六——九八三）初，京師置權易院，仍詔諸蕃國：「香藥、寶貨至廣州、交趾、泉州、兩浙，非出於官庫者，不得私相市易。」」

不過在那個時候，廣州仍舊是最重要的貿易港口，宋孝宗時（一一六三——一二二四）曾任樞密使的洪适，在盤州文集卷三一，師吳堂記中寫道：

「嶺以南，廣為一都會。大賈自占城、真臘、三佛齊、閩婆涉海而至，歲數十椀，凡西南羣夷之珍，犀象珠香流離之屬，禹不能名，禹不能計。」

一二七四年（咸淳十年），吳自牧在夢梁錄中寫道：

「若欲航泛外國買賣，則自泉州便可出洋。」

據宋會要的記載，泉州在宋哲宗元祐二年（一〇八七）十月六日置市舶司。宋高宗建炎元年（一一二七）詔罷，次年又復置福建市舶司。

宋朝的泉州，是一個初露鋒芒，正在勃興中的城市，不久以後，它即將以極大的優勢壓倒廣州。

對麻逸國最早的記載 在菲律賓出土的中國瓷器，證明在明朝以前，中國和菲律賓就有貿易關係存在，不管這項貿易是由阿刺伯商人或中國商人與這個地區直接進行的，或是由三佛齊轉口而來的。

唐宋元三朝的瓷器，曾經在菲律賓濱下諸省被發現過：怡佬戈省、蜂牙絲蘭省、描查安省、邦邦牙省、黎利省、峴都洛省、描實描地省、怡朗省、武六干省和蘇洛省。由明朝以前的中國瓷器在菲律賓廣泛分布的情況看來，和中國的貿易關係，不管是直接地或是間接地，在目前稱為菲律賓的這羣島嶼的各地普遍存在着。

根據中國典籍的記載，直接載明菲律賓與中國發生關係的年代，是宋太宗的時候。文獻通考卷三三二「閩婆條」記載曰：

「又有摩逸國，太平興國七年（九八二）載寶貨，至廣州海岸。」

很多學者都認為這一次由摩逸國運貨到廣州的，是阿刺伯商人，我想，這種說法不會有很大的錯誤。在這件事發生的不久以前，公元九七七年（太平興國二年），渤泥國王曾經派一位名叫 Abu Ali 的阿刺伯人，和兩名其他的阿刺伯人，作為使節入朝中國。（Steiger, Beyer, Benitez, A History of the Orient, P. 205）太平寰宇記對這件事亦有同樣的記載，不過沒有使節的名字，因此不再抄錄。雖然渤泥入朝中國的記載，但是因為渤泥與蘇祿有着密切的關係，所以在這裏，也稍提一筆。

諸蕃誌 宋朝在北方強敵的侵凌之下，中國的政治中心，逐漸自北方南移至東南沿海諸省份，中國商人與南洋諸島嶼直接進行較具規模的貿易，也是自宋朝開始的。

趙汝适所撰的諸蕃誌，有麻逸國條和三嶼、蒲里嚕條，是撰述今日屬於菲律賓範圍地區的第一部中國典籍。

關於這部書的年代，馮承鈞在其所著的中國南洋交通史（六十八頁）中寫道：

「諸蕃誌：：前有自序，後題寶慶元年九月，日朝散大夫提舉福建路市舶趙汝适序，則其書成於一二二五年矣。」

如此，當諸蕃誌書成的時候，正是三佛齊王國開始衰落，閩婆（今爪哇）的政治勢力開始興起的時候。

這本書是中國記載海外交通最重要的文獻之一，雖然馮承鈞在諸蕃誌校注序中說：

「是編雖爲考證宋代西南海諸蕃國之唯一載籍。而文獻通考與宋史嘗引用之。然亦免舛誤。蓋汝适所記非親歷目擊之詞。」

但是在同一文中，他又說：

「本書除採史傳及嶺外代答之文外。頗不見前人記載之文。所記海國之廣。東自日本。西抵西細利。沿海諸國幾盡列舉無遺。現存地理外紀類書。未有詳備如是編者也。」

根據可稽的記錄，第一位研究諸蕃誌的菲律賓人，便是偉大的菲律賓改良主義者扶西·黎利。

一八八七年（光緒十三年），黎利在德國的德萊斯登，和奧地利人 Blumentritt 教授，德國人 A. B.

Meyer 博士，討論十三世紀中葉，趙汝适關於峴里拉的撰述，當時 Friedrich Hirth 博士將它譯成德文。（*Philippine Progress Prior to 1898*, P. 77）

第一個主張麻逸國即菲律賓嶼都洛島的人，便是黎利的好友 Blumentritt。

一八九五年（光緒廿一年），黎利由 Dapitan 寫信給 Blumentritt 說：「注釋是很令人感到興趣，而

且很有啓發性的，但是原諒我，我不能同意某些地理上的命名。現在我懂得了足夠的未獅耶風物，我能夠作出一些改正。如果你允許我，我將會這樣做。不幸得很，Higin先生沒有把這些國家和島嶼的名字的中文附上；然而，我將在這裏找出，我將在一些中國人的幫助下鑑定它們。」（*Epistolario Rizalino*, Vol. V. Part II, pp. 673-674）

可惜黎利在研究諸蕃誌的志願未酬之前便身死了。

宋時的麻逸國 諸蕃誌中對麻逸國的記載如下：

「麻逸國在渤泥之北，團聚千餘家，夾溪而居。土人披布如被，或腰布蔽體。有銅佛像，散布草野，不知所自。盜少至其境。商舶入港，駐於官場前；官場者，其國關闈之所也。登舟與之雜處。酋長日用白傘，故商人必費以爲贖。交易之例，蠻賈叢至，隨皮籬搬取貨物而去，初若不可曉，徐辨認搬貨之人，亦無遺失。蠻賈迺以其貨轉入他島嶼貿易，率至八九月始歸，以其所得準償船商。亦有過期不歸者。故販麻逸船回最晚。三嶼，白滿延、滿里噶、里銀東、流新、里漢等，皆其屬也。土產黃蠟、吉貝、眞珠、瑤瑁、藥檳榔、手達布。商人用瓷器、貨金、鉄鼎、烏鉛、五色琉璃珠、鉄針等博易」。

根據德國學者 Friedrich Hirtz 和美國學者 W. W. Rockhill 所編譯的 CHAU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i, 對麻逸國條的譯註，白滿延爲北呂宋的 Babuyan 島，滿里噶爲呂宋東部的 Pohnio 島。餘

三名，里銀東似指Lingayen，流新似指呂宋，里漢似指Lubang。（然皆出於臆測，未能必其是也。——馮承鈞語）

不過，在該書譯註中對白蒲延和蒲里噲的訂證，現在已經得到一般學者的認可。B. Lanfer在其The Relation of the Chinese to the Philippines一文中，主張白蒲延既在呂宋之北，蒲里噲又在呂宋之東，則麻逸國大約是包括呂宋和岷都洛島，或甚至包括整個的菲律賓羣島。

由諸蕃誌的這段記載看來，麻逸國的商人是非常老實的，他們把商品轉口到其他島嶼去販賣，八九月再回來，仍舊依價償還船商。從「販麻逸船回最晚」這一句看來，當時與麻逸進行貿易的商人，如果不是中國商人，也是在中國長期居留的阿刺伯商人。

同時，在宋朝時候，中國與麻逸交易的重要商品，也在其中列舉出來了。

有人根據「團聚千餘家，夾溪而居。」這一句話，主張這個「團聚千餘家」的地方是馬尼刺，而「夾溪而居」乃是沿巴石河居住。依我看來，這種講法似乎甚為合理。

宋時的三嶼 諸蕃誌中關於菲律賓濱地區的另一段記載為三嶼、蒲里噲條：

「三嶼乃麻逸之屬，曰加麻延、巴佬西、巴吉弄等。各有種落，散居島嶼，船舟至則出而貿易，總謂之三嶼。其風俗大略與麻逸同，每聚落各約千餘家。地多崇岡疊峯，峭拔如壁，馮高依險，編茅爲屋；山無水源，婦女以首彙擊二三甕，取水於溪，登陟如履平地。窮谷別有種落號海膽，人形而小，眼圓而黃，虬髮露齒，巢於木顛；或三五爲羣，踞伏榛莽，以暗箭射人，多罹其害；投以瓷碗，則

俯拾，忻然跳呼而去。番商每抵一聚落，未敢登岸，先駐舟中流，鳴鼓以招之。蠻賈爭棹小舟，持吉貝、黃蠟、番布、椰心簾等至與貿易；如議之價未決，必買蒙自至說諭，徧以絹傘、瓷器、藤籠，仍留一二張爲質，然後登岸互市。交易畢，則返其質，停舟不過三四日，又轉而之他。諸蠻之居環繞三嶼，不相統率。其山倚東北隅，南風時至，激水衝山，波濤迅駛，不可泊舟。故販三嶼者率四五月間卽理歸棹。博易用瓷器、阜綾、絹絹、五色燒珠、鉛網墜、白錫爲貨。蒲里噲與三嶼聯屬，聚落差盛，人多猛悍，好攻劫。海多鹵股之石，槎牙如枯木芒刃，銛於劍戟，舟過其側，預曲折以避之。產青琅玕，珊瑚樹，然絕難得。風俗博易與三嶼同。」

據 Hirth 和 Rockhill 的譯註，加麻延疑是 Calamians，巴佬西疑是 Palawan，巴吉弄似爲 Busuanga 海膽乃 Aeta (卽 Negritos)，此實馬來語 Titan 之訛寫。

由此條看來，三嶼實在是一個比較麻逸落後的地區，商人既「未敢登岸」，也不敢放心讓「蠻賈」將商品帶走，如果價格無法議定，便要留當地人「一二輩爲質，然後登岸互市。」

所謂「南風時至，激水衝山，波濤迅駛，不可泊舟。」必定是指這個地區經常有颶風吹越。

在前面的麻逸國條中，載稱三嶼亦麻逸國屬，據我的意見，綜合諸蕃誌中對這兩個地區的記載，麻逸和三嶼配合起來，應該是泛指自北呂宋，沿呂宋西岸及其岸外島嶼一直到巴佬西，再由岷都洛橫越北未獅耶，展沿至呂宋東部的蒲里噲羣島這個廣大的地區而言的。

中國商人與南洋諸島嶼較具規模的貿易，固然是自宋朝開始，但是宋時經營海外貿易的商人，大部份

還是在中國居留的阿刺伯商人。諸蕃誌三嶼條記述這些商人時，還是稱番商而不稱華商。

元朝的征討爪哇 宋朝滅亡，蒙古族人主中國之後，赴南洋諸島嶼的中國人，在數量上是增加了。元朝對海外諸島嶼，表現出有意開拓的雄心，歷史上第一次，中國大陸出現了強大的海軍。

至元廿九年（一二九二）二月，元世祖忽必烈因其派赴爪哇的使節孟珙，受到黥面的侮辱，一怒之餘，下令征討，詔福建行省，命史弼，亦黑迷失，高興平章政事，征爪哇。史弼總軍事，亦黑迷失總海道事，由福建、江西、湖廣三行省，出兵二萬，發舟千艘，給糧一年。

遠征軍於十二月由泉州出發，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抵爪哇。但是侮辱元朝使者的 *Kartanagara* 已死，因 *Djayakatwang* 弑君篡位。元將與滿者伯夷的將領 *Raden Wijaya* 聯合，擊敗 *Djayakatwang*。當時的滿者伯夷，是一個在印度文化影響下，正在興起的王國。不久以後，建立在爪哇的滿者伯夷王國，即將成爲威震南洋諸島嶼的中心，代替蘇門答臘的三佛齊王國的地位。

我不想在這裏分析元朝這一次的用兵，對爪哇、以至對南洋諸島嶼的政治形勢的影響。但是必須指出，這是中國大陸對南洋諸島嶼用兵的第一次，而且由這段史實看來，遠征軍的兵士，大概多爲福建子弟。

島夷誌略 元朝的典籍對南洋諸島嶼記載最詳的，要算汪大淵的島夷誌略，馮承鈞在中國南洋交通史（八四頁）中寫道：

「元人南海行紀，今傳世者僅有汪大淵島夷誌略一書。大淵字煥章，南昌人，始末未詳，據卷首至正己丑（一三四九）三山吳鑾序，知其人在至正時常附海船浮海，越數十國，紀所聞見而成此書。」

由於烏夷誌略所記的是汪大淵親身的經歷，因此當會比諸蕃誌詳實一點。至正年間（一三四一——一三六七），滿者伯夷（Madjapahit）王國的勢力，已經是相當膨脹了。

烏夷誌略中有關菲律賓濱部份的英譯文（Rockhill譯），被輯於 *Philippine Progress Prior to 1898* 一書中。

元時的麻逸國 烏夷誌略中所記載的，和諸蕃誌所記載的麻逸國，在社會性質上有很大的分別。烏夷誌略麻逸條記載曰：

「山勢平寬，夾溪聚落，田膏腴，氣候稍暖。俗尚節義，男女椎髻，穿青布衫，凡婦喪夫，則削其髮，絕食七日，與夫同寢，多瀕於死，七日之外不死，則親戚勸以飲食，或可全生，則終身不改其節，甚至喪夫而焚尸則赴火而死。酋豪之喪，則殺奴婢二三千人以殉葬。民煮海爲鹽，釀糖水爲酒。地產木棉、黃蠟、玳瑁、檳榔、花布。貿易之貨用銅鼎、鉄塊、五彩紅布、紅絹、牙錠之屬。蠻賈議價，領去博易土貨，然後准價，舶商守信，始終不爽約也。」

從兩段記載看來，在約近一百年中，麻逸國的社會制度，發生了那麼大的變化，是很令人詫異的。

印度文化對麻逸有進一步的、更深入的影響，是可以理解的。殉葬的風俗，完全是由印度傳來的。

但是根據「豪酋之喪，則殺奴婢二三千人以殉葬。」這一句話，則麻逸有着一個高度發展的奴隸制度社會。這是一個很基本的問題，是菲律賓社會發展史上，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因此值得作最詳細、最深入的探討和研究。

不過，在這一百年間，三佛齊民族會大量移居至目前稱爲菲律賓的這羣島嶼中，這個奴隸制度，可能便是三佛齊人建立起來的。

宋史卷四八九三佛齊傳記載曰：

「天禧元年（一〇一七），其王霞暹蘇勿吒蒲迷遣使蒲謀西等，奉金字表，貢真珠、象牙、梵夾經、峴崙奴……」

又記載曰：

「樂有小琴、小鼓、峴崙奴踏曲爲樂……」

可見在三佛齊國中的尼格道人，老早便處於奴隸的地位，爲三佛齊人所取樂，被他們當作進貢中國的物品。

移居到菲律賓來的三佛齊人，可能便將菲律賓的原始土著尼格道人，當作奴隸。尼格道人在三佛齊人的屠殺之下，幾乎近於消滅。

元時的三嶼 島夷誌略中的三島條記載曰：

「居大奇山之東，嶼分鼎峙，有疊山層巒，民傍緣居之。田瘠穀少。俗質朴。氣候差暖。男女間有白者。男頂拳，婦人椎髻，俱披簾衣。男子常附舶至泉州經紀，罄其資囊以文其身，既歸其國，則國人以尊長之禮待之，延之上座，雖父老亦不得與爭焉。習俗以其至唐，故貴之也。民煮海爲鹽，釀蔗漿爲酒。有酋長，地產黃蠟、木棉、花布。貿易之貨用銅珠、青白花碗、小花印布、鉄塊之屬。次

曰答陪，曰海膽，曰巴弄吉，曰蒲里噶，曰東流里，無甚異產，故附此耳。」

據Rockhill的意見，大奇山是北呂宋現在的Cape Engano，呂宋東部沿岸的地區。答陪現無可考；海膽是菲律賓的土著民族，我在引錄諸蕃誌的時候已經解釋過；巴弄吉大概是諸蕃誌中的巴吉弄的誤寫；蒲里噶就是蒲里噶；東流里，有人認為是指東呂宋，但無確證。

烏夷誌略中的三島，和諸蕃誌中的三嶼，不一定是指同一個地方，但同是指目前屬於菲律賓的某些島嶼，則是完全不成疑問的。

根據烏夷誌略的這段記載，三島在元朝的時候，和中國已經建立了很友好的關係，而且對中國存很大的敬仰。三島的男人常常隨商船到泉州去，回國之後，他們的國人便以「尊長之禮待之，延至上座，雖父老亦不得與爭焉。習俗以其至唐，故貴之也。」可見當時到過中國的三島人，比今日到過美國的非菲律賓人，更神氣，更威風。

諸蕃誌中的三嶼，是泛指一個相當廣闊的地區，而烏夷誌略中的三島，範圍則較小。

元史卷二一〇三嶼傳記載曰：

「三嶼國近瑠求（今台灣）。世祖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命選人招誘之，平章政事伯顏等言臣等與識者議，此國之民不及二百戶，時有至泉州爲商賈者。去年入瑠求軍船過其國，國人餉以糧食，館我將校，無它志也，乞不遣使，帝從之。」

元史同卷瑠求國傳記載曰：

「瑠求在南海之東，濠泉與福州界內澎湖諸島，與瑠求相對，亦素不通，天氣清明，隱約若燧若霧……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九月，海紅副萬戶楊祥，請以六千軍往降之，不聽命則遂伐之。朝廷從其請……二十九年（一二九二）三月廿九日，自汀路尾澳舟行，至是日巳時，海洋中正東望見有山長而低者。約去五十里，祥稱是瑠求國，鑿（兵部員外阮玉鑿）稱不知的否。祥乘小舟至低山下，以其人衆，不親上，令軍官劉闔等二百餘人，以小舟十一艘，載軍器，領三嶼人陳煥者登岸，岸上人衆不曉三嶼人語，爲其殺死者三人，遂還。」

由元史的道兩段記載看來，三嶼人陳煥大概是當時在泉州居留的菲律賓人，元朝將領帶他隨軍的目的，無疑地是要他任通譯。元朝時候的中國人，似乎是已經知道毗舍耶國的語言，和三嶼很接近（直到現在，台灣高山族的語言還有許多和菲律賓方言相似的地方）。

元朝的軍隊在出發的當日，即已見到台灣，但是因爲找不到位於台灣的瑠求國，大約便沿台灣的海岸尋覓，一直駛到呂宋的北部，在三嶼停泊。因此元朝所指的三島和三嶼，大概是一些北呂宋的小島嶼。Rockhill考證大奇山就是今日北呂宋的Cape Engano，實在是很有見地的。即使沒有完全正確，也不會與事實相差太遠。

當台灣本島還是一個洪荒的島嶼的時候，中國便與菲律賓建立了很友好的關係，這一點是完全可以確定的。

元時的蘇祿 蘇祿因爲地近渤泥（在今婆羅州），與南洋諸島嶼的政治中心三佛齊王國（在今蘇

門答臘)、和後來的滿者伯夷(Madjapahit)王國(在今爪哇)都比較接近。因此在西方強國的政治勢力尚未侵入之前，它在目前稱為菲律賓的這個地區中，要算是最先進的。

汪大淵的島夷誌略，是對蘇祿作較詳細記載的第一部中國典籍：

「其地以石崎山爲保障，山畚田疇，宜植粟麥。民食沙糊魚蝦螺蛤，氣候半熱。俗鄙薄，男女斷髮，纏皂緜，繫小印花布。賁海爲鹽，釀蔗漿爲酒，織竹葉爲布。有酋長。地產中等降真條、黃蠟、玳瑁、珍珠、較之沙里八丹(Jurafutan, Canhanore)第三港等所產，此蘇祿之珠色青白而圓，其價較昂。中國人首飾用之，其色不退，號爲絕品，有徑寸者。其出產之地，大者已值七八百餘錠，中者二三百錠，小者一二十錠。其餘小珠一萬上兩重者，或一千至三四百兩重者，出於西洋之第三港，此地無之。貿易之貨，赤金、花銀、八都刺布、青珠、處器、鉄條之屬。」

由這段記載看來，中國人老早便喜歡用蘇祿的珍珠作首飾，蘇祿珍珠是輸往中國的最貴重的輸出品。蘇祿是在菲律賓這個地區中，與中國保持較長期的密切關係的地方。中國人對蘇祿的影響，也比較對菲律賓其他任何地區的影響更顯著。直至今日，蘇祿婦人日常生活的衣着，也令人一望而知是受中國人所影響的。

在公元九世紀至十二世紀之間(即宋元年間)，有大量原來已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占婆(今安南)人移居蘇祿。

西班牙人對菲律賓還一無所知的時候，每年就有四百至五百艘帆船，由東浦寨、占婆和中國至蘇祿買

易。

菲律賓受到西班牙人的侵略佔領之後，西班牙人在蘇祿受到最頑強的反抗。蘇祿人民成爲菲律賓的獨立和主權、及其固有的民族文化最勇敢的保衛者。

元時的泉州 元朝於至元十四年（一二七七）在泉州設市舶司。泉州在元朝的時候，成爲中國與南海交通的中心，是當日在世界上最繁榮的港口之一。元史中有關外國的記載，很少有不涉及泉州的。

泉州的古名爲刺桐，宋朝王十朋有詩曰：「刺桐爲城石爲筍」。因爲泉州的西門外有筍山，所以說石爲筍。

刺桐是一種樹木的名稱，又叫做瑞桐，明朝黃仲昭之「八閩通誌」卷八十記載曰：

「五代時留從效，重加版築，傍植刺桐環繞。……其木高大而枝葉蔚茂，初夏開花極鮮紅。如葉先萌芽而其花後發，則五穀豐熟，故謂之瑞桐。」

當時世界的大旅行家，歐洲人馬可李羅和阿刺伯人拔都達（Ibn Battuta）都曾經到過泉州，而且對它驚歎不已

馬可李羅在他的遊記中，對刺桐的記載說：

「該港入口胡椒的數量是很大的。運至阿歷山大港，以供應西方世界的需求的，比較起來是很渺小的，也許還不到百分之一。對這個世界上最大和最寬敞的港口之一，實在沒有一種概念，足以表達其商人匯集和商品堆積的情況。」

拔都達也在他的旅行記中說：

「刺桐港爲世界最大港口之一。甚至可說是世界最大的海港，我在港中見大船約百艘，小船無數。」

當日的泉州是中國綢緞的重要輸出地，中古時代自阿刺伯至全歐洲，都把中國緞叫做刺桐。刺桐今日演變而爲Satin，已經變成西方人日常生活中的共同口語了。韋氏大辭典中的Satin條稱：

「Satin 源自阿刺伯文Zaytuni，出自Zaytun（馬可孛羅遊記中的Zaitun），即中國的刺桐，中古時代的大海港，今日福建省的泉州。」

由此可見，元朝是泉州城的全盛時代。它不但是世界最大的通商口岸之一，而且是中國最重要的海軍根據地之一，元世祖忽必烈遠征爪哇，便是由這裏出發的。

當阿刺伯人開始由海道與中國通商時，以廣州爲最主要的港口。到了宋朝，泉州便開始興起了，這時候不但有許多阿刺伯商人開始移居泉州，中國商人也開始由泉州出發，直接進行海外貿易。元朝中國與海外的貿易，達到了相當高度的發展，這時候中外貿易最重要的港口要算泉州。因而使泉州在世界文化史上，佔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地位。而且也是泉州和福建歷史上最光輝的時代。

泉州的全盛時代，距今已有六七百年了，雖然自元朝以後，泉州在國際貿易上的地位便一直降低，但是在中國與南洋諸島嶼的貿易上，泉州却仍然保持它的重要地位。西班牙佔領菲律賓的初期，中菲貿易主要地還是在泉州和峴里拉之間進行的。

因此，福建人在南洋羣島今日的地位，並不是偶然而獲的，而是六七百年中，因泉州在對外貿易上的地位所造成的。中國人七八百年來在南洋羣島所建的基業，會不會完全被摧毀，目前正面臨一個嚴重考驗的關頭。

中國對阿刺伯商人的態度前面曾經一再地復述過，中國與南洋諸島嶼的關係，最初是通過阿刺伯商人建立的。這些阿刺伯商人進而便在中國建立家業，以中國為永久居留地。

唐朝是阿刺伯商人在中國經營對外貿易的全盛時代，他們把中國叫做唐山，把中國文叫做唐文，中國人叫做唐人；一直到今日，唐山仍舊是南洋羣島的華僑稱呼中國的口語。

阿刺伯人在唐朝的時候，北自長安南至廣州，在廣泛的中國地區中分佈着，他們不但帶來了他們的眷屬，而且在中國各地廣設回教寺院。甚至屬阿刺伯族的「胡姬」，亦為唐朝的中國文人所樂道。

李白的少人行寫道：

「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中國對這羣阿刺伯人的態度，着重於使他們華化，而且對華化的阿刺伯人，予以優厚的待遇。資治通鑑唐紀四八貞元三年條記載曰：

「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居不欲歸，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給，凡得四千人。……胡客皆詣政府訴之。泌曰：「……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於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歸，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

位，給俸祿，爲唐臣。」……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鴻臚寺是唐朝管理外僑及對外關係事務的機關。

這只是唐朝使阿剌伯僑民集體歸化——就是菲律賓華僑的所謂入籍——的一個例子，全中國各地，在中國長期居留而華化的阿剌伯人，數目是相當大的。只要看上面的例子，一次集體歸化便是四千人，歸化之後，還馬上可得官祿，唐朝對阿剌伯外僑的態度，可謂寬大至極。

這些華化了的外僑，爲中華民族的歷史帶來了更多的彩色，而且在中華民族的對外交通史上，放出了光芒四射的異彩。這些祖籍阿剌伯的中國人，曾經在中國對外交通史上，立過不朽的功績，其中最著名的要算宋朝的蒲壽庚，和明朝的鄭和。

蒲 壽 庚 宋末的時候，在泉州主持或操縱對外貿易的，是外國祖籍的蒲壽庚。泉州在這個時候，開始成爲中國與南洋貿易最重要的港口。

蒲壽庚曾經官至福建安撫沿海都制置使，景炎（一二七六）中任福建，廣東招撫使，總海舶。操縱中國和南洋之間的貿易三十年之久。

關於他的先代，明朝何喬遠閩書卷一五二中記載曰：

「蒲壽庚，其先西域人，總諸蕃互市。居廣州；至壽庚父開宗，徙於泉。」

宋朝的民族英雄岳飛之孫，宋寧宗（一一九五—一二二四）時人岳珂所著程史卷十一記載曰：

「番禺有海獠雜居，其最豪者蒲姓，號白番人，本占城之貴人也。既浮海而遇壽，憚於復反，乃

請於其主，願留中國以通往來之貨，主許焉。」

日人桑原隲藏根據這兩段記載，認為滿壽庚的祖父，便是程史中所記載的滿姓富豪。

宋朝的遺民鄭所南在所著的心史中記載曰：

「滿受畊祖南蕃人，富甲兩廣，據泉州叛。」

據桑原考證的結果，認為滿受畊就是滿壽庚，直到現在，桑原隲藏仍舊被公認為是中外學者中，研究滿壽庚最有心得的一個人。

唐宋典籍中，外國人姓滿的很多，包括南洋諸島嶼，諸蕃志的三佛齊國條也說：「國人多滿姓」。爲什麼這些人都姓滿，有許多不同的說法，我個人直到現在還找不到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因此姑且一提，不加討論。

從這幾段抄錄中看來，宋人所著的程史和心史都說滿壽庚祖籍占城或南蕃（皆指今安南），滿壽庚的祖父來自今日的安南，大概是沒有什麼疑問的。但是程史既然說他「號白番人」，我想滿壽庚的祖先，的確是帶有阿剌伯血統的，所以何喬遠的閩書才會說他「其先西域人」。滿壽庚的祖父，可能是阿剌伯和安南人的混血兒。

從歷史上看來，他們這一家族，是很有商業眼光的，當廣州是中國最繁榮的港口的時候，他們在廣州居住。當泉州逐漸興起，即將凌駕在廣州之上的時候，他們便搬到泉州來。

滿氏家族到了滿壽庚這一代，已經是很華化了，壽庚的哥哥壽寔是一個讀書人，著有心泉學詩稿。

宋朝的末年，蒲壽庚在泉州總攬中國與南洋的貿易。在宋朝即將滅亡的前夜，宋朝的宗室退到泉州約有三千餘人，其中有很多是帶兵撤退的。和一切末朝的官僚一樣，他們在泉州爲非作惡，挾權勢欺負外國商人，蒲壽庚雖然身居福建，廣東招撫使也無能爲力，於是懷恨在心。當元朝招降的時候，他便投降元朝，而且殺盡宋朝宗室。

蒲壽庚降元之後，元朝對他始終存有戒心，八閩通志卷八六雖然記載：「元以壽庚歸附之功，授官平章，開平海省於泉州，富貴冠一時。」但是再也不許他經營對外貿易的事業了。

總結 這一章把中國和菲律賓的早期關係，粗枝大葉地概述了一下。這一段關係，不但是在中國與南洋的交通史上，或是在菲律賓的歷史上，都要佔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即使是在處理亞洲史的時候，亞洲國家在西方未侵入以前的相互關係，也必須佔有最重要的一頁。可惜這段關係。一直被中外學者所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有時候固然也涉及到這一個問題，但是却從來沒有把它提到應有的高度來。

如果說首先和南洋諸島嶼建立文化關係的是印度，那麼首先和南洋諸島嶼建立貿易關係的是中國。最初，中國和南洋諸島嶼的貿易關係，是由阿刺伯商人建立起來的。本章由中國典籍中，引證了許多阿刺伯人在中國的商務活動，到了宋末，祖籍阿刺伯的蒲壽庚，不但控制了中國和南洋的貿易，而且官至福建、廣東招撫使。但是這羣阿刺伯僑民，終於和中華民族的血液相融和了，成爲中華民族的有機成份。他們在中國和外國的交通史上，建立了輝煌的功績。

在中國的歷史上，商人從來就是一個受輕視的階層，中國人一向把經商看作是不名譽不高尙的。甚至

中國妓女也把「老大嫁作商人婦」認爲是一種悲慘的結局。因此，很少存有大志的中國人願意從商。在世界史上，商人只有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及其殖民地中受到尊重。

這大概是阿剌伯商人在中國沒有遇到很大的排擠和競爭的原因。

中國與南洋的貿易起初是以廣州爲中心的，到了宋末，這個貿易中心便開始移到泉州。當中國和南洋的貿易中心開始由廣州移向泉州的時候，剛剛是中國商人開始直接進行海外貿易的時候，元史上便有許多中國人進行海外貿易的記載。這段歷史的發展，使今日在南洋羣島經商的中國人，閩南人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閩南人的出外經商，一方面固然由於田瘠民窮，另一方面也未始不是受阿剌伯人的影響。

除了元朝的忽必烈征討爪哇之外，先前，中國從來也沒有妄向南洋諸島嶼用兵的意慾，即使是在武功極盛的唐朝，也沒有向南洋諸島嶼擴展的企圖。倒是南洋諸島嶼常常自動慕名來朝，向中國王朝進貢。中國對來朝的使節，總是予以很優渥的待遇，賜與很豐富的禮物。因此，使南洋諸島嶼的王國或酋長，更加喜歡「仰慕王化」，因爲向中國朝貢，在他們看來，是有利可圖的。宋朝的末期，在內憂外患之下，經常是朝不保夕的。在宋史中，常常可以看到宋末的皇帝禁止番邦朝貢的詔諭。

因此，南洋諸島嶼對中國雖然甚爲景仰尊重，但是却沒有建立過實際上的從屬關係。元朝的征討爪哇，純粹是示威性質的，並沒有加以佔領，建立中國的統治權。

在這個時期，南洋諸島嶼基本上是浸濡在印度文化之中，中國文化對它並沒有發生過本質上的影響。中國文化在目前的菲律賓羣島中，留下最顯著的影響的地方，是蘇祿。但是這項影響在現在，已經不

是意識觀念上的，而是日常生活上的。回教文化的影響完全凌駕在中國文化影響之上，而且回教文化也逐漸有被另一種外來文化所取代的趨勢。

南洋諸島嶼的人民，對中國的景仰和尊重，後來爲什麼變成不滿，輕蔑、和某種程度的仇視呢？我們把當時三島人對中國的態度，和今日的非律濱人對中國的態度比較一下，真是難免有天壤之別的感覺。我們將要在後面數章中，討論分析到這個問題。

第二章 明朝初期的中菲關係

首先，必須聲明這裏所指的明朝初期，並不是根據明朝的歷史劃分的，而是以菲律賓歷史為根據的。這一章更確切的題目應該是：「西班牙未來菲以前，明朝時代的中菲關係」。

中國經濟中心的南移 自從唐朝末葉以後，中國的北方一直是兵連禍結，戰亂迭起；宋朝又是中國國力最弱的朝代，整個華北在宋朝大部份的時間中，都處於強敵的威脅下；元朝是蒙古族入主中國，建都於燕京，對漢人厲行苛政。由於上面的幾個因素，中國北方在戰爭的威脅和苛政的壓迫之下，常常弄得民不聊生；於是，造成了宋元兩朝的期間中，漢族的大量向南遷移。

這種漢民族的大遷移，把中國先進的農業和手工業技術，由北方傳到南方來。配合了江南的沃野和適宜的氣候，中國南方的經濟在這個時候，發生了飛躍的進步，而且使南方的經濟力量，追上並超越北方的經濟力量。於是，中國南部便開始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

在這個經濟中心轉移的時代中，我們特別注意紡織業（包括絲和棉）和瓷業。因為這兩種輕工業，在中國與南洋的貿易上，佔最重要的地位。

宋朝的瓷業仍舊是以河北定州的定窯為最有名；元朝中國瓷業的中心南移，江西的景德鎮開始興起；

到了明朝，中國的瓷器已經以景德鎮為最著名了。

明朝的織染局設於浙江的杭州、紹興、嚴州、金華、衢州、台州、溫州、寧波、嘉興；江西；福建的福州、泉州；四川；河南；山東的濟南，南直的鎮江、蘇州、松江、徽州、寧國、廣德。由此可見，明朝紡織業比較發達的地方，大部份都在長江以南。

中國南部輕工業的發展，形成了對外尋求市場的壓力，元明兩朝，中國商人對南洋的貿易不斷地增加，雖然時時在朝廷禁令的阻撓之下，貿易仍然大量地進行着。

因此，明朝中國與南洋的關係，是基於中國的經濟需要而發展的。當時中國與南洋之間所進行的貿易，對中國的工業有一種推進的作用，在基本上，幫助了中國社會的發展。

明初的對外政策 為明朝開基建業的明太祖朱元璋，在立國的時候便諄諄其子孫曰：

「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犯，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皇明祖訓）

這種和平的對外政策，在大體上是沒有什麼可以指摘的，和平的態度和政策，並不妨礙中國的對外貿易和文化交流。

但是這種和平的對外政策，有時候伸展得很不合理，而且鑄成很重大的錯誤。明朝為了防止倭寇的入犯，採取消極的防堵，甚至罷廢市舶司。明太祖實錄卷四九記載曰：

「洪武三年（一三七〇）二月甲戌，罷太倉，黃渡市舶司；凡番舶至太倉者，令軍衛有司對籍其數，送赴京師。」

同書卷九三記載曰：

「洪武七年（一三七四）九月辛未，罷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廣東廣州三市舶司。」

到了這個時候，明朝重要的市舶司都已罷廢，人民如果要進行對外貿易，只有非法出境，此外別無辦法。

後來，朱元璋又嚴禁私自出境，皇明世法錄卷七五有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制定的「私出外境及遠禁下海」條。曰：

「凡將馬、牛、軍需、鉄貨、銅錢、段疋、紬絹、絲棉私出外境貨賣，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担馱載之人減一等；……若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因而走泄事情者斬；其拘該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夾帶，或知而放縱者，與犯人同罪。」

「凡沿海去處，下海船隻，除有號票，文引許令出洋外，若姦姦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之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爲嚮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謀叛已行律處斬，仍梟首示衆，全家發邊衛充軍。若止將大船填與下海之人，分取番貨，及雖不曾造有大船，但糾通下海之人榜買番貨，與探聽下海之人，販貨物來，私買販賣蘇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發邊衛充軍，番貨並沒入官。」

由此可見，私自下海進行對外貿易，在明朝的時候，是一項很大的罪狀。同時也可看出輕工業在政治上的毫無力量，因為明朝的這項禁令，實際上是對中國工業的一種打擊。但是中國的工業發展在當時仍舊是一種力量，朝廷這麼嚴酷的禁令，並不能禁絕人民之間的中外貿易。因此明太祖實錄卷二〇五，記載着洪武二十三年（一三九〇）再詔戶部申嚴交通外番之禁，曰：

「中國金銀、銅錢、段疋、兵器、自前代以來，不許出番。今兩廣、浙江、福建愚民無知，往往交通外番，私易貨物，以故嚴禁之。」

同書卷二三一又記載洪武二十七年（一三九四）下令禁民間用番香番貨曰：

「先是，上以海外諸夷多詐，絕其往來，唯琉球、真臘、暹羅許入貢。而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諸番，貿易香貨，因誘蠻夷爲盜。命禮部嚴禁絕之。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見有者限以三月銷燬。民間禱祀，止用於松、栢、楓、桃諸香，違者罰之。其兩廣所產香木，聽土人自用，亦不許越嶺貨賣；蓋慮其雜市番香，故並及之。」

從上面這幾段記載，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明朝一開始，對中國民間的海外貿易事業，便不但不加鼓勵，而且極盡壓抑之能事。不但對「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甚至對「擅造三桅以上遠式大船」的，也要「比照謀叛已行律處斬，仍梟首示衆，全家發邊衛充軍。」

這些措施雖說是要防止倭寇和海賊的，但是無論在什麼地方，每當海上的商業貿易比較發達的時候，海上的商船總是運載着許多貴重的財貨，於是，便有許多海賊在海上橫行。明朝的執政者本來應當擴建海

軍，維持海上交通的安全。但是，相反地，它却採取罷廢市舶司，嚴禁海外貿易的政策，結果使進行海外貿易的商人都要和海賊勾結，助長海賊的猖獗。

朱元璋所訂下的這項政策，直到明成祖朱棣的時候仍舊持續着。據明成祖實錄卷十，成祖在建文四年（一四〇二）六月，入南京即位的時候，於登極詔書中曰：

「沿海軍民人等，近年以來，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國，今後不許，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但是民間的對外貿易仍舊無法禁絕，後來索性在永樂二年（一四〇四）正月下令，把民間的海船全部改造，使不能作遠海航行。

「福建瀕海居民，私載海船，交通外國，因而爲寇。郡縣以聞。遂下令民間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爲平頭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明成祖實錄卷二七）

市舶司在明成祖的時候又復設了，明成祖實錄卷二三記載曰：

「（永樂）元年（一四〇三）八月丁巳，上以海外番國朝貢之使，附帶貨物前來交易者，須有官專主之。遂命吏部依洪武初制，於浙江、福建、廣東，設市舶提舉司，隸布政司。」

不過這個時候的市舶司的職權，已經和宋元時代不同了，據明史卷七五職官誌四的記載，市舶提舉司職：

「掌海外諸番朝貢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僞，禁通蕃，征私貨，平交易，閉其出入而慎館穀之。」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二〇記載曰：

「永樂四年（一四〇六）八月，置懷遠驛於廣州城蜆子步，棚房百二十間，以居蕃人，隸市舶所提舉司。」

中菲大量貿易 明朝的瓷器在菲律賓簡直是遍地皆是，從北呂宋沿着呂宋島南下，越過未獅耶羣島，一直到蘇祿，幾乎每一個地方都有明朝的瓷器出土。只有岷蘭佬本島，還沒有進行過適當規模的發掘工作，所以尙未有大量的明朝瓷器被發現。

在菲律賓濱各地，出土的大量明朝瓷器，證明在明朝初期，中國和菲律賓就存在着頗具規模的貿易關係。當時菲律賓所輸入的中國商品，除了瓷器之外，尙有大量的織物。但是因爲織物不能久藏，無法像瓷器那樣可由泥土中發掘出來。

由出土的明朝瓷器種類的繁多，可以看出當時的中國文化，在菲律賓濱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已經有了相當深度的影響。明朝的政府雖然有着如上述的政策上的錯誤，但是中華民族蓬勃的朝氣，使其民族文化不甘被局限於中國大陸，正在開始傳佈到菲律賓來。

中國文化對菲律賓作比較直接深入的影響，可以說是自明朝初期開始。

菲律賓在明朝初期，是中國工業產品的市場，同時正在吸收着比較先進的中國文化。當然，也應該指出，在同一個時期中，回教文化以更大的銳勢傳入菲律賓。於頗大的地區中，在表面上，取代了印度文化的地位。

由中國典籍考察起來，在目前稱爲菲律賓的這個地區中，呂宋和未彌耶一帶，在明朝的時候，已經建立了一種較有組織性的政治形式，而且開始朝貢中國。

因此，中國和目前稱爲菲律賓的這一地區的關係，可以說是在明朝的時候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一種直接和經常的關係，在這個時期中建立起來。中菲之間的貿易，也是在這個時期開始大量進行的。

南洋的新形勢 回教於十四世紀開始經印度傳入南洋諸島嶼，並且於整個的十四世紀中，在馬來半島及其附近諸島嶼中迅速傳佈。

一三九八年（洪武廿二年），回教的馬六甲王國在馬來半島建立起來，而且在十五世紀的中葉，成爲南洋諸島嶼中最重要的強國。過去三佛齊和滿者伯夷的地位，開始爲馬六甲王國所取代。

當馬六甲王國興起的時候，南洋羣島較重要的佛教（及婆羅門）古國，都正在衰退之中。三佛齊和滿者伯夷消滅了，中南半島上的強國暹羅也正在日漸衰弱中。不過，必須指出，這些國家的消滅和衰弱，並不是因爲它們被馬六甲王國所擊敗，而是由於其他的原因所造成的。這些佛教國家的衰弱，促成了馬六甲王國的興起，同時也使回教文化，在許多方面取代了印度文化原有的地位；在表面的宗教信仰上，回教完全打垮了佛教和婆羅門教。

由於南洋諸島嶼的中心轉移到與亞洲大陸接壤的馬來半島；由於中南半島上佛教強國暹羅的衰弱；由於中國文化在中南半島上一向佔重要的地位，以及中南半島和中國的長期歷史關係；由於上面所述及的中國經濟力量的南移，及因此而產生的中國與南洋貿易的經濟壓力；以及其他種種的因素，使得中國與南洋

諸島嶼的關係，在明朝初期，比過去任何時期都來得密切。

這是歷史上，中國文化對南洋諸島嶼作較直接深入影響的開始；以菲律賓來說，中國輕工業所生產的日常用品的大量輸入，開始改變了菲律賓人民的日常生活習慣。

如果說回教文化在十四世紀的時候開始大量傳入南洋諸島嶼，而在十五世紀的時候確立它的地位；中國文化在十五世紀的南洋諸島嶼中可以說正是方興未艾。

以南洋諸島嶼的立場說，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代，一方面是回教文化的傳入，與原來的印度文化發生大交流，豐富了南洋諸島嶼人民的文化生活的內容，並且建立了一個全新的宗教觀念。另一方面是中國文化開始較具規模地傳入，雖然中國一向來便是南洋諸島嶼對外貿易的最重要的國家，在西方國家尚未入侵之前，除了中國以外，南洋諸島嶼從來也未曾與任何國家建立具有重要性的貿易關係；但是却從來也沒有像這個時期那樣直接和密切過。

因此，在明朝初期，我們實在已經可以預見，中國、回教和印度、亞洲的這三大文化，即將在南洋諸島嶼中發生大交流。

這是當時南洋諸島嶼的一般形勢，當然菲律賓這個地區也包括在南洋諸島嶼之中。一向來是比較落後的菲律賓地區，到了這個時候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由福建泉州而來的商船，頻繁地直接與這個地區進行貿易。

鄭和七下西洋 明成祖朱棣時代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不但是中國對外交通史上的大事，而且是世

界文化史上的大事。

朱棣雖然開了明朝重用閹宦的惡例，但是在明朝的皇帝當中，他總算是較有才略的一個人，他也是在中國歷朝的皇帝中，對海外較有雄圖的一個人。

明史卷三〇四鄭和傳雖然記載曰：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蹤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永樂三年（一四〇五）六月，命和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

我認爲明史中所說的，成祖因惠帝亡命海外，便派鄭和到海外去查探一下，完全是一種臆測之旨，不大足信。

其實朱棣在永樂元年（一四〇三），便已派遣了許多使節到外國去，「內官監李興，使暹羅；馬彬使爪哇、蘇門答臘諸國；尹慶使滿刺加柯枝諸國；還有其他中官銜命異域，紛紛四出。」（明紀）可見朱棣一即位，便立刻注意到南洋諸國。

況且，鄭和在永樂三年第一次出洋的時候，便率大舶六十二，將士卒二萬七千餘，越三年始還，已經足以查探惠帝是否亡命海外。爲了一個區區的惠帝，實在沒有派鄭和七下西洋的必要。

因此，朱棣派鄭和出洋主要的用意，還是在於耀兵異域，使外國歸附入朝。

鄭和本身是個太監，雲南昆陽州人。祖先是阿剌伯人，元初的時候移居雲南，到了永樂時才賜姓鄭。曾祖名拜顏，祖父是個Haji，Haji是一種較有地位的回教徒的尊稱。

所以，鄭和是另一位在中國對外交通史上爲中華民族立功的，祖籍阿刺伯的中國人。

中外學者研究鄭和下西洋的歷史的著作，很少看到鄭和確曾到過目前稱爲菲律賓的這個地區的明證。隨同鄭和出洋的人也寫出幾本書，馮承鈞在中國南洋交通史裏面寫道：

「（鄭和）隨使者有會稽人馬歡，太倉人費信，應天人鞏珍。茲三人者，爲誌其事，各撰一書；鞏珍西洋番國誌已佚而不傳，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尙存。參與明實錄，明史紀傳，茅元儀武備誌載下西洋地圖。」

其中我讀過費信的星槎勝覽，雖然也記載三島、麻逸、蘇祿這些地方，可惜抄襲島夷誌略的地方太多，如三島條簡直是全文照抄，完全不足以爲鄭和曾經到過這些地方的證據。

爲了公道起見，我必須指出，費信雖然確有其人，星槎勝覽的作者却實在無法確定，其爲費信所作，只不過是後人的假設，並沒有辦法證明。

但是H. Otley Beyer博士却認爲鄭和曾經在一四〇五——一四〇六（永樂三——四年），一四〇八——一四〇九（永樂六——七年），一四一七（永樂十五年）到過凌牙、榔灣、峴里拉灣、峴都洛和蘇祿這些地方。

爲了這個問題，我曾經尋查許多中國的典籍，仍舊無法找出確證，現在只好姑誌存疑。

蘇祿的歷史上，有一位華僑名人叫白本頭，也有人說他是隨鄭和到蘇祿的，但是一直到現在，却還不能找出什麼令人信服的證據。關於白本頭的事，我在下面還會提到。

明初的呂宋和末獅耶 呂宋這個名稱在明朝的時候，開始出現於中國的典籍中。有些學者（如

Austin Craig) 認為呂宋這個名稱是源自中國的，雖然直到現在還沒有充份的證據可以證明這種說法，不過這個主張也不是全然沒有根據的。西班牙統治菲律賓的初期檔案和文獻中，提及呂宋的時候，每每可以發現「中國人稱其為呂宋」的字眼。

呂宋在明朝初期，已經形成了一個較有組織性的政治單位，並開始朝貢中國。明史卷三二三呂宋傳記載曰：

「呂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洪武五年正月，遣使借瑣里詣國來貢。永樂三年十月遣官齎詔撫諭其國。八年與馮嘉施蘭入貢。自後久不至。」

一般學者都認為洪武五年（一三七二），是呂宋第一次遣使朝貢中國的年份，明紀卷三太祖紀洪武五年亦記載：曰

「呂宋、瑣里諸國來貢。帝謂中書省臣曰：西洋諸國，素稱遠番，涉海而來，難計歲月，無論疏數，厚往而薄來可也。」

不過明初的呂宋並不包括今日的全呂宋島，當時的呂宋大概是局限於今日的馬尼刺及其四圍。

當時呂宋島上的另一小國馮嘉施蘭 (Pangasinan) 亦向明室朝貢，明史同前卷馮嘉施蘭傳載曰：

「馮嘉施蘭亦東洋小國，永樂四年八月，其酋嘉馬銀等來朝貢方物，賜鈔幣有差。六年四月，其酋玳瑁、里欲二人，各率其屬朝貢，賜二人鈔各百錠，文綺六表裏，其從者亦有賜。八年復來貢。」

不過明初的馮嘉施蘭的範圍，也和今日的蚌牙絲蘭省不同，據 Austin Craig 的意見，它當時包括凌

牙鄰灣以西及以北的地區，在更早的時候，它甚至包括更北的地區。

由明史上的記載，可列出呂宋和馮嘉施蘭入朝的年表如下：

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呂宋偕瑣里入朝。

永樂四年（一四〇六）馮嘉施蘭入朝。

永樂六年（一四〇八）馮嘉施蘭入朝。

永樂八年（一四一〇）呂宋與馮嘉施蘭入朝。

明史呂宋傳中所載的「永樂三年十月遣官齎詔撫其國」，沒有言明這位中國官員的姓名。H. Otley Beyer博士在Arsenio Manuel所著Chinese Element in the Tagalog Language一書之序言中說：

「一四〇五年，一位名叫Ko-ch'a-lao的中國總督被委派到呂宋島——某種程度的政治和商業控制，似乎至少在一個短期間中存在着。」

但是Austin Craig在他的「西班牙人到來以前菲律賓一千年的歷史」一文中却說：

「一四一〇，除了馮嘉施蘭的使節之外，還有另一個由Ko-Ch'a-lao所率領的呂宋使節，帶着他的國家的產物，其中以金為最特出。後一個使節之到來，是因為在一四〇五年，永樂帝曾派遣一位高級的中國官員，到呂宋去治理該國。這是與中華帝國有政治結合的絕對標誌。」

這位Ko-ch'a-lao究為何人，在中國典籍仍舊未能被查考出來。

李長傳所著的中國殖民史中，提及張謙曾於永樂十五年（一四一七）九月出使古麻剌郎國，李長傳認

爲古麻刺郎國位於菲律賓羣島的範圍內，但是却没有列舉什麼證據。不過張謙無論從讀音或年份看來，都不會與 *Koch'ala* 有關。

明紀卷十成祖紀三，記載永樂十八年（一四二〇）：

「古麻刺郎國王幹刺義亦奔教、帥妻子陪臣來朝。」

除此以外，明史中還記載着另外一個地方叫做合貓里，明史卷三二三，合貓里傳記載曰：

「合貓里，海中小國也。土瘠多山，山外大海饒魚蟲，人知耕稼。永樂三年九月，遣使附爪哇使臣朝貢。其國又名貓里務，近呂宋，商船往來漸成富壤，華人入其國，不敢欺凌。市法最平，故華人之語曰：若要富，往貓里務。有網巾礁老者，最兇悍，海上行劫，舟若颶風遇之無免者。然特惡商舶不至其地，偶有至者，待之甚善。貓里務後遭寇掠，人多死傷，地亦貧困，商人慮爲礁老所劫，鮮有赴者。」

合貓里既爲近呂宋的海中小國，其屬於今日菲律賓的範圍內，是不成疑問的。有人認爲合貓里就是今日的馬仁愈計（*Marinduque*），但却沒有確證。不過，它如果不是呂宋邊緣附近的小島，便是未獅耶羣島中的島嶼之一。

上面列舉諸國之中，呂宋和馮嘉施蘭位於今日的呂宋島上是確然無疑的；合貓里在今日菲律賓的範圍內，非屬呂宋即屬未獅耶，也是可以斷言的；古麻刺郎是否屬於今日菲律賓的範圍內，則尚須考證。

雖然在明朝初期，中國與南洋諸島嶼的關係比以前密切得多了，但是一向對海外採取消極政策的朱元

璋，並不鼓勵外國來中國朝貢。洪武七年朱元璋諭中書及禮部臣曰：

「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九州之外，則每世一朝，所貢方物，表誠敬而已。高麗稍近中國，頗有文物禮樂，與他番異，是以命依三年一聘之禮。彼若欲每世一見，亦從其意。其他遠國如占城、安南、西洋瑣里、爪哇、渤泥、三佛齊、暹羅，真臘諸國，入貢既頻，勞費太甚。今不必復爾，其移牒諸國俾知之。」

如果依照朱元璋的意思，這些外國只要一世一朝，就已經够了。高麗雖然有特殊情況可以三年一朝，但是最好還是一世一朝。

幸而，朱元璋的這種態度，到了朱棣的時候，總算改變了，朱棣是一個比較喜歡外國來朝的皇帝。

移民的開始

在西班牙人尚未東來以前，中國人（特別是福建人）就已經開始移居菲律賓，有些

且在菲律賓長期居留。明史卷三二三，呂宋傳記載曰：

「先是閩人以其地近且饒富，商販至數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佛郎機既奪其國，其王遣一酋來鎮，慮華人爲變，多逐之歸，留者悉被其侵辱。」

可見呂宋未被西班牙人佔領之前，中國人即已大量移居呂宋。明朝初期實在是中國向菲律賓作較具規模之移民的開始。

明朝是中國歷代以來，皇帝最專制，刑法最嚴峻，剝削最苛酷的王朝。

上面已經指出過，在明朝初期，人民私自下海進行對外貿易，是一項很大的罪狀。因此當時可能有許

多私下進行海外貿易的商販，事洩而爲官廳所通緝，於是他們只有俯聽海賊，或是亡命海外。

這些冒死進行對外貿易的商人，一般講來，都是時勢所迫的。本來，在中國經商已經是下賤而不名譽的了，出海經商，則尚有暴風海浪之險，除此之外，還要冒犯一條足以使他「處斬」、「梟首示衆」、「全家發邊衛充軍」的王法。在冒那麼大的危險之下，在傳統的社會道德觀念的輕蔑之下，試問，除非萬不得已，有什麼人願意下海進行對外貿易呢？

泉州府誌記載曰：

「泉土瘠民貧；一二素封之家，類皆口約腹盈，自營什一之利。外此或經商於吳、粵、或泛航於外國。」

明朝封建剝削之苛酷，田賦之重，是歷朝所僅見的，不但是「土瘠民貧」泉州的人民無以爲生，即使在全國最富庶的區域，農民也貧兒鬻女尙不足以完稅。顧炎武在日知錄卷十「蘇松二府田賦之重」一文寫道：

「松江一府……洪武以來，一府稅糧共一百二十餘萬石。租既太重，民不能堪。於是皇上憐民重困，屢降德音；將天下係官田地糧額遞減三分之二外，松江一府稅糧尙不下一百二十萬九千餘石。愚歷觀往古自有田稅以來，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農夫鬻婦凍而織，餒而耕，供稅不足，則賣兒鬻女；又不足，然後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蕪，錢糧年年拖欠。……」

「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爲人佃作者什九。其畝甚窄，而凡溝渠道路，皆并其稅於田之中。歲僅

秋禾一熟。一畝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過一石有餘。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歲之力，糞壅工作，一畝之費可一緡，而收成之日，所得不過數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者。」

在這種情況之下，農民已經是不堪言了，明廷又派遣了許多稅監到處橫行。除了田賦之外，明朝的稅則又極繁細，加上稅監任意荼毒人民；明初的時候，明朝的皇室尚可挾兵威加以統治。但是在這樣慘酷的壓迫下，無以為生的福建沿海的居民，便冒死進行對外貿易。

在苛政猛於虎的現實形勢下，有許多中國沿海的人民，便被迫移居到南洋諸島嶼中來。因此，當時移居到南洋諸島嶼來的中國沿海的居民，在某種程度上，是帶着被迫害之下求生存性質的。

這裏可以順便提及在閩南一帶盛行的養子的風俗，何喬遠的閩書曾引其他的典籍記載曰：

「福建通志載：「閩人多養子。即有子者亦必抱養數子，長則令其販洋。賺錢則多置妻妾以羅之。與親子無異。」又漳州龍溪縣誌風俗略載：「生女有不舉者，間或假他人子爲子，不以竄宗爲嫌。其在商賈之家，則使之挾貨四方，往來冒霜露，或出沒巨浸與風濤，爭頃刻之生，而已子安享其利焉。」」

由此可見，閩南養子風俗的盛行，實在是因海外貿易而起的。最初的動機是要抱養之子在海外拚生死，讓自己的親骨肉在家中享受。

明初的蘇祿 有一部菲律賓濱政府所編纂的蘇祿史這樣寫道：

「第一位抵達蘇祿的回教傳教士是 Makdum，他是一位來自麥加的阿刺伯傳教士。Makdum 是一位有名的學者和士師，在十四世紀的中葉抵馬六甲……不滿足於他在馬六甲的成功，他向東行駛，並於一三八〇年在蘇祿着陸。他到蘇祿羣島的一些島嶼，並使 Bwanza, Tapul 和 Simunul 的許多居民改奉回教。他在一個叫做 Tubig Indangan 的小島上，建立一所回教寺院，這所寺院直到現在還保存着。據說在他的全旅程中，都有一個中國人和他在一起，但是當他們終於抵達 Tapul 的時候，他便不許這位同伴繼續跟着他。該島上的許多居民，相信是這位中國人的後代，他們還能指出埋葬着「Tapul 人之父」的墳墓。」（國家圖書館原稿本，二三—二四頁）

這是有籍可稽的，第一位抵達蘇祿的中國人，在蘇祿羣島的浪花珠光中，他使中華民族的血液，和蘇祿人民相融和。

明史卷三二五蘇祿傳記載曰：

「蘇洛地近渤泥，閩婆（今爪哇），洪武初發兵侵渤泥，大獲，以閩婆援兵至，乃還。永樂十五年（一四一七）其國東王吧都葛叭哈刺、西王麻哈刺叱葛刺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叭哈刺，並率其家屬頭目凡三百四十餘人浮海朝貢，金縷表文，獻珍珠、寶石、玳瑁諸物。禮之若滿刺加（Malacca），尋並封爲國王，賜印誥襲衣冠帶及鞍馬儀仗器物，其從者亦賜冠帶有差。居二十七日，三王辭歸。各賜玉帶一，黃金百，白金二千，羅錦文綺二百，帛三百，紗萬錠，錢二千緡，金縷蟒龍獸麟衣各一。東王次德州，卒於館，帝遣官賜祭，命有司營葬，勒碑墓道，謚曰恭定。留妻妾僕從十人守墓，俟畢

三年喪遺歸。乃遣使齎敕諭其長子都馬舍曰：「爾父知尊中國，躬率家屬陪臣遠涉海道萬里來朝。朕眷其誠悃，已錫王封，優加賜賚，遣官護歸，舟次德州，遭疾殞歿。朕聞之深為哀悼，已葬祭如禮。爾以嫡長為國人所屬，宜即繼承，用綏藩服，今特封爾為蘇祿國東王，爾尙益篤忠貞，敬承天道，以副眷懷，以繼爾父之志，欽哉。」十八年（一四二〇）西王遣使入貢。十九年（一四二一）東王母遣王叔叭都蘇里來朝，貢大珠一，其重七兩有奇。二十一年（一四二三）東王妃還國，厚賜遣之。明年（一四二四）入貢，自後不復至。萬曆時佛朗機屢攻之，城據山險，迄不能下。其國於古無可考，地瘠，寡粟麥，民率食魚蝦。煮海為鹽，釀蔗為酒，織竹為布。氣候常熱。有珠池，夜望之，光浮水面。土人以珠與華人市易，大者利數十倍。商舶將返，輒留數人為質，冀其再來。其旁近國名高藥，出玳瑁。」

星槎勝覽蘇祿國條記載曰：

「永樂十六年，其酋長感慕聖恩，乃挈妻攜子涉海來朝，進獻巨珠一顆，重七兩五錢，罕古莫能有也。皇上大悅，加勞厚賜金印冠帶歸國。地產真珠、降香、黃蠟、玳瑁、竹布、貨用金銀、八都刺布、青珠、磁器、鉄銃之屬。」

由明史的記載，可以看出，蘇祿在當時就已經與中國存在長期密切的關係。蘇祿王第一次入朝，便率領了三百餘人，明朝也「禮之若滿刺加」。滿刺加就是馬六甲，當時是正在興起中的，南洋諸島嶼中最重要的國家，可見在目前稱為菲律賓的這個地區中，明朝對蘇祿特別禮待。

死於中國土地上的蘇祿東王吧都葛叭哈刺，Jan C. Harunah 在 *Eastern Asia: A History* 一書中曾經述及，他說在山東省德州的北郊，一所小回教寺院的旁邊，還可以找到在一四一七年入朝，死於中國的蘇祿蘇丹的墳墓。

關於蘇祿蘇丹的中國血統問題，李長傳在其中國殖民史（九六一—九七頁）一書中寫道：

「但據蘇祿王室家譜所載，黃昇平初至文萊，率中國人甚多，蓋受元帝命求山伯神龍之寶，此山後名支那巴魯山。龍猛茁，食人無數。黃昇平乃設計以燭易寶石。歸途中同伴王剛（Wang Kong 譯音）爭奪寶石。黃昇平乃回文萊。黃有女嫁文萊蘇丹阿克曼德（Akmed），時在一三七五年（洪武八年）。凡二十餘傳，以迄於今。其王系由女系遞嬗。阿克曼德之公主，嫁夏律阿麗（Arab Sherip）後繼王位，即今文萊王家之始祖也。」（*Sir Hugh Low's Book of Descent;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 5*）

同時又說：

「據溫雄飛君之說，二十年前有其鄉人（廣東人）黃卓如君至婆羅泥（即文萊）貿易，擬承辦該處各種鉅大實業，故婆羅泥蘇丹極優待之。未幾值該蘇丹祭墓之期，蘇丹仍約黃君參觀祭墓典禮，並作郊遊。及期，蘇丹所御之服，半作中國式。盃而雉尾，略如舊式戲劇。乃隨之至郊外約一里許，上山巔，有一古墓，樸實無華，中置碑碣，中隱隱若有中國字，爲其已漫漶不可讀。黃君好奇心切，乃取草紙捫而拓之，得五大字曰「黃總兵之墓」，其旁並無年月日及其他題碑署名等小字。據溫雄飛君

之說，爲黃昇平之墓無疑。其稱爲總兵，或受命於朝而來者，則總兵乃其原銜，如實爲海盜，則比擬其所挾勢力之大小，僭竊此號自娛也。」（溫雄飛著：南洋華僑通史六四——六七頁）。

羅香林所著中國通史關於這件事也寫道：

「據婆羅洲蘇祿王室世系，黃森屏女嫁蘇祿蘇丹阿哈密爲妾，生一女，贅一阿刺伯人爲婿，是爲蘇丹布克。時當在明洪武八年。」

先前，北婆羅洲是蘇祿蘇丹的領域。不管這位「黃總兵」的身世如何，不管他到底是名叫黃昇平或黃森屏，他是蘇祿蘇丹的國戚，從這些記載看來，是沒有疑問的。

白本頭 白本頭是蘇祿歷史上的華僑名人，一九二六年蘇祿華僑隱善君曾投稿刊於華僑商報（十一月二十日），記述白本頭的事略，今節略其大意：

白本頭世居河南新鄭，生於明朝永樂間（一四〇三）。鄭和率旨駕航下南洋時，本頭自投鄭和麾下。舟傍蘇祿島時，躬入深山幽谷，爲瘴癘所侵，踉蹌步返，將及泊舟處，倏然仙逝，遂葬於蘇祿。

據說本頭屢顯靈異，陔庇僑民。

一八〇〇年，乾隆五十六年辛亥正月，僑商柯祉、蔡添二君，爲之建墓碑，相傳陰曆仲冬十八日，爲公成神之辰，每屆是日，華僑皆休息紀念。

民國六年，蘇洛中華總商會會長陳尼姑，重修墳塋，並開闢馬路通達。

但是同日之華僑商報，又載有隱善君所撰白本頭小傳，全文如下：

「蘇洛巴籠山之麓，有一古石城，城旁有清泉，中著鱷魚一，長約丈，池旁草卉叢茂，人跡鮮至。有小道盤繞可達城寨，城中弓、矢、刀、槍木牌、古磁器、橫陳地上，其旁矗立大理石碑大小數十，皆刻墨書漢字，言明成祖九年（一四一二）秋末，白本頭及從者二十三人乘帆船出洋，路繞爪哇，遇颶風，舟中絕糧，四日後到此。築石城以居，凡十三年。與毛洛人三十餘戰，居七年，從者傷亡殆盡。毛洛酋長突而阿耳與公握手，言歸于好。公居洛十三年而沒，公爲華人最先來洛者，每年十二月廿二日，蘇洛僑民舉行紀念會。」

這兩段記載，前後矛盾出入的地方太多，其中絕大部份是杜撰之詞。例如白本頭生於一四〇三年，到一四一二年才只有九歲，如何率二十三人出洋；既遇颶風絕糧，又如何與毛洛人三十餘戰，況且，這個時候的蘇祿並不是蠻荒之域，而是已在向中國朝貢的王國；至於毛洛酋長與白本頭握手，則更是荒唐，因爲西班牙未來之前，東方人不會有握手的禮節。但這是兩則記述白本頭事略的僅有的文字，所以現在姑且錄下，希望蘇祿的華僑會就地探考。

菲律賓政府所編纂的蘇祿史中，也有關於白本頭的記載。謂本頭公（音）生於一四〇三年，爲中國鳩收買物的官吏（Tribute Collector），死於賀洛附近。他的墳墓今日尙存。

但是中國在歷史上只有外國入朝，不會派官吏到外國去鳩收買物。然而，白本頭確有其人是可以斷定的，可惜他的生平已經失傳了。關於本頭屢顯靈異的傳說，最好有人能够將他彙集成編，也好爲菲律賓保存一些民間故事。

第三章 中國和西班牙在菲的最初接觸

十六世紀的中葉，菲律賓的社會因着西班牙的入侵，發生了本質上極大的變化。歐洲人發現了由大西洋西航，繞過美洲，經太平洋到亞洲來的新航路。南洋諸島嶼在歷史上第一次，受到有高度組織性的國家的侵略和統治。

菲律賓這一個政治區域，在西班牙的佔領和統治之下，開始被劃分出來。

在實際上，這是菲律賓這個地區的社會發展，有史以來第一次，為外來有組織的政治壓力所影響。雖然在過去，目前稱為菲律賓的這個地區，有些小國會經向中國朝貢；入朝中國固然多少帶着對中國表示敬重的意義，但是其主要的目的還是商品的貿易和交換。中國政府從來未曾在菲律賓的任何地區，建立過明確的統治權。

歐洲人經美洲越太平洋東來的新航路的發現，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對十六世紀以後的世界形勢和國際關係，起極深長的作用。

中國和菲律賓的關係，及菲律賓華僑的地位，在這個時候，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

在中菲關係上最明顯的變化，便是中國和菲律賓這個地區的和平文化交流，在這個時候，被西班牙侵

略者的政治壓力所打斷了。我在前一章中所提到的，可能即將發生的印度、回教和中國文化的大交流，因為外來的因素而中止了。菲律賓人民被迫接受強加在他們身上的異族文化。

我們必須認清，從這個時候起，菲律賓政治當局一切的對華政策，都是壓迫菲律賓人民的西方侵略者所制訂的。菲律賓人民的思想觀念，也受到了殖民地文化不同程度的影響。

由於歐洲各國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及其各國不同的文化特性，予它們各別的殖民地以特殊的影響，使我們在探討這個時期以後的中菲關係，不能不注意到菲律賓當時的宗主國，西班牙本國的社會發展及其民族特性。因為這是在菲律賓所施行的一切政策的根源。

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中國各時期的社會狀況，因為這是中國對外政策的憑藉。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瞭解中菲關係發展的歷史背景，才有可能分析菲律賓華僑的地位的社會和歷史的根源。不然，我們對中菲關係的歷史，就很難有明確深刻的理解。

歐洲和西班牙 歐洲在十四世紀的末期，由對外貿易最繁榮的意大利，開始發生了一件對歐洲的思想觀念起極重大深長作用的大事件，那便是文藝復興。歐洲人開始由傳統狹窄的宗教觀念的束縛下釋放出來，雖然大部份的文藝復興大師，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他們却使宗教人性化起來。他們企圖美化了人類的生活。

文藝復興由意大利開始，激盪了整個的西歐，在意識形態的各部門，包括文學、繪畫、音樂、建築以及哲學和神學等部門，發生了極長遠的影響。

文藝復興時代歐洲的政治制度，固然依舊保持原狀，但是在歐洲人的思想觀念上，却開始發生了基本上的變化。人性的尊嚴被高舉了，人生的意義被重視了，任何人都胆敢把他的見解當衆講述，有學問的人隨處衆講學，聽衆一多便自成學院，這便是今日歷史悠久的歐洲著名大學的起源。

在某種程度上，意識形態的發展越過了經濟基礎的發展而領先了，歐洲人民開始奠下了迎接民主政治的思想準備。

全歐洲瀰漫着一種蓬勃的朝氣，歐洲人開始步入他們有史以來最樂觀和最富自信的時代。歐洲開始發展成爲全世界最重要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中心。

我認爲對這一點的理解是很重要的，因爲當歐洲人開始向亞洲大陸的邊緣進行侵略的時候，在經濟發展上並沒有比中國先進，但是在思想上的雄心和氣魄，却完全凌駕在中國的上頭。

中國對西班牙的侵略菲律賓濱，表現出不但其無動於中，簡直可以說是麻木不仁。

歐洲的生產關係在當時，基本上仍舊是封建的生產關係，但是這種生產關係已經在開始發生變化，雖然不能說是本質上的變化。最顯著的變化，是封建莊主與農奴的關係，變爲地主與佃農的關係。

輕工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已經使各種工商業的行會（基爾特），成爲歐洲各國的政治力量，雖然並不是一股很強大的力量。農村中的佃農總比農奴自由得多，有的便到城市中去出賣他們的勞動力。自由的勞動力是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不可或缺的。

因此，歐洲的資本主義在當時正在萌芽。歐洲和亞洲的貿易，當時主要地是經過地中海由君士坦丁和

亞歷山大轉口的。意大利半島上地中海的港口，佔得地理上的便宜，威尼斯和熱那亞成爲歐洲最繁榮的商業中心。

但是當西歐正在興起的時候，東歐的顯赫一時的拜占庭王朝却沒落了，勃興中的回教王國奧吐曼（Osoman）在這個地區中佔絕對優勢。拜占庭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君士坦丁堡，在一四五三年（景泰四年）被回教勢力所攻陷。全埃及也進入回教勢力的掌握中。

於是，歐洲和亞洲（指印度和中國）的貿易航路中間，隔着一堵回教的牆壁，而當時的回教勢力和西歐仍舊是處於互相敵視的情況中。地中海岸邊的歐洲商港衰退了，歐洲的工商業界開始尋覓到印度和中國來的新航路。

位於大西洋岸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在這拓殖新航路的過程中，起特別重要的作用。

一四九二年（弘治五年）哥倫布由歐洲的大西洋岸向西航行，抵達今日的美洲，爲當時的西班牙王國，帶來擴拓一片前途無量的大陸的可能遠景。

在另一方面，葡萄牙人循非洲沿岸，繞過好望角捷足先登，由海道抵達印度。

這是麥哲倫即將東來，菲律賓即將爲西班牙所佔領的前夜。我們必須對這個時期西班牙的社會情況稍加探討，使我們能有一個大略的概念。

與西歐其他的部份一樣，在十五世紀的末葉，西班牙社會經濟的基本形態固然仍舊是封建的生產關係，但是這種封建的生產關係的形式，主要地是地主與佃農的關係，而不是封建莊主與農奴的關係。

城市中的工商業行會，開始成爲一股有組織的力量，他們常常與中小地主或封建莊主配合，與大地主大封建莊主對抗。當然，在這個封建地主階級內部的政治鬥爭中，工商業行會在當時所起的，是配合的輔助的作用。這股歐洲史上通常稱爲「中間階級」的行會組織，雖然開始成爲一股政治力量，但仍舊是從屬的、次要的。

但是，在地主階級內部的政治鬥爭中，工商業行會常常因爲中小地主的法律地位的提高，也使行會組織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某種程度的認可。

不過，西班牙和其他的西歐國家比較起來，在歷史文化上有一個特點，便是它曾經處於回教勢力的長期統治下。一直到公元十一世紀，基督教的勢力，才開始在西班牙，將回教的勢力逐出。

基督教徒和回教徒在伊比里亞（Iberia）半島上的戰爭，一直繼續到十五世紀。

一四七九年（成化十五年）由於伊比里亞半島上兩個重要的基督教王國，Castile 和 Aragon 的合併，奠定了今日西班牙大一統的局面，統一的西班牙王國，一般地說，是從一四七九年開始。

西班牙王國的基督教軍隊，在一四九二年正月（與哥倫布抵達美洲同年），攻陷回教徒在伊比里亞半島上的最後一個堡壘 Granada。到了這個時候，整個的伊比里亞半島，完全處於基督教的統治之下。

當然，必須指出我們在這裏所講的基督教，乃是隸屬羅馬教皇的，現在通稱爲天主教的舊教。況且，當時宗教革命還沒有發生，基督教還沒有新舊教之分。

在基督教的統治下，一切非基督教的信徒，當然都被視爲異教份子。在西班牙，主要的異教份子是回

教徒和猶太人。

其中，回教徒大部份是佃農，有小部份較上層的是地主。猶太人則大部份是工商界的份子，其中的上層份子是大商賈和大金融家；他們靠着血統種族的關係，在全歐洲形成一個很強有力的商業和金融的集團。

因此，西班牙政府對異教徒的迫害，是有着程度上的差別的。佃農在地主的壓迫下，不能有很大的作為，而且地主需要佃農耕作生產，沒有了佃農，地主的土地便要荒蕪，所以回教徒常常得到較寬大的待遇。猶太人則因為須在產業上與西班牙廣大的人民作日常的接觸，加上一些上層的猶太富豪的作威作福，他們常依靠他們在經濟上的實力，賄賂西班牙政府的官員。這種情況，很容易在西班牙人民之間，滋長一種對猶太人的仇恨，因此每當宗教狂熱着，或西班牙人的上層份子，遇到適當的機會加以煽動，猶太人便受到慘不可言的迫害和屠殺。

作為佃農的回教徒，是比較容易皈依基督教的，尤其是在地主的壓力之下，不大可能在文化上作什麼反抗。

猶太人就不同了，他們常常堅持他們的宗教信仰，甚至在被迫皈依基督教之後，有些人仍舊在內心上保持着猶太教的信仰。

其實，猶太人在西班牙，並不是僑居者，他們到那個時候，已經在西班牙居住了千年以上了，其中一部份，還是在 Visigoth 人尚未移入之前就在西班牙定居的。他們以西班牙語言為他們日常生活的語言，他們的生活習慣大都與西班牙人無異，他們與西班牙人通婚，他們和基督教的西班牙人最大的分別，只是

在宗教信仰上的。而在實際上，他們的受到迫害和屠殺，主要地是由於他們在社會經濟上的地位。皈依基督教的猶太人，仍舊被視為第二等的基督徒，他們被稱為 *Marranos*（豬）。

對猶太人的迫害，到了十四世紀的末葉，發展成爲大規模的屠殺。在開始的時候，皈依基督教的猶太人，沒有被波及。但是到十五世紀的中葉，連被稱爲「豬」的基督教猶太人，也無法倖免被屠殺的命運。

隨着大一統的局面在西班牙的建立，由於西班牙王國在一四九二年正月，摧毀了回教勢力的最後一個統治據點。基督教的西班牙國王在一四九二年三月下令，全西班牙境內的猶太人必須在四個月內，選擇皈依基督教，或維持他們原來的猶太教信仰。決定維持猶太教信仰者，必須在四個月內變賣全部的財產，離開西班牙國境。在離境的時候，不准攜帶金、銀、錢幣，只有法律上可以出口的物品，被容許攜帶出國。這條法令，在實質上，是對猶太人的財產的明目張胆的搶劫。更殘忍是當猶太人集體離境的時候，西班牙人被禁止對他們作任何幫助，或作任何同情的表示，連在途中送一杯水給猶太人解渴的西班牙人都是犯法的。

這次被迫離境的猶太人的數目，不同的歷史家的估計有很大的差別，最高的估計爲二百萬人，最低的估計也有十餘萬人。

留在西班牙皈依基督教的猶太人，並不能過安靜的生活，他們繼續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迫害。

宗教裁判所於十五世紀的末葉開始在西班牙活動，它的苛酷殘忍，使西班牙成爲當時的西歐宗教迫害最狂熱的國家。

本來，當Granada投降的時候，西班牙國王所接受的投降條件之一：是不得強迫回教徒皈依基督教。但是西班牙王在一五〇二年下令，回教徒必須皈依基督教或離境。

於是西班牙境內充滿了新版依基督教的異教徒，這些異教徒的虔誠程度，在教廷看來，是很成疑問的。西班牙境內的宗教裁判所便加緊活動，偵緝各種各樣的異端邪說。

宗教法庭的審判是很殘酷，屈打成招是家常便飯，被告者不知道原告者是誰，被告一經拘捕，便要等到被判刑或釋放之後，才能重與家人見面。

這是西方文化（即所謂基督教文化）在西班牙肅清非基督教文化的殘酷手段，它企圖把一切非西方的思想都連根拔掉。

但是西班牙這種迫害異教徒的殘忍行爲，却在西班牙人民的性格上產生深長的影響，使西班牙的歷史，永遠帶着罪惡的烙印。當西班牙向外擴展殖民地的時候，它所表現的宗教熱忱，大大地超越了任何其他西方國家。它對殖民地國家的文物的摧殘，常常是很徹底的。他們在潛意識中，一直對非基督教的其他文化，存在着自卑的畏懼。

直到今日，非天主教徒在西班牙仍舊受到迫害。

對西班牙國內的這些問題的瞭解是很重要的，不然，便很難理解菲律賓的社會文化，爲什麼會與南洋的其他殖民地國家，有那麼巨大的差別。

十六世紀的西班牙，是西歐最強有力的國家，可以說是在西歐雄踞着無可與匹的地位。這個時候，整

個美洲大陸都成爲西班牙的囊中物，最初完成環繞地球一周的壯舉的，便是西班牙的船艦。

麥哲倫在一五一九年（正德十四年）八月十日由西班牙出發，在一五二一年（正德十六年）三月抵達菲律賓。麥哲倫在菲律賓濱人民反抗侵略的戰爭中，被殺於麥丹島上。

西班牙隨後又繼續派遣不少的船艦越太平洋東來。

黎牙實備在西班牙國王腓立二世的派遣下，率領西班牙艦隊實行侵略菲律賓，於一五六五年（嘉靖四十四年）四月廿七日抵達宿務，正式在菲律賓建立西班牙的統治。

西班牙佔領菲律賓的時候，正當它在其歷史的巔峯的狀態中，不過這個巔峯狀態並沒有能够長期維持。西班牙人在美洲所掠奪的財富，並沒有成爲西班牙工業的原始資本累積，却被封建王朝浪費在歐洲的戰爭中。

因此，當時菲律賓所面對的西班牙侵略者，在經濟上資本主義雖然在萌芽孕育，基礎却依舊建立在封建的生產關係上；在文化上一方面受到瀾漫全西歐的文藝復興的氣氛影響，帶着對西方文化的樂觀和自信，另一方面又受宗教裁判所和歷次對異教徒的迫害屠殺的鍛鍊，帶着冷酷的殘忍性格；在政治上是西歐最強的國家，西班牙在歷史上登峯造極的時代。

這樣的一個國家，在十六世紀的中葉佔領菲律賓，菲律賓人民當時沒有足以驅逐西班牙侵略者的能力，那是不足爲奇的。

更重大的意義是當歐洲人開始侵略亞洲的時候，十六世紀在歐洲稱霸的西班牙，和一向以天朝自居的

中國在菲律賓發生接觸。

這不但是中菲關係的重要轉折點，世界史也在這個時候開始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明朝中國 明朝中國可以說是中國歷來最腐敗的封建王朝，我們在前一章中已經稍為提到過。

在經濟上，明朝是一個封建制度高度發展的社會，由於中國生產方式的特殊性，中國的封建生產關係，雖然在本質上是和歐洲相同的，但是却帶着中國的特殊性。不過這不是本文範圍內的問題。

皇帝所封的藩王，受到嚴格的監視管轄，除非皇帝允許，二王不得相見。藩王在其領域內，則對人民操生殺大權，皇帝任其掠奪民間田產，不加過問。

明朝的稅役又極苛重，佃農大部份生活在飢餓死亡的邊緣。明成祖朱棣的時代，國家的稅收很豐足，政府倉庫中的米，常至紅腐不可食。可是當太子朱高熾路過山東的鄒縣，看見許多人，男男女女在路旁掘草根，高熾不知道草根有什麼用處，百姓跪着對他說：餓了就吃草根過活。這是鄭和七下西洋，明朝全盛時代的情況。

王弼（明憲宗朱見深時人）寫過一首永豐謠：

「永豐地接永豐鄉，一畝官田八斗糧；人家種田無厚薄，了得官租身即樂。前年大水平斗門，圩底禾苗無半分；里胥告災縣官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犢可賣君莫悲，東鄰賣犢翁賣兒；但願有兒在我邊，明年還得種官田。」

一般農民在苛征暴斂的壓迫下，賣犢、賣妻、賣兒、賣身。有的只有背離鄉井，到處流浪。這些流民

後來便成爲農民暴動（所謂流寇）的最主要的力量。

於是東南沿海（特別是閩粵）的中國人民，有一部份寧願冒死罪，進行海外貿易，或移居南洋羣島，在上一章我們已經提及了。有些無以爲生，又不能或不願出外的，常常流爲海賊，甚至與倭寇勾結。關於倭寇的問題，我們在下面還要談到。而在中國內地被迫到處流浪的佃農，只好鋌而走險，揭竿造反，成爲歷史上的所謂流寇，但是他們在實質上，是反抗明朝政府的農民隊伍。

明朝是中國農民暴動最多的朝代，它在明朝的全盛時代，永樂年間（一四〇三—一四二四）就已經開始了。

永樂十九年（一四二一）唐賽兒起義；正統（一四三六—一四四九）中葉，葉宗留和鄧茂七起義；天順（一四五七—一四六四）中葉，李源保起義；天順末年黃蕭養起義；成化（一四六五—一四八六）中葉，劉千斤和李鬍子起義；正德（一五〇六—一五二一）中葉，劉六、劉七、齊彥名等起義；這個時候，江西和四川都有農民起義；百姓間流行着民謠說：「土賊猶可，土兵殺我」。

明世宗朱厚熜在位的時候（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初期對農民稍作退讓，農民的起義暴動才略爲平息。但是不到一二十年便舊態復萌。加上北面的韃靼酋長俺答不時入侵，東南沿海又有倭寇海賊爲患。

可見明朝除了最初的幾十年之外，幾乎無時不處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中。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明史食貨志中記載曰：

「弘治二年（一四八九），戶部尙書李敏等以災異上曰：「畿內皇莊有五，共地萬二千八百餘頃

。勳戚中官莊田三百卅有二，共地三萬三千餘頃。管莊官校招集羣小，稱莊頭伴當；占地土、斂財物、污婦女。稍與分辯，輒被誣奏，官校執縛，舉家驚惶，民心傷痛入骨。……」

本來，明朝朱元璋建國的時候，固然也帶着反抗蒙古族的民族主義的色彩，但是，在基本上仍舊是農民起義。在歷史上，農民從來就不是一個自覺的革命階級，他們所受的教育，無非是封建主的剝削和虐待。所以在朱元璋建國之後，中國的封建制度只是作進一步的發展。

朱元璋得天下之後，所立下的統治政策，首先便是屠殺功臣，而且勸功臣家的婦女充樂戶（官妓），因為他怕功臣持功跋扈造反。同時，他爲了統治天下不得利用讀書人，然而又怕文人傲慢，便用最嚴厲的方法對付讀書人，動不動便是抄家殺頭，或讓他們帶斬罪任職。同時又不許讀書人受任用，不爲君用的士大夫是要抄家殺頭的。

中國的士大夫階級，自漢朝的叔孫通以來，大多數都是一些腐儒，以充統治者的奴才爲榮的無賴。

到了明朝，士大夫想做忠實的奴才也不可能了，立功太大便有受殺戮的危險。因此，比較不滿現實的人，便盡量表現出自己的愚庸無能，消極地求罷官而去。大部份抱住「學而優則仕」的儒家信條的，則儘量勾結權貴，在得寵的時候極力剝削人民，再與上級分贓。阿諛諂媚、恭維奉承之風，充塞在整個明朝統治階級的意識中，本來已經是奴才相十足的士大夫，到了這個時候，再也不知道廉恥爲何物了。

明朝的皇帝因爲畏懼功臣，朝臣一向沒有實權，皇帝對他們一向是愛理不理，極罕讓他們朝見。根據正史的記載，明憲宗朱見深、自一四六五至一四八七年，在位廿三年，僅在成化七年（一四七一）見過幾

位大學士；明孝宗朱祐樞（一四八八至一五〇五年），在弘治十五至十八年（一五〇二——一五〇五）之間曾召見大臣數次，居然被稱為勤政愛民；明武宗朱厚照，根本是一個僅知遊樂的纨绔子弟，終生沒有見過朝臣；明世宗朱厚熹，自一五二二年至一五六六年，在位四十五年，僅嘉靖廿九年（一五五〇）聽朝，餘長俺答逼京師的時候，不得已出坐奉天殿，令徐階（禮部尚書）捧聖旨，召羣臣臭罵一頓。

明朝皇帝既然與政府的官員這麼疏遠，他們靠着什麼統治中國呢？朱元璋的時候設錦衣衛，朱棣的時候添設東廠，朱見深的時候再添設西廠，緹騎；朱厚照的時候更設辦事廠和內辦事廠，權力在東西廠之上；這些組織如果用現代的口語稱呼，都叫做特務機構。這些特務機構，是當時中國的實際上的行政統治者，它的爪牙遍佈全國，甚至連民間夫婦的口角，也被報告到宮裏去。

明朝可以說是第一個以特務機構統治中國的封建王朝，而這些特務機構，通常又為毫無見識的閹宦所主持，他們持權勢，搜刮民間錢財。

在工商業方面，明朝比先前的任何一個朝代，都有更長足的發展。在工業技術方面，也頗有一些專門的著作，如徐光啓著農政全書，宋應星著天工開物，方以智著通雅，物理小識，王徵著奇器圖說，諸器圖說，項子京著陶磁圖說等；這些著作，固然大多是明末的作品，但是所論述的，却是明朝時代工業技術的知識。

這是歐洲人即將東來以前，中國的一般社會狀況，在經濟上，當時的中國如果沒有比歐洲更先進，也不會更落後。但是在政治上，歐洲帝王的權力已經開始受到約束，明朝皇帝却仍然專制橫行，為所欲為，

毫無顧忌。整個社會瀰漫着阿諛諂媚的風氣，與西方世界那種雄吞寰宇的氣概大不相同。

明朝皇帝利用閹宦統治，這些閹宦到處橫行，敲詐民間財貨。歷史上每次記載這些閹宦被抄家的時候，他們的資產總是大得駭人。民間一些本來可以用於投資生產事業的資本累積，這樣地被閹宦搜括了去，這種現象，對當時中國經濟的發展，無疑是很有損害的。

葡萄牙人東來 上面已經提到過，東西交通由於當時中東的回教勢力的興起，以及歐洲勢力和回教勢力的敵對，無法繼續進行。葡萄牙人捷足先登，繞過好望角到亞洲來。

一五〇九年（正德四年）九月十一日，葡萄牙人Diego Lopes do Sequeira 抵達馬六甲；一五二一年（正德六年）七月，駐印度的葡萄牙總督Albuquerque 派兵侵略佔領馬六甲。

當時南洋諸島嶼中的主要強國馬六甲，被葡萄牙所滅亡了。從這個時候起，南洋羣島一直處在西方國家的侵略佔領下。帝國主義的枷鎖直到最近才逐漸在解脫中。

葡萄牙佔領馬六甲以後，便設法與中國建立關係。一五二四年（正德九年）Jorge Alvares到廣東；一五二五年——一六六年（正德十一年），Rafael Perestrello 往華；一五二七年（正德十二年）安烈德（Fernao Perez d'Andrade）到廣東屯門。這些都是自馬六甲出發抵華的葡萄牙人。

安烈德在一五一七年的抵華，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國與南洋關係史上的大事。該年八月十五日，安烈德率船艦八艘，抵屯門，直駛廣州。張燮東西洋考卷五記載曰：

「佛郎機素不通中國，正德十二年，駕大舶突至廣州澳口，銃聲如雷，以進貢爲名。撫按查無會

典舊例，不行，乃退泊東莞南頭，蓋房樹柵，恃火銃自固。」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二〇寫道：

「正德十二年，西海夷人佛郎機亦稱朝貢，突入東莞縣，大砲迅烈，震駭遠近。」

這裏的所謂朝貢，無疑是中國人自用的名詞，葡萄牙人當時的目的，當然是想設法與中國建立貿易關係。既然如此，文中所記載的砲聲，大概是葡萄牙艦開禮炮向中國致敬。

這是一件使亞洲面臨新的形勢的大事件，由於明朝統治的腐爛，當時的明武宗朱厚照，是歷史上有名的荒淫無道，沉緬酒色的君王。對這樣重大的問題，竟然絲毫不加重視，雖然朝廷中，也有一些較有遠見之士，認為自此之後，「南方之禍，殆無紀極。」（御使何鯨語）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機傳記載曰：

「（正德）十五年（一五二〇），御使邱道隆言：「滿刺加乃敕封之國，而佛郎機敢併之，且啗我以利，邀求封貢，決不可許。宜却其使臣，明示順逆，令還滿刺加疆土，方許朝貢。倘執迷不悛，必邀告諸蕃，暨罪致討。」」

據明史卷三二五滿刺加傳的記載，滿刺加的使臣甚至於一五二一年（正德十六年）入京告難請援。希望明朝能施壓力，使葡萄牙歸還其國土。

況且，葡萄牙人自一五一七年抵屯門之後，便不願再離開，經過廣東海道副使汪鋐親督船艦加以圍困，安烈德還堅守至一五二一年（正德十六年）九月七日才退離。

葡萄牙在南洋羣島佔有據點之後，便不斷地派出武裝商船，強行與中國通商。張燮東西洋考卷七記載

曰：

「（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有佛郎機船載貨船泊滄嶼，漳泉之賈人往貿易焉。巡海使者柯喬發兵攻夷船，而販者不止。都御史朱執獲通販九十餘人，斬之通都，海禁漸肅。」

漳州府誌卷四七記載曰：

「（嘉靖）二十六年，佛郎機番船泊滄嶼，巡海道柯喬、知府盧璧、龍溪知縣林松，發兵攻船，不克。」

「時漳州月港賈人，輒往貿易，官軍還，通販愈甚。總督閩浙都御史朱執厲禁，獲通販者九十餘人，行柯喬及都司盧鏜就地斬之。番船乃去。」

由此可見，葡萄牙在侵略南洋羣島之後，立刻對中國實行武裝侵略，儘管當時的規模還是很小的。不過從上面的兩段記載看來，在中國領域內的中葡最初戰爭，中國並沒有取得勝利。

倭寇與海賊 上節中引自東西洋考和漳州府誌的兩段關於「朱執獲通販九十餘人」的記載，同時見於嘉靖東南平倭通錄之中：

「自嘉靖元年罷市船，凡番貨至，輒賒與奸商，久之，奸商欺冒，不肯償，番人泊近島，遣人坐索，不得。番人之食，出沒海上為盜。久之，百餘艘，盤據海洋，日掠我海隅不肯去，小民好亂者，相率入海從倭。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皆為倭奸細，為之嚮導。於是王五峯、徐必溪、毛海峯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莫敢誰何。」

浙東大壞。至是巡按御史陳九德請置大臣，兼制浙福乃以朱統為都御史，巡撫浙江，命領福興泉漳。統任怨任勞，嚴禁閩浙諸通番勾引。主藏者，凡隻檣餘艘，一切毀之。時浙人通番，皆自寧波定海出洋；閩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往往諸達官家為之，強截良賈貨物，驅令入舟。統因上言，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於是福建海道副使柯喬、都司盧鏜，捕獲通番九十餘人，統欲禁止，令行遣旗牌督決於演武場。一時通番稍息，而百姓諸不便者大譁，紙誣惑亂視聽，調御史周亮、給事葉鏞，奏改統為巡視，從之，統尋罷卒。」

可見當時的明朝政府，將葡萄牙的武裝商船，與倭寇和海賊一例看待。當時的剿倭英雄俞大猷在所著正氣堂集卷五議王直不可招書中寫道：

「二兇（王直毛烈）雖猛，孰與佛郎機？曩時佛郎機船數隻，久泊玄鐘走馬溪，副使柯喬等舉兵驅之，日久不去，輕視官兵何如耶？一旦一船先登，衆船蟻附，彼有大銃不及灼火，強弩不及發機，死者胥溺，生者就擒，何其快哉！」

明朝自洪武七年（一三七四）罷市舶司以來，對外貿易一直是時禁時開，時鬆時弛。前面我們曾經分析過，東南沿海無以為生的人民，特別是閩粵的人民，便鋌而走險，以對外貿易求生存。實在是因為苛稅暴政使民不畏死。

但是對外貿易畢竟是大利所在，豪門權貴當然也不能坐視，他們便利用政治勢力進行對外貿易，一嘗到甜頭便想要壟斷包辦。甚至利用海盜「強截良賈貨物」，向番商賒欠的貨物，也賴債不還。這些不擇手

段的豪門權貴的行為，造成更多的海盜，使東南沿海更加混亂。

當時的所謂倭寇，成份非常複雜，其中有些固然是現在的日本人，但是所佔不過是十份之三四，其領袖大部份還是中國人，真正為日本人所指揮的並不多。真正為日本人所控制的倭寇，是由許多因素所造成，然而這不是本文討論範圍之內的問題。

除了真正為日本人所控制的倭寇之外，當時被包括為倭寇的還包括南洋羣島的土著商人，因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如欠債不還）而變為海賊的；以及被壓迫的中國商人和無以為生，鋌而走險，入海為盜的中國人民。其中有些海盜，成為豪門權貴的幫兇牙爪，他們受到豪門權貴的包庇。

必須特別指出的是葡萄牙武裝商船，他們雖然也被列入倭寇之中，但是他們是有計劃，有組織的侵略隊伍，絕不能與南洋羣島的土著商人相提並論。

為朱執所戮的九十餘人，大概都是豪門權貴所包庇的好商，所以朱執才會落得個「罷卒」的命運。明史卷二〇五朱執列傳記載曰：

「其年（嘉靖二十六年）三月，佛朗機國人行劫至詔安，執擊擒其渠李光頭等九十六人，復以便宜戮之。具狀聞，語復侵諸勢家。御史陳九德遂劾執擅殺，落執職，命兵科給事杜汝禎按問。執聞之，慷慨流涕曰：「吾貧且病，又負氣，不任對簿，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吾死自決之，不須人也！」製壙誌，作絕命詞，仰藥死。」

當時以嚴厲的手段對付勾結葡萄牙侵略者的奸商，實在是無可非議的。不過由朱執的死，可以看出企

圖壟斷包辦海外貿易的豪門權貴，的確擁有龐大的勢力。依我看來，這些豪門權貴必定同時是封建地主官僚，因為整部的明朝歷史，從來未曾出現過工商業界獨立的政治力量（如歐洲的行會）。

自嘉靖初（一五二二）至四十三年（一五六四）是倭寇在東南沿海最猖獗的時代，到了四十三年，戚繼光俞大猷的平倭，已經有了很大的成功。

這是西班牙佔領菲律賓前夜的中國和南洋的一般形勢，黎牙實備於一五六五年（嘉靖四十四年）正式以征服者的臉孔在菲律賓出現。

一四二三年（永樂二十一年）蘇祿入朝，是明史上所記載的，菲律賓這個區域最後一次對明廷的朝貢。本來南洋諸島嶼的朝貢，最重要目的乃是在於貿易，以貨物交換中國商品。大概是後來的朝貢使者，不願長途跋涉赴京朝貢，加以明朝政治糜爛，沿途難免要受貪官污吏的敲詐勒索，因而將貨物在沿海與商人交換，不再上京入貢。後來由於中國沿海的海賊橫行，他們便不願再冒險前來，僅讓中國商人進行這項貿易。

因為談到海賊和倭寇，使我們不能不指出這些海賊，有好幾位曾經在南洋史上，使自己的名字成爲不朽。例如菲律賓史上的林鳳，他的主要的將領莊公便是個日本人。

最初交鋒 西班牙一開始佔領菲律賓的時候，便無可避免地要開始和中國發生接觸。在過去的歷史上，一向景仰中國的菲律賓人民，受到在傳統上與他們毫無關係的歐洲國家的侵略。

從這個時候開始，有關中菲關係和菲律賓華僑的史料，大部份是保存在西班牙典籍和檔案中，中國典籍

中關於這一個問題的記載反而很少。讓我自目前西方世界中，研究華僑問題的重要學者，Victor Purcell 所著的「東南亞華僑」一書，轉引一段 C. R. Boxer 教授的話：

「儒家學者藐視在西方多毛的夷族之間流浪的，苦力或本族漁人冒險的紀事，因此我們不能期望在中國的編年史中，找出任何重要的紀載。關於明末清初的時代，天朝的子民在「世外」流浪的墮落的事跡，我們必須完全依靠歐洲人作為資料的來源。」

接下去，Purcell 寫道：

「這無疑是誇大的，但是它正確地反映出中國官府，對這羣不肖的和（在他們看來）無人格的移民的漠視。」（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 583）

在歐洲方面，西班牙政府的檔案室中，直到今日，仍舊保存着大量有關這個問題的資料。

根據西班牙記錄黎牙實備遠征菲律賓的文件所記載，黎牙實備佔領宿務不久之後（一五六五），便有七八個摩洛人自呂宋島乘獨木舟前往。他們是呂宋的土著商人，在班乃島（Panay）聽到西班牙人帶來了許多銀幣，以為西班牙人是純為貿易而來的。在他們返呂宋島，途經岷都洛島的時候，勸誘岷都洛人乘兩艘帆船往宿務交易。這些岷都洛商人為西班牙人帶來了「來自中國的鐵器、鋤器、瓷器、圍巾、薄毛布和波紋綢、香料、和其他的瑣碎雜物。」

黎牙實備在一五六七年（隆慶元年）七月廿三日，自宿務寫信向西班牙王腓立二世報告道：

「在我們的殖民地的北面，幾乎是離此地西北不遠的地方，有名叫呂宋和岷都洛的大島，中國人

和日本人每年均至該地貿易。他們運來絲綢、毛巾、鐘、瓷器、香料、鐵器、錫器、有色棉布、和他的的小器皿，他們運回黃金和蠟。這兩個島上的居民都是摩洛人，他們購下中國人和日本人所帶來的，再把這些商品運到其他各島交易。」

當時呂宋島和峴都洛島的濱海地區，大概都是回教的勢力，因此西班牙人沿用稱北非的回教徒為摩爾人的習慣，稱這些地方的土著為摩洛人。

中國商人運來多種的商品，與菲律賓人交換黃金和蠟，但是這些交易，主要是出入口性質的。中國商品當時是由菲律賓人轉口轉賣的。

前面我們已經大略分析過當時西班牙和中國的歷史背景，歐洲國家自數千哩外遠涉重洋，以萬丈的氣餒直掠遠東，並且正在敲叩世界最古老的帝國的大門。而中國人民刻苦耐勞的果實，正在被封建王朝的統治者糟塌濫用，中華民族的朝氣，受到專制的暴君的壓抑。

西班牙侵略者在菲律賓，第一次與中國人民直接接觸時，便立刻以血刃相見。黎牙實備於一五七〇年（隆慶四年）五月，派高第（Martin de Goite）任總指揮，率船艦遠征呂宋。有一位佚名作者寫一本書名為「呂宋之旅」，敘述當時的經過，裏頭記載曰：

「總指揮接得消息，五里（League，合三哩）外的河中，有船停泊，有兩艘來自中國，土著稱中國人為生理人。……他派遣沙西洛（Juan de Salcedo）上尉，率Praus（一種馬來小舟）和划艇偵察這些船舶，並與他們建立和平和友好。……（當夜起風，翌晨，沙西洛被後面的船艦趕上，

而且落後了。……破曉的時候，前頭的 *Prau* 抵達中國船下碇的河中。中國人不知道是因為聽到西班牙人到來的消息，抑或是聽到鎗聲，把前桅帆拉起，並排到外面來，播着鼓，吹着笛，開着炮和火箭彈，並作出許多好戰的姿態。其中有許多在甲板上，荷着鎗和由鞘中拔起的短刀。西班牙人完全不是無血氣的，並不迴避中國人對他們所作的挑戰；相反地，他們大胆地，無畏地進攻中國船舶，以他們向來的勇敢，將它攻下。……（西班牙）鎗優良的瞄準器是很準確的，中國人不能離開他們的遮護物，使西班牙人得以登船，並加以佔領。兩艘船上共有中國人約八十名，在這次戰鬥中，約有二十名被殺。兵士搜索中國人裝有貴重商品的船艙，他們找到絲綢，有織就的，也有成綫的絲綉；金絲、麝香、發亮的瓷碗、棉布、發亮的水壺，及其他奇異的貨品——雖然和該船的容量比較起來，並不能算多。兩艘船的甲板上都裝滿了陶壺和陶器；大瓷瓶、碟和碗；有一些精緻的瓷壺。……沙西洛上尉在兵士沒收中國船上的商品之後，率後面的 *Priso* 到來。他因為中國人被蹂躪而不高興。乘着大艦留在後面的總指揮高第，聽到這件事，更表不滿。他所乘的槳船在 *Bato* 河（中國船被發現的所在地）下碇之後，他立刻使他們（中國人）明白他為這件不幸的事故很抱歉，但也指出他們對西班牙人的出擊是不應該的。然而，他除了要將他們釋放之外，還要給他們一艘船，使他們得以回國——除此之外還要給他們以旅途中的必需品。」（Blair & Robertson: *Philippine Islands* Vol. III.）

這是西班牙人所敘述的，中國和西班牙在菲律賓的第一次交鋒，其中當然大部份是片面之詞。但是仍

舊掩飾不了第一個聽到鎗聲的是中國人，他們因而準備自衛，完全是理所當然的。

在中國人被擊殺之後，財貨被掠劫之後，西班牙將領儘管作出一些類似友善的表示，但是這完全是一種侵略者的政治手段。他們主要的目的，不過是不願意在征服呂宋的時候，惹起中國與他們為敵。我這樣寫，絕不是牽強附會，西班牙侵略者不是到處與菲律賓領袖（酋長）歃血為盟嗎？但是他們在什麼時候，曾經把這些酋長當作真正的盟友呢？

中國史籍對中國與西班牙在菲律賓的這一次交鋒，簡直是隻字不提。這實在是很荒唐的。在十六世紀的末期，如果有一艘中國船艦，在歐洲海岸外的大西洋島嶼附近，攻擊一艘歐洲商船，不知將會使當時的歐洲多麼震動！西方的史家不知道將如何地在歐洲近代史上大加渲染！

在這裏應該略加一提，上面一段引文中所稱的生理人，是我們將會在下面常常看到的字眼。西班牙典籍中往往把菲律賓華僑稱為Sangley，有人認為它的意思是「常來」，也有人認為是「商旅」，據日人淵協英雄的考證，認為應作「生理」，我也以為淵協英雄的講法比較合理。一直到現在「生理人」仍舊是菲律賓華僑的口語。

據前面所引的同一書中的記載，當高第所率領的船艦抵達馬尼刺的時候：

「中國人立刻乘小艇來見總指揮。他們送他一些白蘭地（？）、雞、特選的米、幾塊絲綢，和一些沒有多大價值的瑣碎雜物。他們向總指揮埋怨馬尼刺的摩洛人，說他們將其船舵強行取去，並且取去他們最優良的商品後不付錢，總指揮友善地接待他們，但是爲了要兩面討好，他避開這個問題。」

這是菲律賓華僑的大恥辱——如果這段記載屬實。

西班牙征服馬尼刺的時候，馬尼刺地區的酋長，大多是南洋古國滿者伯夷王國統治者的後代，這是呂宋曾經與滿者伯夷王國有過某種程度的從屬關係之旁證。馬尼刺（指今日王城內）的酋長蘇里曼（Soliman），堅決抵抗西班牙侵略者，他是用他的血爲菲律賓歷史帶來了光榮的勇敢衛國者。

現在讓我們看看明史關於西班牙征服菲律賓的記載。明史卷三二三呂宋傳：

「時佛郎機強與呂宋互市，久之見其國弱可取，乃奉厚賄，遣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詐而許之。其人乃裂牛皮，聯屬數千丈，圍呂宋地，乞如約。王大駭，然業已許諾，無可奈何，遂聽之。其稍徵其稅如國法。其人既得地，即營室築城，列火器，設守禦，具爲窺伺計已。竟乘其無備，襲殺其王，遂其人民而據其國，名仍呂宋實佛朗機也。」

這段牛皮奪國的故事，簡直是荒謬絕倫，滑稽可笑。當時的明朝政府，甚至分不清葡萄牙和西班牙，而將他們統稱爲佛郎機。中國朝廷對國外情況的愚蠢無知，實在是造成中國歷來昏憤的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因。

更令人頓足長歎的是當時的明朝政府，雖然先後獲悉馬六甲和呂宋被吞併的消息，馬六甲甚至遣使向明廷求援，但是明朝政府對中國南疆外圍的大變故，却不採取任何實際行動。明朝政府內部固然也有一些明智之士，如御使何茲，認爲自此之後，「南方之禍，殆無紀極」；御使邱道隆更主張對侵略者「聲討致罪」；但是他們的意見，却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當時的明朝政府如果乘咸繼光俞大猷掃平倭寇的餘威，出兵幫助馬六甲和呂宋進行衛國戰爭，維護亞洲鄰國的主權和尊嚴，不管是在法理上或是在道義上，都是名正言順的。對明朝中國本身來說。一方面可以拒敵於國門之外，也許可以使中國避免在近代史上被列強侵凌的慘禍；一方面又可以使明朝內部的萎靡氣象振作起來。

明朝政府對世界形勢的激變，完全麻木不仁，無視無睹。

在廣大的菲律賓人民的心中，他們開始對中國感到失望：他們一向所尊敬景仰遣使朝貢，而且自稱天朝的中國，竟然是一個這樣不仁不義的國家，當他們為倭寇所侵凌的時候，絲毫不能稍盡保護之責。

隨着形勢的發展，這種失望，不久便要變成對中國的輕蔑。

數千年來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在南洋羣島所建立的威望，在明朝暴君的手中開始喪失了。使中華民族在歷史上蒙受這種奇恥大辱的主要責任者，是下列幾個明朝皇帝：武宗朱厚照，世宗朱厚熜，穆宗朱載堉，神宗朱翊鈞。

對華僑最初的态度 不管明朝皇帝如何不爭氣，中華民族歷世歷代的功業，畢竟使中國的雄威遠揚，為中國建立了一個在世界上的崇高地位，使西班牙侵略者在開始的時候，對菲律賓華僑未敢遽然輕侮。況且，菲律賓與西班牙本土重洋遠隔，西班牙人在菲律賓的日常必需品，在在需要中國供應，因此，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他們不能不以友善的態度對付華僑商人。

由上面所引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出西班牙一開始佔領菲律賓，便與中國進行貿易，交易的商品，也已

經在上面列舉過。有一位名叫Hernando Riquel的西班牙人，於一五七四年（萬曆二年）正月十一日，在墨西哥寫了一篇關於菲律賓的報導，其中有一段話這樣說：

「去年有三艘船自中國來到這個城市（馬尼刺）的港口，另外還有五艘至鄰近的島嶼。這些船運來了中國人所日常應用的，和他們所經常運來的商品。這個島嶼離大陸不遠，僅需八日的航程。」（

Philippine Islands Vol. III）

馬尼刺在一五七一年（隆慶五年）五月淪陷，西班牙王腓立二世於一五七四年六月一日下敕令建馬尼刺市。可見中國與菲律賓之間的貿易，並沒有為西班牙的侵略佔領所影響而中斷。

由於西班牙是歐洲當時最富強的國家，也是全歐洲擁有黃金白銀最多的國家，因此西班牙殖民者有向中國購買貴重的消費品和奢侈品的能力，這使中菲貿易進一步的發展。過去中國商品的消費者，是消費力不會太強的一般菲律賓人民，現在增加了一羣在當時維持着最高的生活水準的西班牙殖民統治者。

一五七三年（萬曆元年）六月廿九日，西班牙駐菲總督拉迷沙禮示（Guido de Lavezares）在寫給腓立二世的信中說：

「自從我們抵此之後，中國人卽至此貿易，我們總是設法于他們以優渥的待遇。所以，當我們在此島上的二年中，他們都有更多的船和更多的人來此；而且比先前來得更早……自從他們與西班牙人貿易以來，他們逐年運來了更精美和更豐富的商品。」

一五七四年菲律賓行政當局向腓立二世報告，該報告書寫於七月十七日，一五七四年初至七月共有六

艘中國商船抵菲，其中三艘至馬尼刺，三艘至岷都洛。

西班牙在最初佔領菲律賓的時候，對供應他們以消費品的中國商人，的確是非常歡迎的。

「呂宋之旅」一書中，記載西班牙佔領馬尼刺時候所遭遇的菲律賓華僑：

「社中住着四十位有眷屬的中國人，和二十位日本人。其中有一部份在戰爭爆發以前，到船上來見總指揮。」

有些華僑在交戰的時候逃避，把妻子留在社中：

「俘虜之中，有些是有眷屬的，在社中定居的中國人的妻子；雖然因為她們的丈夫隨摩洛人逃匿，將她們作為奴隸是合法的，但是總指揮不願意這樣做，他只是將她們交給船上的中國人。」

另一位西班牙佚名作家寫了一部「呂宋征服史」，裏面也有關於菲律賓華僑的記載：

「這些中國人在這些土著之間居住，他們都由於某些事故，自他們的本國逃亡。他們帶着他們的妻子，他們的總數，包括男女，約有一百五十人。」

這位作者對當時的菲律賓華僑頗抱好感和善意，他寫道：

「他們是很客氣和謙遜的民族，他們穿着絲質或布質的長袍。和西班牙人一樣，他們穿着闊褲，有袖子和襪子。他們是很機巧和清潔的民族。這是我們所能看到的概略。他們的男人和女人一樣都留着長髮，好好地紮在他們頭上。」

這時候的菲律賓華僑，散居在全羣島各地，明史呂宋傳中所記載的：「先是閩人以其地近且饒富，商

販者至數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數萬人的數目也許有點誇大，但是菲律賓的華僑必已甚多，決不止如西班牙典籍中所說的四十戶或一百五十人。

西班牙人當時對中國的認識，當然也是很有限的。一五六九年（隆慶二年）六月八日，Andros de Miranda 自宿務寫信向腓立二世報告道：

「由這些人（葡萄牙人）獲悉中國是一個很重要的國家，它的人民是很開化的，經營着大量的貿易，有着一個有秩序的政府。他講到十三個城市叫做：泉州、廣州、福州、寧波、溫州、海南、Sisuan（？）、江西、湖南、南京和北京。北京是國王宮廷的所在地。」

一五七三年，Diego de Artieda 中尉也寫信向腓立二世報告道：

「北面便是稱爲中國的大陸。這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大到我們已能確證，是和韃靼毗連的；到此間貿易的商人說，這兩個國家正在彼此交戰中。中國人有很高的文化。他們有工具可以鑄鐵。我看到鑲着金銀的鐵器，和世界任何地方所精製的同樣有技巧。他們對木材和其他的材料都同樣精工。葡萄牙人說中國人是好人——他們多少擁有些世界的亮光，但是他們用一隻眼睛看事。」

明朝中國在工業技術方面的進步，現在又可以由另外一方面獲得證明。可見當時中國的工業技術，並沒有比歐洲落後。

這些寫信給西班牙國王的西班牙公民和中級軍官，對中國的認識固然很有限，但是和中國正史上，我們上面所引的牛皮壽國的故事比較，畢竟是深刻正確得多了。

當西班牙侵略者一踏上菲律賓的土地，一些好大喜功的軍人，便立刻建議進攻中國，這些事實，我在下一章便要談到。

第四章 林鳳征菲及其對中菲關係的影響

弱小民族的起源 三四年前，我曾經寫過一則童話，題目叫做「弱小民族的起源」：
很久很久以前，深山中有兩個部落。

在這深山中有很多很多的老虎。

有一個部落中的年青人打死了老虎回來，長者讚揚，少女鍾情。於是打虎在這一部落中成了時髦的盛事。孩子稍為懂點事，便立志要做打虎者，好替爸爸媽媽爭口氣。人們漸漸地便把這個部落稱為打虎族。

另一個部落的老年人不許年青人打虎。假如有人冒險打隻虎，整個部落的長者便要羣起而攻之；一個胆敢打虎的人，還會有什麼不敢做的嗎？一個打虎者實在有無惡不作的危險，這樣的人當然是罪不容誅的，輕則處罰，重則殺頭，決不寬宥。於是再沒有人敢打老虎了。如此代代相傳，人們漸漸地便把這個部落稱為長虎族。

打虎族人把小老虎捉來飼養，使它馴服。有些老虎便退化成為小貓。長虎族人見了小貓，以為它仍是老虎。打虎族人的家畜在長虎族人看來，仍然是猛獸。

在長虎族人看來，敢打老虎的人當然比老虎更可怕。在打虎族人看來，怕老虎的人是卑微不足道的。

世代相傳下去，畏虎族人更畏打虎族，打虎族人更打畏虎族。

準備侵略中國 西班牙人一開始佔領菲律賓之後，有些好大喜功的軍人，便立刻主張侵略中國。儘管他們爲了需要中國的供應品，非常歡迎中國商人來菲，但是從西班牙統治菲律賓的文獻考察起來，西班牙侵略者對中國或中國人，很少真正地存有尊重和好感。

在馬尼刺還未曾淪入西班牙人手中以前，黎牙實備佔領宿務不過四年，Urdaneta 神甫（他是當時西班牙有名的天象學者和航海者，黎牙實備遠征軍的航海事務，完全是由他主持的。）的侄兒 Andres de Miranda，於一五六九年（隆慶三年）六月八日，便自宿務寫信給腓立二世說：

「我們全體，皇上陛下的奴隸和臣屬，都頗爲確信，當你在位的時候，中國將會隸屬於陛下，基督教將要在這個地區傳佈和高舉，陛下的領域將會擴張，這一切，將在一個很短的期間內實現。」

同一年的七月八日，Martin de Rada 神甫自宿務寫信給西班牙駐墨西哥總督 Marquis de Falces 說：

「如果皇上有意囊括中國，我們知道它是一個很大，很富庶和有着高度文明的國家，它的城市，堡壘和城垣比歐洲的更大，他必須在這個羣島上首先有殖民區，因爲我們不能用高舷的船舶，安全地越過許多島嶼和中國沿岸的淺灘，而必須應用有槳的船舶；其次，要征服一個很大和人口很多的國家，必須在附近有援助和迴避地，以便應付可能發生的緊急變故。然而，我從曾經與中國人交易的葡萄牙人和印度人，以及一名不久以前在一艘槳船上俘獲的中國人獲悉，中國人民完全不是好戰的。他們

完全依賴他們的數量和他們的牆垣防禦。如果他們的任何堡壘，能够被征服，靠上帝的幫助，他們將會解體，並為少數的軍隊所輕易擊敗。」

從這兩封信的語氣看來的，腓立二世本來就有征服中國的意慾，而這兩個臣屬只是在重申征服中國的可能性。Rada 神甫的信，更有欲征服中國，須先征服菲律賓的意味。

無論如何，西班牙侵略者一佔領菲律賓之後，便企圖使菲律賓成爲侵略中國的基地，這一點是完全不成疑問的。

在西班牙佔領馬尼刺不久之後，Diego de Artieda 上尉於一五七三年便寫信向腓立二世報告：

「他們擁有我們所有的各種武器。他們的炮，依我所審察的自中國運來的長炮，是很優良的，還比我們的，鑄得更好。……每一個城市和省份，都有武裝的軍隊。……他們的國王據說是很大的君王，他的軍營是由三十萬人所組成的，其中有二十萬人是騎馬的。我曾經在畫像上看到帶着鎧甲、鋼盔和矛的騎士。這個國家很肥沃，而且有充份的糧食，相信是全世界最佳的國家。跟我談過話的摩洛人告訴我，中國人並不是像我們這樣好戰的民族，而且是異教徒。……」

「如果陛下有意對該國（中國）加以勘測，我只要有兩條船，每艘二百五十噸，每船有兵士四十名，以及所需的武器、彈藥和糧食便可以從命。然後靠着主的幫助，和謁見該國君王的某種使節的權力，我將親自進入該國，在勘測海岸之後，再經新西班牙（墨西哥）返國。我將確定將如何在該地進行貿易和征服。」

一五七四年正月十一日，Hermando Riquel自墨西哥報導稱：

『由他們（在馬尼刺居住的華僑），得知該國（中國）是很富庶而人口稠密的。國王注意準備戰爭，國境由許多堡壘防禦，守軍嚴密地守望著。他們說自廣州城，大陸沿岸最強的城市之一，到君王的居住地北京有一年的路程；……沿途有許多人口稠密的城市，但是如果身上樂意調度，只要不到六十名的優良的西班牙兵士，就能够征服和鎮壓他們。』

主張侵略中國的一些好大喜功的西班牙軍人，常常表現得很狂妄自大，有點『初生牛犢不識虎』的稚氣。

但是明朝政府錯失了一個與歐洲國家在世界上爭雄的大好機會，坐使歐洲國家於以後的數百年中，在歐亞美非澳五大洲上稱霸。等到昏睡中的中華民族被西方的大地震醒的時候，中國已經是岌岌自危了。

西班牙國王腓立二世，當時一方面由於國內及歐洲的問題未能解決，西班牙在征服菲律賓以後，便開始由它的歷史高峯走向下坡；另一方面，也許是憐於中國在世界上的威望，使他未敢立刻對中國輕舉妄動。不過，從這個時候開始，西方強國便處心積慮要滅亡中國。

中國沿海的海賊 上章已經指出過，明朝中國沿海的倭寇和海賊，自嘉靖初（一五二二）至四十二年（一五六四）最猖獗。經過戚繼光俞大猷的平倭之後，倭寇在東南沿海的氣燄，可說是大為收斂了。所以，林鳳在十六世紀的七十年代，已經不能在中國沿海有多大的作爲了。

本來，嘉靖年間的倭寇和海賊，成份是很複雜的，這也是我們在第三章已經講過的。這些海賊之中，

有些的確是中國沿海無以為生，被迫入海為盜的善良農民。他們與在內地起義的所謂「流寇」，是有很類似的性質的。

在「倭寇」和海賊全盛時代，他們常常受到中國沿海廣大貧農羣衆的支持。和一切農民革命的隊伍一樣，所謂「流寇」和「海賊」的紀律都不會太好，但是一般的中國人民，都很瞭解在改朝換代的時候，「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道理。普通的百姓常常分不清「官兵」和「寇賊」有什麼不同，明人朱九德所著的倭變事略也說：官兵「掠姦索食，不減於賊。」

不過，海賊沒有陸地上的根據地，不能時刻與一般農民為伍，在力量的發展上，也受到種種實際條件的限制，不能像所謂「流寇」的隊伍那麼迅速膨脹。因此「流寇」成功之後，常常可以成為開基建國的帝王，海賊成功的却絕無僅有。

根據中國典籍的記載，林鳳確曾在中國沿海充過海賊，不過他在中國沿海的活動，沒有像菲律賓歷史家所渲染的那麼厲害。潮州府誌記載曰：

「林鳳，饒平人，明隆慶二年（一五六八）戊辰冬十月，陷神泉鎮。明年，掠澄海，縣令左承芳禦之，走廣州，航海抵呂宋國。至玳瑁港，築修戰艦，謀脅番人，復圖內逞。聞撫劉堯誨諭呂宋國王，破巢焚舟，賊衆大挫。後又從外洋突入內海，總兵張元勳，副使趙可懷至淡水洋，賊船飄遁。官兵尾追之，焚其船二十隻，鳳乃逃外夷。」

祝秀俠主編的華僑誌總誌，也有一段關於林鳳的記載：

「林鳳爲潮州饒平人。讀隆慶六年八月庚辰（一五七二年十月三日）御史楊一柱奏文，則彼時其黨羽尙不過五六百人（明穆宗實錄卷七八）。萬曆二年（一五七四）以後，林鳳揚粵閩兩省。是年六月廿三日，福建巡撫劉堯誨且報其徒衆已多至萬人，福建總兵胡守仁逐之，並招漁民劉以道諭東番（即台灣）合剿（同上卷二六）。十月辛酉（一五七四年十一月三日）林鳳自澎湖逃往東番鵝港（同上卷三十）。鵝港即今台灣東石鎮鵝港。」

林鳳顯然是後起的海盜，在隆慶二年才引起官府的注目。他在閩粵沿海活動的日子並不太長。

萬曆二年（一五七四）林鳳屯紮於廣東南澳的錢澳，請求明朝政府收撫，但是被拒絕。明神宗實錄卷二二記載曰：

「萬曆二年二月丁巳，海賊林鳳復擾潮惠，泊舟錢澳，挾求招撫。合咨兩廣提督殷正茂，福建巡撫劉堯誨，嚴督官兵會剿，不許扭信地之說，襲招撫之套。」

不過林鳳的海上根據地，乃是建於澎湖，不是在錢澳。求撫不遂之後，林鳳便由他在澎湖的根據地出發，赴台灣的鵝港。福建總兵胡守仁派兵追擊，將林鳳的隊伍擊散。明神宗實錄卷三〇記載曰：

「（二年）十月辛酉，福建海賊林鳳自澎湖往東番鵝港，總兵胡守仁，參將呼良朋追擊之，俟諭番人夾攻，賊船燬燼，鳳等逃散。巡撫劉堯誨請賞賚有差。」

這裏所指的番人，應該是台灣當時的原始居民，不會是將於後文提到的呂宋番兵。

萬曆三年，林鳳再犯福建，又被胡守仁追擊至淡水洋。明紀卷三九，神宗紀一記載曰（這段記載與明

史卷二二二凌雲翼傳的記載大同小異：

「(三年)初，林鳳屯錢澳求撫，殷正茂不許。遂自澎湖奔東番關港。爲福建總兵官胡守仁所敗。及是(明史：是年冬)犯柘林、靖海、碣石。已復犯福建，守仁追擊至淡水洋，沉其舟二十，賊失利，復入潮州。參政金淞，諭降其黨馬志善、李成等。鳳夜遁。」(後面明史凌雲翼傳再加上一句：「明年秋，把總王望高以呂宋番兵討平之。」)到了這個時候，林鳳的名字，便與呂宋相連結了。鄧鍾

廣東倭變記記載曰

「萬曆三年，海盜林鳳突入廣澳，總督侍郎凌雲翼擊走之。林鳳與林道乾皆會一本餘黨也，各擁衆數千，流劫海上，猖獗多年，爲官兵所逐。鳳因奔外洋，攻呂宋玳瑁港，築城據守，且修戰艦，謀脅番人，復圖內逞。福建巡撫劉堯誨遣人諭呂宋國主，集番兵擊之，戰船燒燬，賊衆大挫。至是又從外洋突入廣澳。雲翼乃檄總兵張元勳，監軍副使趙可懷追勦之，與福建總兵胡守仁兵合，追至碣石，獲賊徒男婦八十餘人；復追至淡水洋，賊船飄遯，兵隨擊之，焚沈賊艘二十餘隻，鳳遁走。」

乾隆泉州府志卷三〇記載曰。

「陸一鳳·萬曆二年任泉州府同知·嘗奉檄借諸將討海酋林鳳於惠潮，大破之，覆其巢。諸將椎羊酒相賀。一鳳曰：「禍本猶在，是且走海南諸國而伺義解。」諜之，果走呂宋國。於是以重兵蹙之。」

明神宗實錄卷四五記載曰：

『萬曆三年二月己卯，提督兩廣凌雲翼奏稱，海賊林鳳流突廣福，總兵胡守仁追至淡水洋，衝沉賊船二十餘隻，逃往西番。』

明神宗實錄卷四六載曰：

『萬曆四年正月癸丑，總督兩廣侍郎凌雲翼以廣賊林鳳棄衆投番，撫散餘黨三千報。下兵部議，謂鳳既遠遁，宜聽便宜計取，或修備以待之。而賊軍盡散，地方寧謐，於例並得論功。因論鳳在呂宋，非閩中用間諭夷，豈有潛遁之日？及其黨回潮，非廣中相機諭撫，寧有底定之期？事在相左，實則相成，均宜查敘，爲苦心任事者勸。許之。』

上面是中國典籍中有關林鳳的記載，其中有些地方未免過於妄自誇矜，如潮州府志的所謂：『閩撫劉堯誨諭呂宋國王』；廣東接變記的所謂：『福建巡撫劉堯誨遣人諭呂宋國主』。這羣夜郎自大、俗不可耐的士大夫，還沒有知道這個時候的呂宋已經今非昔比了，新的呂宋國主正在處心積慮準備征服中國。

不必說的，當時呂宋的新統治者西班牙人，絕對不是爲了明朝政府而與林鳳作戰的。

中國典籍上記載林鳳的年代，是很可疑的，關於林鳳較詳細的記載，始於萬曆二年（一五七四）林鳳請明廷收撫。但是林鳳進攻馬尼刺的史實，發生於一五七四年年底。因此，這是很令人困惑的。

雖然根據中國典籍的記載，林鳳是中國沿海的海賊，但是他遠征菲律賓的時候，率船艦六十二艘，陸軍二千名，水兵二千名，婦女一千五百名，兵士中有許多是農人和手工業工匠。船中不但載有武器，而且裝着農具、種子和牲畜。從這項事實考察起來，林鳳的來非，目的並不是要從事掠劫，而是爲了要尋覓一

個可以安居的樂土。也許他還帶有在呂宋建國的雄圖，但是對這項意慾，却在整個的征菲期間中，沒有表現出充份的進取性。

中國和西班牙典籍全部指林鳳爲海賊，美國作家John Foreman在他所著The Philippine Islands (紐約一八九九版本)一書中，總算爲林鳳主持一下公道：

「林阿鳳，西班牙人喜歡將他稱爲海賊，也許忘掉了，他們是以暴力對抗公義，在不久以前，才自先前的所有者奪得該國的。」

林鳳不是林道乾 明史卷三二三呂宋傳記載曰：

「萬曆四年(一五七六)，官軍追海寇林道乾至其國，國人助討有功。」

因此，林道乾往往被誤認爲林鳳，但是林道乾和林鳳確爲二人，他們生平的事蹟，有許多不相同的地方。

上面所引的廣東倭變記便說：「林鳳與林道乾皆曾一本餘黨也。」林鳳是潮州饒平人，林道乾則爲潮州惠來人。李長傅所著的中國殖民史記載曰：

「林道乾潮州惠來人，少爲邑吏，狡詐逾恆，後流爲盜，殘虐嗜殺。時倭寇雖敗於戚繼光，但仍剽掠於閩粵，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道乾爲俞大猷敗於詔安，倭寇竄北港(臺灣)，道乾從之，嗣道乾懼爲所併，又懼官軍追擊，乃自安平鎮二鯤身揚帆南航，至鯤崙島(Pohn Condo)，遂留居焉。但其地狹小，且有颶風爲患，又南航至大泥(Datani)，略其地以居，號曰道乾港，聚衆至

二千餘人。據暹羅記載，林道乾居留大泥，鑄炮三尊，最後一尊不成，道乾設祭禱之無效，大恚，佛然詛曰：「斯礮荷成。當以身祀之。」」

羅香林所著中國通史則曰：

「林道乾，福建人。嘉靖末，爲亂海上，爲官軍所敗，逃之東浦寨及暹羅等地，旋走勃泥，闢道乾港。」

林鳳和林道乾都是在南洋史上不朽的名字，但是由於林鳳所對抗的是西班牙侵略者，因而使他的事跡具有更大的意義。

西班牙典籍中有關林鳳的記載很多，其中有一部份我將在下面加以引錄。

林鳳征菲的動機，中國沿海的居民，爲了要逃避明朝政府的苛稅暴政，開始大量移民到南洋諸島嶼中，這是我在前面已經分析過的。

林鳳征菲的時候，率船艦六十二艘，陸軍二千名，水兵二千名，婦女一千五百，兵士中有許多是農人和手工業工匠。由此可見，當時林鳳的部隊，有許多是攜眷來菲，準備在菲律賓濱作久居之計的。林鳳和他的部屬這種乘風破浪，向海外拓荒的壯舉，是一篇永遠爲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所嚮往的史詩。因爲林鳳的征菲，主要地是屬於移民性質的，所以當他在馬尼刺遇到挫折之後，便無心戀戰，立即撤退。

當時盤踞在呂宋島上的西班牙人，是一個文化高度發展，而且有高度組織性的侵略隊伍，他們帶着當時瀾漫全歐洲的雄吞寰宇的氣概，甚至正在準備侵略中國。這是林鳳所未會理解的——也是他所不可能理

解的。林鳳沒有意識到，他是在亞洲的土地上，和歐洲最主要的強國作戰。

這是中國人民第一次在亞洲土地上，和歐洲侵略者所進行的較具規模的戰爭。（固然本書的前二章也提及一些零星的遭遇戰。）不管林鳳的主觀願望如何，他和他的隊伍在客觀上，不自覺地在菲律賓，進行了一次抵抗歐洲侵略者的正義戰爭。當我們站在亞洲民族的立場上考察這段歷史的時候，對這一點是不應該加以忽視的。

林鳳征菲的實力，可以說是大大地超過當時西班牙在菲律賓的力量，但是在整個征菲的過程中，表現出林鳳是一個毫無政治常識的人，並且完全缺乏進取性。

西班牙典籍有關林鳳的記載甚多。西班牙史家也說林鳳是潮州人。並且記載當他十九歲的時候，糾集了一羣少年，參加中國海賊Tia-La-Ord的隊伍，甚受賞識。Tia-La-Ord死後，他便繼起為該羣海賊的首領，建根據地於澎湖。後來又擊敗另一名叫Ontuchia的海賊，使他在海賊羣中的威望更高。最後，他偷襲一個很強有力的，名叫Vintocuanian的大海賊成功，俘獲了五十五艘船艦，從而使林鳳成爲一個擁有九十五艘船艦的大海賊。

西班牙典籍中的中國海賊的中文名字，現在還無法在中國典籍中找出，Vintocuanian音似爲林道乾，但是事蹟却完全不似。

據一五八六年（萬曆十四年）在馬德里出版的，Juan Gonzalez de Mendoza神甫所編中華帝國史（History of the Great Kingdom of China）的記載：王望高（Omonoon）率軍四萬名，船艦一

百三十艘追擊林鳳。林鳳率部逃往一個地方叫做Tonzunacotican，應該就是東石鎮塹港，即台灣廳港。並且在那個地方截劫商船。

在這些被截的商船中，有兩艘是自馬尼刺駛往中國的。他在這兩艘船中搜到許多金和墨西哥銀，這是當時西班牙人用以償付中國商品所用的貨幣。商船上的人且向林鳳報告呂宋的富庶，和馬尼刺城防禦的薄弱，守城的西班牙人不會超過七十名，因為其餘的西班牙人被派出以征服其他的島嶼。馬尼刺守軍很大意，並且沒有建築什麼炮位，雖然也有幾門很優良的大炮，但是並沒有被安置在適當的位置上。

一五七五年（萬曆三年）至一五八〇年（萬曆八年）年任西班牙駐菲總督的弗蘭西斯戈·黎·山地（Francisco de Sande），在一五七六年六月七日致西班牙王腓立二世的報告書中，也作類似的報告。他還說，商船的船長對林鳳的來菲大有幫助，他對林鳳說，此地的西班牙人很優閒，而且分散在許多地方，有一條船即將駛往岷蘭佬，也許已經開行了，如果林鳳能迅速征非，他將不會遭遇多大的抵抗。

西班牙典籍這些描述有時候未免過於誇大，我已經分析過，林鳳活動的年代，剛剛在威繼光俞大猷掃平倭寇之後不久，林鳳在中國沿海不大可能有太大的作為。中華帝國史中關於明朝政府追擊林鳳的軍力，也大有過於誇張之嫌。在歐洲諸國中，西班牙是對異國異族的文物最不加重視的，但是由中華帝國史出版的年代和內容看來，西班牙人對異國文物所採取的態度，完全是中國所望塵莫及的。他們以成功的征服者的姿態，切實準備作再進一步的征服。中國則是蒙住了自己的耳目，一味着人家不起。

林鳳截劫航行呂宋中國之間的商船，可能是一項事實。當時的林鳳及其部屬，大概都厭倦了海賊的生

活，既然向明朝官府求撫不遂，一聽到海外有一個這麼富庶的島國，便萌起了遷移之心，準備到這個樂土來建立家業。於是，林鳳的船艦便由台灣沿北呂宋南下，浩浩蕩蕩向馬尼刺進發。

怡佬戈遭遇戰 懷着一顆永遠可以遠離中國官府壓迫的心，林鳳率領他的部隊，循着北呂宋的沿岸南下。他們在怡佬戈（Ilogos）沿岸，首先遭遇一艘載有廿五名西班牙兵士的大木船。西班牙征服菲律賓初期的有名的軍官范·黎·沙西洛（Juan de Salcedo），當時率領着西班牙軍正在征服北呂宋，林鳳所遇到的這艘大木船，便是沙西洛所派出以搜尋食物的。

西班牙駐菲總督弗蘭西斯戈·黎·山地在致腓立二世的報告書中，對這次遭遇戰作頗詳細的報告。

根據山地的報告書，該木船上有廿二名兵士和水手，在怡佬戈沿岸的Sinait與林鳳的船艦遭遇。林鳳發現這艘大木船之後，立刻加以進擊。木船上有一門重十四Quintales的青銅鷹炮（Falcon），據說這門鷹炮在抵抗時一共開了五發。西班牙兵士把這門鷹炮叫做Vigilantib，這是因為在這門炮上鑲有這個字眼。在林鳳的圍攻之下，大木船上的西班牙兵傷亡慘重。餘生者都跳入海中，結果不是為中國人所殺，便是為土著所殺。中國人自大木船上，奪得Vigilantib為戰利品。這是林鳳在菲律賓濱所獲的第一件戰利品。

林鳳所率領的巨大艦隊，當然無法逃避沙西洛的覺察，沙西洛在米岸（Visan）獲悉林鳳及其船艦的消息之後，便立刻派三名兵士，乘一艘小舟急報馬尼刺，小舟當然無法遠離海岸搖划，然而却又在三捕禮示（Zambales）的岸邊為林鳳的船艦所發現。在林鳳船艦的進擊之下，三名兵士只好棄舟逃上岸。林鳳的部隊並沒有把該小舟完全破毀。三名兵士再乘小舟緩緩地划至馬尼刺，在林鳳第一次攻城以後的中午抵

達。山地的報告書中把這件事講得很悲哀，他說三掃禮示人沒有比割掉人頭以外更高的志向，他們善於使用弓箭。『如果不是靠着上帝使生理人沒有完全破毀他們的船，這三名兵士將無法自那個粗莽的地區逃脫。』

由此可見，自怡佬戈至三掃禮示沿岸，西班牙人到處都是仇敵，大多數的菲律賓人民，都懷着隨時殺死西班牙人的敵意。

同時，沙西洛立刻率領五十餘名西班牙兵士，兼程趕返協助保衛馬尼刺。

第一度攻城 林鳳在一五七四年聖·安德烈節日（St. Andrew's day）的前夜抵達馬尼刺灣。

他知道出奇制勝的重要性，當夜便派遣四百名有作戰經驗的兵士分乘小舟，準備在破曉之前在馬尼刺登陸。但是那一天的夜間，由陸地上吹來的風浪很大，兵士們雖然盡力量逆風划舟，然而也沒法在破曉之前抵達陸地。這是林鳳第一度攻城時所遇到的天時不利，使林鳳的部隊無法在侵晨，西班牙軍尚在睡夢中的時候攻城。

林鳳的先鋒部隊四百人，於聖·安德烈節日（十一月卅日）晨八時至九時之間，在日本人莊公（Siogo）的率領之下，在巴蘭玉計（Paraguano）登陸。他們在馬拉地（Malate）被土著所發覺。土著提高着嗓子叫喊，說是渤泥的國王率軍來攻。當時馬尼刺守軍的總指揮馬丁·黎·高第剛好抱病在牀，他聽到所謂渤泥國王率軍來攻的叫喊，全然不以為意。他完全想像不到在這個時候，會有什麼敵人來攻。他諷笑這些土著是喝醉了酒。

據說當時這羣中國人，由嚮導帶路，沿着海岸，正在直趨總督的住宅和西班牙人藏大炮的地方。如果他們達到了這項目的，他們便有可能殲滅全部西班牙守軍，並將全城佔領，因為當時總督的住宅，位於馬尼刺海岸和巴石河相交的地方，而且沒有設防。當時的馬尼刺，便是今日王城內的地區，不過還沒有城垣。如果林鳳的部隊，佔據了位於巴石河流入馬尼刺灣這一點上的總督住宅，西班牙軍便無從再集台建壘防禦。

但是當林鳳的部隊正在沿海岸進軍的時候，總指揮高第的妻子 Lucia del Corral，據說是頭上戴着一頂小孩子的盔帽，正在望着窗外的海，她叫他們，向他們招手，用西班牙話罵他們是狗，說他們都要被殺絕。這羣中國人到了這個時候才從他們的嚮導聽到，這就是總指揮的家。於是，這羣中國人便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他們便向屋裏拋擲火彈；這所總指揮的住宅和其他所有的房子一樣，是一所茅房，因此很快地便被燒燬了。高第穿起盔甲應戰，臂中一彈，在烈火之下，由窗口跳下，結果戰死。還有幾名他的隨從，都隨他戰死。

根據西班牙駐菲總督山地致腓立二世的報告書說，高第的妻子，首飾被劫奪，頸部被刺數傷。後來自屋中逃出，躲在高草桿中而得免死。有些史家說高第的妻子大受非禮。

當然，林鳳的部隊的紀律不會太好，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不過，在那個時代，即使是正式的軍隊，也很難找到紀律嚴明的。從各種記載考察起來，林鳳當時主要的目的還是攻城略地，而不是沿途搶劫。

高第之家的這一場戰鬥，雖然是莊公進攻馬尼刺的第一度勝利，但是這一場戰鬥，却成爲一種緩兵作

用。使當時西班牙的駐菲總督拉未沙禮示（Guido de Lavezares），在莊公率部攻城以前，有時間先行準備。馬尼刺所接到的，林鳳部隊來攻的確切的訊號，便是高第住宅的被焚。

如果沒有經過和高第的這一場小戰鬥，即行直接攻城，莊公成功的希望也許會大一點。當時住在馬尼刺的西班牙人，完全沒有防備，大炮的零件四散在地面上。因此高第之家的這一場戰鬥，對西班牙方面是非常有利的。

這些事實完全暴露出林鳳部隊的散漫，和全然無組織性。他們既然已經在海上受到風浪的遷延，本來就應當迅速行軍，在西班牙軍猝不及防的時候攻城。當莊公發現總指揮高第的住宅的時候，其實也大可不必再度遷延整個部隊的進軍，只消遣派一部份的兵士加以圍攻，就完全足以應付高第和他的隨從了。況且，高第的住宅剛剛在馬尼刺外圍的 *Basumbayan*（今日的會禮齊廣場），莊公很可以一面派人圍攻高第，一面同時率部入馬尼刺。我並不是要在事後再替林鳳擬寫作戰計劃，而是要在這裏分析證明林鳳的部隊，的確不是一支很有作戰能力的隊伍。在後來的戰鬥中，林鳳的部隊雖然在數量上佔有絕對優勢，仍舊敵不過西班牙的軍隊。這項事實是很令人深思的。

當莊公在圍攻高第之家的時候，西班牙軍的 *Velasquez* 和 *Chacon* 上尉，率領西班牙兵士至海岸邊，以朝向海灘的房屋為屏障。莊公率部開始攻城的時候，西班牙兵士以配有準確瞄準器的鎗，射擊莊公的先頭部隊。在這一場戰鬥中，據山地致腓立二世的報告書，戰死的西班牙人十四名，中國人八十餘名。莊公所率的部隊終於敗退，當他們撤退的時候，西班牙軍隊沒有實行追擊。因為西班牙兵士的數量有限，恐怕

迫逼過甚會使他們回擊。

據說林鳳在艦上看見火起，又聽見炮聲，以為莊公已經完成任務，便將全部船艦駛入甲未地(Cavite)港停泊。莊公所率領的部隊，乘原來的小舟赴甲未地港與主力會合。

關於林鳳第一次攻城，中華帝國史有頗詳細的描述，爲了介紹西班牙史家的觀點，現在特譯如下：

「儘管有着風浪造成的所有的困難，四百名中國人於聖·安德烈節日晨八時，在離城（馬尼刺）一里（League）外的地方成功地登陸。把他們的小舟留於該地，他們上岸後，立刻以作戰的陣勢，作勢迅速的行軍，前面是二百名鎗手，後面的二百名是矛槍手。但是他們爲居民所窺見——這是無可避免的，因爲這裏是一片平地，有這麼多的兵士急速行進，立刻可以看出是入侵。他們入城來喊道：『拿起武器，拿起武器，敵人來了！』但是他們的警號沒有多大的用處，沒有人相信他們。相反地，他們認爲這是土人自己造出的謠言，或者是有些人正在開玩笑。敵人終於抵達總指揮的住宅，馬丁·黎·高第的住宅，是敵人在入城途中第一個被佔領的地方，城內的西班牙人和兵士第一次看見敵人，在這以前，他們不相信那些叫喊和謠言。敵人立刻放火燒總指揮的住宅，將他及其全體的家人殺害，除了他的妻子之外，沒有一人倖免。她受着重傷，全身赤裸，被認爲是死了，她的傷後來被治癒。當他們進行這項第一宗暴行的時候，公民們確知發生了什麼事了，雖然沒有人想像到這項未曾預期的事件，他們終於發出訊號武裝，並開始保衛他們的生命。有些兵士以發生這類事件時所常見的紛亂，衝到海岸邊。結果是中國人將他們全部殺死，沒有一個人逃掉。於是，餘下的西班牙人形成一個組

織，當敵人入城射擊，發出勝利的呼喊時，作出一些抵抗。這種反抗是西班牙人在遇到危險時所表現的性格；這種頑強和勇敢足以阻抑直到這個時候還是勝利者的氣燄，甚至使他們退回，儘管兩方面的軍力是很懸殊的。在撤退的時候，中國人喪失一些兵士，而且不能給予在防禦中表現得很卓著的西班牙人以嚴重的損傷。這些中國人，因為沒有時間使船駛到較近的地方，把它們留在頗遠的地方，在這種情形下，放棄他們所開始的進攻……當他們到他們停舟的地方，因為怕有危險，便開始駛回船艦。……他們到林鳳所乘的主艦上。他們向他詳細地敘述經過，如何因為逆風，使他們不能依照他的願望，如期抵岸。所以，他們因為沒有他的同在，未能完成任務，只好等待更好的機會。他安慰他們，對他們的成就表示感激。他答應他們要迅速地達到這個可惡的目的，他立刻下令使他的主艦的船首朝向一個叫做甲未地的港口，離馬尼刺市二里（League）的地方。』

這是純粹西班牙人的觀點，連他想像中的林鳳對其部屬的態度，都是西班牙式的。

菲律賓人民起義響應 當林鳳的部隊在馬尼刺登陸的時候，在菲律賓歷史上，同時發生了菲律賓人民，第一次反抗西班牙統治的起義，這兩件事，絕對不是偶然的巧合。

林鳳第一次攻城的當日，西班牙駐菲總督拉未沙禮示，便逮捕了兩名土著的領袖，據說這樣做，可以使土著不致中斷供應他們以食物。後來這兩名土著領袖無故被殺。

第二天，馬尼刺的土著起義暴動，反抗西班牙的統治。許多史家認為菲律賓人民這一次起義，是因為這兩名土著領袖的被捕被殺，和先前投降西班牙的土著酋長拉干愈拉（Lakanidua）的不滿和煽動所引

起的。

拉干愈拉在西班牙軍進攻馬尼刺的時候，不願與英勇衛國的蘇里曼酋長共同作戰，反而與西班牙侵略者妥協合作。後來甚至幫助西班牙軍的總指揮高第征服中呂宋。但是在中呂宋被壓平之後，西班牙征服者便不再對他加以重視。黎牙實備死後（死於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日），繼任的拉米沙禮示總督，更忘掉許多西班牙當局對拉干愈拉的允諾。拉干愈拉於是懷恨不滿，其實這也是一切甘心作爲侵略者之鷹犬者的命運。然而，當林鳳征菲的時候，拉干愈拉由於對西班牙當局的不滿，也率領他的部屬，參加菲律賓人民的起義，倒是一件歷史上的事實。不過，這只能證明當時的西班牙侵略者是如何地孤立，連甘心爲其鷹犬的拉干愈拉，在這個時候也舉戈反抗；却不足以證明這一次的人民起義，是拉干愈拉煽動領導的。從拉干愈拉一生的歷史考察起來，他是不配得到這項榮譽的。

拉干愈拉及其部屬在岷里拉北郊那模查示（*Nawodan*）建立根據地，西班牙當局對他採取綏撫的政策，派遣 *Geronimo Marin* 神甫和沙西洛前往招撫。拉米沙禮示並且送給拉干愈拉一付金鏈和一套絲綢衣服，於是拉干愈拉又再度被收買。可見，拉干愈拉只是利用菲律賓濱人民這一次的起義，以達到他完全自私的目的。不過，西班牙當局在這個時候所做到的，也只是爭取拉干愈拉保守中立，直到林鳳退往蜂牙絲蘭省以後，拉干愈拉才再度與西班牙當局正式合作。

從這一次菲律賓濱人民起義的範圍和規模看來，拉干愈拉及其部屬只是參加起義的一個隊伍，而不是唯一的隊伍，更不是發動者。西班牙駐菲總督山地致腓立二世的報告書上說：

「當這個地方的土著，他們是摩洛人，看見第一日所發生的事蹟，認為中國人是勝利者，他們全體在第二日反叛。在很短的時間內，馬尼刺市的附近，集合了萬名以上的摩洛人，乘着他們的小舟，準備去聽取海賊的指揮。他們說，他們也派遣傳訊員到甲未地去，消息迅速傳佈着。一切駐有神甫的地方，摩洛都拘捕他們和侮辱他們，威脅要將他們噍死，奪去他們的所有。他們褻瀆教堂，在裏面殺羊；殺死一切可能尋到的西班牙人及其奴隸。兵士們說，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們沒有離開炮壘，以阻止海賊逸去，因為摩洛人由四方八面圍住他們。當摩洛人獲悉生理人已去，西班牙人是勝利者的時候，他們才使神甫恢復自由；逐漸地變得馴服——解釋說他們的起義是由於他們的領袖在獄中被殺。」這一次的菲律賓人民起義，並不局限於馬尼刺和甲未地，而且擴展到岷都洛（Mindoro）地區。Juan de Medina 神甫在 1630 年（崇禎三年）所著的 *Historia de la Orden de S. Agustin de las Islas Filipinas*（一八九三年在馬尼刺出版）一書中寫道：

「岷都洛的番人很快地相信這項消息（說林鳳殺盡西班牙人），他們也有點像摩洛人……這個教區在開始的時候，被置於我們（奧古斯丁教派）的轄下，當海賊林鳳進擊馬尼刺的時候，該島是一個 Priorate。……這些摩洛人一聽到在馬尼刺所發生的事，他們便擺脫羅絆，攻擊神甫，扣捕他們，說要把他們殺掉。然而，他們沒有立刻把神甫們殺掉——我不知道是爲了什麼原因，因為摩洛人的確準備要這樣做。」

和甲未地一樣地，這些神甫後來也都被釋放。

每當西方國家向西方文化範圍（在十六世紀末，這個範圍主要地還是局限於西歐。）以外的地區進行侵略的時候，他們那雙血腥的手常常是一手舉着十字架，一手提着征服的劍。由於西班牙本國的特殊性，在政治、軍事和宗教的互相配合上，表現得特別強烈（參閱本書第三章）。西班牙的神甫和傳教士，是西班牙向外侵略的熱誠的支持，也是西班牙鞏固其殖民地統治的幫兇。因此，每當菲律賓人民「擺脫羈絆」，發動起義的時候，他們便立刻對付這批神甫。整部菲律賓歷史，處處記載着神甫和傳教士的罪惡行爲。不過，我並不是要在這裏反對基督，因爲西班牙侵略者及其神甫的行爲，是和耶穌毫無關係的。我認爲必須指出，耶穌潔淨的外衣，是被這羣侵略者的血腥的手所染污了，不但在菲律賓是這樣，在全亞洲都是這樣。

毫無疑問地，當時的菲律賓人民聽到或看到中國船艦來攻的時候，並不知道這是林鳳或所謂海賊的船艦，他們所能理解的只是中國船艦來進攻西班牙人了。他們知道中國是很強大的，就是他們的父親、祖父、曾祖父……也都知道：中國向來就是很強大的。中國雖然是很強大，中國人不過是來做做生意，帶來了菲律賓所需要的物品，換回去一些在菲律賓所出產的；固然也有一些中國人住在菲律賓人中間，用他們巧妙的手工業技術，製造一些很精美的商品和工具；但是中國人從來也沒有強佔過他們的土地，中國人從來也沒有把統治權力加強在他們頭上，現在，中國果然派兵來進攻這羣可惡的西班牙人，很好。趕走了西班牙人一切又要恢復常態了，他們的主權和自由又要恢復了。西班牙人固然也很強大，但是無論如何不會強大到足以擊敗中國人，在當時全南洋羣島的土著看來，沒有一個國家會比中國更強大——那是全然不可

想像的。於是，廣大的菲律賓人民，一聽到中國船艦來攻，便起義響應。

菲律賓人民一聽到林鳳來攻的消息時，還以為是他們所景仰的中國，果然不負所期，派兵要來為他們解懸拯溺。於是，他們立刻起義響應，反抗西班牙統治者，他們在這個時候對中國所表現的忠誠信賴，不但可以說是非常動人，甚至可以說是仁至義盡。

終於，他們親眼看見他們從來所不敢想像的：中國被擊敗了（雖然他們後來也知道林鳳是中國海賊）。西班牙人到底是很強大的，也許比中國更強大，菲律賓人民不禁會這樣想。這是西班牙人擊敗林鳳最大的收穫。

關於這段史實，後來的人似乎都很少提到，西方史家歪曲掩蔽這段史實，甚至把山地致腓立二世的報告書這麼堂皇重要的文獻也棄而不顧，是完全不足為奇的。但是中國文人對這段史實，連片紙隻字都不曾加以提及，却應該自引以為恥；因為這種態度使中國人不能正確地瞭解中菲關係演變的實際歷史，同時也使對中國人民尚存好感的菲律賓人鬱悒歎息。

可以說在林鳳征非的時候，大部份的菲律賓人，對中國尚存景仰信賴，他們以中國為友，以西班牙為敵。

華僑敗類申賽 在林鳳征非的時候，菲律賓歷史上，出現了第一個華僑敗類告密者申賽（Sinsey 譯音）。當廣大的菲律賓人民起義支持中國的時候，他却去勾結西班牙侵略者，和他們合作。山地致腓立二世的報告書中寫道：

「當中國人敗逃（指第一次攻城）之後，本市有一個中國人，名字叫申賽，往見總督。他告訴他以海賊的名字，他是何許人，以及他的軍力。他又說他是一個海賊，而不是他的國王派來的，並且說，毫無疑問地，他將在三天後重返。他勸告西班牙人築壘自衛，並除去總督閣下屋頂上的茅草，以免發火——這些勸告均被採納。」

任何阻抑中華民族向上發展的中國人都是很可惡的，何況告密者申賽還要企圖勾結西方侵略者。

這一類的華僑敗類，一直為菲律賓華僑帶來了極大的恥辱。申賽的行爲，在林鳳和西班牙的交鋒中，不見得起了多大的作用。他雖然厚着臉皮，要去媚悅西班牙統治者，爲他們立功，但是在西方人對這件事的全部記載中，找不出一句話或甚至一個字，以表示他們對申賽的稱讚。在西方人的眼中，甘心出賣與自己同族的人是十足可恥的無賴。

第二度攻城 一五七四年的聖·安德烈節日林鳳的部隊第一度攻城。在林鳳的部隊被擊退之後，西班牙駐菲總督拉未沙禮示，立刻率部加強防務。他們除了自海灣至巴石河的地區築木柵之外，並以所有的木板，乾草和裝着沙泥的箱子作防禦工事。他們雖然儘力設防，但是防禦仍舊是非常脆弱的。

第二日，十二月一日，那三名沙西洛由怡佬戈派出，乘小舟向馬尼刺報警，而在三掃禮示岸邊與林鳳的船艦遭遇的西班牙兵士，在中午抵達。沙西洛所率領的西班牙兵士，在該夜抵達馬尼刺。據山地致腓立二世的報告書的記載，沙西洛由馬尼刺灣的左邊入港，差一點被靠在右邊的中國人所發現。但是據Glorio, Rio F. Zalde 所著的菲律賓政治與文化史第一卷，却說沙西洛及其所率的五十名兵士，在十一月卅日抵

達播打安省，有些親西班牙的中國商人向他報警，說林鳳的船艦泊於馬尼刺灣內。沙西洛於是在播打安（Batagan）登岸，星夜兼程由陸路趕赴馬尼刺，並於十二月一日晚抵達。但是我寧願相信山地的報告書，因為第一，山地身為總督，在向西班牙國王報告的時候，不會也不敢太虛偽。第二，山地的報告書寫於一五七六年（萬曆四年）六月七日，沙西洛於是年三月十一日卒於菲律賓，山地寫報告書的時候，還有可能得到許多第一手的材料。第三，當時由播打安至馬尼刺的交通一定不會很方便，土著也不見得會太友善，因此，沙西洛是否可能由陸路，自播打安抵馬尼刺是很成問題的。

幾乎所有的菲律賓史籍（教科書），都說當拉干愈拉起義的時候，沙西洛是奉派前往招撫的主要的西班牙人之一，而招撫的時間又是當林鳳尚在叩攻馬尼刺的時候。但是沙西洛既然是在十二月一日晚抵馬尼刺，而林鳳又在十二月二日清晨實行第二度攻城，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沙西洛如何前往招撫拉干愈拉呢？因此這節歷史是必須重新探討的。

十二月二日凌晨，中國人排起作戰的陣勢前進，好像是在準備報復。清晨四時，林鳳的全部船艦，在馬尼刺的海外，排成一個巨大的半月形，艦上所有的大炮，全部同時開發三響。在破曉的時候，林鳳的船艦放下小舟，部隊乘小舟在俞禮齊廣場登陸。林鳳也親自隨軍登陸，但是據說他本人沒有上陣，只是在那裏觀戰。這一次登陸的林鳳部隊，約在一千名至一千五百之間。林鳳將他們分成三股，由三方面同時攻城。

山地致腓立二世的報告書中，檢討這一次的戰役，他認為讓林鳳安穩地這樣登陸，是一種很大的錯誤，他說這個地方沿岸的草很高，射擊手很容易在草中埋伏，而對正在登陸的部隊加以伏擊。甚至可能一

鎗擊殺林鳳本人。

他的報告書中同時說：「海賊們在這一天，好像預先決定地，沒有放火焚燒任何看來還好的房子。」他們直接攻城，並且由兩面作很猛烈的衝擊。在靠海的一邊，因為當時在該地負責防守的軍人，Sancho Hortiz De Asurto軍曹戰死。（他身上被矛刺一傷，但是因為有一顆子彈由背入腳，西班牙當局還在事後進行調查，以決定他在作戰中是否犯錯誤。）因此，西班牙這一方面的防衛力，頓形削弱，林鳳的部隊在這一點上突破，約有八十名中國人衝入城中，「如果他們全體都有同等的勇氣，他們可能全部」入城。『根據報告，我國的兵士立刻還擊，用槍矛和鎗，將他們（指入城的中國人）全部殺掉。』

但是西班牙軍在其他方面的頑強抵抗，迫使林鳳的隊伍撤退。以致突破陣綫的這一股的主力，也隨着其他方面的隊伍撤退，留下入城的八十人，全部為西班牙人所殺。

在這次戰役中，有一顆火彈插在彈藥之中，因而發生爆炸，兩三人在爆炸中死亡，爆炸同時造成火災。奧古斯丁教堂（當時是木建的）在這次戰役中被焚；先前曾經提到過，有一艘即將前往岷蘭佬的大帆船，也在這次戰役中被毀。當時馬尼刺的房子，不是茅房便是木屋，在戰爭中發火燃燒，是絕對無可避免的，但是後來很多史家，說林鳳在馬尼刺放火焚掠，這種講法，似乎甚帶惡意。山地致腓立二世的報告書明說：「海賊們在這一天，好像預先決定地，沒有放火焚燒看來還好的房子。」山地只會對林鳳懷着敵意，絕對不會替他掩飾。

撤退的時候，林鳳派出一些小船，由海中划至巴石河，作為疑兵，使西班牙軍不敢追擊。但是後來仍

舊有一些西班牙人，認爲讓林鳳這樣不受阻撓地撤退，完全是一種錯誤。

山地檢討這次戰役的時候，在報告書中寫道：

「大略加以檢討一下，相信該海賊如果能以更大的軍力，在一開始的時候便想到由許多方面進攻，他是有可能成功的。但是如果他不是不瞭解這一點，便是不敢這樣做。」

山地報告說，在這次戰役中，西班牙兵士三名戰死，數名受傷，中國人死傷二百名。林鳳的主要將領莊公，據說也在這次戰爭中陣亡。西班牙方面主持這次戰役的軍人是沙西洛，沙西洛自怡佬戈抵岷之後，便被委繼高第任總指揮。

Juan Gonzalez de Mendoza神甫在他所編的中華帝國史中寫道：

「正如我們所相信的，這一切是因着我主上帝的天道，祂不願意使這些羣島中，許多受洗的並封印着祂的最神聖的信仰之亮光智慧的靈魂，再回到魔鬼的權勢之下，祂把他們拉到祂永恆的恩惠之中。祂也不願失去這些島嶼與中國接近的方便，神聖的主宰也許注定，要由這個地方拯救和救贖該國（指中國）全國。」

西班牙侵略者隨時隨地，都利用着基督教，不但在國外，可是也在國內，爲他們的侵略行爲張目。

遠往蜂牙絲蘭 我曾經在前面一再地強調過，林鳳的征非，主要地是屬於移民性質的，準備到菲律賓來建立家園，作久居之計。因此，林鳳的部隊兩次進攻馬尼刺城，每次都在稍遇挫折之後，即行退却，無心戀戰。林鳳在中國沿海固然作過海賊，但是他的部隊在兩次攻城之中，都明顯地暴露出他們並沒有很

強的作戰能力。儘管他們佔有數量上的絕對優勢，仍然無法與組織和配備良好的西班牙軍作戰。

林鳳的軍力不但在數量上佔絕對優勢，而且得到廣大菲律賓人民的支持和響應，當時的林鳳只要略為有點政治常識，與菲律賓人民聯絡，是完全足以把外來的西班牙統治者逐出菲律賓的。但是不幸地，林鳳是一個毫無政治常識的人物，在認為無法攻下馬尼刺城之後，便退到蜂牙絲蘭省去。

蜂牙絲蘭是呂宋島上一個很富庶的省份，與中國又曾經有過歷史關係，明朝初期派過使節朝貢中國。因此退到蜂牙絲蘭去對林鳳實在是很有利的，不過，這大概是一種巧合，林鳳不見得是有計劃地退到蜂牙絲蘭去，他對蜂牙絲蘭的歷史和經濟背景，也不見得有所了解。

林鳳到了蜂牙絲蘭之後，並不再圖謀發展，而只是作為一羣移民，在那裏定居據守，完全表現不出他有捲土重來，再攻打馬尼刺的冀望。但是，一心一意企圖要儘量向亞洲發展的西班牙侵略者，却不能坐視林鳳在蜂牙絲蘭偏安一隅。他們召集人馬準備追擊林鳳的部隊，將他們全部消滅或逐出西班牙的勢力範圍。

當時的西班牙人並不是全部聚居在馬尼刺，其中有一部份散佈在甘馬仁（Camaringes）省，約一百名在宿務（Cebu），約七十名在怡保省，由沙西洛率領（沙西洛率五十人趕至馬尼刺幫助當地的西班牙人守城）。林鳳撤退之後，西班牙統治者除了一方面在馬尼刺加緊築壘，以防林鳳再來之外；同時，一方面派船前往各地召集西班牙人，以期集中軍力，消滅林鳳的部隊。當時奉令至馬尼刺歸隊，而又有能力參加作戰的西班牙人，共有二百五十六人。由此可見，西班牙人當時在馬尼刺的力量薄弱。他們以如此有限的力量，由數千哩外乘風破浪來征服菲律賓，甚至準備侵略中國大陸。

這二百五十名西班牙兵，和二千五百名強徵和僱傭的菲律賓兵，以沙西洛爲總指揮，於一五七五年（萬曆三年）三月廿三日由馬尼刺出發。拉干愈拉及其部屬，也參加這個進攻林鳳的隊伍。

林鳳的堡壘建於蜂牙絲蘭的渥諾（Año）河口，這就是中國典籍所稱的玳瑁港。外國史籍說林鳳在那裏自建王國，徵收稅餉。農民出身的中國官兵和匪盜，由於他們一生所受的教育都是封建地主的剝削，因此他們每到一個地方，都會向一般人民徵收「錢糧」。但是林鳳到底有沒有建國稱王，在我看來，是很成疑問的。

西班牙軍於三月卅日，剛剛是該年耶穌受難週的星期三抵達蜂牙絲蘭。當時西班牙軍分乘大小船艦共五十九艘，不過都是本地建造的小船。他們在將要破曉的二點鐘抵達，在不爲林鳳的部隊覺察之下登陸，同時並運上了四門大炮。登陸後，沙西洛立刻派出探子，偵察林鳳部隊的動靜。

林鳳到了蜂牙絲蘭之後，滿以爲天高皇帝遠，中國官兵不見得會追到這麼遙遠的異域來，同時，也未必知道林鳳現在何處。馬尼刺的西班牙人麼，在他兩次攻城之後，大艦全被焚毀，同時也不見得會那麼好戰，故意派兵到蜂牙絲蘭來和他爲難。他完全不理解，也不會理解當時的政治形勢，西班牙統治者絕對不能容忍他在蜂牙絲蘭坐大。在當時，林鳳的部隊是西班牙征服菲律賓最大的障礙和威脅，如果不把林鳳部隊消滅或逐出，西班牙統治者便無法在菲律賓維持他們的威望。但是林鳳却毫無警惕。

因此探子偵察的結果，便回報說，林鳳很大意，完全沒有提防。沙西洛接到這項報告之後，立刻派遣 Chaves 和 Chacon 上尉，率領九艘小船，每艘船上載着八名士兵，出發搜尋林鳳的船艦。他的目的是要

截獲一艘較大的船艦，以便填塞河口，使林鳳無法逃逸。當西班牙人正在搜尋林鳳的船艦時，意外地發現三十五艘林鳳的船艦正在航行，它們據說是林鳳派出以集取供應品的。它們很優遊大意地航行着，一見到西班牙人，便掉頭而逃。西班牙船上的兵士開鎗追擊它們，中國船幾乎在灘上擱淺，船上的人全部棄船逃入堡壘中。結果，全隊三十五艘的船艦，僅為西班牙人所獲。但是不知是什麼人放火，這些船艦全部被焚毀，不能用以填塞河口。

西班牙典籍的這段記載，也許有點過份誇張西班牙軍的戰績，不過我始終認為，由林鳳整個征非的過程看來，他的部隊並不是一支有豐富作戰經驗的隊伍，而是一羣在中國大陸上無以為生的農民，在尋覓一片可以安居的樂土。他們的目的是要在土地上求生存，而不是要在戰場上立功名。

這個時候大約是早上十時，與西班牙小船隊同時出發的，有一支陸上部隊在 *Cabrero do Rivera* 上尉率領之下，奉命進攻林鳳的堡壘。他們的任務是要牽制林鳳的兵力，使西班牙船隊在截捕林鳳的船艦時，林鳳的陸上部隊無法前往救援。他們成功地攻入林鳳的第一個堡壘，山地的報告書中說：他們「俘獲約一百人，殺死了約同樣的數目。他們同時在寨中放火，後來再說這件事是番人所為。這是一項很大的錯誤，因為風把火燄吹向西班牙人的面部，使他們很痛苦。有些兵士在寨中搶掠。總指揮沒有派援軍前往協助——雖然（西軍）上尉通知了他。因為火燄的緣故，他們只能有很小的作為，使得中國人能夠重新整頓。當夜晚來臨的時候，（西軍）上尉必須退却，放棄他們已經獲得的堡壘。如果與總指揮同留在營中的援軍到來，他們可能會俘獲全部的敵人。據說中國人已經在從堡壘的另一邊，急促地逃往山中。」

截獲三十五艘林鳳船艦的西班牙兵士，聽到陸上的鎗聲時，都離船前往參戰，那些林鳳的船艦，全部焚爲灰燼。

西班牙駐菲總督山地在致腓立二世的報告書中，檢討這一次戰役寫道：

「由於獲得意外勝利的極度的歡愉，他們疏忽了留下一些船以阻塞河口的工作，以及他們（林鳳）也有一些巨大的而配備優良的船，特別是海賊的主艦。因爲缺乏一種對這類事件要應有的秩序，正如與野蠻人作戰所應預期的，這一次沒有達到應有的成功。一，總指揮在聽到陸上的鎗聲時，缺乏趕往救援的迅速性，至少可使 Calderin 上尉極小的部隊，不致被掃蕩。二，缺乏哨兵，並缺乏安全所需的增援部隊，以在如同上述的情況下前往救援。

「有些兵士，帶着運取寨中財貨的奴隸往見總指揮。他們報告勝利，聲稱堡壘已經投降，一切都結束了。這些人沒有他們的上尉的命令私下來往，結果又不受處罰；儘管上尉們堅稱他們曾報告戰況，却沒有採取什麼新的行動。上尉們看見中國人已不再畏懼，並且使一些（西班牙）人受傷，他們便於日落時，在疲憊中回營。如果那些留營的人予他們以援助，堡壘便不會被放棄；他們將會留在裏面，或越過它，那麼勝利便確定了。上尉們說他們都很熱情，但是正如你所看到的，他們自早上十點開始作戰；而這個國家又很熱，他們的武器很重，火煙吹向他們的臉，他們看到夜晚就要到來的時候，還沒有援軍和糧食。他們甚至說如果不是找到了一口中國人爲了他們的工作而掘的井，他們都會滅絕；這口井的水雖然很壞，但是他們用盞取水解渴。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被迫回營。當他們回營的時

候，他們說，總指揮范·黎·沙西洛出來迎接他們，他對他們說，如果他是一名兵士而不是總指揮，他將和他們死在一起，因為他也是一名和中國人作戰的兵士。這些上尉和一般人都覺得總指揮對所發生的事很煩惱——他埋怨他們不遵守他的命令，將船艦焚毀，而且花時間和敵人在寨中周旋；他們回答說這是對他們不宜的報酬，在他們冒對自己極大的危險而達到勝利之後，他是由於妒嫉而說這些話，他只在顯出他自己的不忠，並且在需要的時候拒絕援助他們。……能够指揮這場戰爭的人是確然缺乏的，這一日確然是最幸運的，也是想像中最無秩序的。由於他們的無秩序，和等待敵人復原，他們數人受傷，五人被殺。」

由這段報告看來，西班牙和林鳳在蜂牙絲蘭的初度交鋒，並不見得怎樣取得優勢。沙西洛是西班牙征非初期最有名的將領，在這次戰役中，也受到這麼嚴厲的檢討。

當夜，沙西洛和他的將領舉行軍事會議，大多數的意見認為應該在明天早上，林鳳未能重新步署之前即行進攻。於是，第二天早上，沙西洛率領所有的西班牙兵士準備進攻。進軍到林鳳堡壘附近的地方時，他們接得消息說，林鳳已經準備好堅強的防禦。沙西洛聽到這個消息便下令退却，他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不便進攻，他不願把西班牙所僅有的幾個兵士，暴露在那麼大的危險之下。沙西洛的這個命令，使西班牙軍中發生許多的意見分歧。山地似乎是一直反對着沙西洛在這次戰爭中所採取的戰略，他也認為該日不實行進攻是一種錯誤。

西班牙軍退至林鳳堡壘的附近紮營。林鳳看到這種情形，便下令開炮轟擊西班牙的營地。先前在怡化

戈沿岸爲林鳳所奪的西班牙炮 *Vigilantib* 也被林鳳的部隊所使用。西班牙軍在林鳳炮火的壓力下，終於作再進一步的退却。山地認爲這樣是「一項重大的錯誤，後面隨着一項更重大的錯誤。這樣便變成了長期的圍困，他們自由地以賭博娛樂自己，征收稅餉及諸如此類的事。」

林鳳到了這個時候才切實備戰。他不時派遣帶着槍矛和鎗的支隊外出，他自己却不會離開堡壘出戰，只是在裏面指揮。

當西班牙軍正在圍困林鳳的時候，福建巡撫派遣潮州把總王望高到菲律賓來追擊林鳳。關於王望高使非的經過，我將在下一節中詳細敘述。

在圍困的過程中，沙西洛只是作些伏擊，但是從來未曾與林鳳的部隊作過較具規模的戰鬥。山地的報告書說：

「雖然中國人的領袖派出五百或六百人，裝作要作戰的模樣，但是一般地說來，一有五十名西班牙人出現，他們便會逃走。可以確定地說，如果是面對面，中國人將不會等待作戰；假如是靠着上帝的幫助，如果他們留下來，他們必將潰敗，儘管他們有三倍的軍力，因爲他們不是一個好戰的種族。同時也可以確定地說，所有的人都承認這是事實，西班牙人期望短兵相接的戰鬥，以及實行進攻。他們總是負起他們的責任，作一個勇敢的人那樣地作戰，雖然也有一些懦怯的，正如所有的人都有他的弱點。」

在圍困的期間中，林鳳的部隊和西班牙人有一些小接觸：

「由於護海賊有機可乘，後者能够作些遷延，和一些損壞。警方說，有些兵士被派出去作些小伏擊；但是中國人接獲警報，並作出了反伏擊。有七個兵士離開營地，中國人殺死並俘虜五人，其餘的二人逃逸。像這樣地派出這麼少的人，是極其有勇無謀的，如果中國人比較勇敢一點，它可能造成極大的損害。總指揮不願上尉們的勸告，率領廿人離開營地去組織一次伏擊，也同樣地證明是不成功的，雖然當後援到來的時候，中國人不作很大的損壞便退却了。」

但是林鳳似乎是從來也沒有準備和西班牙人決戰，他的這些伏擊和反伏擊的小接觸，實際上只是緩兵之計。在西班牙軍的圍困之中，他作着撤退的準備。山地的報告書寫道：

「因為海賊沒有船，他派人到外面去砍木，由於他的兵士都是很好的工匠，他們不久便在堡壘中建好了卅艘船，在堡壘被圍四個多月以後，它們在八月四日中午啓航。……當這些船啓航的時候，西班牙人怕它們回來進攻他們；以為是有些隊伍是要來進攻他們的後方。因此，當海賊離開的時候，他們加強他們後衛的防務。認為中國人要來進攻他們是可笑的，他們全部的實力從來也不敢與我們比長短。」

有些史家說：林鳳是掘一條出海的溝渠，由小舟逃脫的，我一向就不大相信這種講法。現在看來，林鳳的堡壘剛剛是在濱海的地方，雖然確切的地點，直到現在似乎還沒有考證出來。而且林鳳的離菲，乃是堂而皇之的撤退。不過自此以後，便沒有再聽到關於林鳳消息。這位在菲律賓濱歷史上留下不朽名字的中國人，遭到了下落不明的命運。

還有一些留在菲律賓的林鳳殘部，逃入中呂宋和北呂宋的內陸，與當地的土人結合。可見當時中呂宋和北呂宋的人民，對中國人的態度是很好的，林鳳在蜂牙絲蘭顯然沒有怎樣地過份虐待當地的土人。即使是西班牙人所寫的，爲侵略者歌功頌德的歷史典籍，也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句關於菲律賓人民報復屠殺林鳳的記載。由林鳳征菲時，菲律賓人民的起義反抗西班牙，和林鳳敗退後，菲律賓人民的容納林鳳殘部；完全證明了當時菲律賓人民對西班牙侵略者的仇視，和對中國人的好感友善。

林鳳征菲的史蹟本身，大體可以到這裏結束。林鳳本人當時如果稍有政治常識，或者他的部隊是一支有豐富作戰經驗的隊伍，他是完全可能逐出西班牙侵略者的。但是他所率領的是一支草莽出身的農民隊伍，而且又是強弩之末，一味苟求偏安，稍遇阻力便要退却。

我在本章中對林鳳在菲律賓的作戰經過，不願求詳地加以描述，因爲第一，林鳳是進攻並暫時佔領一部份菲律賓土地的唯一中國人，一般史籍一向對他的史蹟都不加詳細記載，同時歪曲掩蔽的地方太多；第二，要證明林鳳的征菲主要是屬於移民性質的，他的部屬是優良的工匠，而不是優良的兵士；第三，要體現出西班牙當局對這個事件處理的態度，他們對林鳳征菲事件，在菲律賓的西班牙當局的最高層，作了頗爲客觀的檢討。對照之下，明朝政府對此一事件的記載，顯得異常誇矜無知。

下一節便要講到中國官員王望高對林鳳征菲事件的處理和態度。

王望高使非經過 前面已經說過，當西班牙軍正在圍困蜂牙絲蘭的時候，潮州把總王望高剛好也爲林鳳的事到呂宋來。王望高可以說是菲律賓在西班牙統治下，第一個到菲律賓的中國使節。也是中國政府

和西班牙政府之間，在菲律賓所建立的最初接觸。

中華帝國史對王望高使菲的事蹟，有頗為詳細的記載：

當西班牙將領沙西洛率軍圍困林鳳的時候，奧古斯丁教派的Martin de Rada神甫有一次因事到蜂牙絲蘭去找沙西洛。在回馬尼刺的途中，Martin de Rada在蜂牙絲蘭河附近，Buljane港的地方，看見一艘中國船剛剛駛入該港。他們以為這艘中國船也是與西班牙敵對的，於是神甫所乘的這艘船和另一艘西班牙船，便準備要與中國船交鋒。中國人看到這種情形，便準備逃逸，但是對面的逆風，使他們無法逃脫。西班牙船同時用帆和槳追趕，不多時，中國船便在西班牙炮的射程之內。那個名叫申賽的菲律賓華僑，剛好在那艘西班牙船上。據中華帝國史的記載，申賽是西班牙人所熟悉的，對他們很友善，並且懂得西班牙話。那艘中國船由外表上看來，並不像海賊船，於是申賽請求西班牙人在尚未瞭解船上的實況以前暫勿開火。他到船頭去和他們打招呼，從而並斷那是一艘追尋林鳳的中國船。西班牙和中國官兵便由此互相瞭解，他們有着一個共同目的，而且是彼此懷着友意的。

西班牙人立刻轉乘小舟，登上中國船，帶着申賽任通譯。西班牙人在這一艘船上，第一次遇到了福建巡撫派到呂宋的潮州把總王望高。據中華帝國史的記載，王望高將一張中國皇帝的敕諭展示給西班牙官員及神甫看，該敕諭謂林鳳的屬下如棄離林鳳，轉隸官軍，將獲赦無罪；同時允諾予捕獲或擊殺林鳳者，以很大的獎賞。申賽向他敘述林鳳征菲的經過，並且告以林鳳目前正被圍困於蜂牙絲蘭河口，無處可以逃逸。王望高聽到這些消息之後，樂不可支，喜不自禁。『他數度擁抱西班牙人』，並以各種各樣的方法表示

他至爲歡欣。由於他被告以林鳳之被捕獲或擊殺，已經是指日可期的，蜂牙絲蘭又在附近，他便決定到蜂牙絲蘭去，和西班牙軍的總指揮商議一下。於是王望高帶着申賽，與西班牙人分手，到蜂牙絲蘭去。

到了這個時候，已經可以相當確定地看出，前面所提及的華僑敗類申賽，便是當時菲律賓華僑的所謂僑領。我們只要看到他那麼輕易地爲西班牙總督所接見，經常與重要的西班牙人爲伍，懂得西班牙話，同時爲西班牙人所熟知，並且似乎還得到他們的信任，便可斷定，申賽無疑是當時的菲律賓華僑的上層僑領。由上面記載的各種史實考察起來，作爲僑領的申賽，一方面與西班牙統治者互通聲氣，另一方面則勾結封建王朝的腐敗官僚。

讀史的將候我們常常要注意到史家的觀點，他們主觀的理解力以及社會生活的制約性。中華帝國史在描述王望高的歡欣時，說：「他數度擁抱西班牙人」，可以說完全是以西班牙人的生活習慣，來描述中國人表示歡欣的方法。明朝政府的官員，無論怎麼地喜不自禁，都不會「數度擁抱西班牙人」。我爲什麼要這樣地提到這些瑣碎的問題呢？因爲我們將會接觸到許多西班牙史籍中對中國人的描述，對這一類的記載，我們必須先有一個正確的認識：西班牙史家是依照他們的社會生活，和傳統習慣來理解問題——這當然是指他們不帶偏見歪曲問題的時候。

現在讓我們繼續敘述王望高使菲的經過。

西軍總指揮很有禮貌地接待王望高之後，告訴他林鳳已瀕絕境，不久就會被解決，他勸王望高到馬尼刺去。他還告訴王望高，他不需要中國艦隊的合作，因爲他的軍力足以應付林鳳。於是他派一艘築划的小

船，載王望高到馬尼刺，並且保證在數日內將林鳳送交，不管是活的還是死的。

王望高到馬尼刺以後，受到當時的西班牙駐菲總督拉未沙禮示（Guido de Lavezaras）的盛意款待。但是在馬尼刺過了數日，王望高看見圍困仍然繼續，林鳳何時解決却還遙遙無期，中國方面又不知他的下落；反正現在林鳳已被圍困，西班牙人又已向他保證過，無論如何，他們將把林鳳交給他——不管是死的還是活的，使王望高可以向政府銷案。於是他通知西班牙總督，說決定先行回國，在接到林鳳被捕獲的消息之後，再到呂宋來。總督表示同意王望高的這項決定，而且再度向王望高申明，如果林鳳被捕獲或被擊殺，他將立刻通知王望高。

西班牙總督同時供應王望高旅途的全部必需品。王望高對西班牙總督的舉動非常感激，於是答應他可以帶幾位神甫，和數名西班牙兵士同往中國。他相信由於他將帶回有關林鳳的好消息，他攜帶神甫赴華的舉動，將不會帶來什麼危險。自從黎牙實備開始征服菲律賓以後，西班牙當局便一直準備要派遣傳教士到中國，一方面可以傳道，一方面也可以研究中國的事物。但是他們從來也沒有辦法完成這項願望，因為馬尼刺的中國商人，不論得到多大的代價，都不願意幫助這些神甫，他們都害怕中國王法將加在他們身上的懲罰。現在王望高答應親自帶西班牙神甫到中國去，這件事完全使他們喜出望外。

結果，西班牙當局派遣兩名神甫 Martin de Rada 和 Geronimo Marin 與王望高同行。這兩位神甫都是屬於奧古斯丁教派的。Martin de Rada 一向都表現出他對中國有很濃厚的興趣，一五六九年七月八日，他便自宿務寫信給西班牙駐暹西哥的總督，討論侵略中國的計劃。因此，Rada 奉派隨王望高赴華

，實在是很耐人尋味的；他本人懂得華語，而且曾經一再地用盡種種方法要到中國。這兩位神甫同時帶了兩位西班牙軍官 Miguel de Lourca 和 Pedro Sarmiento 同往。神甫們帶軍官同往的目的，是準備如果中國准許他們傳教的時候，派軍官回菲律賓，以便向總督報告所見所聞。

王望高邀請西班牙神甫赴華，使當時在菲律賓的西班牙當局雀躍歡欣。因為這是他們一向所求之不得的。西班牙總督爲了要向王望高表示他的感激，特別送他一付質素極佳的金鏈，和一件很華貴的長袍，他們也預備了一些禮物，要王望高帶給泉州府同知和福建巡撫。中華帝國史又記載道：「同時爲了不會使申賽（我在前節已提及，他是位知名的商人——原文）不滿或覺得困惱，使（西班牙人）所要進行的工作能順利，總督也給他另一付金鏈；……」同時，與林鳳作戰所獲俘虜，也全部交給王望高。

菲律賓的西班牙當局對當時的中國官員表示親善，主要的原因有二點：：第一、希望能够在中國建立一個傳教，並進而研究中國的據點；第二、設法與中國建立正常的貿易關係。不過，平心而論，當時的中國政府實在不必把門戶完全關閉，如果西方文化從那個時候便開始大量傳入中國，亞洲的（甚至世界的）近代史將會有着全新的面目。可是當時的中國政府一方面未能抵抗歐洲侵略者，保護亞洲鄰國，使中國的威望在亞洲落後民族的眼中降低喪失；另一方面又一味看輕「夷人」，不肯切實加以理解學習，結果使中國墮入數百年慢瘡的災難中。

「主曆一五七五年六月十二日，一個星期日的早上，上述的總督和所有的公民，聚集在一起，到聖·奧古斯丁教派的修道院去。在那裏作一次最莊嚴的聖靈的彌沙。在最終，所有的人都請求上帝，以最高主

宰的尊嚴和榮光，來引導這個旅程，並拯救這個魔鬼所長期控制的巨大帝國中的靈魂。」

到了中國之後，這些神甫受到很有禮的接待，但是他們始終受到監視，中國官員不許他們離開他們的住所。據說福建巡撫懷疑王望高、申賽和西班牙人互相串通，偽造有關林鳳的故事。這羣由菲律賓派出的西班牙使節，在一五七五年十月間返菲。Rada 神甫還帶回一百多部的漢文典籍，他是早期在菲律賓研究中國文化的最重要的西班牙學者。

中國典籍對西班牙人這一次的對華訪問，幾乎一致稱為朝貢。明神宗實錄卷五四記載曰：

「萬曆四年（一五七六）九月丙申：巡撫福建按察使劉堯誨奏報，把總王望高等以呂宋夷兵敗賊林鳳於海，焚舟斬級，鳳潰圍遁，復斬多級。并呂宋所賚貢方文物以進。下所司。辛亥，禮部議賞呂宋番夷例以聞，報可。」

據這段記載，呂宋的西班牙軍好像是受王望高所指揮的。泉州府同知陸一鳳更是誇矜狂妄，認為林鳳事件中，呂宋是「小夷效順，機我大鴻臚典。」泉州府志卷三〇記載曰：

「呂宋迫逐林鳳，有所俘獲，上獻，因請得入貢，比於暹（暹羅）、臘（真臘）諸國。臺下議，鳳曰：「不聞職方氏有呂宋也，奈何以小夷效順，機我大鴻臚典。」臺曰：「當如何？」曰：「疆場之利，專之可也。以臺勞，取羈縻而已。」諸與議者咸服。」

山地在致腓立二世的報告書中說：

「他們偽造拉米沙禮示給他們的信件，其中竟有一部份說他們在前綫英勇作戰，並在西班牙人焚

燒船艦和摧毀堡壘的時候鼓勵他們；因此他們除了升官之外，每人還獲賞四百兩銀，每兩銀約值十二個西班牙 *reals*（銀幣）。」

山地 在報告書的另一個地方寫道：

「有一封來自中國的信，來自 Yneuanon（？）（因為他們是野蠻人，他們所實在擁有的關於我們的情報，說我們的數量只有二百人），他說（我不知道那些字是什麼，但是意思是「買物」），在我到來以前，中國人在去年所取去的禮物，已放置於國王的寶庫中。神甫回來之後告訴我，王望高塗改由此取去的信，他甚至偷去了一大部份的禮物——他必定是說，在他參加西班牙人作戰之後，海賊林鳳的船艦是靠着他的力量焚毀的。」

西方力量入侵之後，中國政府派來的第一個使節，便這樣地使中國蒙受極大的恥辱。他們在國體蒙羞之後，還要大言不慚，貽不知羞地說什麼「諭呂宋國主」，把西班牙人所送的禮物當作朝貢品，還要說什麼「奈何以小夷效順，穢我大鴻臚典！」

一五七五年十月間，西班牙神甫要求在中國傳教不被允准之後，只得返菲律賓。王望高也在這個時候再度使菲。這個時候華僑敗類告密者申賽，已經是明朝政府的官員了。我已經在前面指出過，華僑敗類申賽，無疑是當時的所謂僑領，儘管他因為替西班牙侵略者立功，而獲明朝政府授以官祿，但是他出賣亞洲民族的罪惡行爲，使他在歷史上，永遠成爲菲律賓濱和中國人民所共同唾棄的第一個菲律賓華僑。

王望高第二次抵馬尼刺的時候，西班牙駐菲總督拉未沙禮示，已經由山地繼任了。有些史家認爲山地

之所以經常對一切屬於中國的事物懷有偏見，是由於王望高不願把原來要送給拉未沙禮示的禮物，轉送給山地。我認爲事實未必儘然，山地在報告書中寫道：

「他們帶來一些薄禮，幾塊絲綢和棉質圍巾，還有一些信。有一部份的禮物是要送給總督的，另一部份送給總指揮，一部份給軍官，其他的給兵士……我接受原要送給總督的那一份，現將該包禮物呈于陛下……」

至於王望高帶來的那些信，原文很少看到，*Philippine Islands* 第廿三卷，有一封福建巡撫所寫的信的英譯文，只是，語氣太西方式了。而且都不過是泛泛之詞。

山地不大可能是因爲與王望高之間的誤會——所謂不送禮物，而對中國存有偏見。山地也許可以說是西班牙諸總督中，最富侵華思想的。但是侵略中國，可以說是菲律賓濱西班牙領袖的一致願望。即使那些常常排出一付仁慈面孔的神甫，也大多是侵略中國的支持者。例如懂得中國話，到過中國，對中國事物頗有研究的 *Martin de Rada*，便是侵略中國的支持者。因此，說山地對中國存有特別的偏見是很不適宜的，他的主張也許會稍爲激烈一點，但是和西班牙自菲律賓濱侵略中國的一貫政策却是相符合的。況且，自山地的整篇報告書看來——當然其中也有錯誤，他是一個很細心的行政者。例如他說中國官員以西班牙的禮品爲賈物，王望高僞報戰功，竊西班牙軍的戰績爲己有，這些都與中國典籍的記載相符，並不是無端的謾謗。山地只是一個更積極、更明目張胆的侵華主張者，他的這項主張絕不是特例。

由於他日常所接觸的中國人，大多是中華民族最腐朽的部份，如申襄、王望高之流，因此他對中國人

的印象極劣。王望高第二次使菲時所率的船艦共計十艘。山地寫道：

「這十艘船艦運來一些商品出售，雖然很少，但却以高價售出。他們是一羣鄙賤，無恥而且可厭惡的族人。他們在這個港埠中逗留了六個多月，並且要求帶一些禮物回去——說是這樣做才能得到他們的好感；如果給他們以這些禮物，將在他們的國家中大大地有助於西班牙人。一聽到林鳳逃逸的報告之後，由於這些人和番人一樣地懦怯，他們懇求寫一封信到中國去說林鳳已經死了。爲了這項目的，他們設法購買許多人頭，這是本島的土著常常作爲珍品保藏的，他們要用來說，這是林鳳的頭。他們僞造一個假圖章，也說那是林鳳的，由他們奪來的。他們竭力要我如此這般地寫信到中國去，但是當他們一提起這個問題的時候，我總是告訴他們，西班牙人不懂得怎樣說謊，而我們不能討論這樣瑣碎的問題。……當他們在這裏的時候，我待他們很好，但是除了送禮之外，沒有別的方法軟化他們的心。雖然——在我看來，武器將是更有效的。」

王望高這次回國時，帶着兩名神甫 Martin de Pada 和 Agustin de Albuquerque 同行，在一五七六年五月四日離馬尼刺，這兩位神甫希望能夠留在中國傳道。但是這一次西班牙人除供王望高以旅途的必需品外，沒有再送任何禮物。我猜想得到西班牙人不送禮的原因，主要的是不願意他們的禮物再被誤認爲貢品；其次是他們不相信王望高會按照實額將禮物送交。因爲這個原因，這兩位神甫被王望高的船艦隊，丟在三描禮示 (Zambales) 岸邊。(Historia de la Orden de S. Agustin de Estas Islas Filipinas)。

從很幼小的時候開始，就聽到父兄師長說外國人如何尊崇中國人的文化道德，開始的時候我也信以為真。然而後來認真地研究幾個問題以後，才知道原來並沒有這回事。一切較負責任或較有權威地位的西方人，都很少尊崇中國或中國人。有時候，偶爾說兩句好話，其實在背地裏却都有着其他的作用。

山地的報告書是西班牙統治者的統治建立之後，菲律賓的西班牙當局報告其本國政府的第一件最重要的文件。我們對西班牙侵略者的動機和行爲，不能不表示憤慨；但是我們却不能不承認，他們對中國和中國人的分析，有些地方是頗爲客觀的。

對中菲關係的影響 林鳳征菲是菲律賓歷史上的一件重要的大事，其對中菲關係無疑發生非常深長的影響。這影響可以分爲中國與菲律賓人民的關係，及中國與西班牙統治當局的關係兩方面。

前面曾經一再提及，在西方國家尚未入侵之前，菲律賓人民與中國有着長期的友好關係，菲律賓人民對中國存着極大的敬仰和尊重。當西班牙侵略者到來，菲律賓人民無助地受到侵凌的時候，他們對中國開始感到失望。林鳳征菲（一五七四）的事件，發生於西班牙統治的初期（西班牙於一五七一佔領馬尼刺），自林鳳開始進攻西班牙人至林鳳敗退的整個過程中，廣大的菲律賓人民表現出他們是以中國爲友，以西班牙爲敵。但是由於林鳳的失敗，菲律賓人民對西班牙侵略者的畏懼增加了，於是，西班牙在菲律賓的統治地位得到進一步的加強。

但是更壞的是有一部份菲律賓華僑，當廣大的菲律賓人民起義響應林鳳的時候，以申賽爲首去和西班牙侵略者勾結。這種舉動爲菲律賓華僑帶來了無窮的後患，在菲律賓人民內心的深處，種下了輕蔑華僑和

中國之根。也許有人會說申賽之流的行爲，只不過是權宜之計，是爲了要保全華僑的生命財產。一時聽來，這種講法也許好像有幾分道理，但是從歷史上來分析這個問題，申賽之流的舉動完全是對亞洲民族的出賣。作爲當時可以說是世界主要強國之一，而毫無疑問的是亞洲最強的國家的國民，當準備計劃侵略中國的西班牙侵略者，在廣大菲律賓人民支持中國反抗西班牙之下陷於孤立的時候，反而去和西班牙人合作實在是罪大惡極的。

十六世紀的後半期，是歐洲國家開始對亞洲進行實際侵略的時代。在這樣的一個歷史時代中，任何一個在亞洲土地上抵抗歐洲侵略者的亞洲人，他所進行的戰爭在亞洲人看來都是正義的。在同一時期，中亞細亞的回教勢力，也正在向歐洲擴張，在這一個時期任何抵抗回教勢力的歐洲人，在歐洲歷史上都受到表揚。林鳳的征非開始使菲律賓人、中國人和日本人抵抗歐洲侵略者的血，在菲律賓的土地上混和了。

明朝中國政府對這種形勢一無所知，對菲律賓人民翹望中國幫助，驅逐西班牙侵略者的合理願望，完全不加理睬。在林鳳征非的時候，派來了一個王望高，在菲律賓除了羞辱國體之外，毫無作爲。對上峯的報告又是偷天功爲己有，使中國典籍對此事蹟的記載成爲歷史笑料。中國文人一向主張「格物致知」，認爲「一物不知，君子所恥」，中國封建王朝的腐敗官僚，對林鳳事件毫無所知，而只是一派狂言的態度，實在是完全不可容忍的。

王望高使非的表現，在菲律賓造成一種使中國很尷尬的場面：菲律賓人民支持中國，中國政府却與菲律賓人民的仇敵，壓迫菲律賓人民的西班牙侵略者爲友。中國政府這項政策的後果，是完全可以想像得到

的。從這個時候開始，明朝中國始創的這項自取滅亡的政策，一直延續了數百年之久；不但使這個數千年雄踞中原的亞洲第一強國的威望完全掃地，而且使她在近代史上有一個時期面臨亡國的嚴重危機。

以王望高、申賽之流爲代表的中華民族最腐朽的成份，使菲律賓濱人民對中國開始由失望轉爲輕蔑。而西方侵略者，西班牙的統治當局對他們的印象又復如何呢？山地致腓立二世的報告書中說：

『他們是一羣鄙賤、無恥而且可厭惡的族人。』

『他們是異教徒，作出很荒唐的事。……（形容中國人不信教）……他們是一個卑鄙的族人，而且且是鷄姦者，西班牙人可以證明他們看見年青的孩子到法庭，詢問他們所犯的罪應受罰的款額，而率直地付款。他們都是暴君，特別是那些執政者，這些執政者厲害地虐待窮弱者。』

山地把中國人和菲律賓人等同看待：

『（中國）人的品德很壞，正如這些島（非島）上的居民，這些島嶼實在是屬於中國的羣島，它上面的居民與中國人是同一族人……』。

山地的報告書對中國人的印象，無疑是根據他日常與中國人的接觸，以及曾經到過中國的那四個西班牙人的報告。林鳳征菲無可避免地會在西班牙人的腦海中留下一個印象，一個在中國被逐海賊，尙有力量幾乎攻陷馬尼刺，中國的實力是不可低估的。但是西班牙當局對中國政府和中國海盜，在這個時候似乎已經有了辨別認識。山地的報告書中說：『一支有一百人的海賊，就能够掠劫有三萬居民的社鎮。』

西班牙當局對中國『執政者厲害地虐待窮弱者』這項事實非常重視，山地在主張侵略中國的時候，

便以這項事實作爲他主要的根據之一。

繼續主張侵略中國 準備侵略中國是西班牙當局佔領菲律賓以後所採取的一貫政策。林鳳敗退之後，西班牙駐菲總督山地繼續主張侵略中國。山地主張侵略中國的理由和根據是：

「和這個國家（中國）的戰爭是最公義的，因爲這將于窮弱者，被殺害的，孩子們被陌生人所劫奪的人民以自由；他們的法官、執政者、和國王以聞所未聞的暴政對待他們。他們每個人都說他的鄰居的壞話；他們幾乎全是海賊，只要一有機會，他們沒有一個人會對他們的國王效忠。況且，一個戰爭可以因爲其禁止（外）人進入他們的國境而發動。除此之外，我不知道，也未曾聽到過，他們未曾做過的壞事；因爲他們是偶像崇拜者、雞姦者、強盜、和海賊，不管是在陸地上，或是在海中。在事實上，根據國際公法應該是自由的海，在中國人看來並非如此；有什麼人航行至他們所能抵達的地方，只要他們能力所及，便受到殺害和搶掠。有一天我去見王望高，私下告訴他我要派一艘大帆船與中國進行貿易，他以友誼及最大的誠懇告訴我，除非我能再派十艘以上配備良好的船與其同行，便不要派那艘大帆船去；因爲中國人極有犯罪的傾向，他們會在某種藉口之下，設法攻擊截捕，以便搶奪它上面的財物，並使其船員充奴隸。可以很穩當地說，不管我們對他們怎麼好。他們每日都要提供我們以一千種可以進行正義戰爭的理由。現在我的意見是，如果陛下喜悅，有足夠的軍力，使他們（中國人）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發現我們有準備將是對我有利的。」

這段話可以說是對中國人極盡侮辱誹謗之能事，中國官員王望高似乎也與他甚有同感，中國政府第一

次派到菲律賓來的，就是這麼一個一再辱國的使節。其中所說的中國皇帝和執政者，如何殘民以逞，固然不是沒有根據的；他認爲「只要一有機會，他們沒有一個人會對他們的國王效忠」，也可以說是有一定的真理；在中國每逢末朝的時代，末朝的官兵總是狼狽不堪，新的執政者常常是「義師所至，望風披靡」；但是對外來的侵略者却從來不會有這種態度，當時的山地總督似乎是在夢想西班牙侵略者的「義師」，會得到中國人民的支持響應。不過他的最後一句話，說要讓中國人知道西班牙隨時都有準備，倒是表現出他對某一羣中國人尙存畏懼，也許是他們對林鳳征菲的餘驚未定。

當時侵入亞洲的歐洲國家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但是在他們之間，就已存在着矛盾，這種矛盾也體現在西班牙對中國的態度上。葡萄牙人比西班牙人更先到亞洲來，而葡萄牙人一到亞洲來，便竊據亞洲大陸邊沿的土地爲據點，先是印度沿海的港岸，進一步便消滅馬來半島上的馬六甲王國。當西班牙佔領菲律賓的時候，葡萄牙人早已據中國土地澳門爲貿易站了。葡萄牙人這一點時間上和地理上的便宜，常常引起西班牙人的嫉恨和顧忌。山地報告書中所舉的另一個必須迅速侵略中國的理由是：

「有些番人（Indians，在西班牙侵略典籍上用以泛指一般美洲和亞洲的土著居民，也有可能是印度人。），日本人、和中國人告訴我，葡萄牙人運武器到中國去，特別是我們所用的炮；有一個中國人賣給我一把葡萄牙關劍。葡萄牙人教他們如何使用大炮、如何御馬、以及其他對我們同等有害的事。因爲他們是商人，他們這樣做是不足爲奇的。陛下是不是認爲應該加速這個遠征，並立刻進行？因爲在事實上，這是對上帝和對陛下的服務上，所可能發生的最重要的事。我們聽說他們共有一百萬

人，他對其國王的稅資達三千萬或更多些。」

由這段話看來，山地顯然是害怕中國人學會了歐洲的武器和作戰方法，西班牙便無法征服中國，因此勸西班牙國王迅速行事。他同時作出了一些準備計劃：

「這項遠征所需的是四千至六千人，配備着槍矛和鎗、船艦、砲、和所需的彈藥。」

「有二千或三千人，便足以佔領所欲佔的省份，而由其港口和艦隊，成爲海上最大的強國。這將是很容易的。征服一省之後，便足以征服全國。」

「人民將會立刻反叛，因爲他們受到很惡劣的待遇。他們都是異教徒，而且很貧弱；我們所將讓

他們看到的良好的待遇，威力的顯證，和宗教，終於會使他們堅強地和我們連結在一起。

「這些島嶼有足够的木材、和足够的人手，以建造一大隊的帆船。在這一切島上，有許多海賊、

我們可以爭取他們幫助這項遠征，同時可以爭取日本人幫助，他們是中國的死敵。所有的人都願意參加這個行動。有一些土著海賊將與我們在一起，引導我進入該國。」

當時的西班牙如果侵略中國，能否如山地所說的，在中國大陸上佔得一個據點，我們在現在只能加以揣測。以中國沿海的廣闊和明朝政府的腐敗，西班牙在中國沿海登陸並佔一據點，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山地所預期的中國人民反叛明室支持西班牙，却是全然不可想像的。即使中國人民乘機推翻明朝暴君，也不會忍受一個由數千哩外而來的，一向與中國毫無傳統關係的異族暴君的統治。

自從元朝的忽必烈遠征日本失敗之後，日本民族便逐漸活躍起來（其中的因素很多，我現在不加分析

），明朝中國的沿海，便不時受到倭寇的騷擾。西班牙侵略者對明朝時代的中日關係，顯然是熟悉的。不過在這裏值得注意的，便是西方強國和日本結盟瓜分中國，並不是廿世紀才開始的。西班牙在佔領菲律賓的早期，便企圖聯合日本來滅亡中國。

最令人感到興趣的是中國海賊與西班牙侵略者作戰，中國政府企圖利用西班牙侵略者的力量消滅中國海賊，看到西班牙侵略者擊敗林鳳的時候，「樂不可支，喜不自禁」。西班牙侵略者却計劃着要組織海賊的力量，幫助西班牙軍打垮明朝中國。相形之下完全表現出明朝中國的對外政策（更正確地說是毫無政策），是多麼地愚蠢、無能、昏庸、可恥。

在西班牙駐菲的諸總督中，山地可以說是特別具有侵略中國的熱誠，他在報告書中寫道：

『我自薦願在這項遠征中為陛下服務，我極其熱望，因而使我不可能講得過份。假如是因為這個原因，使陛下不信任我是你忠實的臣屬和奴僕，就讓你所喜悅的其他人主持這項遠征，即使我不同去亦可，只要它是在陛下的名下進行的。只要我能成為陛下意慾的推動者，我就滿足了；……如果上帝樂意賜我以巨大的財富，我將隨時依陛下的命令，我將毫不猶豫地將我全部的遺產，用於這項遠征之上。』

山地對侵略中國的意慾也許是特別強烈，但是侵略中國確然是當時西班牙政府的冀望，作為侵略中國的初步，西班牙駐菲的第一任總督黎牙實備，便有着一個探察中國的切實計劃。一五七三年（萬曆初年）六月六日，Francisco de Ortega 神甫致書西班牙駐墨西哥總督寫道：

「探察中國之旅沒有實現，原因是黎牙實備總督之死，他非常服從我皇陛下和閣下的命令。」
William Lytle Schurz所著的The Manila Galleon中寫道：

「一位老練的領港者和航海者Juan de la Isla向腓立二世建議的探察之旅從來未曾實現，雖然它可能獲得比後來探察更多的收效。La Isla建議一面調查貿易的可能性，同時沿亞洲海岸至北緯五十或六十度繪圖，然後再沿美洲海岸至新西班牙（墨西哥）。關於這一方面的指示已經準備停當了，但是黎牙實備死於這位熱練的海員離開馬尼刺之前，他的繼任者拉未沙禮示，拒絕供給這項事業所需要的。」（一九五九年紐約版）

這項探察中國的最初計劃，並不是誇誇其談，而是一個詳細切實的計劃。西班牙典籍對這一個計劃有許多片斷的記載，只要加以進一步的整理研究，便可以知悉當時西方最主要的強國，準備侵略中國的實際計劃。

不過，有許多歐洲方面和西班牙內部的問題，阻止了西班牙政府作出侵略中國的實際行動，我們在後面還會接觸到這個問題。

第五章 西班牙當局的初期對華政策

爲什麼不侵略中國 西班牙征服菲律賓的時代，可以說是西班牙歷史上的最高峯。一五七一年，也就是黎牙實備佔領馬尼刺的這一年，西班牙和回教奧吐曼的海軍在地中海決戰，獲得決定性的勝利。這就是歐洲史上有名的黎班道（Lepanto）在今希臘哥林多（Corinth）灣內的海戰。這次的勝利對歐洲的前途有很重大的意義，回教的海軍力量在這次戰爭中崩潰了。

當時整個的美洲大陸完全在西班牙的掌握中，但是西班牙却沒有將自美洲大陸掠奪而來的巨額的財富，投資於工農業的生產，建立鞏固的國家經濟基礎。美洲的黃金和白銀，僅被用以購買外國商品和維持軍費。

作爲當時歐洲最主要的強國，在保衛歐洲抵抗回教勢力的戰爭中，西班牙付出了相當的代價。

除了與中亞細亞和東歐的回教勢力作戰之外，在歐洲內部，西班牙和法國的戰爭也長期持續着。在西班牙國內，皈依基督教的回教徒，因爲不堪壓迫，在一五六八年爆發革命，前後經過四年才被壓平。

由於西班牙的經濟金融一向是掌握在猶太人的手中，西班牙政府和宗教集團對猶太人的逼害和驅逐，同時又沒有培養出一個足以代替猶太人的西班牙經濟勢力，無疑是對西班牙的社會經濟結構的打擊和破壞。

。後來對回教徒的逼害和驅逐，也引起西班牙地主階級的抗議，因為這種舉動對西班牙的農業發展是不利的。西班牙這種毫無遠見的宗教熱狂，對西班牙自身的經濟產生了極大的損害。

本來，西歐的荷蘭（包括比利時）也是屬於西班牙王國的領域的。一五六六年，反抗西班牙統治的革命戰爭在荷蘭爆發，這個戰爭在表面上是宗教戰爭，因為大多數的荷蘭人是信奉基督教新教的，但是在實際上，却帶着很濃厚的政治和民族的色彩，不過，我不要在這裏詳加討論。西班牙與荷蘭的戰爭是很長期的，這個戰爭後來甚至擴展到西班牙和荷蘭在亞洲的殖民地上來。這是予西班牙以最大的消耗的一個戰爭。因此，在歐洲戰爭的長期持續，西班牙國內的動亂和經濟困難的情況之下，腓立二世對侵略中國的行動當然有所顧忌。歐洲的戰爭已經使西班牙在財政上發生困難了，他當然不願意再在亞洲陷於與中國的長期戰爭中。中國的威名是老早就已傳遍歐洲了的。

八連的建立 西班牙人佔領菲律賓的時候，西班牙本國的社會在基本上是一個封建社會，因此它對菲律賓的剝削形態，主要的是封建的剝削形態。便是把大片的菲律賓土地，圈封給西班牙王國征非的功臣，和有勢力的權貴。由於重洋遠隔，西班牙本國的手工業和輕工業產品，無法大量運到菲律賓來推銷。因此，當時菲律賓的消費品，完全仰賴中國供應。

在佔領美洲大陸之後，西班牙成爲全歐洲最富有的國家，擁有大量自美洲獲得的黃金和白銀。因此，西班牙對菲律賓的佔領，大大地使菲律賓的消費力提高了。墨西哥的白銀源源自美洲大陸流到菲律賓，在西班牙統治者強大消費力的刺激下，中國和菲律賓的貿易有了很大的發展。

一向公然表示仇視中國人的西班牙駐菲總督山地，在一五七六年（萬曆四年）六月七日致書西班牙國王腓立二世，正式反對與中國貿易：『因為他們帶走我們的黃金和白銀』。

但是西班牙本國又無法供應菲律賓的日常消費品，因此中菲貿易在這個時期只有繼續發展。自中國來的移民也在這個時候大量增加，中菲貿易和菲律賓華僑的數量，開始引起了西班牙當局的關懷注意。曾任馬尼刺Royal Audiencia法官的Antonio de Morga，在他所著的Suces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記載曰：

『在他（郎基溜，Gonzalo Ronquillo de Peñalosa）的任期中，與中國的貿易增加了，他在市內建立一個市場或叫八連（Parian），使中國人得在其中售賣商品。他訂定了對輸出新西班牙（墨西哥）的商品徵收百分之二，對菲律賓自中國輸入的商品徵收百分之三的稅則。雖然，他因為沒有皇上陛下的敕令，擅自行動而受到申斥，這些關稅的稅則仍舊有效，而且自該時起一直繼續徵收。』

郎基溜自一五八〇（萬曆八年）至一五八三（萬曆十一年）任西班牙駐菲總督。Morga的著作於一六〇九年（萬曆卅七年）在墨西哥出版。

『八連』在中國典籍中作『泖內』，張燮東西洋考卷五呂宋條記載曰：

『其地去漳為近，故買船多往。』

『華人既多詣呂宋，往往久住不歸，名為墜冬。聚居泖內為生活，漸至數萬，間有削髮長子孫者』

我不大清楚中國人爲什麼將菲律賓華僑叫做「壓冬」，這個名詞現在已經不再應用了。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三，也有一段關於菲律賓華僑的描述：

「是時漳泉民販呂宋者，或折關破產，及犯壓各境不得歸，流寓土夷、築廬舍、操傭買雜作爲生計。或娶婦長子孫者有之。人口以數萬計。」

關於八連的建立和西班牙當局早期的華僑政策，天主教的第一任菲律賓大主教沙拉利（Domingo de Salazar）神甫，在一五八三年所寫的 *Relacion de las cosas de las Filipinas* 中，有頗爲詳細的記載：

「與生理人的通商，一向被認爲不但是對本市的供應和貿易，而且也是對來此投資並有所期的那些人，係非常重要的。這項貿易在今年受到很大的難爲和損害，我們很怕由於此間的紛亂，和他們所受到的惡劣待遇，那些來到此間的（中國）人，或其中有許多，將不願再來，或者不願依照先前的價格出售他們的產品。」

「在去年和今年之中，不良的反應增高了；因爲他們在開始的時候，不必付什麼（稅）；後來便有繫船稅加在他們身上——主要地是爲了確立權力的承認，而不是爲了要有所獲；去年和今年，他們向生理人要求百分之三的關稅，如此使後者蒙受許多的損害。他們大大小小被命令參加修建一堵木柵，而這變成了一個徵稅的機構。他們都很不願意到那裏去，他們在裏面要付出比在外面更高的代價。一個有權懲罰他們的看守人，被委在他們上頭；而且根據報告，有許多虐待和損害加在他們上面。事

實上，他們因爲很細微的原因便被加上餘扣，並課以苛厲的罰金。有時候他們因爲晚上出外小便，或因爲他們的地方不够乾淨而被罰款。

在他們必須向陛下納稅的藉口下，他們出售任何沒有先行登記的東西都要受罰；然而當他們實行登記的時候，他們最佳的商品却被檢查員或登記員以自訂的價格取去。因此生理人便藏下一些絲綢，或是在對他們較有利之下售出，或是將商品送給他們所允諾之人。他們會因此受到嚴酷的懲罰，好像這條罰則已經施行數年了，而事實上是相反地，他們僅僅聽到了一兩次。我知悉的各事中，有一件是因爲一個中國商人藏匿了幾塊絲綢，庫官 Antonio Yofre 命令加以沒收，並判他被鞭一百鞭、罰款七十五 *pesos*（西班牙銀幣，值半披索）。他的一個兄弟跑來請求我的保護，在我的要求下他們取消鞭撻，但是要付清 *pesos* 才能離開牢獄。這些及其他的個別虐待，發生了許多次，使我大爲困擾。有些人暴力取去生理人的商品，並收藏下來；有些人給他們以期票（這是在他們之間大量使用的）然後再拒絕付款。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會趕來找我；因爲我無法彌補這些錯誤，我大爲苦惱。這種向他們奪取商品的紛亂和不法是太普遍了，爲了要取得較佳和較廉的，那些在這種事項上有權力的人，不願讓生理人有出售商品的自由。但是我所提起的這些人把所有的貨品取去了。在擇取他們所欲，並付出他們自訂的價格之後，他們還要將剩下來給他們的僕役、朋友、和部屬。結果，雖然有廿艘船來自中國——從來未曾看見過在同一期間中來得那麼多，今年完全看不出中國運來了什麼東西。中國商品漲至極高的價格，一塊先前在此間值十或十二 *pesos* 的緞，以四十或四十五售出；而且依然無

法找到，即使是要給教堂的，（教堂）非常需要，它還無法得到絲綢以作一件裝飾品。先前在街上沿街叫賣的所有其他中國商品都是一樣。……

『由這種情況，造成很大的災害，這一定是本市的貿易中止的原因。那便是，所有的商品在今年，爲少數人所擁有了……：罪惡還不止於此；因爲這些商人被迫服役充哨兵，正如兵士一般，爲了要使他們的商品不致被偷竊，他們僱用兵士爲他們服役。因此爲了服役充哨兵的事，他們每年要付出 Boston 。

『這些商人復被召參加赴日本的遠征，一隊船艦準備駛向那邊去；爲了要避免前往，他們每人要付出卅或四十披索（Peso）。於是，在許多方面，今年的貿易是不幸的。最後的一件損害——那便是對中國人最難爲的，而且最使他們激怒的——便是我所提及的，派一艘大帆船赴日本的遠征、廿或卅名今年到此間居留的生理人被拉夫，並被迫划船。有許多人來向我申訴，說他們到此間是爲了要謀生養活他的兒女；並且要求既然他們不能被允許達到至此的目的，他們應被允許回他們的本土。但是他們和我這樣說都沒有用，他們參加這項遠征而且還沒有回來。由此產生了一件對我們所有的人的損害。因爲那些被派隨大帆船前往，以及後來再派往的，都是漁人，先前在街上大量廉價出售的魚、現在以很高的價格也無法得到。後來，他們又派另一隻船，載着供應該船艦隊的米、也命令同一數目的生理人同往。爲了要避免前往，每個人都尋求可以代替的人；那些沒有僕役可派的人，付十披索僱人代替。這些，以及其他的錯誤，使今年來此居留的二百名生理人回國；而那些已經在此居留的，也有

二百名以上離去。在隔河的對岸，他們本來有一個很繁榮的居民區，現在看來好像是沒有人了……不過當時在菲律賓的西班牙行政當局與宗教當局之間存在着一種摩擦，因此上面的一段話，有些地方也許會稍嫌誇大，然而在大體上却是可靠的。沙拉利本人對向中國傳道有極大的熱忱，他希望利用與菲律賓華僑的關係，打開向中國傳教之門。他的這項宗教熱忱，使他對華僑在菲律賓所受的虐待，採取比較客觀的態度。

西班牙統治初期到菲律賓的中國人，大多是運載中國生產品到菲律賓來推銷的，其中也有一些手工業生產者和中國沿海的漁人，到菲律賓來謀生。當時的中國仍舊是世界上最富強最先進的國家之一，所以一遇到西班牙人的逼害和虐待，便有許多華僑返唐山去。

然而我們必須指出，當西班牙當局在經濟上，完全需要中國商品的供應時，便對菲律賓華僑加以歧視虐待。除了對入口的中國貨品徵稅之外，西班牙官員對華僑商人明目張胆的敲詐，簡直是跡近強盜。徵召華僑服役，更是毫無道理，菲律賓華僑並不是西班牙的臣民，完全沒有替西班牙當局服役的義務。西班牙當局建立八連的目的，顯然是爲了要將華僑置於嚴格的管理和監視之下，並使更便於敲詐勒索。西班牙在菲律賓的統治當局，在一開始統治的時期，便露出腐化的跡象。菲律賓排斥和歧視華僑的舉動，完全是西班牙人所創始開專的。

在這個時候，明朝中國可以說是在經濟上、地理上、和與菲律賓人民的歷史關係上，佔有絕對的優勢。可是在這種優勢之下却毫無作爲，麻木不仁地讓西方強國在中國南疆的邊緣虎視眈眈。

一五八四年七月三日 Royal Audiencia's Auditor, Melchior Davalos 致書腓立二世說：

「陛下發出禁止自你的領域內帶出錢幣，或與海賊交易的法律。但是中國人每年都帶去了所有的錢幣。這裏有許多船，數目在廿五艘至卅艘之間，來此交易的人數有四千。我們不怕他們的強橫，因為他們對我們的商業極爲重要；但是，因為我們沒有商品可以給他們……陛下傳下我們應怎樣做的命令，將是很適宜的。」

「陛下命令我們應如何處罰，此間的人告訴我的，中國人或生理人在他們的船上所犯的罪行，在對上帝的服務上是很重要的。我正在研究這個問題，以便向本 Audiencia 報告，但是由於懲罰可能損害通商，溫和節制是必要的，直到陛下通知我們對這個問題應該怎麼辦。」

「我曾經申斥和訓戒神甫們，叫他們應該勸誡這羣卑鄙的人。其中有一些告訴我，他們不願意爲中國人洗禮，因爲他們確然感覺，他們一回到本國便會棄教。我說他們應當作他們所應該做的，如果上帝不願意選召這些人，至少不應有神甫所未盡的事留下。我將一直堅持這一點。」

這是一段代表行政當局的觀點。當時除了西歐大陸之外，中國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先進的國家，因此在中菲貿易上，菲律賓幾乎沒有什麼可以和中國交換的商品，如果有，在數量上和菲律賓自中國輸入的商品比較起來，也是微不足道。這是西班牙當局在對華貿易政策上最頭痛的問題，以現代化的口語講，便是外匯基金不斷外流的問題，西班牙必須以黃金白銀換取中國商品。在西班牙當局看起來，這項純然入超的對華貿易是很不利的。然而當時的中國如果不是以消費品供應菲律賓的唯一國家，則無疑地是最主要的國

家，所以西班牙當局對這種情形感到無可奈何。不過當時的西班牙，握有美洲大陸，如果適當經營，可以說是取之不竭的財源，因此在對華貿易上的長期大量入超，並沒有造成菲律賓的經濟危機。

西班牙在菲律賓的行政當局與宗教當局之摩擦，也體現在他們在華僑政策上的互相推諉和互相指斥。華僑之爲菲律賓的政治皮球，在西班牙統治的最早期便開始了，所不同的是現在的非律濱政治集團互相指斥對方寬容華僑，當時的西班牙當局則互相指斥對方歧視華僑。

由沙拉利所寫的上面的一段話看來，第一個八連是在一五八二年左右建立的，建立的目的是爲了要嚴格地管理監視菲律賓華僑。有些腐敗的西班牙官吏，當然更會乘機敲詐勒索了。中國人民在封建王朝長期壓迫之下，受敲詐勒索乃是家常便飯，因此都有應付貪官污吏的經驗。中國人的這一套應付的方法，便被稱爲賄賂。其實，賄賂和各種各樣合法非法的敲詐勒索，實在是隨伴而生的。

輸入的中國商品 如果說在西班牙尚未入侵的明朝初期，中國與菲律賓開始了大量的直接貿易，那麼，西班牙的入侵，却使這項貿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菲律賓當時所輸入的中國商品，不但供應菲律賓市場的消費，同時也供應西班牙所統治下美洲市場的消費。

當時菲律賓所輸入的商品的種類繁多，Morga在他所著的*Sucesos*中寫道：

「他們所運來售給西班牙人的商品普通是：成束的細至兩股的生絲，以及其他質地較差的，鬆散的細絲，白的及其他顏色的，捲成小紋；成數的絲絨，有些是色平的，有些繡着各種各樣的花樣、顏色和款式——有些是金底的、或繡着金絲；各種顏色和式樣的，有着金和銀在絲綢上的織物和錦緞；

成數的金和銀的繡紋；花緞、緞、光亮細滑的綢緞、Gorvaranes（一種絲毛交織的布帛）、Picotes（一種山羊毛繅成的粗織的織物，或一種光滑的絲織品，這裏所指的大概是後一種。）一種用草織成的，叫做Lencesnedo的布（鳳梨纖維所織成的布，現在叫做Pita。）；和充各種不同用途，各種質地和樣式的白棉布。他們同時運來了麝香、安息香膠和象牙；許多床上的裝飾品、垂帷、被單、和絲絨刺繡的帷帳；各種深淺顏色的花緞和絲毛混織品；桌巾、墊子、和地氈；用同種料子製成的馬飾，鑲着玻璃珠和小粒真珠；也有一些真珠和紅寶石和水晶石；金屬盆、銅壺、及其他銅和銑製的鍋；成數的各種各樣的釘子、鉄板、錫和鉛；硝石和火藥。他們供應西班牙人以麵粉；柑、桃、梨、苜蓿、Scorzoneria、薑、及其他中國果子製成的漬品；鹹豬肉和其他的醃肉；活的家禽，很優良的閩雞；成數的生果、柑及其他，極佳的栗子、核桃、梨子、和Chieneyes（一種美味的果子，有生的也有晒乾的——原文）（？）；各種各樣很細緻的繡、針、和各種琴星的東西；小匣子和寫字盒；牀、桌、椅、和光耀的凳子，繪着許多花樣和圖案。他們帶來了養馴的水牛；看來像天鵝的鵝；馬、一些騾和驢子；甚至於籠中鳥，有些會講話，有些會唱歌，他們教它們以各種各樣的玩意。中國人供應無數廉價的玩物和裝飾品，這些為西班牙人所珍視；此外還有成數的各式各樣精美的陶器、Canganes（指：Kaga所產的布或瓷器，黎利認為這裏所指的是布，不是瓷器。），及黑色和藍色的袍、Tacley，即各種不同的珠子；成串的紅玉髓，各種顏色他種珠子和寶石；胡椒和其他的香料；及稀有物……如果我把一切列舉出來，我將永遠無法結束，也沒有足夠的紙張書寫。」

不過，這張貨單上沒有列舉大量的瓷器，大概是太過普遍以致遺漏，瓷器也是當時中菲貿易的重要項目。

由當時的貿易狀況可以看出菲律賓在那個時候對中國的依賴程度。整部的菲律賓的對外貿易史，自從菲律賓稍為可由文字記載稽考的時候開始，在一個極長的期間中，實際上是一部中菲貿易史。不但是在西班牙未入侵以前，而且也在西班牙統治菲律賓的大部份期間，中國是菲律賓最主要的貿易國，也是菲律賓消費品最主要的供應國。菲律賓仰賴歐美和日本商品的供應，只不過是一二百年來的情況，從長期的歷史眼光看來，這個期間實在是很短暫的，這種情況是不是菲律賓歷史短暫的插曲，只有將來歷史的發展才能提供答案。除了最近一二百年的期間之外，菲律賓的對外貿易在基本上就是中菲貿易。

中國人在菲律賓的商業基礎，實質上完全是依靠這項貿易上的優勢所形成的。由於長期的中菲貿易，使菲律賓華僑老早便集結了龐大的商業資本累積，使菲律賓華僑掌握了，巨額的、大大超越了人口數量之比例的流動資產（包括貨幣和商品等）。

不過，菲律賓華僑在經濟上的優勢，主要地只是在商業上的，只是擁有了相當巨額的流動資產。這種優勢完全是建立在菲律賓對中國商品的依賴的基礎上的。西班牙當局在數度大屠殺華僑之後，並沒有能够把中國人完全排除，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沒有依賴這些中國商人與中國貿易，菲律賓將無從取得必需的消費品。（當然，當時除了消費品之外，菲律賓還需要中國的手工業工匠。）要不然，菲律賓華僑在西班牙當局的逼害之下，老早就已經垮了，那裏還會有今日的地位。

近代有關菲律賓的史籍，對菲律賓與中國的這種傳統的經濟關係，很少有適當的論述。因而使菲律賓人對菲律賓的民族傳統缺乏正確的認識，也因而使菲律賓的所謂民族主義，缺乏真正民族主義的內容。現在菲律賓知識份子，都以爲西班牙統治一開始，菲律賓便與西方世界建立密切的經濟關係。然而在西班牙統治菲律賓的大部份的期間，菲律賓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比菲律賓與任何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都要密切得多。大部份的菲律賓華僑也都不瞭解，菲律賓華僑的商業地位，是開始建立在菲律賓對中國商品依賴的基礎上的，如果不是靠菲律賓對中國商品的長期依賴，菲律賓華僑是絕不可能有今日的地位的。

在中非的長期貿易中，有許多中國的動植物被移植到菲律賓來，這是中國在歷史上對菲律賓所作的最重要的實際貢獻。中國人對這一個問題，直到現在還沒有加以整理研究，實在是很可惜的。在另一方面，這個時候由菲律賓移植到中國的植物，現在已成定論的有呂宋菸草，中國大陸上所產的番薯，也很有可能是在這個時候由菲律賓移植過去的。

W. L. Schurz 在他所著 *The Manila Galleon* 中，有一段話描述中國商船運貨到菲律賓來的情況：

『當一艘中國帆船在馬尼刺灣出現的時候，便有駐於馬利末禮示 (Marivelo) 的守望者登船，他置守衛於船上，同時發出訊號，向馬尼刺當局告知它的抵達。當它駛入灣內之後，它的貨備便由皇家的財庫官員檢查，並估定所應付的百分之三的入口稅。在付清入口稅和繫船稅之後，貨備駁運上岸，儲藏在八連或華僑區中。』

這些菲律賓輸入的中國商品，有一部份再轉運到墨西哥去，運往墨西哥的商品要付百分之二的出口稅。現在不大清楚轉往墨西哥的中國商品，究竟是要先付百分之三的入口稅，再付百分之二的出口稅，或者是僅付百分之二的轉口稅。

與墨西哥的貿易 本來，哥倫布便是爲了要尋覓到東方來的新航路而偶然抵達美洲的。麥哲倫繞過南美洲經太平洋到東方來的實際動機，也是爲了要開闢與中國和摩鹿加（Moluccas）羣島（香料羣島）的新貿易航路。可是當西班牙人抵達亞洲的時候，葡萄牙人早已繞過非洲的好望角，越印度洋捷足先登，控制了摩鹿加羣島的一部份了。香料貿易當時在歐洲是一項極有利可圖的貿易事業，葡萄牙是當時壟斷此項貿易而大獲厚利的唯一歐洲國家。

西班牙繼麥哲倫之後，數度派遣航海家越太平洋東來，都一再聽到中國商船常常到菲律賓來，因而使西班牙執政者萌起了要征服菲律賓的念頭。他們的目的是要先佔領菲律賓，然後再向中國和摩鹿加徐圖發展。西班牙的這項目的在征服菲律賓初期的檔案和文獻中，表現得異常明顯，簡單沒有什麼可以令人懷疑的餘地。西班牙在菲律賓所表現出的宗教熱忱，完全是由於西班牙本國特殊的歷史傳統所促成的，強迫菲律賓人民接受天主教，是西班牙政府的統治手段（在西班牙本國，他們也採用同樣的手段，參閱本書第三章。），絕不是西班牙侵略者的目的。

在西班牙統治菲律賓的最早期，黎牙實備便計劃在菲律賓種植香料（主要是丁香Clove），以與摩鹿加羣島競爭。但是當時的西班牙當局還沒有發展出能够在菲律賓大量生產丁香的農業技術，因此黎牙實備

的這個計劃沒有實現。

但是西班牙所期望的與中國貿易的新航路，却真的被發現了。由歐洲繞過非洲的南端，越過印度洋到亞洲的這條航路，屬於葡萄牙的勢力範圍內，這是當時的西班牙所承認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世界的國際條約所明文規定的。但是西班牙經大西洋繞過美洲越太平洋到亞洲來的這條航路，航程未免太長，加以西班牙執政者不善經營，因此和葡萄牙的大獲厚利不同，西班牙本國在對華貿易上，並沒有得到很大的經濟利益。不過西班牙爲了殖民地的實際需要，打開了美洲和亞洲貿易的先聲，美洲在那個時候與中國的貿易，是以馬尼刺爲轉運港，以墨西哥的 Acapulco 爲中心的。

當時的這項貿易叫做大帆船貿易 (Galleon Trade)，西班牙統治菲律賓的一個很長的時期中，菲律賓被置於西班牙駐墨西哥總督的管轄下，大帆船貿易在表面上好像是西班牙殖民地之間的貿易，但是它在實際上與中國有很大的關係，是中菲關係史上很重要的一章。W. L. Schurz 在 *The Manila Galleon* 一書中寫道：

「中國一直是帆船上的貨載的主要的來源。新西班牙（墨西哥）人把這種帆船叫做 *Nao de China*，或中國船，馬尼刺不過是中國和墨西哥之間的中間站，此項貿易中最巨額的主要商品絲綢在該地堆積，以便越過太平洋。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常常在無意中把菲律賓稱爲是中華帝國的一省。對馬尼刺講來，每年越中國海而來的槳船，是她繁榮的基礎。」

這段話頗爲正確地刻劃了，在大帆船貿易中，菲律賓、中國和墨西哥的相互關係。大帆船貿易自一五

六五年開始，於一八一五年（嘉慶二〇年）終止。它不但有助於墨西哥的開發，到了後來，對加里福尼亞州的開發也有幫助。自中國本身看來，這項貿易無疑是有利的，它刺激了中國輕工業的發展；中國商品所換來的墨西哥銀幣，大量地在中國流通着，直到不久以前，墨西哥銀幣仍舊是南中國沿海諸省的居民所樂用的貨幣。

當西班牙獨霸美洲的時候，它自美洲取得了大量的黃金和白銀，因而使西班牙成爲全歐洲最富強的國家。但是西班牙本國的生產力，却沒有隨着財富的增加而發展。西班牙的財富的增加，實際上只等於貨幣流通量的增加，黃金白銀向來便是國際上的流通貨幣，加上連年的征戰，耗竭了西班牙的財庫，造成西班牙經濟的惡性的通貨膨脹。西班牙國內的物價，比歐洲的任何其他國家都要貴上數倍，這種情況無可避免地使西班牙的黃金白銀大量外流。

當西班牙公民開始移殖並開發美洲的時候，向較先進的國家取得日常必需品的供應，是完全必要的。由於西班牙在經濟上的通貨膨脹，使廉價的中國商品儘管是在重洋遠隔之下，仍舊能够在美洲與西班牙和歐洲的商品競爭，特別是在太平洋岸的美洲。然而，中國商品的運銷美洲，對西班牙的手工業和輕工業無疑是一種打擊。

一五八六年（萬曆十四年）六月十七日，有一封未署名的，致西班牙國王的信，這封信雖然沒有署名，不過顯然是皇家殖民地理事會（Royal Council of The India）的成員所寫的：

「……………雖然（來自中國的）緞、花緞、和其他的絲綢商品，甚至是最精美的，都僅含有

少量的絲，而且還有和草混織的（都是沒有什麼價值的），人們都依賴這個廉價的市場，由西班牙輸入的絲綢的價格降低了。後者的 *Tafetas* 變得值不到八個 *Reals*，緞和花緞也變得很廉。他怕長此以往，便不需要再自西班牙輸入絲綢。他進一步說，由該島（菲律賓）運出的一切商品都是無多大價值的，該地不能因其得到什麼利潤——如瓷器、寫字檯、小箱、扇子和陽傘，都是易壞而很無益的。我們只能以黃金和白銀與中國人交易，因為他們有充裕的一切。新西班牙艦隊司令致陛下的信也受到審閱。他說由於與菲律賓羣島的貿易，該地（墨西哥）自本王國（西班牙）輸入的薄織物，在逐漸減少中。……這是一個需要極迅速補救的情況。我們得到一個詳細的報告，我們已經調查這些地區的情況。除了這些商品有極小的價值之外，還要運往大量的白銀和錢幣與之交易。雖然這些錢有一部份留在這些島嶼（菲律賓）中，其餘的都由自大陸運商品前往銷售的中國人帶走。

「如此，王國的商業減降了，帶錢來此受到了阻礙；這些都是有後果和重要性的問題。這不是維持我國事業的方法，因為向該地的殖民必須能靠該地的富庶和肥沃，以及每日所作的其他發現的展望，而不是靠貿易。那些參與這項貿易的，只不過是過路客，那些島嶼只成爲這項商業儲貨的地方；因爲全部，或者大部份的商品，都是來自中國的。西班牙人只自繫船稅得到二、三或四千 *Ducats*；這是取得泊船權所付的稅。商品價廉的誘惑，覆蓋了一切其他的看法。這妨害了人民的繁榮，無助於他們最重要的事務如：向該島的殖民，發現和經營該地的金礦。我們獲致結論，認爲只要係是種商品，與該島嶼的貿易和商業應該取消，這些商品不應被帶到西班牙及 *Indias*（指美洲）的其他部份，以

使本王國的貿易——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得以繼續。應該將此事通知新西班牙的總督，向他講解上述的不利；……」

這封信雖然不署名，但無疑是西班牙國王中很有勢力的份子所寫的。西班牙王在信上批道：

「這個建議極佳，因此我已簽署敕令。你在理事會中關於這件事所發表，以及其成員所批准的，我也將全部贊成。」

平心而論，前面那封信對中國商品的批評，雖然大有偏見，但是他反對墨西哥與中國的貿易，站在西班牙經濟的觀點上，却是頗為明智的。腓立二世對這封信採取很迅速的行動，他在二日後，六月十九日立刻向西班牙駐墨西哥總督發出敕令：

「……知悉了自中國和菲律賓羣島運至你的轄區的絲綢是頗無價值的，但是因為其價格的低廉，它們被出售和分配着；同時因為，如果該貿易繼續下去，本國的布疋出口貿易將會中止或大為減少；同時也因為運往的絲綢及其他物品（都是沒有多大價值和對本國無利的——原文），是僅以黃金、白銀、或錢幣交換的……停止與菲律賓羣島及中國的貿易，看來似乎是最好的……由於目前是以加補救的適當時機，正如一個極重要的問題所要求的，我命令你——在權衡到上述及你將再被告知（因為這是一個經常的問題——原文）的各點，及可能發生的困難之後，如果你發現在反面，沒有什麼重要至可以超越它們的——下令不再繼續是項貿易，或輸入上述的商品和中國商品至該地出售。……如果你執行上遇到什麼特別的困難……逼使你中止，你要將所發生的事通知我，連

同你的意見，而同時採取你認為最適宜的措施。……」

西班牙駐墨西哥總督 Marques de Villa Manrique 對這條敕令不加執行，他在 一五八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上書腓立二世說：

「……：菲律賓的土著和中國居民及其他國家之間的交通和商業，和對他們的友誼及良好待遇，看來是頗為重要的，因為他們是一個有良好武器和人口衆多的人民，統轄他們或違背他們的意志和他們談判，看來是很困難的；由於他們主要地是依賴商業生活，使他們由此得到利益，似乎不但可以使他們成爲基督徒，並在相當的期間內，將有利於陛下所欲在該國的作爲。」

「……：……」

「同樣顯著的，如果這項貿易停止了，目前每年離境的船隻和人丁也會停止；將會使那些和平的土著，以及那些直到現在還不冀望和平的，看到這項貿易由彼奪去，船隻和西班牙人再也不來了，有更大的刺激以起義和反叛……」

「因爲這些看來嚴重的困難，以及可能造成的傷害還沒有過去，我認爲擱置陛下的命令是適宜的，一直到你對我作進一步的指示。目前，我將使該部份的事務保持現狀，使由本國駛往該島的船隻，只能依照它們的噸數，運往一半的貨幣。」

「……：……迄今，正如我在一五八六年二月廿三日致陛下信第九節所寫的，他們所付的（稅）每噸不超過九 Ducats；現在他們將付出三十二至三十四。陛下可依照你的意欲發命令。」

由此可見，當時菲律賓濱與墨西哥的貿易，固然主要地是中國商品交易墨西哥的黃金白銀，墨西哥的西班牙當局不願意放棄這項貿易，一方面是爲了準備對中國作進一步發展的更大的雄圖；另一方面也因爲這項貿易是維持對菲律賓濱的統治所必須的。

本來，菲律賓濱與美洲的貿易並不局限於墨西哥，但是腓立二世不久便發出敕令，禁止菲律賓濱與墨西哥以外的美洲地區交易：

『我們規定和命令，在祕魯、Tierra-Firme、危地馬拉、或Indias（美洲）的任何其他部份，不准與中國或菲律賓羣島有貿易或交通，即使有總督、Audiencias、統轄者、或判事的執照，違者所運的貨物將被沒收。船主和船長的全部財產也將被沒收，並充大帆船上的苦役十年。』

這條禁令在一五九〇年十二月十八日發出，並於一五九一年二月六日再度重申。

西班牙代表會議請願書 一五八〇年（萬曆八年，利馬鑾於該年抵澳門）腓立二世在使用政治權術，和利用他與葡萄牙皇室的血統關係之下，以合法的手段承繼葡萄牙的王位。這時候是西班牙歷史的巔峯，羅馬帝國之後，第一個歐洲最強大的國家。不過，腓立二世雖然以西班牙國王兼任葡萄牙國王，葡萄牙並沒有和西班牙合併，葡萄牙在政治上保持着很大的獨立性，腓立二世並不能以西班牙人統治葡萄牙人，他實際上是二個獨立王國的最高統治者。然而，腓立二世之繼任葡萄牙國王，使西班牙迅速組成「無敵艦隊」成爲可能。於是，歐洲的歷史面臨着一個重要的轉捩點。

西班牙當局在這樣的形勢下，訂定西班牙的亞洲政策。一五八六年（萬曆十四年）四月廿日，菲律賓濱

的西班牙政治、軍事、宗教負責人，以及移居菲律賓的西班牙公民的領袖，舉行一個馬尼刺西班牙代表會議（General Junta of Manila）。這個代表會議向皇家殖民地理事會提出一件備忘錄（請願書），建議西班牙在菲律賓以及在亞洲所應施行的政策。這份請願書由各署名者在同年七月廿六日正式簽字，共有四十九名西班牙人在上面簽了字，其中包括西班牙駐菲總督仙參戈·黎·迷拉（Santiago de Vera），菲律賓天主教大主教、西班牙軍事將領和西班牙公民領袖。這個請願書有一大部份為西班牙政府所採納。這件請願書實在是研究西班牙在菲律賓所施行的政策的重要文件。西班牙代表會議派遣耶穌會教派（Jesuit）神甫、阿倫樹·山齊示（Alonso Sanchez），親自把這件請求書送交皇家殖民地理事會。

該請願書的第二章第三條，是關於菲律賓對華貿易的：

「第三、我們要求由這些島嶼的港口或諸港口以外——如中國、葡萄牙、日本、暹羅、婆羅洲及其他——而來的，都不必納任何稅，特別是食物、供應品、和諸如此類的物資，以便使本國獲利及增加財富；因為這些關稅，于中國人諸多不便，阻礙他們經常到來；望陛下頒下勅令，不讓這件事發生。這件事有關的一切，前往的人將如所必須的，提供詳細的信息。」

同年的六月廿六日，馬尼刺的 Royal Audiencia 致書腓立二世，書中第七節寫道：

「正如我們先向前陛下報告的，本年中國的船，運來商品及許多供應品，這些（商品）是此地很感不足的。對加諸糧食及供應品等類物資上面的關稅的恐懼，因其容積大、運費貴、及在此間的利潤小，使這些商人不再運來上述的項目，而代之以其他的。因而造成了供應品的重大的缺乏，及對此地

頗大的不幸。我們讀到陛下的敕令，命令我們對本羣島的總督，G·郎基溜加諸商人的關稅作一報告，並報告加重稅是否合宜；抑或應完全取消。目前，我們將採取我們認為在對陛下的服務上，所最必須的措施。我們已經下令停止徵收對輸入此地錢幣所課的百份之一·五的稅；同時，爲了要使中國人運來大量的供應品，以及馬和牛，正如他們正在開始作的，已下令對其所運入的穀物、麵粉、及一切的其他糧食不課關稅，以鼓勵他們供應此地大量的此種供應品。況且，除了上述的理由之外，在這方面可替陛下徵收的數目是很小的。陛下將依在此一問題上所欲行的下敕令。」

向中國商品徵稅的惡果，於一五八三年由大王致沙拉利首先提出，到了一五八六年，這項惡果已經發展得復嚴重明顯，菲律賓的西班牙當局甚至急不及待，不等西班牙國王頒下敕令，便自行取消關稅。

由此再度證明，杜絕中國商品的供應，當時在菲律賓濱所能引起的嚴重後果。

禁止華僑經營零售業 西班牙代表會議的請願書中，第三章的第二和第三條說：

『第二、我們希望在現在和將來，不管是中國或其他的外國船，不得依目前的習慣經營零售，本市的居民也不得公開或祕密加以購買，違者處以重罰。我們要求指定和選擇人選，批發購買這些商品，人選的數目視所需而定，使他們得以單獨批發購買中國船所運來的全部商品，然後再以他們所付出的價格，加上其他額外所需的開支，公平分配給西班牙公民、中國人、和土著。如果陛下命令並申明這一點，價格將由總督決定和訂立，人選也將由他委派。』

『第三、由上述的事項伴來了另一很重要的問題——那便是所有的中國商人和販賣者，不應留此

以聚藏和零售商品，並造成許多其他的損害，造成本市和本地的供應品的缺乏，他們還教導祕密的罪行和邪術，神甫對此將詳加講述。還有，他們所擁有的，為零售商品所必須的店鋪，應於一年內由西班牙人取代，以使利潤留予我方，並予西班牙公民及殖民者以機會。除非採取這種行動，他們（殖民者）不會增加，因為此地有太多的中國人；這（行動）是適宜的，因為許多其他的利益可由此而獲。居住在本市之外的中國人，只應是基督徒及其他老居民，他們不來來往往，而且不全是販賣者，而是工匠——機匠、木匠、陶丁、和農夫——及其他經營糧食者，他們到土著的村落中收聚糧食，再運到本市來。」

西班牙當局一方面不願中國商品的供應中斷，另一方面却厭惡菲律賓濱華僑，一個在上述的請願書及六月二十六日致腓立二世書中簽過字的 *Royal Audiencia* 的成員 *Pedro de Rojas*，在一五八六年六月卅日寫信給腓立二世說道：

「每年都有卅萬披素的銀幣由此國流入中國，今年則有五十萬以上。中國人在此獲得大量的黃金、他們也把它帶走，而且不再流回此國；他們所運來的是他們本國的渣滓，而帶去的却是陛下領域中的油膏和財富。」

「通過商業上的機會，許多中國人到此間來，在這個很貧弱的土地上造成不小的損害；每個中國人都比五個摩洛人吃得多，而且總是擇取最好的，即使是價格很高，由此而使糧食變得更貴。由於獲得不正常的利潤，他們不再作他們應作的工作，因為這些是不能如貿易那樣獲利的。如果這種情況終

止了，其中有些爲了自身的利益，發現他們不能做什麼別的，將留在這些島嶼中充農夫，其他的將充牲畜飼養者；還有其他的將作機匠，特別是建築，這是本國一項極重要的事業。他們可由此獲利，西班牙人將得到他們所需的一切的服務，而且很便宜。他們如果不再運絲綢和花緞來，他們可運來牛、馬、牝馬、糧食、軍用品、銅器、各種金屬、和火藥，每樣都很大宗，而且很低廉——這將對此地大爲有利，正如所能輕易看到的。

「如果沒有與中國的貿易，這些島嶼上的公民將更富裕；因爲土著如果沒有許多的 *posson*，他們將以流通中的產品納貢——那便是：布料、*Lampotes*、棉布和金，這一切對新西班牙都有很大的價值。因爲有大量的銀幣，他們停止了生產；更壞的，而且對陛下造成更大的損害的，便是他們不像先前一樣，在礦中工作以取出黃金。」

西班牙當局對中菲貿易的一般態度，是他們希望中國商人運來必需品，而不歡迎由中國運來的奢侈品；運來的中國商品最好是由西班牙人鑿批購買，然後再加以零售；留在菲律賓的中國人，最好是從事有助生產的技術工作，而不是經營西班牙人看來有害的商業。但是商品的交易從來便是爲供求律所支配的，中國奢侈品的輸入，中國商品價格的昂漲，都是由於西班牙人的消費力旺盛所造成的。西班牙政府未能引導西班牙人所擁有的資金，投入生產事業，而使其成爲流動的商業資金，這些商業資金結果終於大量流往商品的供應來源，不論古今，這個結局是絕對無可避免。

爲了這個問題，腓立二世於一五八九年（萬曆十七年）八月九日頒下敕令：

「當耶穌會教派的神甫亞倫樹·山齊示一到來的時候，他奉羣島（菲律賓濱）上各階級的命令，並被授權討論有關服務我主的一些問題，以及這些羣島上的土著和居民的利益和保障，我令我的理事會的一些成員來聽他講話。他們都遵命。該神甫奉令提交的一件備忘錄，受到徹底的審查。在他們和我們討論過該備忘錄的某些點之後，我在上述那些被委研究該備忘錄的議員的同意之下，決定對你作出下列的指示。我命令你以我對你所期望的熟練、謹慎和盡力，在各方面履行你的責任。該神甫同時代表該市請求我，命令自外面進入該島嶼的港口的所有的人都不必繳納關稅——不管他是中國人、葡萄牙人、日本人、暹羅人、婆羅洲人、或任何其他人士、特別是那些運來糧食、彈藥、及這類貨品的原料的。這些稅對中國人是一種損害，於是貿易受到阻撓，而且還造成其他的不利，正如亞倫樹·山齊示神甫詳細向我告知的；以此為據，我曾經認為，而且現在還認為，在目前對糧食和彈藥最好不課關稅。因此除非另有命令或敕令，你必須不准征課任何關稅。同時討論過的另一合適的措施，便是沒有任何中國船或外國船，可如同現在所為的，零售他們運往該島的商品；也不許任何居民公開地或祕密地購買商品，違者處以重罰。對是項商品的購買會為理事會所討論，合格的人選將依該商業之所需而被委任。僅有這些人能自船上批發地購買全部的商品，然後以所訂定的劃一價格，公平地分配于公民，西班牙人、中國人和土著。這個問題曾為理事會的成員所討論和審查，如我現在所為的，將對此一問題所達致的決議通知你，看來是最好的。我命令你記住這一點，發出你認為我所能接受的命令。你必須將你的處理程序通知我，同時除了那些由一條特別命令所委任的人之外，不容許或允准任何人到船

上去。你必須努力使該島的產品，與上述的商品交易，以便在可能之下，避免如同慣例地使太多的錢幣流入外國。除了由執行上述的條文所將獲得的良好效果之外，我們能够預期另一項重要性不亞於此的；那便是，由於這些條例的執行，你不但將消滅那些藏匿和售賣他的商品的中國零售商，而且同時也將避免許多其他的損失、耗費、和匱乏，以及他們所教導的祕密罪行和邪術。他們那些在零售上所需的店鋪，可於一年內交于西班牙人，使他們得以擁有並由此獲利。這個方法也可使大量的公民團結在一起。你可以容許那些並不來來往往的，並在真實在字義上不是經營零售業的，中國基督徒和其他的老居民留下；他們所作的工作是機匠、木匠、園丁、農夫，及其他生產糧食的勞作。考慮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你受警戒不得容許或允准（中國）異教徒和零售商在該島存在。這一切你必須謹慎和盡力加以執行，我的信任置於你的品格和持重，以及在對我的服務上所將表現的熱誠上面。」

除了這件敕令之外，腓立二世附帶還發出一件與這件敕令大體上相同的指示，可見他對菲律賓濱西班牙代表會議的請願書的重視。西班牙當局一方面需要中國商品，另一方面又沒有足額的貨物可與中國交換，因而造成銀幣的大量外流。不過，沒有大量中國商品的供應，西班牙對菲律賓的統治是難以維持的。所以西班牙政府便特別鼓勵中國商人，運備西班牙當局所最急需的糧食和彈藥來菲。糧食的缺乏可能造成很嚴重的後果，這是普通常識，任何統治者都不願在他所統治的領域內發生糧食的困難。彈藥是軍事上的必需品，是鎮壓菲律賓人民的反抗所必需的。因此，西班牙當局當時的對華貿易政策，完全是爲了鞏固其對菲律賓的統治。儘管當時的中菲貿易是西班牙統治菲律賓所必需的，嚴格地說來，如果不是靠中國商人在糧

食上和彈藥上的補給，如果不是菲律賓與美洲的大帆船貿易上的中國商品，使菲律賓與西班牙美洲保持一線經濟上和交通上的聯繫，西班牙侵略者在佔領菲律賓的初期，簡直無法維持它對菲律賓的統治。但是他們對中國人却很少有什麼好感，在當時由於他個人對向中國傳教的熱忱，已經算是常常肯替中國人說幾句公道話的天主教大主教沙拉利，也在一五八八年六月廿七日寫信給腓立二世說：

「有太多的中國人到此地來，使本羣島充滿着他們。因而隨着帶來了許多對土著的損害，因為中國人是很不道德的族人。和他們交接不會得到什麼好處，而會得到許多的壞處。我設法使總督將本市所有的中國人集中，以補救這種情況。然而我看不見有什麼改善；爲了此地的屬世的和屬靈的利益，改正這種現象是很重要的。陛下是否樂意下令以峻嚴的措施加以改善。」

西班牙侵略者所採取的排除菲律賓華僑經營零售業，第一項最嚴酷的措施，便是腓立二世在一五八九年八月九日所頒下的敕令，禁止菲律賓華僑經營零售業。這項禁令的目的，表面上雖然是爲了要使商品能依劃一的價格公平分配，同時使西班牙公民有機會取代此一有利可圖的事業。但是在事實上西班牙當時的社會觀念，並沒有把商人看成一個高尚名譽的階層，以勝利的統治者的身份到菲律賓來的西班牙人，願意經營零售業的，恐怕是絕無僅有。不過腓立二世並沒有掩飾這件敕令的真正目的，是要使中國人無從「教導秘密的罪行和邪術」。他甚至嚴重誥誡西班牙駐菲總督：「你受警戒不得容許或允准（中國）異教徒和零售商在該島存在。」

作爲當時世界最先進國家之一的國民，中國人民掌握着先進的手工業和農業的技術，西班牙當局在菲

律濱的經濟建設和生產上，不能不求助於這羣掌握着先進技術的中國人，因此根據腓立二世的敕令，只有能幫助經濟建設和生產的中國人，才可在菲律賓居住。

不過，由於菲律賓對中國商品和中國工匠的依賴，由於菲律賓人民與中國的傳統關係（他們可能不願西班牙法律與中國商人交易），由於願意取代中國人的地位注意經營零售商的西班牙人必然是絕無僅有的，腓立二世這條苛刻的法令並沒有辦法嚴格執行。中國人仍舊自中國源源而來。

西班牙當局雖然也曾經採用過 *Panacala* 的制度，批發購買中國商船上的商品，但是批發購來的商品仍舊需要零售，因此，除非準備好一批能夠接代的，非中國人的零售商，當時要執行該項禁令的確是有很大的實際困難的。*Panacala* 的制度不久便逐漸消滅，到了十七世紀的中葉，可以說是僅在名稱上存在的一個制度。

然而很顯然的歷史事實是：禁止菲律賓華僑經營零售業，是一項西方侵略者所創始的，有長遠歷史的排華政策。

侵略中國的詳細計劃 西班牙侵略者的魔手一觸進亞洲之後，便立刻準備侵略中國，這是我在前面一再提及的。這個侵略中國的計劃的確不是誇誇其談，而是西班牙建立亞洲帝國的迷夢的主要內容。一五八六年所舉行的菲律賓西班牙代表會議，擬就一個很詳細的侵略中國的計劃，呈交給西班牙政府，這便是西班牙代表會議請願書的第十章。這是直到現在為止所發現的，西班牙準備侵略中國最詳細的計劃，這個計劃是在近代史上，中國和西方強國作最初接觸的時候擬就的，它不但是中菲關係史上的重要文件，同

時也是中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史上的重要文件。爲了要得到一個關於當時歐洲最主要的強國，西班牙對中國的態度和政策的確切完整的概念，我要把這個計劃書的內容譯出：

「第一：那位被派前往作爲見證的人，將給予陛下一個關於中國的幅員廣闊的描述，以及關於它的果實和供應品的豐富，關於它的商品的富庶，和它擁有大量的金、銀、水銀、銅、鐵、和其他的金屬；它的巨大的而確然的寶藏，無限量的和多種多樣的產品和手工藝品及人力；以及更重要的，關於它的人民及其生活、健康、治安和豐盛可以無止境地講談的事物；還有，如何有了以及由於這一切，提供了世界上對一個王國所能提供的，最大的機會和最偉大的開端。這裏排在他面前的，是人類頭腦中所能冀望或理解的一切的財富和永恆的聲譽，也是一個基督徒的心，對拯救和恢復現在被罪惡，以及他的無知和邪惡所掌握和迷惑的，爲了祂而被造，並爲祂的血所救贖的無數的靈魂，在榮耀神和祂的信的時候所能期望的一切。

「第二：如果我們在這裏的人，看到和聽到了這些事，不管在那一方面疏忽了——不管是逃避工作、熱誠、危險、和代價或任何其他的原因——向陛下告知這件事，並說動他進行這項巨大的工作，我們將是沒有執行我們對天的責任，這是我們對神和對我們同族的靈魂所欠負的；同時也是沒有執行我們的信和忠心，這是我們在此際對我們的國王，我們的宗教，和我們的祖國所欠負的。確然地，由於站在能獲得如此大量利益的門檻上，而滿足於我們所獲有的些微；並由於怠惰的壓力和所獲的些微而自娛，我們沒有看到，或設法取得全世界、對神、對我皇、對我們自身、和更重要的對這個國家的

人民，極重要的目的物；我們所有的人都將被稱爲心靈卑劣的懦夫，缺乏勇氣之人。

「第三，讓陛下對這個問題作出決定，因爲我們在此地居住的人，知道這個問題必須棄置，全然放棄並永遠喪失，或必須在現在採取行動，因爲機會正在溜走，永去不返。在數年前，它可以不費力、代價、或喪失人命完成；今日已不能毫無損失完成了，再過一個短時間，便不可能以任何代價完成它。他們甚至在準備戰爭的武器，加強自身，並訓練人才——這一切是他們自葡萄牙人和我國人學會的，並在繼續學習。看到抵該國中的葡萄牙人，以及在此間的我國人，他們很害怕，特別是葡萄牙人對他們所講起的關於我們的事，告訴他們，我們如何征服外國的土地，推翻土著的國王，並自行封王，而這是我們到此間來唯一的目的，神甫還自中國官員口中聽到其他的事，這是他會加以詳述的。除此之外，他們看到了自此駛澳門的 *Fragatas*，這是他們的港中所有的人，或他們的船艦所看到的；而更重要的，目前如果在本羣島上所進行的工作被知悉了，可以被明智地理解爲是毀滅了一切成功的希望。

「第四：況且，如果由於他們和我們的罪過，回教的道理傳進了他們的國家——這已經佈滿了幾乎整個的印度、馬六甲、蘇門答臘、爪哇、渤泥、摩鹿加、呂宋、和幾乎所有其他的地方——如果它在那裏得到了一個立足點，而他們已經有些人進入了，不但在由這樣執拗的錯誤中潔淨他們的靈魂上，而且在佔有該地的事上，將造成無法克服的阻撓；因爲他們即將進入，並教導如何使用武器、彈藥、和戰爭技術。

進佔的合理根據

「第一、至於我們進入和征服這片土地的理由和根據，將赴西班牙的神甫將向陛下討論並解釋，因為他曾經長期經常和此間的西班牙人，及其他地方如印度、中國和日本的葡萄牙人以及一切有謹慎的良知和廣泛之經驗的人研究，他知道他們對這個計劃的看法。陛下也許會認為需要知道，神甫所聽到、知道、和感覺到的關於（侵華）的現有的，或可能有的理由和根據，不但是在傳福音上面，並且也由於我們逐日所受到的損害，不但是爲了這羣島嶼，而且也爲了澳門和葡萄牙人。

入侵所需的條件：首先是人才和軍隊

「第一、考慮到中國的氣候和條件及其人口，一萬或一萬二千來自西班牙的，不管是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或其他陛下下的臣屬，將是必需而足夠了的；但要儘最大的可能得到這個數目。如果可能的話，遠征軍在出發時將添上五千或六千日本人，和許多未獅耶人，他們是陛下在本島的臣屬，而且是有生氣而剛毅的人民。

「第二、雖然這裏有些大有勇氣和經驗的人，然而在這麼一個巨大的工作上，他們的數目太少；一些經考驗有能力的軍官和人員，必須來自西班牙，正如一項巨大的事業所要求的——因爲只有那些因戰爭的光榮，以及因對他們的神、他們的國王和世界的尊貴的事業而感到驕傲，並對其他的利益和不義之財少有貪慾的，被派來此的經挑選的貴族，才能加以完成。

「第三、這羣島嶼的總督，同時應為遠征軍的指揮；他必須是個偉大的人物，官階比其他的所有的人高，不管他是何族人，他在這次遠征中担任何事，或任何與此有關的事項，不管他們是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在分配軍官和職位時，應優先錄用退伍的軍官和兵士，特別是這羣島嶼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公民，那些在他們的忠誠、工作和服務上有功績的，不但因為他們估得和保衛這片土地，而且也因為他對這個國家和人民有很多的經驗。此外，他對這個國家、它的氣候、熱度、和雨量、已經適應和習慣了；是以他們的幫助和意見將有高度的價值，他們應該在每一方面獲得酬報和優先。

「第四、派來的軍隊應該是有鎗手、甲冑兵和矛兵的步兵，此外，還要有少數的毛瑟鎗手。

「第五、應該派來四艘大帆船的船員，要有熟練的水夫長和頭目。

「第六、陛下作出決定之後，便應派來三四名鑄炮者。

「第七、然後，陛下應命令印度總督送來，或給與任何前往接受的人，五百名奴隸，因為這些在那裡是很豐富而便宜的。

「第八、應該自西班牙派來一二名武器和拋火器的機匠，和一些能製瀝青的手工藝匠（對此已作過一些準備），因為這裡有此種原料。

「第九、要有一些能造高舷側的大帆船和 *Fragatas* 的優良的造船匠，這是充此種用途的最佳的船艦。在古巴島上住着一個人叫做 *Francisco De Guzman*，一個很優良的工匠，他造 *Melendez* 的船，這些船使法國人大為恐懼。

「第十、應先派一位軍官帶着陛下的敕令，和駐日本的耶穌會教派主持人的訓令，使他能得到他們（日本的耶穌會教派神甫）的接納。並推行他的使命。他們應該攜帶足額的錢，以償付將自該國運至一個被指定地點的軍隊。他們每月應被付與一 Ducat 或十二 Reales，或更低的代價。

所需的武器和供應品

「第一、除了來自西班牙的兵士所帶來的正規武器之外，還要有一些供緊急用途的鎧甲和鎗；最重要的是要自新西班牙（墨西哥）運來五百桿毛瑟鎗，三四千根矛，一千付甲冑，和一千 Burgundian Morion。

「第二、鎗所需的優良的燧石和捲毛，可在此地廉價獲得；但是鎗身必須由西班牙運來，而且必須都有同一口徑，以便它們得以應用同一種的子彈。

「第三、我們可自中國非常廉價地購得銅、硝石、和子彈；而本島上有豐富的銅和硫黃的礦藏，一切所需的東西均可在不同的地方廉價購買。據說所必需的錫和硝石，亦可廉價而大量地獲得。

「第四、必須自印度購得二千 Quintals 的繩，這將值二千披索或同一數目的 Ducat。如此將節省大量的金錢，同時，繩索將不致因自 Vera Cruz 至墨西哥，然後越過山嶺、山谷和河流至 Alcapulco 的艱困的旅途而磨傷和損壞。這些要與上述的奴隸，來自同一國家。

「第五、應自新西班牙運來布疋（灰色和其他顏色的；和混和的），以便在雨季和暴風季中保

軍人，因為這個國家是頗為寒冷和潮濕的。項目：應該要有供病人應用的被單和衣着，及其他的必需品。

「第六、陛下要撥下二十萬披索，以供應這些及其他的東西，償付日本人，和其他意外的開銷。

「第七、讓遠征軍的指揮帶來一些禮物，以便收買一些中國官員和其他的重要人員；爲了這項目的，要自西班牙帶來絲絨、緋紅色的布、鏡子、玻璃器、珊瑚、大羽毛、油畫、羽毛飾物、天球儀、和其他的稀有品，和一些充同一目的紅色和白色的酒。

本島可供應些什麼

「爲了使陛下能够瞭解他的臣屬，在這個國家爲如此重要的事業替陛下服務，並使他能更清楚地知悉，此間所能進行的工作和供應，現在作如下的描述：

「第一、在此間所舉行的代表會議，包括主席，Auditor和Fiscal（均 Royal Audiencia之成員），以及大主教和上面述及的其他人物，當這個計劃被討論及的時候，全體認定一個如此嚴重的，有這種可能性的問題，不應在立刻派人前往與陛下討論之外毫無作爲；此間立刻作出必須的準備，全體以頗大的熱情和嚴肅議決，由於皇家財庫之缺乏款項，並由於這個國家因爲先前的火災和船隻的喪失而變得很貧窮，他們將動用爲遺族（Caxa de Difuntos）而保留的，未有遺囑的款項，這筆款項約爲一萬至一萬二千披索，由此開始工作。他們與中國訂立合同以運入銅、硝石、和其他原料。現在

已經在進行鑄造大炮，和取得火藥和武器；因為如果陛下決定不進行此項事業，我們將不會有何損失，向中國人運入以製造戰爭武器的原料，及此地所需的供應品，徵收百分之三的關稅就已經够了。

『第二、將派一艘船至馬六甲，運備除了向中國人購得之外的錫和硝石，和火藥，和一些奴隸，以幫助鑄造及其他的工作。』

『第三、五千名本羣島上的未獅耶士著，和一些優良的軍隊必需的武器，將被集中起來。』

『第四、不管艦隊將自本羣島的何一港口進入，都將有寬敞的地盤，和充分的供應品接納他們；如果它們到加牙那去，將有若干有利的條件。第一：它將直接來自西班牙，不會遇到島嶼、沙灘這一類的危險。第二：該河是優良的柵閘，在低潮時有四Bancos或更多的水。第三：它位於接近中國的地方，有兩日的航程。第四：它最接近日本、台灣島和琉球。第五：該地與中國之間有許多島嶼，交通可以小船進行，能够保持一種密切而迅速的交通，並能輕易地，對任何意外加以補救。第六：那裏有好些島嶼叫做Rabuyanes，那裏有豐富的豬、羊和禽鳥，和相當數量的米。第七：在該地有大量的豬和禽鳥，是水牛和鹿的優良的獵場，在數日中獵得兩千桶的肉類是很平常的。第八：可以並將在該地建築可儲藏十萬Tunegus米的倉庫，這是本國的主要食糧。第九：該地有大量的魚類，那是和肉類同樣富於營養的。第十：在該地可獲大量所需的酒，棕櫚酒是很好的。而且還可以自中國運進一種在本島大量飲用的，價廉而很優良的酒。第十一：該地可獲得麵粉和麵包的供應。第十二：甚至比西班牙扁豆更佳的腎形豆，在本島是很普遍的。第十三：這裏可以供應一種Andal of Anabo，是一種

如同苧麻的草，可製成船纜。這裏有大量的棉花。第十四：製內衫、緊身上衣、短袴、及其他東西用的麻布，不論是土製的或中國製的，在此地都很普遍而便宜。第十五：加牙那有可供各種船隻的大量木材；這在其他的一切島上，幾乎都是一樣；幾乎全部，或至少是大部份的土著，是木匠和冶金匠。第十六：自中國運來的製釘的鐵，很豐富，而且很便宜，五Arrobas（一個中國Quintal），只值八至十Reals。第十七：大型和中型的鐵鐵炮彈，均由中國人供應，他們每顆售賣二至三Reals，而在此間單單生產費便要八至十Reals。第十八：靠着少數向他提供計劃和模型的少數西班牙木匠的幫助和工作，本羣島的土著已能很熟練地造船和Mascotas，他們造得很快而便宜，一艘五六百噸的船只要三四千披索便可造出，正如我們所曾經看到的。第十九：最重要的，如果陛下意欲嚴肅地進行這項事業，本羣島的Encomenderos將供應Fragatas，人力、和金錢、正如他們一向在有機會遠征時所作的；他們已經而還將很樂意和忠誠地做，如果陛下要進行這項遠征，因為對陛下及他人所能造成的屬靈和屬世的好處的期望是太大了。

艦隊應採取的路線

「應該知道有四條航路可以遵循。第一：自Sevilla至新西班牙——經過墨西哥至Acapulco。第二：自Sevilla至Nombra de Dios和巴拿馬。第三：取道好望角至馬六甲，然後經澳門至加牙那。第四：取道麥哲倫海峽。最後一條航路，取道海峽，是其中最佳和最短的，在航程中沒有非凡的危險

和阻撓。研究和討論這個問題，以我們對它的看法，和該地（西班牙國內）的觀點，最佳而最安全地加以決定。我們在此間的人認為這是最佳航路的理由，將由攜此同往之人加以解釋。

最好有葡萄牙人參加

「第一：讓葡萄牙人分担這一次的征服是重要的，因為他們在這個地區的海上、陸上、及對付其人民的經驗將大有幫助。他們的軍隊不應與西班牙人同來，也不應單從一方面進攻；他們應取道廣州，而讓西班牙人取道漳州（Chincho，或指泉州），並儘最大可能在同一時間行動。

「第二：陛下委任以指揮葡萄牙艦隊的人，官階應比印度總督更高，或至少，要無論在那一方面都不必依靠他；因為葡萄牙人都埋怨說：總督是阻撓這個重大的計劃，或帶進他們的親屬和隨從而使其對他們本身有利，或如同從來不會缺乏的這一類的人帶進其他的私人利益。

「第三：這個人應該帶有陛下確切而明白的命令，讓他可自印度、和自印度的任何堡壘或城市，儘量取得他所需要的，不但是軍隊、而且包括款項、武器、船隻和其他一切的必需品。

「第四：這個人應該與西班牙遠征軍的指揮有默契，包括進攻的時間，在進攻之後將如何相會，以及在過程中將產生的，而又需要解決的其他各種問題。這些均應弄明白，不留下爭論的餘地。

「第五：參加遠征的日本人如果不願意與西班牙人在一起，而寧願與葡萄牙人在一起，因為他們已經瞭解他們，同時也因為他們相處得較好，況且、葡萄牙比此間所做得到，更平等地對待他們）可

讓他們這樣做)。但是如果他們願意與西班牙人在一起，讓他們到加牙鄰來，這要和將充嚮導的耶穌會教派神甫安排好。

「第六：陛下應該爭取耶穌會教派的主持人指揮和命令在日本的神甫、不要阻撓自日本取得這批援軍，或可自該地取得的一切；並應為這項目的委派一名有充份職權的神甫、他應是一個意大利人。

「第七：在適當的時機，當遠征的消息尚未為中國人所知悉之前，耶穌會教派在中國境內，在福建的神甫、應該撤退，他們可以供給軍隊以他們所知悉的，有關該國的情報，它的實力，以及它的軍事力量和供應品；以及他們所想得到的一切其他危險或應加留意的。他們也可以担任翻譯，勸告中國人容許西班牙人和平進入，並諦聽和接受傳道者，和接受神傳給他們的宗教。他們可以告訴中國人以陛下想要給予他們的保護，使他們能夠無恐懼地接納西班牙人；使他們自暴君獲得解放對他們是多大的恩惠，替他們解除目前所負的奴隸的枷鎖，讓他們的身體和靈魂得到自由，並對這種恩惠的舉動不取任何代價。這些是耶穌會教派的主持人應向其所委任的人加以指示的。

「第八：在西班牙的人應該知道，當葡萄牙人向東航，而西班牙人向西航的時候，他們應該而且必須同時抵達，風的運行對他們是有利的；因為葡萄牙人可以在五月底，或在六月整月內抵達澳門；西班牙人將同時抵達加牙鄰。

「第九：先抵達者應派出一艘快速的船艇至一定地點，以便與另一艦隊相會。這可由兩三條航路做到，因為在這個季節裏，小而輕便的船艇可以航行；距離也不太大，雙方相距約一百五十 Leagues。

陛下所應提防的危險和不幸

「第一：如果兩支軍隊的數量太少，即使有着優良的武裝和配備，由於中國人是很多的，他們將會被欺蒙而抵抗；況且、西班牙人是勇敢的戰士，破壞和屠殺將是無止境的，因而使國家蒙受極大的損害。所以應該努力使軍隊衆多，訓練配備良好，並受到戰略上的控制，使其沒有機會抵抗；只要他們的出現和一次的行動，就足以不大流血地使中國人屈服。如此便沒有西班牙人、發現他們受到中國官員催促和煽動的一大羣人所包圍和逼迫的危險，而需要作可怕的損壞和殘殺，致使該國的農業受阻撓和人口減少。

「第二：不要讓他們來的時候數量太少，配備和供應不良，無紀律和不服從，以致在那麼僻遠的地方，造成紛亂、沮喪、或逃避的危險，因為這樣將會把遠征毀掉；也不要讓他們做出一些能杜絕成功的功的事，而使中國人成爲我們公開的敵人，同時使我們喪失聲譽，以及取得澳門港和一條往日本之通路的明亮的機會。靠與他們交接而散佈基督教的事就成爲沒有希望了，我們便要失掉我們自廣州所取得並分佈於全印度和葡萄牙的財富，以及穀倉的收入和許多其他的利益。

「第三：讓陛下很小心和謹慎地派出參加遠征的人選，不管是它的軍官、領袖、或指揮；因爲要不然、很有可能——不，幾乎確定地，事態將在古巴島上，以及其他原來人口稠密，現在變得荒廢的地方所發生的一樣。如果西班牙人以他們通常的習慣進入中國，他們將會蹂躪和毀壞，從未見過的

人口最衆多和最富庶的國家；如果中國的人民被驅走了，它將如同其他人口減少的殖民地一樣貧困——因爲它的財富是人口衆多和勤勞的人民所產生的，沒有他們，它將不會是富庶的。

『第四：陛下應該知道該族人的政府在約束那麼大羣人，並維持秩序的上面是很奇妙的；雖然缺乏進一步的亮光和信心的幫助，它維持着這樣的和平和安靜，那麼多的財富、快樂和豐盛，據所知道的，自從它建立以來，它的領域的主要部份從來未曾遭遇過戰爭、瘟疫、或飢荒，儘管在韃靼的邊境上有着戰爭。如果該政府被毀掉，他們必會遭受這些災害，因此他們應該被置於該政府或一個類似的政府之下。要看出這一點的重要性，人們只需要觀察，殖民地的其他地方，土著的法律和機構如何被殘踏，即使是我們自己的也沒有受保全。人民如此受摧毀，國家的人口減少，不必說到由之而生的對靈魂、肉體和財富，以及對信仰的傳佈上所造成的損害。這是一項嚴重的錯誤，陛下或那些犯有這類罪行者所能遭到的最壞的後果；因爲這使他沒有領土留下，或者只剩下那些荒廢的，不會產生報酬或利潤，它們在獲得之後便耗竭了。

『第五：要讓人瞭解，前此爲了準備戰爭所講的和所頒下的敕令，並不是要使人感覺我們應該或可以，作得好像是在對付不友善的，我們的國王和我們的信仰的公開敵人，土耳其人，摩爾人和其他種族。因爲這些人不懂得也不瞭解它（基督教），而且沒有惡劣的傾向。所派出的軍隊只是要陪伴和保護宗教傳佈者和國王的使者，保證使他們得以進入該國，並可在他們所選擇而且認爲需要的地方傳道，使那些政府官員，不阻撓他人諦聽和接受教養。他們也將保證皈教將不受威脅地進行，而那些已

經皈依的人，不會因爲在刑罰的威脅下，有再陷邪道和棄教的危險。

「第六：我們認清侵入的事業應該如何地謹慎和溫和，正如國王在他的有關侵入和新發下的命令所表現的基督化的態度中，全面而清楚提出的。但是這些在征服中從來未曾被遵循，因爲它一向是爲沒有經過謹慎選擇的、基督精神未曾經過考驗的、質劣的人所主持的。要補救這種及所有我們曾經述及的罪惡、危險、和損害、以及許多其他最嚴重的，便是遠征軍的指揮是一個在基督的熱誠上和寬大上被承認的人；不爲一切的貪婪所惑，熱中於對神和陛下的服務上的榮譽；有人道的性格，充滿了對一般的善，和對靈魂的救贖的熱情。其餘的領袖、參議、和指揮也應盡可能有同樣的性格；他們必需是一個如果犯了一個基督徒所不齒的罪行時，便要在慚愧和恥辱中低頭的基督徒和貴族。

「第七：如果這一切沒有受到充份的注意，並採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補救——不但是如同上述的關於人選的問題，而且應該頒下嚴格的懲罰敕令，並於適當的時宜加以執行——陛下將在大量的勞作和損失之後，得不到彌補，而只是失掉了他的榮譽、財富、人民、船艦、和武器，這些是由陛下的領域內取得的，這些都是領域內所極其需要的，而被送出去毀損一片土地，蹂躪一族人民——在屬世方面所能擁有的是最豐盛和最富庶的，在屬靈方面是直到現在所發現的最大的可能前途。結果將是，不是由於神的審判，爲了要防止太多的罪行，和損害太多的人民與一個很好的政府，軍隊和整個遠征將被毀滅；要不然，如果該地被贏得了，征服上將毀掉和破壞一切所可能獲得的，而且除了永恆的悲哀的種子之外毫無所獲。

此項征服的利益，如果運用正確

「第一：此項征服如果能正確地訂定並加以執行，其非常巨大的利益，便是神和祂的兒子，我主耶穌基督的知識——這是在離開教會和天主教國王很遙遠的這些土地已經發軔的；而目前在這些土地上受到狹窄的壓抑，和小有傳播，如果一疏忽，每日都有結束的危險——不但將在廣大的領域中傳播，而且應用這種方法，將能很好地建立，很好地伸展，以至永不毀壞或消滅；並且還要在這個新世界中，在神和人的面前，保留一個國王的盛名和榮耀，這個國王靠着他的熱誠、勤勉和豪爽，完成了世界上的其他王國所未會做到的。

「第二：如果沒有親自看見，沒有一個人能够想像或理解，將由此而認識和崇拜他們的創造者的無數的靈魂。今日，他們完全在黑暗中，並且忽視祂，還對地上存在着的魔鬼作最大的馴服和侍候——由完全因着其土地的富庶和豐盛所產生的，大量的偶像崇拜，邪惡和獸慾。

「第三：如果沒有親自看到，人們更難於理解，和罪惡的敗壞、墮落、邪惡、及頑固的風俗相違的——仁慈、高貴、滿足、溫和、愉快、馴良、如何因着天性，輕易地管束這些人民；全中國如何以一個族類，很巨大而人口衆多，許多交接如何以新的或舊的世界所會知道或發現的最大的和平，有規則、安靜、合義、和秩序中進行——這一切並不靠神聖的亮光，或任何懲罰或酬償的援助，而僅靠一個優良的土著政府的力量，或應該說是優雅。

「第四：尋這個方法，我們的風俗將會，或至少可能傳入，同時可極輕易地傳入我們的信仰的條文，不但是因為他們的優雅，同時也因為他們極高的智慧和智力，這是他們清楚顯著超越我們的地方。

「第五：必須立刻建立大量的學校，使我們的書法、語言、和文學可以迅速而容易地在那裏學會，並使他們棄掉他們自己的，因為那是極困難的，即使他們在孩提的時候也不懂得。這些是惡魔的發明，使他們的一生中的整個頭腦忙碌，使他們不能涉及其他的科學，別人在掃清這項阻礙之前也無法教他。在掃清之後，不但是孩子們，而且連成年人，也會學習我們的文字、語言、和文學——不但是因為我們的文字容易，及釋下了他種重負，同時也由於他們天生的才能，他們的溫和的傾向，以及當有所引導時，他們對導向的天性的適應。

「第六：一開始便要建立大量的教堂和寺院，不但是為了上述的目的，而特別是為了要教導我們的信仰、教義、和生活方式。

「第七：鎮撫農民和村民並使其皈依教將不會有什麼困難，他們是很衆多的，幾乎全地都是村落；因為他們是頗為簡單和純淨的，並且遭受極大的壓迫暴政。至於婦女，她們也是很衆多的，要傳入信仰將更無困難，因為她們的美德和自愛是一切認識她們的人所注目的——達到一種程度，在一切道德問題上和我們比較，只是欠缺基督教。

「第八：它將及時阻止可咒詛的回教教義的傳入，這已經染及所有其他的領域，它要在該地建立是很容易的事，因為中國人很有肉慾並充滿了罪惡；只要它一傳入該國，拯救靈魂將是極端困難的，

要征服該地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這種邪惡的信仰對人的堅持上很執拗，在自衛上很殘酷。

『第九：如果讓這個機會溜走，拯救最多的靈魂，和以一個人的能力所能獲得的最大的財富的一切希望都要喪失，這是使我們在這裏想起來很悲哀的，正如我們失掉了許多印度的領域，它們堅強防衛或荒廢無存。並這些具體的利益將要失掉。

其他特別利益

『第一：該國不但足以自供自給，陛下而且可以靠將在該地獲得的物資，阻止和脅迫我們所有的舊敵人。因為他每年可以不損及任何人，輕易地取得五艘建好配好的帆船，配備着武器和彈藥，甚至裝滿物資和軍事供應品。進一步，如果中國人受到良好的待遇和報酬，他們能夠供應在船上工作所必需的人員；他們的勤勞和能力並不亞於我們的船員，正如我們認為他們在葡萄牙船上很熟練的。

『第二：這些船和許多其他的，每年都可裝滿了金、生絲、和各種絲織品——綢、緞、花緞等；以及麝香、鑲着象牙的箱子、匣子、精製和鍍金的帷帳，人類所應用的各種各樣的傢器、器械、裝飾品和首飾；各種各樣織就的麻布。於是不必如現在所為的，由外國運這些物品到西班牙；我國的金錢將保留在西班牙，現在却不然。

『第三：許多看到過的人知道金銀寶藏的塔，以及其體積之大。他們告訴我們多麼大量的銀在通用着，因為沒有他種貨幣在流通，以及它如何大量地自他國流入，而永不外出；除此以外，該國還有

許多極其豐富的礦藏。他們又說，國王不願意讓礦被開發，以使貿易和土壤的耕作不致停止。因為這個原因，銀不斷地被帶入該國，該國所有的却未被帶離——他們說，這使該金屬留於該地成爲寶藏。

「第四：陛下可自一般來源取得的租稅和利潤的數目是很大的——並且不致損害到該國的民政和地方政府。他將由對一般主權的尊重取得；信仰的保衛傳入，可由其本身的代價，照料和謹慎而完成；並且通過不但是維持和保衛該信仰，而也是維持和保衛良好和鞏固的政府的義務，以加以保全。

「第五：在我國人民之間可獲分封的 *Encomiendas* 的數目是很大的；而且太富庶了，每一個受封的人都能够優厚地和慷慨地維持那些留在該地的人。他的封域將是極大的，如果他要再分封給他的屬下，他將有足够的（土地）給每一個人，沒有一個人會被疏忽。

「第六：陛下必須建立許多行政和司法的不同的祿位，以便授予他的臣屬。

「第七：將有許多上尉及其從屬，和軍事職位，以及可給予兵士的位置；有了這三種機會，許多西班牙人可以到那邊去居住，並獲得封爵，該國將因此被置於非常充份安全的地位上。

「第八：由於該地的人民很聰明和智睿，有適宜淺色的皮膚和構造良好的身材，並且很可敬而富有，他們沒有什麼番人的性格，除了信心的救贖和勇氣之外，他們的一切都是對我有利的。而且因爲婦女們極有德行、謙遜和緘默，並且是很貞潔的妻子，對她們的丈夫很謙遜和馴服；由於她們甚至比西班牙女人更殷勤、美麗、和賢慧；並由於她們是富有而又有良好身份的——讓她們和西班牙軍官、商人、及各階層的人結婚（正如有些人在澳門所做的），是一項很簡單而平常的辦法，而且是很可贊

可敬的。那些將和他們的妻子在一起成爲貴族的，將在中國建家立業。於是兩族的人民將會混和，他們將使種族繁殖增加；簡單說來，所有的人將結合、如同手足並成爲基督徒。這是在被發現和殖民的印度的任何部份，所未曾發生或有所成就的事，因爲那裏的人太野蠻和殘酷、太醜陋、卑劣和貧窮，以致（歐洲人）很少和他們建立婚姻的結合。在少數這一類的婚姻的事項下，他們都被認爲是可恥的，這一對夫婦，他們的孩子和後代，都招惹惡名和恥辱。因此，在這些國家之間，沒有友誼、團結、也沒有安全；在土著方面，沒有信心，沒有數量的增加，沒有發展，沒有忠誠；在西班牙人方面，沒有定居者和事業。從而，沒有殖民區也沒有政府；每一個地方都是一種野蠻的生活方式，破毀和敗壞，不管是在屬靈或是在屬世的問題上。在政府的律法上，在產業、村落、和個人的事項上，每一樣都不斷地由壞變得更好，而且處於一種很脆弱的情況下。中國將不會發生這一類的事，也不能容許這樣地漫無秩序，由於這類婚姻所將提供的友誼的機會，並由於在習慣上平等的交接。於是，我們將能在該地維持並確立由於該地人民的特性——他們的美德和美麗、尊貴、財富、和節儉——以及其他有關該國的優點。

「第九：不但如此，這個國家世世代代都很健康和富於生殖力，不久在西班牙人和中國人之間，便會產生出一大羣男孩子和青年。然後，他們不僅將如前所述地，被送到教導讀和寫的學校，而且也要教導科學；在大學裏——裏面將要教導，除了拉丁文和其他語文之外，哲學、神學、和其他的學科。中國人在這一類的學習上，有極佳的記憶力和理解力，而且有很敏銳的才能。他們有優雅的氣質，

和良好的身材。他們很整潔而有禮，在行爲上很嚴肅，有很規則的生活。他們有持有任何官職和尊貴的性格，他們據有並代表比我族人更有權力和嚴格的職位。在另一方面，他們表現得很溫和和融洽——由於在這個領域內沒有峻嚴和暴虐的刑罰，而很安穩定居和平，以令人贊歎的公義統治着。

『第十：由上述的論據，隨之在土著中便會有一些人——不管是純血的，或是有一部份西班牙血的，正如前面所述——在這兩族人民連結之後，會有些人適宜於作神甫和傳教士；並擔任國家的政府官員、和軍事官員的職位；以及負責國家的一切其他的服務和事業。這樣，便顯然可以看到國家如何鞏固，和平和團結，因為這些人會如同對自己的祖國一樣的對付他；由於各地之間所存在的連繫和結合，以及許多親屬的——如妻子、孩子和親戚——和財產的連繫，將迫使他們互相幫助，並照顧國家。

『第十一：在其他的殖民地都沒有這種現象，而是不斷地自西班牙，或自純西班牙人中，供應神甫和傳教士；以及行政官員和法官；和其他一切的職位和指揮，不管是民政上的和軍事上的——甚至是機械匠和上述人員的助手和下屬。此外，西班牙人總是獨善其身，和土著分隔開來——賤視他們，不讓他們分享利潤和榮譽，自己永遠是個陌生人和外國人，而對土著來講，是可怕的題目。當有些西班牙人死亡，或回西班牙的時候，便又有新的來，他們與本國的人民一向是陌生者，並把土著看成爲野蠻人。由此產生了兩項嚴重的弊病，並開始了許多其他的。首先：西班牙人的數目總是很少，對本國（菲律賓濱）只有很少的經驗和知識；他們對它少有愛護，在該地只有很少的連繫和利益。他們總是想回返祖國，以及使自己致富——不管是以公正的方法或以不義的方法；爲了急欲達到他的目的，

甚至加以破壞和消耗——自己不管是加以破壞或改善。第二項弊病是：在西班牙看來，番人的平凡是很新奇的，後者一直被當作工人和奴隸，和擁有他們著的糟蹋物。是以，他們總是被侮辱，被輕蔑，工作過度，精疲力竭，和甚至死亡——正如事實上所發生。隨着這一切，他們的數量的增加，或他們的境況，或他們的土地的改善是不可能的；相反地他們將繼續敗壞和死亡——正如在許多區域中已經荒廢了；依照所有觀察和認清它們的狀況的人的意見和判斷，每一地方都有這種傾向。

『第十二：這一切是由兩個根源產生的。首先是前面曾經說過的，這些人很下賤、野蠻、貧困、醜陋、愚昧、無知、和不配與西班牙貴族結合。第二是土地太過貧乏，沒有足額的財富；它沒有根基或什麼可以生根蒂固的。因為這些人所僅有的財富，即是礦和金屬，以及他們的私有物，而這些都不是固定不動的。這裏沒有世襲的或耕作的田地，或農作物，或日常供應品：沒有工匠的作物，也沒有機器；沒有日常應用的一般供應品。整個地是一個沙漠、窮困、靜止和無人居住——正如他們所說的，是屬於東風的。所以西班牙人正如在旅舍小歇一般地未曾定居下來。這便是他們所贏得的土地。

『第十三：在中國，情形便完全不同了，由於它的人民，正如上面所說的，有資格（與西班牙人）結婚、交友、結合和平等；他們也够格在屬靈和屬世的方面，享執職位、尊榮和權力。況且，該國的財富是很巨大的，又是這種形式——不動產，農作物，和生活的必需品；米、小麥、和大麥供應；的各種各樣的果子，和各種的酒；家禽、鴨、和許多種的禽鳥；許多種的牛、馬、母牛、羊、綿羊、和水牛；大量的皮，無盡的絲，和頗成數的棉；麝香、蜜和黃臘；多種有價值的木材，許多種的香料

，及其他由土地生長的物質；此外還有前已述及的大量的礦產和金屬。這一切是很大量的，很有才能的、節儉的、勤勞的、和良好管理的人民的勞作的結果。難以置信的大量和豐富的，供人類應用所能要求的各種行業、技藝、發明、工業、和作坊——必需品、裝飾品、奢侈品、首飾——和所有的工場和商品，不但是供本國應用，也供與外國貿易。這一切，連同前面所講的關於這些人民的，如果上帝願意，將足以使我們進入這些領域，簡單說來，使他們平定、通婚和結合，西班牙化和基督教化。使得人們無法描述由此產生所有的巨大的利益，不管是屬靈的或屬世的——一種新的信仰的亮光，優良的生活方式，救贖中國人和許多人的靈魂，並榮耀上帝；我皇的財富、尊榮和永世的榮譽；西班牙國的聲威大振、繁榮、和滋長，及由此而及整個的基督教範圍。此外，還有這些將隨之而來。

除了已提及外的其他利益

「第一：可以立刻建立大主教和主教（在該地，可以有整個的舊基督世界一樣多），和一個總主教（Patriarch）。

「第二：該地可以建立一個比舊國家有更大的稅賦的新的軍事制度；或者可把舊有的 Santiago, Calatrava, Alcantara 和 San Juan 伸展，如果這些和其他新的，可在征服中被使用，甚至將有更大的利益。

「第三：一羣爵位可被建立，如伯爵、公爵、和侯爵，正如目前所委的 *Encomenderos* ——因

爲該地的 *Encomiendas* 必將更大；有這樣的遠見，入侵將會大爲確定，土地在以後也會更穩固，因爲該地有許多爵位。

「第四：陛下將委任四名或六名總督，如同現在的十五省有十五名，他們將與國王在其他地方的總督有同樣的權力。

「第五：在這一些都已達到之後，該地已在穩定的情況下時，陛下可自該地爲本國取得大量的入息和許多商品，正如上面已經述及的。

「第六：可以與韃靼人和在中國與土耳其之間的地區中的其他部落，獲致和平和諒解；我們將能更好地知悉他（土耳其）的情況和實力，並找出一個由東方的此間窘迫他的途徑。

「第七：傳訊者和遞郵者，可由陸路遺至西班牙；因爲雖然已經有些人來自陸路，他們一直都在尋覓一條更短和更佳的路綫。

「第八：先前與 *Son* 及阿米尼亞人所建立的和平和親善，以及在全亞洲所將被發現或交接的，或認識的任何其他的人民，將會大爲加強。

「第九：當陛下成爲中國的國主之後，他將立刻成爲它的沿岸的所有的隣國的國主，包括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羅、*Pata* 和甚至遠達馬六甲；它將能很輕易地轄隸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摩鹿加諸島嶼。

「第十：可由此保障印度，及來自中國的商品的利潤——沒有這項商業，他們將無法維持；這在

現在是不安全的，而且除非它被征服，是很不穩的。

「第十一：在某些王國中建立統治權，與其他建立聯盟和通商的理由，將是强有力的——爲了救贖靈魂的機會；靠着這個方法，以基督爲名的知識，將被傳入這一切的地區中，其中所有的靈魂，將繼續被救贖。」

「第十二：中國人將航海至祕魯及新西班牙等殖民地；他們和我們的關係將會更加確立和鞏固。」

「第十三：該國的人口很巨大也很稠密，許多中國人可以被帶進這些島嶼作爲殖民者，由此可使他們自身和這片土地致富。」

「第十四：立刻佔領中國可以堵塞法國和英國，及其他異端和北方的國家，將發現和航行在這些地區對面的海峽的危險——正如這些所說的 *L'Inbrador*。（這是一條當時所假設的航綫，並沒有地理上的事實。）」

「這些是簡略的，許多應該防止的弊病和一些（不再提到許多其他的）無數利益的一部份——這些要逐條寫出是很長的，甚至不能被想像到——陛下如果選擇要進行這項極巨大的事業所將獲致的；願上帝我主施予他以恩惠和眷愛以便進行。」

這件侵略中國的詳細計劃，完全證明了西班牙侵略者對侵略中國的確有切實的準備，西方強國在進入亞洲的最初階段，便做着滅亡中國的迷夢。當時在菲律賓濱的所有的重慶西班牙人，都在這件計劃書上簽字，可見到了這個時候，侵略中國已不是少數好大喜功的西班牙人的意見，而是西班牙在菲律賓濱的統治當局

，包括軍事、政治和宗教部門的一致主張。由這件計劃書的字裏行間，也流露出西班牙本國的政府，一向來也就有了侵略中國的念頭，這件計劃書只是擬就具體步驟，向西班牙政府提出。

當時的西班牙國王腓立二世，同時兼任葡萄牙國王，歐洲大部份的土地，除了法國、意大利的一部份和英國之外，都在腓立二世的統治下。腓立二世統治下的領域，自歐洲東部與奧吐曼回教王國接壤的地方開始，伸展至歐洲國家在美、亞、非三洲的全部殖民地。這個時候準備侵略中國的，是一個可與羅馬帝國媲美的歐洲強國。

十六世紀的歐洲政治和宗教是無法分開的，更因為西班牙特殊的歷史傳統使它帶着特別強烈的宗教熱忱，西班牙的侵略行爲，都是軍事、政治和宗教互相配合的。西班牙侵略者在進行侵略和鞏固其殖民地統治的時候，天主教神甫一直是一股重要的力量。在這個計劃書中很明顯地暴露出這個事實：天主教神甫一方面要幫助西班牙自日本取得協助，另一方面甚至要撤出少數進入中國的天主教神甫，供給情報並協助西班牙侵略軍。西方的神甫和傳教士在歷史上一貫來的表現，是他們對其本國的忠誠往往超越其對宗教的熱忱，他們總是在必要的時候，幫助其祖國的勢力的發展。基督教在本質上是西方文化的特性之一，西方人的文化生活的各部門與基督教發生密切的關係，不瞭解基督教，是無從瞭解西方文化的（這是在文化上着這個問題，而不是基督教的教義上）。一向被認爲，也自認爲是歐洲的一部份的西班牙，在剷除他們認爲是異族文化的回教和猶太教的時候，基督教表現得異常殘酷。當猶太人被迫害的時候，基督教文化成爲一種崇拜幾個已死的猶太人，而迫害成千成萬活着的猶太人的文化。西班牙人的這種文化傳統，使美洲土著

的Aztec（墨西哥）和Inca（祕魯）的文化受到徹底的摧毀。

但是到了西班牙佔領菲律賓以後，西班牙侵略者已經有着較豐富的統治殖民地的經驗，他們已經有了使菲律賓天主教化的更有效的方法。在這個計劃中，使中國人民天主教化，仍舊是西班牙計劃中，統治中國的最主要的手段。儘管他們一再斥罵中國政府是壓迫人民的暴君，中國人民是邪惡的族類，然而他們却很清楚，在佔領中國之後，他們仍舊須要利用這個中國政府統治中國人民，他們也明白中國是一個文化高度發展的國家（當時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之一），如果能夠穩定地統治中國，將會為西班牙帶來極大的利益。

他們甚至計劃使西班牙貴族與中國女人通婚，從而鞏固西班牙與中國的連系，加強對中國的統治。在西班牙人看來，這已經是特別看得起中國人了，因為西班牙人如果與任何其他殖民地的女人通婚，這些西班牙人和他的後代都要受到鄙視。我想中國人大概不會因此而受寵若驚，中國人民只會因為當他們尚稱富強的時候，西方強國早已在中國南疆虎視眈眈，封建王朝對這種形勢却一無所知而感到痛心。

明朝中國的政治一向來是極腐敗的，到了這個時候已經是很糜爛了，西班牙如果在這個時候實行侵略中國，佔領中國南部的一部份土地並不是絕不可能的，當時的澳門早已為葡萄牙所盤據。固然西班牙的這種佔領不大可能長期維持，歷史上從來也沒有一個外來侵略者能夠長期統治中國，但是中國在當時畢竟是餘威猶存，佔領中國南部會使西班牙在亞洲的聲威大振，甚至有可能因此席捲東南亞和整個印度。更大的意義是西班牙如果侵略中國，將是中國在歷史上第一次受到一個文化高度發展的國家有組織性的侵略，中

國歷史可能在這個時候，開始了一個全新的章回。

不過，我們不能對歷史的可能性作太多的揣測。歷史的事實是當菲律賓濱西班牙代表會議提出這項計劃的時候；在歐洲、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即將進攻英國；在亞洲、為清朝開基建業的努爾哈赤正在中國的東北角坐大，而日即將統一建州衛。一個全新的形勢，不久即將在歐洲和亞洲出現。

「無敵艦隊」的慘敗 一五五八年（嘉靖卅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信奉英國新教的英國女王伊利沙白一世繼承英國王位。在當時的英國，英國的基督教新教（Anglican）與天主教之爭，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宗教問題，它在本質上是英國的民族主義在文化思想上的體現，自從君士坦丁奉基督教為羅馬國教以後，歐洲的政治和文化的發展，都是和基督教分不開的。英國新教在英國的鞏固發展，意味着英國對羅馬教廷的抗拒，也意味着英國與天主教歐洲的對立。對正在勃興中的英國民族主義，英國新教起了極大的激發作用。

當時天主教歐洲的領袖國家當然是西班牙、一五七〇年（隆慶四年）二月，天主教皇庇護五世，發表將伊利沙白逐出教會的敕諭，使西班牙在與英國的爭執上，完全得到天主教會的支持，使西班牙能夠持着宗教上的正統地位，討伐英國新教的異端邪說。當時英國的皇族，亡命於伊利沙白宮廷中的蘇格蘭瑪麗女王，是伊利沙白一世的合法繼承人，瑪麗女王是一名天主教徒。（當時的蘇格蘭另有國王，不是在英國國王的直轄下。）亡命英國的瑪麗女王對伊利沙白一世的統治是一個極大的威脅，以西班牙為首的天主教勢力不止一次地企圖謀殺伊利沙白一世。當時的天主教是歐洲的統治思想，英國是崇奉新教的唯一獨立國家

。反對宗教改革的勢力，集中火力對付英國、認爲只要摧毀英國的新教，全歐洲新教的勢力便會被廓清。在這樣的形勢下，英國政府不斷地發現暗殺伊利沙白一世的陰謀，英國的新教勢力於是認爲把伊利沙白一世的合法繼承人，天主教徒瑪麗女王處死，是一項政治上的必要。一五八六年（萬曆十四年）英國法庭宣判瑪麗女王犯有叛國罪行。一五八七年二月八日，瑪麗女王被處死刑，暗殺伊利沙白女王，使瑪麗女王登極恢復天主教在英國的勢力的企圖，至此宣告無望。

不過西班牙與英國之爭，在表面上看來，固然帶着濃厚的宗教色彩，在實質上却是經濟發展的競爭。只是英國和西班牙不同的歷史傳統和文化背景，使它們在各別的殖民地上，加以全然不同的影響，使它們各別的殖民地的發展，有着顯著的差異。

英國自十六世中葉開始，便處心積慮要染指美洲大陸；一方面由於英國內部人口膨脹的壓力，使一部份英國人謀求移居海外，在美洲大陸建立一個海外英國；另一方面由於英國的紡織業（當時主要地是毛織品），希冀在海外發展市場，英國便自行努力尋覓另一條可以通達中國的新航綫。

伊利沙白一世所承繼的英國，是一個面臨風雲險惡、內憂外患交加的英國。英國當時不但是面對着天主教歐洲的敵意，英國政府在財政上又很窘困，英國政府要向歐洲的金融市場貸款，必須付出很高的利息。她的勁敵西班牙，是一個可以源源不絕地自美洲大陸掠取金銀的富強國家，他的財富使他擁有一支配備最佳的極強的軍力。

伊利沙白繼承英國王位以後，表現出她是一個很精明而圓滑的統治者和外交家，而且是一位偉大的愛

國者。爲了英國的利益她可以不擇手段，作出不顧一切的犧牲。她利用未婚的身份，玩弄國內和國際的政治，鞏固她在國內的統治，並阻止歐洲大陸集結成爲一個強有力的反英聯盟。在她登位後的最初期，她甚至表示準備與英國最主要的敵人腓立二世結婚。後來當英國國會一再要求她結婚的時候，她始終認爲未婚的身份在政治上對她是有利的。

不難看出地，西班牙在當時，不管是在財力上或是在軍力上，都佔有壓倒優勢。英國政府並不敢在軍事上公開與西班牙抗衡，她只能以海盜的身份的出現，在海上進擊西班牙商船，掠劫西班牙在美洲的，有時候甚至是在歐洲大陸上的港埠，伊利沙白一世一直支持着這一類她伴稱不知的海盜活動。一五八〇年英國著名的海盜 Drake 自環遊世界的掠劫航行返英的時候，載回大量的金、銀、錢幣，伊利沙白女王親自在後甲板的士官室中，封 Drake 以 Golden Hind 的爵位。

英國海盜襲擊西班牙船艦和港埠並不是造成英西戰爭的原因，而是英國和西班牙爭奪世界霸權的接觸戰鬥。這些海盜戰爭使英國獲得與西班牙作戰的經驗，使英國熟悉赴美洲大陸的航路，使英國打開了直接與亞洲交通的航路。英國海盜所掠劫得來的財富，成爲一向貧困的英國的資本累積。實際上獲得英國政府支持的英國海盜的不斷強大，其活動的不斷加劇，是迫使西班牙不能不公開與英國正式作戰的原因之一。

西班牙檔案室中保存着好些文件，證明西班牙老早就準備進攻英國。但是一方面由於伊利沙白一世在歐洲大陸上運用她圓熟的外交手腕，另一方面由於西班牙一直陷於與法國和荷蘭的慢痛的戰爭中，使西班牙進攻英國的計劃受到長期的就延。

荷蘭是基督教新教（與英國新教不同）在歐洲大陸上的一個堅強的據點。荷蘭的獨立革命戰爭，開始的時候是以宗教戰爭的形式出現的，在西班牙與荷蘭的漫長的長期戰爭中，英國一直是半明半暗地支持着荷蘭。這是迫使西班牙公開與英國正式作戰的另一個主要的原因。

一五八〇年腓立二世承繼葡萄牙的王位，使葡萄牙人造船與航海的技术和經驗，能够與西班牙互相配合，使「無敵艦隊」的建立，完全成爲可能。腓立二世在一五八三年作出了進攻英國的最後決定，西班牙與英國的決戰，到了這個時候，幾乎是無可避免的了。英國只能作出一些緩兵之計的行動。

儘管西班牙在當時是堪稱爲羅馬帝國之後最主要的歐洲強國，西班牙內部却存在着嚴重的弱點：西班牙的財富只限於由美洲大陸剝奪而得的財富，這些財富並沒有成爲投資於工農業的資本，因此西班牙國內並沒有一個强有力的國家經濟體系；對猶太人和回教徒的迫害驅逐，只是造成本國經濟的混亂和衰退；天主教勢力的強大，使僧侶成爲一個特權階級，許多優秀的西班牙人進入修道院修道，西班牙的人口不但沒有增加却反而減少；和一切沒落的王朝相似地，西班牙商業金融勢力開始與政治勢力勾結，造成政治上的貪污腐化；諸如此類的現象，已經開始使西班牙露出沒落的端倪。不過，在「無敵艦隊」征英之前，西班牙雖然已經顯露出沒落的開端，但是却還沒有達到無可救藥的地步，西班牙大帝國崩潰的命運還沒有被注

定。

一五八八年五月，西班牙的「無敵艦隊」準備就緒，其中包括船艦約一百卅艘，載有官兵水手約三萬多，炮二千五百門。從整個形勢看來，西班牙佔有絕大的優勢，英國完全處於劣勢之下。西班牙如果征服

了英國，壓平荷蘭的革命是指日可期的，歐洲甚至可能在西班牙稱霸之下形成大一統的局面。歐洲面臨着一個重要的歷史關鍵。

但是「無敵艦隊」的征英，完全暴露出西班牙的腐朽。「無敵艦隊」的整個征英的作戰計劃，是腓立二世在西班牙親自訂定的，西班牙將領在作戰過程中，發現這項計劃不合實際的時候，又不願改變作戰計劃。被委為總指揮的Medina Sidonia公爵，對海軍事務毫無常識，他完全是因為他的家族的聲望而得到這項委任，他毫無隱瞞地率直告訴腓立二世以他缺乏海軍常識，但是腓立二世堅持他的委任。除了總指揮以外，許多將校也都是缺乏海戰經驗的。糧食的供應（由私營商人承辦）更顯出西班牙政府的腐敗，不但糧食的供應不足和爛壞，連船上的食水供應都發生毛病。

由於腓立二世所訂下的作戰計劃在基本上是錯誤的，指揮者又無法隨機應變，「無敵艦隊」在五月二十日離開西班牙，在七月底實行進攻英國，結果是一敗塗地。「無敵艦隊」只得駛返西班牙，在歸途中又遭遇風暴，一五八八年十月，只剩船艦六十五艘，載一萬人安抵西班牙。由英國現存的記錄考察起來，當時參加這場戰役的英國人，還沒有能够充份地理解他們為英語民族所建樹的功績。不過顯而易見地，這場戰役使英國的民族自尊大為提高。

這是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海戰，「無敵艦隊」的慘敗是對西班牙的世界霸權最致命的一擊，是西班牙大帝國崩潰最明顯的開端，是歐洲歷史重要的轉捩點，也是中國和西方關係史上的一個段落。

「無敵艦隊」的慘敗對菲律賓的歷史，無疑是具有重大的意義。菲律賓並不是當西班牙正在向上發展

的時候被佔領的，而是在西班牙處於登峯造極的時候被佔領的，西班牙在統治菲律賓的最初期，便開始腐化沒落。菲律賓社會發展的這種特殊背景，無可避免地會影響中菲關係和菲律賓華僑。

「無敵艦隊」征英失敗之後，西班牙和英國的戰爭長期持續着，西班牙的沒落，當然不是直線下瀉的。但是西班牙帝國沒落的命運至此已經是確定了，「無敵艦隊」慘敗之後，西班牙的國力就此一蹶不振。英國開始以一等強國的身份出現，並與西班牙爭奪世界的霸權。但是一個大帝國的崩潰，和一個新興強國的朝上發展，同樣是長期緩慢的。西班牙的世界霸權，並沒有立刻為英國所取代。

菲律賓西班牙代表會議所派出的請願代表亞命樹·山齊示，於一五八七年九月抵達 *Seville*。西班牙國王立刻予以接見，並建立一個委員會專門研究該請願書，該請願書有一大部，後來為西班牙政府所採納。但是一五八八年，「無敵艦隊」慘敗的消息傳來，西班牙在事實上開始進入了一個歷史的新階段，侵略中國的計劃在這種形勢之下，當然只有加以擱置。

這一次西班牙和英國的海軍決戰，不但在歐洲，而且也在亞洲造成一個新的形勢。西班牙的亞洲政策因此而必須重新調整，菲律賓的統治者，開始由一個雄心勃勃，夢想建立亞洲大帝國的歐洲霸主，變成一個每况愈下的腐敗的封建王朝。這個羅馬帝國以還，全歐洲最強大的西班牙帝國，不久便要墮成只會追憶過去光榮的歐洲最落後的國家。

中菲關係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中國南疆所受的侵略威脅，為客觀形勢所減輕，已經侵入亞洲的歐洲強國，開始由一個朝氣蓬勃的侵略國家，變成一個腐爛沒落的老大帝國。在「無敵艦隊」慘敗之

前，西班牙侵略中國的計劃，是一個切實準備執行的計劃，中國在實際上面臨着由菲律賓濱而來的武裝侵略的威脅；在「無敵艦隊」慘敗以後，西班牙對中國的侵略大多只是紙上談兵，固然西班牙後來也還有一些侵略中國的計劃和行動，但是他們再也沒有先前的氣魄和雄心了。

這是客觀的歷史事實，西班牙的對華政策，隨着歐洲形勢的大轉變，而起了本質上的變化是確然無疑的。但是我們無法從明朝中國的南洋政策（更正確地說是毫無政策）考察出中菲關係的變化，因為明朝中國對當時的國際形勢，是全然盲目無知的。

一向來在歐洲歷史上只被晦隱提及的英國，從這個時候起，開始則身於世界強國之列，而且在不久之後，即將取代西班牙的地位在世界上稱霸，英語民族在這個時候開始抬頭，成爲左右世界的政治力量。

歐洲形勢的此一巨變，造成一個對中國極端有利的歷史時機。一方面是歐洲最主要的強國西班牙的沒落，另一方面是正在興起中的英國還沒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取代西班牙的地位，這是西方強國侵入亞洲以後，客觀形勢對中國最有利的歷史時機。當時的中國如果有一位英明的領袖，以當時中國的國力和客觀的國際形勢，實在是足以一舉把西方勢力逐出亞洲，甚至可能領導亞洲、非洲、和美洲的落後民族與西方強國抗衡。但是當時統治中國的是一個毫無雄心和朝氣的封建王朝，充塞全朝的是恭維奉承和阿諛諂媚的萎靡之風，只會把即將縱橫全球的歐洲人目爲野蠻的夷人，不但使中國在極有利的客觀形勢之下，錯失了一個大有可爲的歷史機會，而且把中華民族導入萬劫的深淵。

然而西班牙「無敵艦隊」的慘敗仍舊對中菲關係，以及對中國與整個西方世界的關係有重大的影響。

正如前述的，西班牙侵略中國的威脅在這次歐洲大海戰之後減輕了，並且隨着西班牙的繼續沒落而終於消滅了。保守自封的中國封建王朝，得以沉醉在過去光榮的歷史中，繼續苟安自大一二世紀，坐使西班牙帝國逐漸沒落，坐使英語民族羽毛豐滿稱霸世界，坐使歐洲均勢在消長變化中再度穩定之後，再讓西方強國聯合日本以宰割中國。

研究這個時期的菲律賓歷史和中菲關係，不能不把握住歐洲形勢，和西班牙歷史發展的這一項基本變化。

使華僑西班牙化 西班牙佔領菲律賓以後，菲律賓的中心城市馬尼刺的居民，中國人在比例上佔有很大的數目。西班牙人的數量，一向是較中國人爲少；中國又是當時亞洲的主要強國。這種現象一直使西班牙當局忐忑不安，他們始終認爲在數量上遠遠超過西班牙人的菲律賓華僑，對西班牙在菲律賓的統治是一種極大的威脅。但是由於菲律賓在經濟上對中國的依賴，菲律賓華僑又是西班牙統治當局所需要的。於是，爲了要減少華僑對西班牙統治的威脅，同時，又帶着征服中國的雄心，西班牙當局便訂下了要使菲律賓華僑西班牙化的政策。

天主教文化和回教文化在歐洲大陸的邊沿上所進行的、持續了數世紀的鬥爭，是西班牙的重要歷史文化背景。天主教的勝利，使西班牙真正地成爲歐洲的一部份，使西班牙的文化與歐洲文化的主流相融匯。在擊敗回教勢力之後，西班牙政府主要地是依賴天主教的力量，來鞏固其對本國的統治，因此，在統治被征服的殖民地的時候，天主教神甫通常也是主要的統治工具之一，天主教神甫經常與軍事暴力相配合。由

於西班牙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西班牙人常常表現出近乎狂熱的宗教懼忱，所謂西班牙化，往往似乎就是天主教化。西班牙的天主教政權是靠殘酷的手段加以鞏固的，西班牙天主教有着極端狹隘的性格，不擇手段迫害異教徒的長期傳統，使西班牙的天主教對任何細微的反抗象徵，都無法加以容忍。西班牙天主教的這種特別偏激狹隘的傳統，是與一個以固有文化自豪的民族很難以相容的。

明末清初有許多天主教傳教士到中國去，有一部份很受中國歡迎，其中有一些人甚至可以說是在中國大有建樹，例如有名的利馬竇。但是在菲律賓長期計劃，甚至有西班牙政府的力量作後盾的西班牙傳教士，在中國反而很少有所作為。西班牙天主教的狹隘性格，大大地阻礙它向外傳佈——除非與暴力相配合。不過，基督教在它的最初期，是一個被迫害的宗教信仰，在耶穌死後的三百年中，無數的基督教徒在慘酷的迫害之下堅持他們的信仰，許多基督教的殉道者，成爲人類優美性格的典型。當然也有一些天主教神甫，繼承着真正的基督教的傳統熱忱。但是一般地說來，當時的西班牙當局所要在菲律賓傳佈的基督教，是一種教徒必須向天主教國王（他們把西班牙國王稱爲天主教國王）效忠的天主教。在他們看來，不向天主教國王效忠的天主教徒，是不可想像的。

使菲律賓華僑西班牙化，並向中國傳佈天主教，是西班牙一佔領菲律賓以後，立刻制定的政策。

西班牙一佔領菲律賓以後，不管是行政當局或宗教當局，對使菲律賓華僑天主教化的工作，都非常加以重視。他們的共同目的是要使菲律賓華僑效忠西班牙。

明朝滅亡，滿族入主中國之後，強迫中國人民薙髮，成千成萬的頭顱因爲不願薙髮而被斬掉，不願薙

髮成爲漢民族不願臣服異族的表示。最有趣的是當西班牙人要使菲律賓濱華僑皈依天主教的時候，也發生過剪髮的問題。西班牙總督Santiago de Vera於一五八七年（萬曆十五年）六月廿六日致腓立二世的報告書，提到了這個問題：

「我曾經向陛下報告，有些到本市來的中國生理人，成爲公民和基督教徒。主教立刻命令他們，依照我國的風俗，剪掉他們的頭髮；本來他們依循他們的風俗，把它留得很長，並以一定的方法辮結。他們對此極爲不悅，爲了不致被迫剪掉他們的頭髮，其中有許多不願受洗；因爲在他們的國家裏，這是對他們極大的侮辱，被認爲是一項足以使他們斬首的大罪，沒有了它（頭髮），他們便不敢回去帶他們的財產和他們的妻子到這裏來定居。我曾經對大主教說，因爲這是風俗而不是一項宗教的禮儀，正如我們有短頭髮的風俗一樣，他不應該將它剪掉。但是他拒絕這種看法，他說他最怕他們回返本國，並回去崇拜偶像。可否請陛下審查並解決這個問題。因爲它是極端重要的，我在此重申這項懇請。」

一五八八年七月十三日Vera致腓立二世的報告書中，再提到向菲律賓濱華僑傳教的問題，而且再度涉及剪髮的問題：

「自從我至此之後，我一直堅持傳教士應該設法學習中國話，以便教導本地的中國人使其皈依，他們通常是如我前述的那麼多。因爲它很困難，傳教士又忙於在土著之間進行工作。當道米尼干教派至此之後，我委任他們去教導中國人，並供應翻譯以教他們這種語言。我吩咐他們在生絲市場（叫做

八連)，及中國人居住和做生意的敦洛區中，建一座教堂和居所。其中有兩位傳教士是很有能力的，有一個已經能懂能講是種語言，另一個不久也將要懂得。他們傳道教導，並使許多人皈依，現在已經有了一個基督教徒的小村。今年耶穌受難週的星期四，他們有一個為基督的血而舉行的行列，他們在此中表現出很大的熱誠。我希望我主能使這些人，很清楚很堅定地瞭解他們所學到的，而且在一個很短的期間內全體都會皈依。確然地，如果在洗禮時不必剪掉他們的長髮（如大主教所命令的），此地將有大規模的皈依，他們將接受洗禮。我依此向陛下報告，並等待你的命令。」

腓立二世對這個剪髮問題所作的批示是：

「把這件事寫信通知有關部門，並為剪掉中國人的頭髮這件事，寫信給主教。這是不適宜的，因為他們的皈依因此而受阻滯。況且，他們不敢再回返本國，以便教導並使其他人皈依。如彼所知的，這種中國人留長髮的風俗，是比殖民地的其他風俗更普通的；從來並不被認為是不適宜的。讓主教召集各教派的首領，以及其他有學識和熱心人。他們可討論並決定作出有關使中國人皈依的適切措施。他應提交關於此事的建議，以及將遭遇的困難，同時提供辦法。」

由此可見，菲律賓華僑不願因皈依而剪髮，成爲一個西班牙當局很重視的問題，西班牙在菲律賓的行政當局，和西班牙本國的政府，都認爲這是一項可以退讓的小節。

後來腓立二世發下敕令，容許願意受洗禮的中國人，可以不必剪掉頭髮，菲律賓天主教主教大主教 Domingo de Salazar，於一五九〇年六月廿四日，致書腓立二世，對這個問題加以辯解：

「在第二條敕令中，陛下命令願意受洗禮的生理人，他們的頭髮可以不必剪掉。那個向陛下報告這件事的人欺騙了你，因為有不止一千家的房子，爲留在此地出售他們的商品之生理人所居住，而有超過（原稿空白）住在本市叫做八連的絲市場，並有超過（原稿空白）在市郊。可以確定地說，在這地方至少共有超過（原稿空白）。自從聖道米尼干的傳教士來到本國之後，已有兩百多人受洗禮，而每日都有更多的人受洗禮。至於與生理人有關的事，以及上帝對他們和對我們的大慈大悲，將在另一封信中敘述，以免使本信過長，陛下將在該信中讀到你得到多麼良好的服務的證明，而你將會大爲感激上帝。向陛下報告這些事的人有些熱誠，但是沒有智識；因爲我比那個寫信給陛下的人，更多地考慮到一切的情況，期望使這些中國人皈依，並達到目的。如果不是很必要，如不是不這樣做對我所交接的人和信心大有危險，我將不會決定將他們的頭髮剪掉。這些事的性質是不管有人提出什麼意見，我將不能別有所爲，即使是我希望要這樣做。因我爲曾經使其中的二人不必剪髮而獲得洗禮，我因而造成對我極大的損害；陛下可以由此看出事實與由此寫信給你所說的事是多麼相反，而且並不是如寫給陛下下的信中所說的，他們會因剪掉頭髮而被處死刑；因爲在道米尼干教派的神甫學會該語言之後，我們發現了該地先前嚴加隱匿的大量的祕密。」

西班牙當局內部對中國教徒剪髮之爭，在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基本的對立，問題只是在於觀點上的不同，行政當局認爲剪髮只是小節問題，大可不必拘泥，而宗教當局則認爲剪髮是中國人皈依天主教之後，準備效忠西班牙的最有效的保證。

道米尼干教派是第一個率派向中國傳道的天主教派，他們在一五八二年七月十四日，取得向菲律賓和中國傳教的權力。Juan Crisostomo 於一五八二年九月十五日在羅馬取得一件教皇格利哥里十三世的敕書，該敕書授予在菲律賓和中國的道米尼干教派，以赦罪，將教徒逐出教會，及其他判斷，譴責和刑罰的權力。

菲律賓天主教第一任大主教 Domingo de Salazar 便是屬於道米尼干教派的，他本人對向中國傳道又頗具熱忱，因而常常表現出對華僑的關懷。本章「八連的建立」這一節中，便提及這位大主教在一五八三年，就已對西班牙行政當局虐待華僑的舉動表示不滿，在一五九〇年六月廿四日致腓立二世的信中，他又寫道：

「因為信中，關於陛下命令我採取步驟保護土著的一節，沒有提及生理人，總督認為——而這是他的意見——由於我們沒有被委任，我和我的代表，都不能像替土著一樣地，替他們辯護。可否請陛下申令這件事的處理辦法，因為生理人比土著更需要受保護。目前，依總督之所欲，我將不停止在一切有關的事上協助他們，如同陛下委任我管顧他們一般；我的代表也同樣地，在屬於他們的問題上這樣做。」

一五九四年六月十一日，腓立二世終於在馬德里發出一件敕令：

「我們獲報告謂自中國前往菲律賓貿易的生理番人，受到西班牙人的損害和虐待；特別是由我們的皇家官員，派駐在他們船上的守衛，向他們索取賄賂，以讓他們取掉一些自他們本國帶來餽贈親友

的東西；前往船上登記的職員，取去和濫用一切最佳的商品，留下一些品質不太好的，結果使之大為失却均衡，生理人通常無法如同被他們取去的優良商品一樣地，售掉所剩下的；雖然前往登記的職員取去了最佳的（商品），官員們說當所剩餘的售出之後，他們將照價償還，因此他們只是償付較劣和普通商品的代價。於是中國人損失了如果他們能夠自由出售，將會是最有價值的物品；因為怕前往登記的職員取去他們的商品，他們在估價的時候，為他們的商品標出比其真正價格更高的價格，而他們依商品所估定的價格付稅，雖然在事實上，他們後來以更低的價格售出。我們同時獲通知，他們船上的桅被取掉，以便樹在那些在該島嶼上建造的船，因為那些桅是很輕的；它們被換上重的，致使他們的船無法支載而破裂，中國人因此而受到嚴重的損失。由於顯然應在這些人前往貿易時，受到歡迎並得到良好的待遇，以便使他們在回到他們的國家時，對他們自我國的臣屬所得的待遇和歡迎，作良好的報告，從而激發其他人前往，藉着這一種交通，接受基督教的教導，並宣佈信仰天主教，這是我們主要的意欲和目的，我們命令總督在審查了這些損害的性質之後，頒下必要的命令，終止這一類的困難。他們將不容許中國生理人，或任何其他商人，受到上述的或任何他種的任何損害、阻撓和壓迫；他們應非常謹慎地對待生理人，並予他們的良好訊息。那些傷害和虐待他們的人將受到懲罰。』

西班牙佔領菲律賓的初期，菲律賓華僑立即受到西方侵略者的虐待，明朝政府也分明知道這種情形，

明史卷三二三呂宋傳記載曰：

「佛郎機既奪其國，其王遣一會來鎮，慮華人為變，多逐之歸，留者悉被其侵辱。」

這是多麼可恥的記載，一個與中國維持長期友好關係的朝貢國，受到寇讎的侵凌時，中國政府毫無能爲已經算是罷了。何況這個侵略者在「奪其國」之後，對中國僑民便「多逐之歸，留者被悉其侵辱」。中國正史尚能够安安閒閒地輕描淡寫，難免令人慨嘆無已。中國封建王朝即使在堪稱富強的時候，亦未曾盡過保護華僑的責任，讓西方強國一踏入在傳統上尊崇「天朝」的地區之後，便要向「天朝的子民（或粟民）」施捨「不要過份虐待」的「恩惠」。

前面提到皈依天主教的菲律賓華僑，都要被迫剪髮，這些剪髮的華僑天主教徒，大概都是準備在菲律賓建立永久的家園的，東西洋考卷五呂宋條記載曰：

「華人既多詣呂宋，往往久住不歸，名爲壓冬。聚居湖內爲生活，漸至數萬，間有削髮長子孫者。」

這裏的所謂「削髮長子孫者」，大概是專指不再回中國的華僑。當時的菲律賓華僑在皈依天主教之後，便不得回中國，腓立二世於一五九四年六月十一日頒下一道敕令：

「主教們不容許在菲律賓羣島皈依天主教的中國基督徒回他們本國，以免他們和異教徒的交接和一起生活，造成使他們墮於棄教的危險；總督知道他們除了在近郊貿易、購買供應品供應社鎮之外，沒有其他的方法生活，又不許他們未曾許可便離開馬尼刺，這對使其他人皈依是很大的阻撓和障礙。我們命令這種許可證不得收費；在使中國人得以自由在這些島嶼上來往的事上，總督應該寬大和小心地使他們沒有困難。」

赴中國傳天主教

天主教神甫一向是與西班牙侵略軍相隨伴的，西班牙一開始向亞洲進行侵略，向中國傳教便成爲西班牙政府的一項重要政策。在這項政策的執行上，天主教神甫常常表現得比行政當局更熱中。一五七五年隨王望高赴華的奧古斯丁教派的神甫 Martin de Padua 和 Gerónimo Marin，是由菲律賓濱出發赴華的第一批傳教士，但是他們沒有被允許在中國傳教（參閱第四章）。

一五七七年第一批佛蘭西斯教派的神甫抵菲，中華帝國史對他們赴中國傳教的熱忱，有詳細的記載：「佛蘭西斯教派在島中住了一年，忙於幫助奧古斯丁教派，和教導並使土著皈依，自奧古斯丁教派神甫本身的報告，並自不斷帶商品來到本島的許多中國商人，獲悉許多有關該帝國的奇妙的事物及無數的靈魂，這些靈魂在魔鬼掌握下爲其服役，以虛偽的偶像加以欺騙——他們充滿了拯救這些人民的巨大的熱誠和渴望，並希冀能到該地去傳福音，雖然這樣會使他們的性命冒危險和憂患。他們多次向皇上陛下派至本島的總督山地表達這項慾望，懇求他贊成並容許他們，隨當時有船在港內的一些中國商人到中國去；爲了得到後者的同意，自動獻身要作他們的奴隸、或以任何其他可能的方式。」

「但是每當他們和總督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對這個念頭顯然是冷淡的，並驅掉他們的希望。懷念到在事實上，他們自西班牙來的主要的目的，是企圖要進入該帝國傳福音，在與中國人本身的交接中，更提高了他們的這項冀望，因爲他們是一個很有才能而謹慎的民族，並有極佳的理解力——這使他們的冀望甦生，並使他們確信能够使他們輕易地理解與上帝有關的事物——他們決定要採用其他的方法，因爲他們所設法取得的總督的友善是很不確定的，數日後，當他們討論這個問題並以最大

的迫切要求上帝在能對祂作最大的事奉上，並贏得這些靈魂、加以引導和指示，一名中國人到菲律賓來，據他們所聽說的，他是該帝國的神甫和傳教士之一，在中國所有的社鎮中，有大量的這種人。這個人數度到這些神甫的修道院去，和他們討論世界的創造和其他問題，開闢途徑使後者得以對他講關於上帝的事，而他聽得很有興趣。在向他們極詳細地講述這些神甫極其冀望使之皈依的中華大帝國的、宏大和祕密的事物之後；在提出許多有關基督教信仰的細心而敏銳的問題之後，過了數日，他迫切地懇求他們爲他洗禮，因爲他希望成爲一個基督徒。由於他得到我們的天主教教義的講解，在本市民不可言喻的喜悅下，也在他自身的喜悅下，他們接受他虔誠的冀望。成爲一名基督徒之後，他便住在修道院中，除了生的青菜之外，他什麼都不吃；當他看見神甫起來作午夜的晨禱，他們嚴守紀律，晚上大部份的時間都在聖像的面前祈禱，他一模一樣地摹仿他們，做一切他看見他們做的事，而且帶着極大虔誠的明證。這一切激起了保管神甫及他所有的助手，渴望達到如前述他們所冀望的。因此他們再一度仰賴總督，再一度以最迫切的詞句解釋，他們所常常向他要求的；那便是，請他採取一些步驟，使得教士能夠到中華帝國去傳佈上帝的律法，保管神甫是自我獻身者之一。他們說如果他們得不到許可，他們將於得到第一個機會時擅自前往，依據他們的上司和神所囑咐的，要爲拯救他們的鄰居工作。不管是這一切的分辯，或是最近才基督教化的中國人的極佳的精神之例子，都不足以勸動總督；相反地，他固執着他先前的意見，回答說現在還太早，因爲我們和中國人的友誼還是很淺的；況且，奧古斯丁教派的神甫早已多次設法進入中國，但又未能達到他們的冀望……現在再作這種嘗試將予中

國以一個機會每日笑諷西班牙人。所以他們應該等到上帝在其意旨的時間打開進入之門，這可能含有長期的拖延。保管神甫在得到總督的答覆之後，看到他堅持其固執地不願尋找，可使他們進入大陸的方法。開始作秘密談判，目的是要盡一切的努力，取得作此一旅程的方法——在如果沒有其他可能的方法之下，即使沒有取得總督的命令。他們立刻進行這件事，因為保管神甫和 Estevan Ortiz 神甫——一名傳教士，他曾為這項目的學習中國話，而現在已經能夠講得頗好——把他們冀望告訴一位在事奉上很忠誠，和他們特別接近的兵士，名叫 Juan Diaz Pardo。這個人曾經數度當眾宣告，即使冒性命的危險，他也極冀望能為上帝作些工作。他支持他們的願望，答應要至死和他們隨伴。在彼此同意之後，他們便一塊兒去和中國船長討論這個問題，他當時有一條船在港內，他曾經到他們的修道院好多次，和他們討論上帝和天堂的問題，他表現出極佳的接受性，好像是以極大的喜悅和愉快，表達他對這一切的贊同。他們將他們的願望向他告知，懇求他援助使其成功。他表示願意幫忙，答應要帶他們到中國去，條件是他們要給他的水手一些禮物。那位兵士，Juan Diaz Pardo，答應他所要求的一切，他們給他幾個 *pesos* 並且還有一筆定金。為了使這一切不會為總督或其他任何人所覺察，共同約定船長必需迅速離開，到離馬尼刺二十 *leagues* 的岷都洛港口去，他要在那裏等他們。他應帶着上述洗過禮的中國人一起走。船長趕快離開，到那個約定的港口去。在數日內，保管神甫和他的助手，和他們的朋友那位兵士，都跟着來了。但是當他們抵達時，他們發現中國船長作了新的決定，不管是禮物或是懇求，都無法勸誘他實踐他在馬尼刺所作的允諾。相反地，他將他所收到的定金退還，

並絕對拒絕帶他們同往；因為他知道他如果這樣做，他將喪失他的生命和財產。看到了這種情形，那位新受洗的中國傳教士，憤慨而悲哀地痛哭，因為魔鬼改變了船長的心，使福音無法在該帝國中傳播。保管神甫安慰他，決定回馬尼刺等待另一個機會。他們在那裏過了數日之後，有一天總督召保管神甫去，要他派一名神甫到加牙那去，他在數日前剛派出一些西班牙人至該地去組織一個殖民區。保管神甫說他將給他一名神甫，而他本身將陪同後者至怡佬戈省，他將至該地探訪傳教士；然後依總督閣下的命令，派遣他到加牙那去。保管神甫請求在該旅途中有衛兵同伴，Francisco de Duetas 軍曹和 Juan Diaz Pardo 兵士（他們的朋友正如上述的），並欲自該地前往中國……總督爲了要使他滿意，答應他的要求，保管神甫匆匆準備行程，帶着上述的兵士和一名叫做 Augustin de Tordesillas 神甫的傳教士作他的助手，後來他自回憶中追述在中國所發生的事。

「到了怡佬戈之後……」

「第二日他們召集一次會議，該會議一致議決，該地所有的人，都要設法到中國去使那些異教徒皈教，或爲是項工作而死。於是決定再去找另一位兵士，名叫 Pedro de Villaroel。他們告訴他——沒有說出他們的目的，使他不會傳出去——如果他願意伴同他們，和其他的兩位兵士，去作一件在事奉上帝上面很大的事，並贏得許多的靈魂，他可以答應，却不問要到那裏，或者要做什麼，因爲這是沒有到時候說不得的。他立刻回答說：他願意和他們同往，而且至死不會將他們遺棄。於是他們全體，帶着特殊的喜悅，登上保管神甫及其助手和兩名其他的兵士，自馬尼刺乘至該地的船。這是一條

頗佳的 *Trasata*，雖然只有少量漠不關心的水手。……他們於六月十二日，作彌沙並懇求上帝指引對他作神聖事奉之旅途。」

他們後來到了廣東，並且因為得不到糧食而只好沿街求乞，但是，中國官員聽到這件事以後，便供給他們以糧食。起初，他們被命令要到 *Ancheo*（潮州？）後來又奉命速回廣州，乘一艘葡萄牙船離中國。離開中國以後，他們分成兩小批，保管神甫（*Pedro de Alfaro*）和另外一個人到澳門，以便學會更多的中國話，另外兩個人回馬尼刺，並於一五八〇年二月二日抵達。

這是由菲律賓自行出發，往中國傳道的最初記載，從中華帝國史的這段記載，可以看出當時的西班牙神甫，實在頗具一種宗教熱忱。佛蘭西斯教派神甫 *Pablo de Jesus* 於一五八〇年七月十四日，寫信向當時的教皇格利哥里十三世報告道：

「記住我們的救贖者，我主耶穌基督的教訓：『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馬可十、六章十五節），我們向強大的中華帝國傳福音的熾情逐日增加。是以有本教派的四位兄弟和三名兵士，乘小船至廣州，那是中國最富庶的城市，他們在該地逗留的六個月中，他們利用翻譯員，在總督和巡撫的面前，不倦地講傳天國的福音。但是翻譯員因為害怕講出不利偶像的話語，便會失掉腦袋，而譯出與所講完全不同的話欺騙我們的兄弟。中國人實在因為我們的兄弟所穿的衣服的粗穢，和他們的食物簡陋而感到奇怪；特別是當他們要送黃金給我們的時候，因為我們對錢財的輕蔑而覺得驚異。由於這些人難以置信地愛錢，他們把我們的兄弟目為從天降下的好人。不管如何懇求，都無法留得更

久，因為當地的法律禁止外國人在該地居住。於是他們到澳門去，那是一個離大陸上的廣州二十 leagues，為葡萄牙人所居住的地方，二名我們的神甫，在長者和葡萄牙人大感喜悅之下，在他們所建的修道院中找到一個居所。（這裏所指赴中國傳教的，和中華帝國史上所記載的是同一羣人。）神甫們希望能在那裏擊敗魔鬼的支配，能開闢一大片可傳福音的場地。中華帝國是很大的，甚至有一千 leagues 的幅員，有那麼大量的居民，使整個王國看來是很強大的。中國人的膚色淺，眼睛小，有大量的經商者，很機敏，而且很會做生意，至於關於靈魂安全的事，是異常遲鈍無知的。雖然對文學很有興趣，然而在科學上則還是孩提的時期，而且沒有藝術修飾。……他們比任何其他的國家都更富巫術、迷信、和崇拜偶像。他們把天叫做天公，他們指着月亮發誓，他們以綿羊、豬、羊、牡牛獻祭。他們為那些他們認為比其他人更勇敢和剛直的人雕像。他們也有他們的和尚和隱士，住在遙遠的地方，吃青菜和樹上的果子，相信死後便會被月亮召到天上的住所。……（中國）男人是最不潔淨的，叫奴隸作鷄姦，虛空地以為他們是最聰明的人。」

因為中國是一個文化悠久的古國，赴中國傳教老早便是基督教傳教士所嚮往的盛事，所以許多奉派到菲律賓來的天主教神甫，都一心一意想要找機會到中國去。只要一有機會，他們便不惜放棄他們在菲律賓的工作，擅自離職到中國去。這種現象不久便引起西班牙本國政府的注意，腓立二世於一五八五年六月八日，頒下敕令禁止奉派到菲律賓來的天主教神甫擅離職位赴華：

「由於有些在菲律賓羣島服務的傳教士，常常沒有適當的命令，便擅離他們所主持的傳教工作到

中國去，因為他們的不在，許多已經進行和建立的向番人的開導和教育的困難和損失便隨之而來，我們囑咐在菲律賓羣島的宗教當局的高級主管人，如果沒有總督和大主教的特別許可和命令，而且明白聲言這些傳教士的離去沒有違背本法律，不得准許其教派下的傳教士到中國去，或放棄他們所負責的傳教工作；要更加注意和留心由我們資助而到該羣島去的，以及那些奉派到那裏作永久居留的，如果沒有總督和大主教的許可，不應也不得被准許到中國大陸或其他地方去，因為我們派他們去履行我們教導我們的臣屬之義務。如果沒有我們的特別命令或總督和大主教的許可，任何西班牙的普通公民都不得予他們以 *Fragata* 或船上的供應品，不管他們聲言何種特權。」

這條法令於一五九六年五月廿五日重申，腓立二世於一五八九年八月九日致 G. P. Dasmariñas 的指示中，又提到這件法令，並謂阻礙這條法令執行的人，可予逐出教會的處分。菲律賓天主教大主教 O'Connell 於一五九〇年六月廿四日致腓立二世的報告書中，對這條法令表示支持：

「陛下命令傳教士如果沒有得到陛下，或總督和本人的特許，不得擅離本主教區，這是很公正的，因而被執行；因為不讓傳教士離開此地，在我看來也是很適宜的，這裏的傳教士太少，所需要的太多。在這條船抵達以前，總督和我派遣了兩名道米尼干傳教士到漳州（泉州？）去，那是離本地最近的中國省份，也是所有至此貿易的生理人的出發點。這次的遣派完全符合陛下的命令的條文，雖然我們還沒有接到它。」

不過腓立二世也命令菲律賓的西班牙行政當局，對被准許赴中國傳教的教士，要予以各種各樣的方便

。他在一五九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所頒的敕令中說：

「對那些根據法令，被特許和許可進入中國或日本的傳教士，馬尼刺的 Audiencia 應該供應所需的船隻、船上的必需品、法衣、及其一般的供應品。我國在該羣島上的官員，應該執行和償付主席和 Auditors 爲該事務所命令和授權的。」

腓立二世於一五九六年二月五日，再頒下一條關於赴華傳教的敕令：

「當任何一個傳教士要去向住在中國、日本、和其他王國的異教徒，傳佈和教導神聖的天主教信仰的時候，他們在進入這些野蠻人的國度之時，不應採用無法達到所冀望的目的之方法；這是合宜於對我主上帝和我國本身之服務的。所以我們宣佈並命令，任何一個住在菲律賓的傳教士，除非有菲律賓總督的許可，不得到日本和中華帝國去，即使是帶着和傳佈和教導神聖的天主教信仰的目的。每當有一個派遣傳教士赴中國或日本的問題發生時，或有赴該地的申請時，我國在馬尼刺的 Royal Audiencia 的主席和 Auditors，便要與大主教及菲律賓諸教派負責人，舉行特別會議，他們應受諮詢並討論對此項神聖而虔誠的目標的適宜的措施。沒有參加會議的全體認可下，沒有事前得到大主教和總督的許可，沒有一名傳教士可被准許到異教徒的王國中去。爲了要達到這項目的，我國的 Audiencia 及其主席，應製訂並催使執行一切必需的命令。這是我們的願望。」

這條敕令於一六二一年十二月卅一日；一六三五年二月十六日；一六三六年十一月六日；一六三八年九月二日；一六四〇年七月十二日一再重申，可見它是一件極爲西班牙當局所重視的法令。

西班牙政府對向中國傳教這項工作，是非常重視的，但是正如我在前面說過的，他們並沒有收到很大的效果。平心而論，明朝政府如果在這個時候，讓西方傳教士大量進入中國，對中國實在不見得會有多大的害處。這些傳教士有許多在學問上在科學上都有很高深的修養，讓他們進入中國很有可能促成中國和西方文化的大量交流。

不過，由前面所轉引的西班牙史籍和西班牙政府的檔案考察起來，西班牙政府所計劃的向中國傳教，不但不是爲了文化交流，甚至很難看出有多大的宗教虔誠。因此當有些較具虔誠的宗教熱忱的天主教神甫，要擅往中國傳教的時候，便受到西班牙政府的禁止。很顯然地，西班牙政府一方面是不願讓幫助鞏固其對菲律賓的統治之傳教士，隨便擅離職位，以致影響西班牙對菲律賓的統治；在另一方面當然也希望進入中國的西班牙神甫，都能勝任西班牙政府所付托的任務。因此，當時奉令進入中國大陸的傳教士，多數可能帶着罪惡的目的。然而，明朝政府當時對由歐洲方面而來的侵略，是全然盲目的，所以明朝政府所經常採取的禁止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的政策，並不是基於對歐洲侵略者的防範。和西班牙侵略者建立某種程度的文化接觸，對那個時候的中國，至少可以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必要。但是明朝政府既不設法把歐洲侵略者逐出亞洲，又不想進行瞭解這羣不遠千里而來的闖入者，而只是緊閉國門，弄得對國際問題一無所知，對國外形勢的變化無視無睹。

明朝中國眼裏的佛郎機 我在前面已經把西班牙當局的初期對華政策，逐條加以陳述，同時也稍爲分析一下當時歐洲的歷史背景，從而論述歐洲形勢的變化對亞洲的影響；因爲在這個時候，歐洲正在開始

發展成爲全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一五八八年西班牙和英國大海戰的結果，無敵艦隊的慘敗，不成爲歐洲歷史的轉捩點，而且也在亞洲發生了深長的影響。非常顯然地，主要地是由於西方侵略一踏進亞洲，便完全握有主動；因此，從這個時候開始，決定菲律賓對華政策的因素，並不在中國，也不在菲律賓，而是在於西方國家（當時只有西歐）。從西班牙佔領菲律賓的最初期開始，西班牙的對華政策，包括對中國的政策和西班牙在菲律賓所施行的華僑政策，都是受西班牙的國內形勢和西歐的形勢所左右的。

當時的明朝中國，在實力方面可以說尙不愧爲亞洲第一強國，但是瀰漫全朝的却是萎靡的氣氛，對亞洲形勢的此項巨變，完全不加以重視，讓西方侵略者完全取得主動，自己在迫不得已的時候才招架一下。明朝的典籍把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概稱爲佛郎機，讀明史三二五卷佛郎機傳，多少可以瞭解明朝政府對西方侵略者的看法和態度：

「佛郎機近滿刺加，正德中（一五一一），據滿刺加（馬六甲）地，逐其王。

「十三年（一五一八），遣使臣加必丹末（Orpitan Moor）等，貢方物，請封，始知其名，詔給方物之直，遣還。

「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兒爲食。已而貪緣鎮守中貴，許入京。武宗南巡，其使火者亞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時學其語以爲戲。其留懷遠驛者，益掠買良尼，世室立寨，爲久居計。

「十五年御史邱道隆言：「滿刺加乃敕封之國，而佛郎機敢併之，且詔我以利，邀求封貢，決不可許。宜却其使臣，明示順逆，令還滿刺加疆土，方許朝貢。倘執迷不悛，必檄告諸蕃，覈罪致討。」

「御史何鰲言：「佛郎機最兇狡，兵械較諸蕃獨精。前歲駕大舶突入廣東，會城炮擊殿地；入驛者違制交通；入都者桀驁爭長。今聽其往來貿易，勢必爭鬥殺傷。南方之禍，殆無紀極。祖宗朝賈有定期，防有常制，故來者不多。近因市政吳廷舉謂缺上供香物，不問何年，來即取貨，致番舶不絕於海濱，蠻人雜遷於州城，禁防既疏，水道益熟；此佛郎機所以乘機突至也。乞悉驅在澳番舶及番人，潛居者禁私通，嚴守備，庶一方獲安。」

「疏下禮部言：「道隆先宰順德，鰲即順德人，故深晰利害。宜俟滿刺加使臣至廷，詰佛郎機侵奪鄰邦，擾亂內地之罪，奏請處置。其他悉如御史言報可。」

「亞三侍帝驕甚，從駕入都，居會同館。見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焯怒撻之。（江）彬大詬曰：「彼嘗與天子嬉戲，豈肯跪汝小官邪！」明年（一五二一），武宗崩，亞三下吏，自言本爲華人，爲番人所使，乃伏法。絕其朝貢。」

「其年七月，又以接濟朝使爲詞，攜土物求市，使臣請抽分如故事，詔後拒之。其將別都盧（Pedro Homen），既以巨砲利兵，肆掠滿刺加諸國，橫行海上。復率其屬疎世利（？）等，駕五舟擊破巴西國（Pacem，位蘇門答臘西北岸）。

「嘉靖二年（應作元年，一五二二），遂寇新會之西草灣，指揮柯榮、百戶王應恩禦之。轉戰至稍州，向化人潘丁荷先登，衆齊進，生擒別都盧，疎世利等四十二人，斬首卅五級，獲其二舟，餘賊復率三舟接戰，應恩陣亡，賊亦敗遁。官軍得其炮，即名爲佛郎機、副使汪鏗進之朝。」

「九年（一五三〇）秋，盜累官右都御史，上言：「今塞上墩臺城堡未嘗不設，乃寇來輒遭蹂躪者，蓋墩臺止瞭望城堡，又無制遠之具，故往往受困。當用臣所進佛郎機，其小至廿斤以下，遠可六百步者，則用之墩臺，每墩用其一，以三人守之；其大至七十斤以上，遠可五六里者，則用之城堡，每堡用其三，以十人守之。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依，遠近相應。寇將無所容足，可坐收不戰之功。」帝悅即從之。火炮之有佛郎機自此始，然將士不善用，迄莫能制寇也。」

「初，廣東文武官，月俸多以番貨代，至是貨至者寡，有議復許佛郎機通市者，給事中王希文力爭，乃定令諸蕃，買不以時及勘合差失者，悉行禁止。由是番舶幾絕。」

「巡撫林富上言：「粵中公私諸費，多資商稅，番舶不至，則公私皆窘。今許佛郎機互市有四利：祖宗時諸蕃常貢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其餘，足供御用，利一；兩粵比歲用兵，庫藏耗竭，藉以充軍餉，備不虞，利二；粵西素仰給粵東，小有徵發，即措辦不前，各番舶流通，則上下交濟，利三；小尼以懋遷爲生，持一錢之貨，即得展轉販易衣食其中，利四。助國裕民，兩有所賴。此因民之利而利之，非開利孔爲民梯禍也。」從之。」

「自是佛郎機得入香山澳爲市，而其徒又越境，商於福建，往來不絕。」

「至廿六年（一五四七）、朱執爲巡撫，嚴禁通番。其人無所獲，則整衆犯漳州之月港滬嶼，副使柯喬等禦却之。廿八年（一五四九）又犯詔安，官軍迎擊於走馬溪，生禽賊首李光頭等九十六人，餘遁去。執用便宜斬之。怨執者，御史陳九德遂劾其專擅，帝遣給事中杜汝禎往驗，言此滿刺加商人

，歲招海濱無賴之徒，往來鬻販，無潛號流劫事；執擅自行誅，賊如御史所劾。執遂被逮自殺。莫不知滿刺加即佛郎機也。

「自執死，海禁復弛。佛郎機遂縱橫海上無所顧忌，而其市香山澳壕鏡（即澳門）者，至築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國然，將吏不肖者，反覩爲外府矣。

「壕鏡在香山縣南虎跳門外。先是暹羅、占城、爪哇、琉球、渤泥諸國互市，俱在廣州設市舶司領之。正德時移於高州之電白縣。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指押黃慶納賄，請於上官，移之壕鏡，歲輸課二萬金，佛郎機遂得混入。高棟飛甍，櫛比相望，閩粵商人趨之若鶩。久之，其來益衆，諸國人畏而避之，遂專爲所據。

「四十四年（一五六五）僞稱滿刺加入貢，已改稱蒲都羅（？）家守臣、以聞下部議，言必佛郎機假托，乃却之。

「萬曆中破滅呂宋，盡擅閩粵海上之利，勢益熾。至卅四年（一六〇六）又於隔水青州建寺，高六七丈，闕敞奇闕，非中國所有。知縣張大猷請毀其高墉，不果。

「明年，番禺華人盧廷龍會試入都，請盡逐澳中諸番出居浪白外海，還我壕鏡故地，當事不能用。番人既築城，聚海外雜番，廣通貿易，至萬餘人，吏其土者皆畏懼莫敢詰，甚有利其寶貨，佯禁而陰許之者，總督戴燿在事十三年（一五九八—一六一〇）養成其患。

「番人又僭倭倭賊，殺殺官軍。四十二年（一六一四），總督張鳴岡檄番人驅倭出海。因上言：

「粵之有澳夷，猶疽之在背也；澳之有倭賊，猶虎之傳翼也。今一旦驅斥，不費一矢，此聖天子威德所致。惟是，倭去而番尙存，有謂宜剷除者，有謂宜移之浪白外洋龍船貿易者。願兵難輕動，而壕鏡在香山地，官軍環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於我，一懷異志，我卽制其死命，若移之外洋，則巨海茫茫，奸宄安詰，制禦安施，似不如申明約束，內不許一奸闖出，外不許一奸闖入，無啓釁，無弛防，相安無恙之爲愈也。」部議從之。

「居三年，設參將於中路，雍陌營調千人戍之，防禦暫密。」

「天啓元年，守臣慮其終爲患，遣監司馮從龍等，毀其所築青州城，番亦不敢拒。其時大西洋人來中國，亦居此澳。」

「蓋番人本求市易，初無不軌謀，中朝疑之過甚，迄不許其朝貢，又無力以制之，故議者紛然。然終明之世，此番固未嘗爲變也。」

「其人長身、高鼻、貓眼、鷹嘴、鬚髮、赤鬚、好經商，特強陵轢諸國，無所不往。後又稱干系臘國。所產多犀象珠貝。衣服華潔，貴者冠，賤者笠，見尊長輒去之。初奉佛教，後奉天主教。市易但伸指示數，雖累千金，不立約契。有事指天爲誓不相負。自滅滿刺加、巴西、呂宋三國，海外諸蕃無敢與抗者。」

文中所謂漳州之月港浯嶼，根據大明一統志的記載，月港屬漳州、浯嶼屬泉州。宜以一統志記載爲據。嘉靖元年中葡之戰中，明史中所謂「生擒別都盧，」明實錄作「未兒丁甫思多滅兒」(Matin)

Alfonso de Mello Continho)。應以明實錄的記載爲正確。

當時的明朝中國，顯然不但以爲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同一個國家，而且還不知道所謂佛郎機國，乃是來自大西洋的歐洲國家。從明史佛郎機傳中的語氣看來，明朝政府還以爲佛郎機是與滿刺加毗隣的小國。

佛郎機傳中所記載的，大部份是關於葡萄牙事蹟的，但是到底可以看出當時明朝政府，對滅滿刺加、巴西、呂宋三國的佛郎機，所採取的是怎麼樣的一種態度。其實，當歐洲國家侵入亞洲的初期，西班牙對中國的政策是最值得重視的，這一個時期的中菲關係，必須在中國對外關係史上佔有最重要的地位。因爲這實際上是歐洲國家侵入亞洲的初期，西歐最主要的強國與中國的關係。西班牙當局在這個時期的對華政策，實際是代表一般歐洲國家的對華政策，西班牙在歐洲的地位被英語民族所取代之後，英語民族的對華政策，便一直成爲西方國家的代表。因此，要研究西方國家的對華政策，實在是要由西班牙的對華政策開始。

西班牙所始創的對華政策，由不准菲律賓華僑經營零售業，一直到派軍侵略中國，以至聯日侵華等等，雖然當時的西班牙政府由於種種實際條件的限制，都沒有辦法實施，但是在最近數百年的歷史中，西班牙政府的這些政策，一直不乏青出於藍的繼承人。

不過平心而論，當歐洲國家侵入亞洲與中國作最初接觸的時候，無論從那一方面看來，中國實在都沒有讓歐洲國家居上風的理由，不幸地，歐洲國家在亞洲所遭遇的，是一個腐敗的明朝政府。

葡萄牙初至中國的時候，中國的統治者明武宗朱厚照（一五〇六——一五二一在位），是一個只知遊

樂的皇帝。有一次他要到南方去遊玩，朝臣都出來諫阻，結果是厚照大怒，罰朝臣一百七人在午門外跪五天，然而又有一批朝臣繼起諫阻，厚照便更生氣，便將諫阻的朝臣白天牽出午門罰跪，晚間牽入獄中囚禁。罰跪期滿之後，再各各罰杖三十至八十。朱厚照死的時候，剛剛是捍衛國土的拉布·拉布擊斃麥哲倫同一年。

繼朱厚照做明朝皇帝的是明世宗朱厚熹（一五二一——一五六六在位），朱厚熹做皇帝的時候，任用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奸臣嚴嵩為大學士（權同宰相），大權落在他的手上二十年久（一五四二——一五六二）。嚴嵩和他的兒子世蕃貪賄無度，大事搜刮民間財富。加上東南沿海的倭寇為患，北方韃靼酋長俺答入侵。朱厚熹本人又只好研究房中術，無錫人顧可學因精通此術，入京三四年，便升為工禮兩部尚書。終日無所事事，專與嚴嵩及道士顧仲文探討房中秘訣。黎牙實備在朱厚熹死的前一年（一五六五）佔領宿務，正式建立西班牙在菲律賓的統治。

朱厚熹死後，穆宗朱載堉做皇帝（一五六七——一五七二在位），一即位便起用張居正為大學士。西班牙在他做皇帝的時候攻陷馬尼刺。朱載堉的承繼者神宗朱翊鈞繼續以張居正為大學士。張居正可以說是明朝唯一名相，總算是明朝的大學士中最出色的一個，然而林鳳征菲和西班牙確立其對菲律賓的統治初期，剛剛是張居正做宰相的時候。朱翊鈞在位四十七年，以後還有很多事件，都是在朱翊鈞做皇帝的時候發生的。

同樣地是封建專制政體的君王，明朝中國專思遊樂、專門研究房中術的皇帝，和力謀一統歐洲、窺圖

獨霸世界的腓立二世比較一下，或者和不擇手段、力挽英國厄運的狂瀾、使英國擠入強國之列的伊利沙白女王比較一下，便不難看出明朝的統治者是多麼罪大惡極。

日本第一次侵略朝鮮 這個時代可以說是世界的新均勢開始形成的時代，不但是在歐洲的西部正在進行着有決定意義的均勢的消長，在亞洲的東部，均勢的消長變化，也有了重要的發展。

當歐洲人開始東來，倭寇和海盜在中國東南沿海至爲猖獗的年代（參閱第三章），日本正當封建莊主大混戰，日本歷史上有名的戰國時代，各封建莊主爲了要擴充自己的領域，彼此一直進行着殘酷的戰爭。佛教大寺院的僧侶常常擁有大片的土地，並統治它上面的居民，因此也成爲戰國時代主要的封建勢力，而且大大地阻礙了日本的統一。根據這個歷史背景和當時倭寇海盜的成份，我指出了當時中國沿海的倭患，並不是來自日本方面的有組織的侵略隊伍，而明朝政府對造成中國沿海海賊的猖獗，實在要負極大的責任。但是長期的混戰畢竟不能無止境地拖延下去，一五五八年（嘉靖卅七年）織田信長在他的部下豐臣秀吉的幫助下，出兵逐一吞併他的隣國（封建莊主）。他在軍事上，獲得了迅速的成功。不能不指出，西方國家的進入，對織田信長的成功是很有作用的。

當時盤踞澳門的葡萄牙人，已經在與日本進行貿易。一五四二年（嘉靖廿一年），葡萄牙人把歐洲的火藥武器輸入日本，織田對這種新輸入的歐洲軍火非常重視，這一類的軍火的應用，對他在軍事上的成功大有幫助。

在與其他封建莊主戰爭的時候，織田用各種各樣的方法爭取商業資產階級的支持，封建割據分裂的局

面，對商業經濟的發展是一種很大的阻礙；織田却重視新興的城市的力量，予商業資產階級以金融上的援助，特別是幫助了博多和長崎的發展。織田信長的經濟政策，大大地幫助了國內外商業貿易的發展。

織田統一日本的道路上的一項重大的障礙，便是佛教寺院的勢力，因此在政治舞台上，他成爲佛教僧侶的敵人。爲了要與強有力的佛教勢力對抗，他不惜利用在一五四九年（嘉靖廿八年）傳入日本的基督教力量。他使禁止基督教的法令無從生效。一五六七年，在長崎，由當地的封建莊主大村，主動建築天主教堂。到了一五八二年，九洲的基督徒約有十萬人以上。西方強國和織田信長在宗教上，完全是在互相利用。織田以基督徒爲工具，對付阻礙他統一日本的佛教勢力，西班牙則企圖以日本作爲一個立足點，準備進而侵略中國。西班牙的意慾在前面所譯出的侵略中國的計劃書中，表現得非常明顯。

織田信長和他的大兒子，於一五八二年（萬曆十年）爲他的部下明智光秀所謀害，代他而起的，是比他更優秀、更有才幹的豐臣秀吉。

豐臣秀吉繼續進行統一日本的大業，一五八三年，他在大阪建築城堡，邀請日本重要的商業資產階級到大阪，奠下這個日本大城市的基礎。

日本的基督教徒在豐臣秀吉之下，最初也和和在織田之下一樣受到很多的優待。但是當豐臣的領域不斷擴展的時候，便遭遇到力量不斷強大的日本基督徒的反抗，其中甚至有些公然拒絕服從「異教」政權。豐臣秀吉在一五八七年下令，限天主教傳教士在二十日內離境，不過這條法律不適用於歐洲商人。

這條法令並沒有被積極執行，豐臣對天主教傳教士仍舊採取容忍的態度。一五九三年（萬曆廿一年）

，西班牙人的佛蘭西斯教派神甫進入日本，一開始便和耶穌會教派（大多是葡萄牙或其他非西班牙的歐洲人）發生爭執，在這次爭執之中，雙方在互相指斥中暴露了歐洲國家準備侵略日本的陰謀。忙於在朝鮮進行侵略戰爭的豐臣秀吉大為震怒，下令對付叛逆日本的基督徒。一五九七年他下令禁止基督教活動，判處八十名神甫以死刑，命令所有的基督徒即時離境。

這些事蹟看來好像僅與日本有關，但是對當時在西班牙統治下的菲律賓的對外政策，特別是對華政策，是大有影響的。

豐臣秀吉在使日本成爲一個大體上統一的封建國家之後，自任關白（宰相），實際上握有統治日本的大權。但是爲了要鞏固這項政治上的統一，便謀求向外發展，當時首當其衝的便是朝鮮。萬曆十八年（一五九〇年），那便是豐臣秀吉統一日本的第一年，日本關白豐臣秀吉致書朝鮮王李暉曰：

『吾邦久屬分離，秀吉起於微細，討逆除暴，曾不數載，定六十餘國。夫人世年不滿百，予亦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於明，使四九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凡海外諸蕃後至者，皆在所不釋，貴國先修使幣，帝甚嘉焉。秀吉入明之日，王其率士卒，會軍營，爲我前導。』

這是中國在歷史上，受到由日本方面而來的侵略威脅的第一次。當時的朝鮮王當然不敢與日本合作侵華。於是豐臣秀吉在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派兵侵略朝鮮，朝鮮兵大敗，朝鮮王李暉向明廷求援。在開始的時候，明朝政府對這個事件的態度是積極的，全朝認爲朝鮮一向是中國的藩籬，是保障中國安全的必

爭之地。正如兵部右侍郎宋應昌上神宗請撥兵協守朝鮮疏中所說的：「關白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朝鮮，非止爲屬國也；朝鮮固，則東保薊遼，京師鞏於泰山矣。」萬曆二十年秋七月甲戌，副總兵祖承訓帥師援朝鮮。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軍隊渡過鴨綠江，抵抗由日本方面而來的侵略。

但是這場中國第一次援助朝鮮抵抗侵略的戰爭，並不是很如意的，祖承訓所率領的中國軍隊與日軍首戰於平壤，便遭遇慘敗。兵部尙書石星，起用一個嘉興無賴沈惟敬與日寇私通，開始在朝中主和。

豐臣秀吉可以說是一個很有野心的執政者，他一面侵略朝鮮威脅中國，一面則窺覷南洋羣島，西班牙政府的檔案室中，至今猶存豐臣秀吉當日致呂宋國的氣餒逼人的書信。當朝鮮戰爭和議方酣的時候，萬曆廿一年十一月，豐臣秀吉派原田孫七郎出使呂宋，並命他在途經台灣的時候，交一封信給高山國，書曰：

「夫日輪所照臨，雖至海岳山川草木禽虫莫不受他恩光也。予際欲處慈母胞胎之時，有瑞夢，其夜日光滿室，室中如晝。諸人不勝驚愕，相士相聚占卜之。曰：壯年輝德色於四海，登威光於萬方之奇異也。故不出十年之中，而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異邦遐陬響風者，忽出鄉國，遠泛滄海，冠蓋相望，結轡於道，爭先而服從矣。朝鮮國者，自往代於本朝，有牛耳盟，久背其約。况又予欲征大明之日，有反謀，此致命諸將伐之，國王出奔，國城付一炬也。聞信已急，大明出數十萬援兵，雖及戰鬥，終依不得其利，來勅使於本邦肥之前州而乞降。繇之築十個城營，收兵於朝鮮域中慶尙道，而履決看僞也。如南蠻琉球者，年年獻土宜，海陸通舟車，而仰予德光。其國未入幕中，不進庭，罪彌天，雖然不知四方來享，分爲其他疏志。故原田氏奉命而發船。若是不來朝，可令諸將攻伐之。生

長萬物者日也，枯槁萬物者亦日也。思之不具。」（連橫：台灣通史卷一）

賣國求和的石星和沈惟敬在一開始主和的時候，並沒有立即受到朱翊鈞的重視。萬曆二十年十二月，中國軍隊在宋應昌和李如松的指揮下，再渡誓師越過鴨綠江。二十一年正月，攻克平壤，大破日軍。在向朝鮮京城疾進的時候，於碧蹄館受日軍伏擊，中國軍隊在這一役中受到很慘重的損失。但是李如松派遣間諜至敵後，把日本軍糧大部焚毀，逼使日軍退至釜山，釜山的海口又為中國和朝鮮的海軍所圍。到了這個時候，豐臣秀吉想要親自渡海督戰，為部下所勸阻，又想要派兵赴援，但是又欲徵無兵，只得悵然長歎：「吾不幸生於小國，兵力不足，使我不克遂耀武八表之志，奈何奈何！」

但是沈惟敬却在這種形勢之下，親赴釜山偕日本軍使小西飛與中國議和。前綫將士俱認為所謂議和，實乃日本的緩兵之計，不可輕信。不過，到了這個時候，明廷主和派的勢力已佔有絕對優勢，萬曆二十一年秋七月癸丑，召援朝鮮諸邊鎮兵還；十二月丙辰，薊遼總督顧養謙（石星的牙爪）兼理朝鮮事，召宋應昌李如松還。本來是大功即將告成，勝利已經在望的援助朝鮮的正義戰爭，在朝廷主和派可恥的出資之下，竟至功敗垂成的結局。

此後，朱翊鈞一意主和，議戰守的大臣多被貶斥。萬曆二十二年和議告成。所謂和議告成，更是莫名其妙，日本史籍所載的和議條款是：（一）明朝公主嫁給日本皇帝；（二）兩國人民於各海口通商，不受阻撓；（三）兩國公佈罷戰言和；（四）撤退佔領區，但是在撤軍後，各地由在朝鮮的大日本武官主政；（五）朝鮮派王子大臣赴日為質；（六）朝鮮賠償日本軍費五百萬兩；（七）朝鮮使臣，須刑牲敵血以誓

，子子孫孫恪守於大日本臣節，無敢攜二，以保太平。明史中所載的和約條款却說：（一）勸倭盡歸巢，（二）卽封不與貢，（三）誓無犯朝鮮。日本從來就沒有承認過明朝政府的三條和議條款，他們始終認爲「不料和局旣成，而卽爲中國所愚也」。

不知道是爲什麼，明朝的皇帝多是那麼昏愚，明朝的大臣又多半是那麼蠢笨而無恥，使得明朝的對外關係史，充滿了醜話笑料。沈惟敬從來就是流氓無賴，可以不必去說他，石星身爲兵部尙書，如此左袒日本，喪心病狂地出賣中國和朝鮮，在當時的形勢之下，這種作爲實在是完全令人百思難解的。豐臣秀吉對他們這種賣國行爲，實在並不認爲滿意。

萬曆廿四年，朱翊鈞滿以爲和議已成，派楊方亨沈惟敬赴日本，封授豐臣秀吉以日本國王的金印。他們在九月間抵日本的時候，得到豐臣秀吉盛禮款待，秀吉戴冕披蟒服，使德川家康等七將皆着其所賜章服。宴冊使的時候，據日本國志記載曰：

「使者出；召人讀冊文，至封兩爲日本國王，秀吉色變，立脫冕服拋之地，取冊書裂之，罵曰：「吾掌握日本，何待髻虜之封，且吾而爲王，若王室何。」卽夜命驅明使者；並告朝鮮使曰：「若歸告而君，我將再遣兵屠而國也。」」

沈惟敬回中國後，又不將實況直告，楊方亨懼怕石星沈惟敬的權勢，也不敢有所吐露。直到萬曆二十五年二月，日本再侵朝鮮，朝鮮使者再來請援，石星沈惟敬賣國的情事才完全敗露。朱翊鈞大怒，再派新任兵部尙書邢玠援助朝鮮，但是同時又密令邢玠「陽戰陰和，陽剿陰撫」，弄得將兵不敢力戰，以致一敗

再敗。幸而豐臣秀吉在一五九八年（萬曆二十六年）九月十六日突然死去，日本國內發生政爭，日軍只得退出，使明朝軍人得以慘勝回國。

這是當時在亞洲出現的一個新形勢：日本開始由一個封建莊主混戰的國家，發展成爲一個統一的封建專制的國家。不但準備侵佔朝鮮和中國大陸，而且還想要染指台灣和菲律賓。但是日本在當時畢竟還只是一個新興的國家，經過織田信長、豐臣秀吉，以及後來德川家康等人的努力，才形成了大一統的局面，還個大一統的局面，是後來到德川的時代才確定的。

西班牙則由於無敵艦隊初敗，沒有力量在亞洲用兵，因此儘管日本大舉排斥基督教徒，屠殺天主教神甫，西班牙政府除了設法將他們撤退至菲律賓以外，毫無其他辦法。當時的日本政府致書西班牙當局，常常威嚇交加，而西班牙總是無可奈何。不過在實際上，日本在當時並沒有可能向外發展的力量，而西班牙也不過是開始走向下坡，在歐洲諸國中，論實力仍舊是屈首一指的國家。日本之所以能够在朝鮮有所作爲，完全是因爲朝鮮的懦弱，和明朝中國的腐敗。

明朝中國的糜爛，到了這個時候已經是到了幾乎是無可救藥的地步。日本無故侵略朝鮮，準備進一步威脅中國，已經表現得非常明顯。當時的明朝政府，出兵幫助朝鮮進行抵抗侵略的正義戰爭，不但是協助鄰邦衛國，而且也可以說是一種保衛中國東北角的安全的合宜的措施。但是當形勢發展至對中國有利的時候，朝內的主和派居然得勢，明朝皇帝朱翊鈞竟昏妄到把佔優勢的中國軍隊撤退。不但如此，在進行所謂和談的時候，明朝政府簡直是莫明其妙地昏頭昏腦，從日本典籍上所記載的和議條款（完全是戰勝國盛氣

凌人的條件），和明史上所記載的，實在是已屬不當的和議條款比較一下，使明史的記載有點如同癡人說夢。對一個無故侵犯中國藩籬的國家，並沒有決定性地戰敗，突然要與中國議和，接受中國的錫封，實在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但是明朝政府不知道，也不願知道國外形勢的重大變化，還要妄自尊大，封豐臣秀吉爲日本國王，而結果弄得自取其辱。在明朝政府看來，封王是對秀吉的一種綏撫，在秀吉看來，却是一種莫大的侮辱。由明朝各種重要的典藉考察起來，明朝政府對這種種局勢，一直到最後還沒有正確的理解。明朝主和派的作爲，和朱翊鈞後來的八字密令完全是不可理解的。沈惟敬是一個卑鄙不足道的流氓，但石星之流的徹底主和是非常費解的，以當時日本和中國的財力相比較，以石星的官階之高，似乎不大可能是由於日本的重金收買，日本在當時似乎也沒有這種能力。石星這一派的行爲，相當明確地反映出明朝的統治階級不求振作的萎靡氣象，和一切末朝沒落的政治派系一樣，不擇手段地，毫無德行地排斥其他派系。朱翊鈞當然是最主要的責任者，他不但是把中華民族的命運當兒戲，簡直是在和他自己的江山開玩笑。

這是西班牙統治菲律賓的初期中非關係的背景，一方面是在開始走向下坡的歐洲強國，在西方國家內部均勢的消長之中，逐漸降爲一個不被重視的歐洲大陸邊緣的小國；另一方面是一個糜爛將近頂點的亞洲封建王朝，只是數千年的勞力的疊積，使他在當時擁有全世界最充沛的財富，他的人民始終保持着的偉大的潛力，維持着他當時的實力地位。

另一個勢力開始於這個時候在亞洲興起，在西方國家均勢的消長之中，歐洲國家暫時緩和了對亞洲國家直接侵略的時候，日本努力在國內振興，而且表現出對外擴展疆域的企圖。

這個歷史背景，對中菲關係的發展，是有着重要影響的。

總 結 現在，我們可以把自明朝開始至西班牙征服菲律賓初期的中菲關係，作一個概括性的總結。

從唐朝末葉開始，經過了宋元二朝，中國的經濟力量不斷地向南方發展，由於長江以南優良的天然條件，由於北方的混戰和異族勢力的直接壓迫，本來比較落後的中國南部，到了明朝已經發展成了強有力的經濟中心。南中國的經濟力量的發展，造成了一種對外貿易的強大的壓力，配合了南洋羣島本身在經濟上相對的進步，中國和南洋諸島嶼的直接貿易，在明朝初期有了重大的發展。明朝中國的生產技術上，比先前的任何朝代，都有更長足的進步，中國人民在經濟上的發展所造成的對外貿易的壓力，衝破了腐敗的明朝政府禁止對外貿易的人造的束縛，使朱元璋所手訂的嚴禁通番的禁令歸於無效。

唐朝時代幾乎完全握於阿刺伯人手中的中國對外貿易，到了明朝已經完全由中國商人取代經營了。由於中國與南洋諸島嶼之間的貿易的發展，由於中國商人直接主持這項貿易的經營，中國人民與南洋諸島嶼的人民的大量的交接，代替了很久以前便已開始建立的零星往來。

朱棣做皇帝的時候，是明朝政府對海外最感興趣的時代，他派遣鄭和七下西洋，是中國政府有史以來，與南洋諸島嶼作最頻繁最密切之接觸的時代。三寶太監下西洋，直到現在仍舊是南洋華僑所樂道的盛事。

儘管中國經濟和生產技術在明朝時代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明朝政府却是一個極其腐敗的封建王朝。南中國沿海的居民在苛徵暴政的壓迫下，開始向南洋諸島嶼作頗具規模的移殖。中國大陸上的生活方式和

先進的生產技術，開始較具規模地傳入南洋諸島嶼。

南洋諸島嶼到了這個時候，也有了新的發展。這個先前完全在印度文化浸濡之下的地區，現在已經有回教文化的大量的傳入，而且在許多方面，有取而代之的趨向。先前作為南洋諸島嶼之中心，三佛齊和滿者伯夷地區的居民，大量地越經蘇祿和峇蘭佬移居未獅耶羣島和呂宋島，使一向來可以說是南洋諸島嶼中比較落後的呂宋和未獅耶地區有了長足的進步。在明朝初期，具有原始國家形式的政治結構，已經在呂宋和未獅耶的一些地區中形成了。這些政治單位，和當時在今日稱為菲律賓濱的這一地區中可以說是最先進的蘇祿，都經常朝貢明廷，直接與中國進行貿易。

中國和呂宋及未獅耶地區的大量的直接貿易，可以說是從明朝初期開始的，中國人民較具規模地移入這些地區，也可以說是始於這個時期的。

南洋諸島嶼的中心，由三佛齊和滿者伯夷，移至亞洲大陸的邊緣，馬來半島上的回教王國馬六甲。後來成為重要的亞洲國家的日本，在這個時候正處於封建莊主混戰的戰國時代。許多個別的日本人在中國沿海與中國人勾結，成為當時對中國沿海大事騷擾的倭寇和海賊。

歐洲和亞洲的貿易航路，恰巧在這個時候被中東的回教勢力所切斷，歐洲國家紛紛設法尋覓東來的新航路。位於大西洋邊緣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佔有地理上的便宜。葡萄牙人繞過好望角經印度洋到香料（摩鹿加）羣島，並且佔領南洋諸島嶼的中心，消滅了馬六甲王國。西班牙人則橫渡大西洋，囊括南北美洲大陸，然後再繞過南美洲，橫越太平洋到亞洲來。首先佔領菲律賓濱作為他徐圖發展的根據地。

葡萄牙在南洋所征服佔領的，是南洋諸島嶼中最先進的政治中心，並且立刻把亞洲的香料運銷歐洲而大獲其利。西班牙所征服佔領的，却是一個比較上落後的地區。不過，他們尋覓東來的新航路，却有着同一的目標——那便是要找一條與中國進行貿易的新航路。

這兩個最初侵略亞洲的歐洲國家，比較強大的要算是西班牙，特別是在他佔領美洲大陸之後，由美洲搜括而得的財富使他成爲全歐洲最富強的國家。

西班牙佔領菲律賓以後的中菲關係，可以說是歐洲最富強的國家和亞洲最富強的國家的接觸。因爲西班牙在佔領菲律賓不久之後便開始走向下坡，所以他的許多計劃中的亞洲政策都無法實施，而明朝對這兩個首先侵入亞洲的歐洲侵略者，表現得異常愚蠢無知，將他們統稱爲佛郎機，既不知道他們從何處來，又不知道他們爲何而來。一向來，當人們研究這個時期的中菲關係的時候，往往忽視了當時西班牙在菲律賓所施行及所計劃的對華政策，是最主要的西方強國對付當時實際上是亞洲第一強國的政策。不從這個角度來理解這個時期的中菲關係，我認爲是不正確的。

當時的西班牙國王腓立二世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執政者，馬德里附近的 Escorial 修道院，可以說是代表腓立二世時代的建築物，這座建築物的屋頂，有一座腓立二世捧着地球奉獻給上帝的大像。明白地表示腓立二世當時最大的野心，便是要利用天主教征服世界。由最初參加征服菲律賓的西班牙神甫和軍人寫給腓立二世的書信，看出西班牙侵略者一以征服者的姿態踏上菲律賓的土地，便開始計劃征服中國。腓立二世在當時一面設法壓服歐洲內部與西班牙對立的力量，一面與已經侵入歐洲東部的回教勢力對壘，而同時

又做着建立亞洲大帝國的迷夢。

中國是一個數千年雄踞中原的亞洲強國，南洋各國的遣使入朝，固然帶着很濃厚的貿易性質，但是他們對中國的敬仰和尊崇却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當歐洲國家開始侵略亞洲的時候，唯一有能力將歐洲國家的侵略軍隊逐出亞洲的便是中國，當南洋諸國受到歐洲國家的侵略壓迫的時候，他們都翹首企望中國王師的到來，在實際上，南洋諸島嶼的主要強國馬六甲，一遭受侵略便遣使向明廷求援。明朝政府對這種形勢却完全淡然漠視。

西班牙佔領馬尼刺以後不久，有一個曾經在中國沿海作過海賊的林鳳，在準備放棄海賊生涯向明朝政府求撫不遂之後，率領一羣部屬攜帶家眷，要到菲律賓來建立家園——也許多少帶着要在海外獨霸一方的慾望。林鳳和他的部屬，在菲律賓不自覺地進行過一次抵抗歐洲侵略者的正義戰爭。聽到林鳳進攻西班牙人的一切地區中的菲律賓人民，都起義響應，並且立刻以實際行動對付西班牙侵略者。但是林鳳率領到菲律賓的中國人，在本質上是一羣移民而不是一支善於作戰的隊伍，當然無法與高度有組織性的西班牙軍隊對抗，結果是完全被擊敗。

爲了林鳳的事件，明朝政府與西班牙侵略者建立首次的接觸，中國政府的使節王望高在菲律賓一再羞辱國體。同時也在這個事件中，菲律賓歷史上出現了第一個華僑敗類告密者申賽，申賽可以說是當時的菲律賓僑領。申賽和王望高可恥的罪行，在廣大的菲律賓人民的心中，開始種下了對中國的輕蔑。

擊敗林鳳是西班牙征服菲律賓的大事件，從這個時候起，菲律賓人民開始意識到他們不能再期望由中

國而來的幫助。對鞏固西班牙侵略者對菲律賓的統治，這是有極大的意義的。西班牙人完全理解這個意義的重要性，擊敗林鳳的日子——聖安德烈節日——十一月卅日，成爲西班牙在菲律賓的主要節日。西班牙人在整個統治菲律賓的期間中，每年都熱烈地慶祝這個節日，大主教堂中要爲這個節日舉行隆重的彌沙，大主教和所有重要的行政官員都要參加。直到後來因爲美國駐菲總督拒絕參加這項慶典，這項隆重的慶祝儀式才宣告取消。

幾乎與征服呂宋島同時，西班牙在歐洲與回教勢力進行一項有決定性的海戰，那便是黎班道海戰。這項海戰是回教勢力與歐洲戰爭的轉折點，回教海軍在這項戰役中慘敗而且就此一蹶不振。於是，歐洲所面對的回教勢力侵入的威脅大大地消滅了，而且從此一直消滅，直至回教勢力被逐出歐洲。這對歐洲的發展是有着決定性的意義的。

西班牙在佔領菲律賓以後，在全歐洲最富有的國家統治下的菲律賓，出現了一羣擁有大量金銀錢幣的西班牙人，於是菲律賓的消費力大大地增加了，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也大大地增加了。中菲貿易在這個時候有了飛躍性的發展。因爲菲律賓一向是一個落後的地區，可以輸往中國的商品是很有限的，當中國商品大量輸入的時候，無可避免地要造成入超的差額，這種入超的差額，只有靠金銀錢幣彌補，西班牙人由美洲運來的墨西哥銀幣，大量流入中國，成爲南中國通用的貨幣。這種現象使當時的西班牙當局異常困惱，但是當時中國是供應菲律賓各種必需品的最主要的國家，由美洲所掠得的大量的財富，又使西班牙人有非常旺盛的消費力，造成一種對中國所生產的奢侈品的需求。在菲律賓的經濟史上，菲律賓的對外貿易，有絕

大部份的期間在實際上就是中菲貿易，西班牙統治者在這項貿易中出入口的，力爭平衡，但是沒有成功，因為這種大量的入超差額，在事實上是西班牙人異常強大的消費力所造成的。菲律賓華僑原始商業資本的累積，是在這項貿易中形成的，菲律賓華僑在商業上和金融上的基礎，也是在這項貿易中開始建立起來的。如果不是基於菲律賓對中國商品的依賴，西班牙侵略者一征服菲律賓以後，菲律賓華僑在事實上就成爲不受歡迎的一羣。

當時菲律賓的行政當局，受轄於西班牙駐墨西哥的總督，來往於馬尼刺和 *Veracruz* 之間的大帆船，維持菲律賓和墨西哥之間僅有的交通連系，菲律賓和西班牙美洲之間的這種大帆船貿易，主要地是墨西哥銀幣和中國商品的交易。西班牙統治下的菲律賓，有一個很長的時期，是中國和西班牙美洲的貿易轉運站，中國商品不但是大量地運銷菲律賓、同時也通過菲律賓運銷西班牙美洲、當時的菲律賓、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上，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中國商品的運銷墨西哥，當然是在與運銷美洲的西班牙商品競爭，因此便遭受西班牙國內的一羣有勢力的集團的反對，但是不但由於西班牙的生產力沒有隨着財富的增加而發展，產生了惡性的通貨膨脹而造成西班牙商品的昂貴，而且也由於交通運輸上的困難，特別是在美洲的太平洋岸，西班牙殖民者不能不設法取得廉價中國商品的供應。況且，西班牙政府又正在做着建立亞洲大帝國的迷夢，大帆船貿易使西班牙美洲與菲律賓保持着唯一的交通連系，沒有這一線連系，西班牙便沒有可能維持他對菲律賓的統治。在權衡各方面的利害之後，西班牙政府不得不使大帆船貿易長期繼續下去，使菲律賓在一個頗長的期間中，成爲中國與美洲貿易的聯絡站。

在這裏必須指出：中國商品當時的運銷菲律賓，和後來工業國家對其殖民地的推銷工業產品有着全然不同的性質。宗主國向其殖民地推銷工業品的時候，主要地是依賴他所擁有的關稅特權和他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這些特權壓迫阻撓殖民地生產力的發展。後起的工業國家在競爭市場的時候，往往也要依靠其國家的政治力量作後盾。但是當時中國商品的運銷菲律賓，完全是一種互惠的和平交易，中國商人不但從來未曾享有任何特權，而且經常受到排斥。西班牙征服者在其殖民地中，所醉心的是搜刮現成的財富和發掘金銀礦藏，取得大片土地的圈封之後，却由它荒廢不事生產。他只是生產大量的銀幣去和外國交換消費品。可以說當時的中菲貿易固然有助於刺激中國手工業（以及某種程度的輕工業）的發展，但是在客觀上却幫助了西班牙侵略者鞏固對菲律賓的統治，助使他在中國南疆的邊緣耀武揚威。

到菲律賓來的中國商人，或移居到菲律賓來的華僑，從來也未曾獲得中國政府的支持和鼓勵，更說不上以中國的政治力量作後盾，雖然中國在當時堪稱爲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之一。但是這羣菲律賓華僑却常常使西班牙當局感到不安，於是用各種各樣的方法限制他們的行動，征召他們服役，對他們橫施種種的虐待和迫害。馬尼刺的華僑大多被集中的八連區中。但是中國移民仍舊源源而來，爲了使中國人無法在日常生活經常與菲律賓人民接觸，西班牙政府在統治菲律賓的初期，便頒下了禁止菲律賓華僑經營零售業的法令，雖然這條法令由於種種實際條件的限制，並沒有被切實施行。西班牙當局當時的政策，顯然是只要讓從事生產建設事業的中國人移居菲律賓。

對在菲律賓定居的菲律賓華僑，西班牙當局努力使他們西班牙化，目的是要使他們對西班牙國王效忠

。由於西班牙的特殊歷史文化背景，這種西班牙化在表面上看來，好像是天主教化，當時菲律賓的天主教大主教，逼令皈依天主教的菲律賓華僑剪髮，他顯然認為剪髮是當時中國人宣佈效忠西班牙的公開表示。打開向中國傳教之門，一直是西班牙侵入亞洲以後的重要政策，但是由菲律賓瀆出發向中國傳教的工作，從來就沒有收到很大的效果。

由於日本內部的政治形勢，織田信長要培植一個足以與佛教勢力對抗的力量，而使葡萄牙人向日本的傳教工作有了頗大的成績。西班牙對這項成就甚加重視，當腓立二世承繼葡萄牙王位之後，馬尼刺西班牙代表會議所擬定的侵略中國的計劃書中，便明文主張向日本募兵參加侵略中國的隊伍。

明朝中國在當時，一面不願派兵與歐洲侵略者對抗，一面又自蒙耳目，對海外的形勢不求理解。利馬寶是意大利人，到中國來因為中國古籍沒有意大利的國名，但是知道明朝中國把海外的一大片地區統稱西洋，中國古籍又有一個西洋瓊里，於是便自稱大西洋人。利馬寶在中國的時候，和許多明朝政府的重要官員來往，對西方文化的輸入中國，也可以說是頗有貢獻而且是頗受重視的一個人。但是明朝的政府對他的來歷却不求理解，這是很奇怪的。遣使出國在中國歷史上老早便有許多先例，遠在漢朝便有張騫班超的出使西域，明朝初期還有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但是到了佛郎機盤踞澳門的時候，明朝政府既然知道佛郎機擁有極優良的武器，又知道佛郎機無故侵佔中國的朝貢國馬六甲和呂宋，却不想遣使試探佛郎機的虛實，完全證明了明朝政府的腐敗和糜爛。明朝政府如果在西班牙佔領菲律賓的初期，立刻開始研究這個闖入亞洲的西方強國，或者還能及時制定一個合理正確的對外政策，但是中國封建王朝的專制暴君在歐洲強國一

侵入亞洲便已鑄成大錯，而且一錯再錯延續了數百年久。

侵入亞洲之後，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侵略亞洲這個目標上固然是一致的，但是他們之間却存着異常顯著的矛盾和競爭。這個矛盾即使在腓立二世兼任二國國王的時期中，也並沒有實際緩和了多少。葡萄牙由於航路上的地理優勢，壟斷歐亞貿易而大獲利益；西班牙的貿易活動，主要地則限於中國、菲律賓和美洲之間。然而在當時的歐洲國家中對世界形勢能起決定作用的，還是西班牙而不是葡萄牙。

腓立二世承繼葡萄牙王位之後，西班牙當局便準備組織西班牙葡萄牙聯軍，再招募一些日本和菲律賓的僱傭兵配合，侵略滅亡中國。馬尼刺西班牙代表會議擬定了一個侵略中國的詳細計劃書，這是一個切實準備執行的計劃，在菲律賓的西班牙人，甚至已經在進行一些實際部署。這個計劃書，不但是中國和菲律賓的關係史上的重要文件，也是中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史上的重要文件。這個侵略計劃完完整整地包括軍事、經濟、文化各部份，連征服以後的統治計劃都包括在內，實在可以說是在歷史上，中國第一次面對着一個文化高度發展的國家的精密有組織性的侵略威脅。以當時的形勢而論，如果西班牙「無敵艦隊」的征英，不是慘敗而是大勝，這個侵略中國的計劃可以說是勢在必行的。

西班牙佔領菲律賓的初期，歐洲發生了兩次決定性的海戰。第一次是黎班道的海戰，這一次海戰解除了回教勢力侵入歐洲的威脅，回教勢力的發展於是告一段落。第二次是西班牙「無敵艦隊」征英的慘敗，這一次海戰完全改變了歐洲的均勢，西班牙大帝國從這個時候起，明顯地開始沒落。於是，開始了一個歐洲均勢消長的長期調整。但是，歐洲形勢的變化，開始對亞洲有着明顯的影響，歐洲已經開始發展成爲

全世界視綫所集中的中心。

西班牙政治的腐化，在征服菲律賓的最初期便開始暴露，和迫害虐待相配合的，是西班牙官員對菲律賓華僑的敲詐勒索。在封建王朝苛稅暴政的壓迫下，中國人受敲詐勒索本來是家常便飯，因此對西班牙官員的敲詐勒索，必定是很善於應付的。這便是所謂華僑賄賂菲律賓官員的開端，當西班牙愈走下坡的時候，政治當然也就愈來愈腐敗，西班牙官員的敲詐勒索也就愈來愈利害。

亞洲的形勢也在這個時候開始改變。首先是日本的統一和興起。豐臣秀吉統一日本之後，便立刻起兵進攻朝鮮，並且企圖威脅中國。豐臣秀吉同時又派遣使者，恐嚇菲律賓和南洋的其他國家。其實日本在這個時候不過是初露鋒芒，還沒有能力有多大的作為。日本在朝鮮之所以還能有以表現，完全是糜爛的明朝政府所造成的。明朝政府在日本初露鋒芒的時候，便助長他的氣焰，開始養成他對中國的輕視。

還有另一項不久便要使中國大陸發生大變化的發展，便是中國的東北角，有一個長期為漢族所壓迫和歧視的少數民族——女真族，在努爾哈赤的領導下開始興起，於西班牙佔領菲律賓的初期，在建洲衛奠下了滿清的基業。這是一個後面還要比較詳細討論的事件。

歐洲最強大和最富有的封建國家，和亞洲最強大最富有的封建國家，在菲律賓發生接觸，這是這個時期的中菲關係的特徵。當時中國和西班牙所擁有的財富，佔全世界全部已知財富之極大的百分率。當時的英國和日本，與西班牙和中國比較起來，簡直是赤手空拳一無所有。但是在政治上，一個很強大而却在衰落中的力量，是不足重視的，必須重視的，是正在興起的新生中的力量。通過中菲關係的發展，我們將要

清楚地看到，亞洲的封建大帝國和歐洲的封建大帝國之沒落崩潰。

第六章 一封大主教的信

——中國人及其八連

菲律賓的第一任天主教大主教沙拉利（Domingo de Salazar）於一五九〇年（萬曆十八年）六月廿四日，寫了一封信向腓立二世詳細報告中菲關係與菲律賓華僑的情況。因為它是西班牙統治菲律賓的初期，有關菲律賓華僑的最重要的史料，所以我特別在這樣將它譯出：

「陛下：

正如中國人的問題是很值得瞭解的，我想最好是特別在一封信向陛下作一個關於他們的報告，雖然我所講的一切，和事實比較起來，是少得很多的。在我敘述上帝通過祂的慈悲而使我們知悉的，我們極其無知的，有關該王國的事物以前，爲了要使我的良心平安，且能不猶豫地死去，我必須改正我在先前有一個時期所犯的錯誤。在是項錯誤之下，我在我當時的感覺寫信給陛下。雖然根據所獲知的消息，我當時所寫的是對的，但是後來我獲悉，事實剛剛相反。我一開始發覺錯誤，我便立刻寫信給陛下；然而那是沒有以必要的效率作成的，因爲那時我還沒有完全覺悟。現在我已經完全覺悟了，如果我不設法改正該錯誤，那將是很嚴重的。正如當時在一種錯誤的觀念之下，我寫信向陛下報告我所感

覺的；現在我已經完全覺悟了，我也將寫出我現在所感覺的；因爲一個人總是應該把整個而赤裸的事實，不帶惑亂的因素地在所有的人的面前排出來，對陛下更應當如此。

『在我來到這些島嶼以前，我聽說沒有一個外國人，除非得到該王國的執政者的特別許可，能够不冒生命危險地踏上中華帝國。該地的原有的居民如果未經許可，帶一個外國人進入該地，將會被處極刑，而該外國人將終生被關在監牢中。當我抵達這些島嶼以後，我首先查詢幾個來到此地的葡萄牙人，我聽到他們宣告和證實我先前所聽到的。因爲我來的時候就有這一種印象，我很輕易地相信葡萄牙人對我說的話，並說服我自己，如果不冒生命的危險，實在沒有一個外國人可以進入中國。很久以來，我的心便逼使該王國皈依，我帶着這種念頭，到島嶼中來。使我接受這位主教職位的原因之一，便是這些島嶼與中國很接近，而且有許多中國人來此居住。因爲想到如果不容許外國人踏上該地，福音的傳佈便會遭到障礙而感到悲傷，我作出了一張有許多自澳門和印度來到此間的葡萄牙人作證簽字的報告。在我送交陛下的該報告中，我提出證據說，叫做Mandarin的中國統治者，除非有他們的許可，不容許任何人進入該王國；爲了這項目的，他們維持一支很大的海軍以巡衛沿岸，並擊斃或逮捕所有要在該地登陸的人。根據葡萄牙人所給我的情報，我寫信給陛下，確言陛下派遣海軍至該國，如果傳教士不被容許進入，便以武力打開一條路，使中國人接受他們將是合理——領會到這項反對只是來自中國官員的，一般的人民將不會反抗，而將好好接納他們。當島嶼上所有的人，包括我本人，都抱有這種觀點的時候，因我主的喜悅而揭穿了這項欺蒙，並使自這項錯誤中釋出。事情是這樣發生的

，有一隻船離開這些島嶼到墨西哥去，在災難中抵達中國沿岸。最初，船員多少受到保衛沿海的兵士的虐待，因為後者將他們當為盜賊或間諜；但是在他們被帶去見 Mandarin 總督之後，他一聽到他們是由呂宋出發的，這是他們稱呼這些島嶼的名字，總督予他們以很好的待遇，命令兵士們歸還自他們取去的東西，並懲罰那些取物者。他們送西班牙人平安到澳門，他們從而抵達本市。該船的船長，以及船上的兩名奧古斯丁教派的神甫，現在都還在這裏，他們告訴我對他們發生的一切的事。

「從這個時候起我開始覺悟，並瞭解中華帝國並不像葡萄牙人所形容的那樣地難以抵達。於是寫前述致陛下信，確言有關中國官員的不良的報告，並不是真實的報告，而是葡萄牙人所偽造的。後來，我對這項事實的信念為某些人所證實，那些曾經由這些島嶼到過中國的人，不管是神甫或是世俗人。當這些人抵達該地的時候，中國人將他們拘捕起來，以便找出他們什麼時候抵達，和他們來做什麼；當他們發現他們是什麼人以後，他們便被容許平安地回來，甚至給他們以旅途的供應品。當我在寫這封信的時候，我遇兩位佛蘭西斯教派的神甫，他們告訴我，他們一抵達中國便被拘捕，並被用手扣住，帶到中國官員面前。當他查出他們是何許人之後，他便下令讓他們自由，並予他們以供應品，直到他們能回到此間。完全向我證實這一切事實的，是當時統治新西班牙的總督派至澳門的一條船，在漳（泉）州受到良好待遇的報告，該船的船長 Lope de Palacios，是墨西哥的法官 Auditor Palasio 的兄弟。這條船因氣候的襲擊而被驅入漳（泉）州，當漳（泉）州的居民獲悉他們是至中國貿易的時候，船上每一個人都受到良好的接待。他們勸他們不必再繼續航行，說他們能夠供應他們的

船以商品；但是上帝，爲了要懲罰那些違背了陛下的意志，企圖毀掉這片土地的人，使他們看不見，使他們不願意採納，所能對他們作出的最有益的建議。船上三名道未尼干教派的傳教士，都受到很好的接待，並爲該省的中國官員所盛意款待。他將他們帶入市內，使他們住在自己的家中，給他們一座房子讓他們能够作彌沙。他們如同在你的宮廷中一樣安靜和安全地作彌沙。中國官員留他們住了一星期，後來再讓他們回到船上，繼續航往澳門。這是我從身歷其境的教士親自獲悉的。目前，我正在我的家中招待一個乘該船來自墨西哥的人，作親眼看到的證人，他對我講一切所發生的事；但是，由於這些報告及其他所發生的事，二年前便已向陛下報告了，而這些報告必定已到達了它的目的地，我將不因這些事物的更詳細的報告而使你就攜。

「我提到這一切，是爲了要改正對中國統治者的錯誤的看法；雖然在實際上他們是細心而多疑的，謹慎地要保護他們的國家，使不受可能傷害和紛亂該土地的外國人侵入，然而沒有任何疑問地，先前所說的關於他們的一切，都是虛偽的指控；因爲直到現在，我們還找不出任何人，如葡萄牙人所說的那樣，因踏上他們的土地而被殺，也找不出一個人，因此而終生投入獄中。如果有任何西班牙人到該地去，在中國人手中受到虐待，那是由於葡萄牙人在他們中間，散佈對我們不利的報告，警告他們要提防干戾臘（Castilians）人，因爲他們是一族有偷竊和佔奪外國王國的癖好的人民；正如他們成爲新西班牙、祕魯、和菲律賓的主人一般，將會同樣地力爭以奪得中國。該王國的人民，是全世界最細心的人民，頗容易地便相信了葡萄牙人所告訴他們的，關於我們的事；結果便使他們苛待到那

裏去的干戍臘人。我在這裏所講的，是一項早已確定的事實，是那些僅因為葡萄牙人在中國人面前，指他們為間諜，而處於在中國被殺的極大的危險下的人所知悉的。我前面所述及的佛蘭西斯教派的傳教士之一，向我斷言他本身曾聽到說，葡萄牙人報告他們是間諜，爲了這個原因，他們被加上手扣。如果我不是確知事實如此，我將不敢向陛下斷言，因為這些是對葡萄牙人不利的嚴重的事項。雖然不一定是說，他們每一個人就這樣地說我們，然而只要有幾個人這樣說，便足以說服中國人；而這幾個少數的人，造成了不小的損害，要不是上帝提供了一項補救，他們將會使福音之傳入該王國，大大地受到了阻礙。不過，自從中國人經驗到與對他們所講的所相反，自此聞到該地的中國人或生理人（兩者有同樣的意思），告訴他們以我們在此如何公平地對待他們，以及他們在我們之中所享有的自由，他們便重獲信心，再不因看見我們在該地而忤怒，正如被驅入他們的海港那兩條船所證明的。Doctor Santiago de Vera 去年告訴我，他要設法與漳（泉）州的官員取得協議，請他們在離海岸不遠的地方給我們一個島嶼，使干戍臘人得以在該地居住並建立商業；他又說這個計劃，沒有遭遇到生理人方面很大的反對。但是這並沒有實現，我不知道是什麼造成它的失敗。爲了要確證中國官員並不像葡萄牙人所聲言的那樣，把該王國的門關得很緊閉，最近發生的一件事，很明白地顯示出來。當葡萄牙人將所有干戍臘傳教士逐出澳門，命令他們到印度去而不得回到此地的時候，兩名神甫祕密地逃到廣州去，再自該地由陸路到漳（泉）州，越過約一百 Leagues 的距離，沒有受到任何的損害；相反地，他們得到良好的待遇，漳（泉）州的官員，用一條他個人的船，將他送到本市來。帶他們來的那位船長

來訪我好幾次，我向他致謝。目前，這些傳教士在本市，並對我講過自澳門至漳（泉）州的旅途中所發生的事，以及從漳（泉）州帶他們到這裏來的船長所送給他們的禮物。

「由上述的一切，我們推論，先前所謂中華帝國及其統治者，拒絕准許外國人入境，是葡萄牙人的偽造和誹謗，他們這樣做是爲了私人的利益，害怕如果干戈臘人得以進入該地，他們與中國人的商業將會中止。我們住在此地的人，把這項誹謗歸因於——或更正確地說，它是魔鬼的狡猾，冀圖用這種方法，阻撓我們所期望獲得的結果，便是我主耶穌基督，囑咐他的門人和使徒，向普天下去傳福音的方法，不是信靠他自己的力量，或是人類的智慧或能力，而只是靠上帝的力量。因爲祂，當祂認爲合適的時候，解決一切可能發生的困難；如果有時候，祂讓他的使者受虧，這是爲了他們最大的益處，以便使我主上帝的能力和至善，能以更大的光輝閃耀。所以，我說如果我因爲得到該王國的統治者，由於不容許那些能傳教的人進入該地，而妨礙和阻撓了福音的傳佈的錯誤的報告，而一度認爲可能要與中國作戰，現在我已知悉了事實，我宣稱對上帝可能作最壞的觸犯，和對傳福音所可能作的最大的阻撓和抑制，便是帶着鉄拳到中國去，或應用任何的暴力。因爲我們從來也未會有過，而現在也沒有，任何應用武力進入該王國的原因、權利、或理由；因爲我們顯然未曾告訴他們，他們也不知道，我們的目的。相反地，他們以爲我們是一個目的僅在僭取外國王國的族人；因爲他們既然這樣想，他們便當然防範我們。爲了要糾正他們對我們的錯誤觀念，我們不要以大隊的艦隊和有配備的軍隊到那裏去，因爲這樣做唯一的結果，便是擾惱和忤怒全世界最大和最好的王國；但是如果我們依照上帝所

命令和期望的方法前往，依照神聖的主宰所指定的日期（因為人無法懂得），我們將要有自原始教會以來，最大規模的皈教。這是魔鬼靠着在國外傳揚，唯一可以進入中國的方法便是應用武力的觀念，而加以阻撓的。而事實上，是直到現在，還未曾發現有任何族人，如此欣然地要接受福音，或者依照我主耶穌基督所命令的方法去傳福音，可以希望能有很大的收效；如果有任何人，即使他是由天而降的天使，有着不同的見解，願陛下將他當作是魔鬼的使者，想要說服人們以耶穌基督的福音，是靠着狂熱、靠着暴力和武力傳佈的，正如回教的可蘭經。願上帝把這個原則，自基督教的主教的頭腦中除去，以及自一切熟悉上帝的律法和福音的真理的人的腦中除去。我確信，當陛下獲悉這些事實之後，你將不會容許作出任何與上帝的意志相違的事。

「現在，我將要談到生理人，如果不是因為我在過去，曾經向陛下敘述過許多與他們有關的事，將會有許多可以談及的。因此我將會很簡要，以使所報告的，不會超過所必須的。

「當我抵達此地的時候，我發現有一個村落叫做敦洛（Tonto）——離本市不遠，中間有一條河隔着——住着許多生理人，其中有一些是基督徒，但是大部份是異教徒。在本市中也有一些店鋪是生理人所有的，他們留在這裏，以便售賣逐年積在這裏的商品。受這些生理人散居在西班牙人之間，並沒有指定一個固定的地方給他們，直到Don Gonzalo Ronquillo才撥出一個有四座大建築物的地方讓他們去住，並充作絲市場（此間叫做八連）。許多店鋪在這裏開張，商業增加了，並有更多的生理人到本市來。渴望要使這些人皈教，我不久便使用我的眼睛注視他們，並採取步驟使他們得到良好的待

遇，因爲用這種方法可使他們依附我們的宗教——正如我所知道的，這是陛下下的冀望。考慮到這一點，只要在可以找到西班牙人的地方，都會有一些刁悍的，他們忘掉了他們應該予這些異教徒的好榜樣，有時候虐待他們，我開始在這方面保護和幫助中國人，譴責那些虐待他們的人。我沒法解除他們的苦難，使他們得以自由地照料他們在商業上的利益，以及售賣他們的商品。在此一問題上，那些有責任要加以改善的人，在本市大大地濫用權力。爲了這個原因，生理人開始很愛我，因爲他們是我所見到過的，最知感恩的人。逐漸地，商業大爲增加，有許多生理人的船，載着商品來到本市——如各種各樣的麻布和絲；彈藥；糧食供應品如大麥、麵粉、糖；和多種的果子（雖然我未曾見過在西班牙所常見的果子）——而市容變得很多彩，如果不是因爲大災，和由陸地和由海中侵襲她的災難，她將成爲陛下領域內，最繁榮和富庶的城市。正如我在給陛下的另一封信上所寫的，本市有屬世和屬靈的共同最佳的可能的位置，以及其所能冀望的一切的利益。因爲在東方，雖然是頗爲遙遠的，然而沒有遙遠到阻礙一個人由適宜的旅程，可由該地而來，騎着新西班牙和祕魯；向北方，約三百 *League* 的地方，有日本的大羣島；在西北方，騎着巨大而廣闊的中華帝國，離本島極近，由清晨起程，如遇適宜的氣候，人們將於翌日看見中國；在西邊騎着交趾支那、暹羅、Pattany 和馬六甲王國、Daclien 大王国（古代的 *Trapobana*），兩個爪哇，較大的和較小的；南邊騎着摩鹿加羣島和婆羅洲。由這一切地區中，人們到本市來貿易；我們也從這裏到他們那裏去，因爲他們離得很近。至於在屬靈上的利益，如果我們有福音的傳教士可由此派出，這些地區是對我們開放的，我們可由此得到良好的效果，

因為佛蘭西斯教派的傳教士，曾經到過這些地方的一部份，並受到良好的接待，雖然因為有許多戰爭和翻譯員的缺乏，他們被迫返回。還不能很確定，他們在中國會不會得到如同他們在別的地方那樣的接待；但是直至現在為止，還沒有到那邊去的人，被殺死或被關在監牢裏。

「當我到來的時候，所有的生理人都幾乎被忘掉了，並被逐至一個角落中。沒有人想到要使他們皈依，因為沒有人懂得他們的語言，又因為它極其困難，而沒有人想要去學習它；同時因為在此地生活的傳教師，忙於向這些島嶼的土著工作。雖然，奧古斯丁的神甫負責向敦洛區的生理人工作，他們並不是應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去向他們傳教或教導他們，而是應用這片土地上的土著的語言；於是在此地的生理人基督徒，只不過是名義上的基督徒，並沒有比他在沒有皈依之先，懂得更多的基督教。爲了缺乏能用他們自己的語言，教導這應有名的一個民族的教士，我極其煩惱。這導使我去和 Don Gonzalo Ronquillo 商議，指定一個特別的地方專供他們自己使用，並將爲他們特派神甫，這些神甫必須學習他們的語言，並以其語言教導他們。當這一切都已佈置停當，而神甫也被委派之後，整個地都被當時所產生的阻礙而未能着手。於是我向所有的教派呼籲：派出他們的神甫學習中國話，並負責主持生理人的工作。雖然他們都表現出要這樣做的冀望，有些人甚至開始學習它，然而沒有一個成功；沒有人能够以必要的認真，來教導生理人並負責使他們皈依，直到一五八七年，上帝把道米尼于教派帶入這些島嶼中。他們是爲了生理人的利益而來的，正如結果所證明的，也正如我將要進一步講述的。上帝不久便向我們顯示，該教派是依照祂的意旨而來的，以主持向生理人的工作。本市，

由於建築在一個很窄的土地上，一邊是海而另一邊是河，它整個地都被佔有了，看來好像沒有道米尼干教派可以安頓的地方；但是不久便找到了一個先前沒有人想到過的地方，它現在是全市最好的地方。這個地盤與生理人的八連毗連，使該教派的神甫有機會和他們開始交接，並使神甫和生理人成爲彼此互相依附。因爲每當生理人自八連出入的時候，他們走過了 *St. Domingo* 教堂。由於他們是很多的人民，他們常常停下來瞻望在那裏所發生的事。當該教堂的 *Parish* 和 *Oratory* 的兄弟會在遊行時，很大羣的生理人都出來看。他們住在離修道院很近的地方，在晚間聽到神甫們在作晨禱，他們由此受到不小的啓迪；他們也有他們自己的宗教，在他們之間，有過着很嚴肅的生活的神甫，並據說是生活在恭謹的靜思中。開導他們將會使上帝喜悅，基督教無疑地將會由這樣的性格得到很多的利益。

我在前面說過，*St. Domingo* 修道院離生理人的八連很近，它建於本市南北交界的沼地上。當 *Diego Ronquillo* 任總督的時候，生理人被遷移到這個地方，因爲 *Don Gonzalo Ronquillo* 所建的八連，被火所毀掉了。起初看來，要在該沼地上建設人類的住所的想法似乎是荒謬的，但是生理人是一族很勤勞、而且是最機敏的人民，經營得很好，在一片似必是不能居住的地上，建築了一個和前一個類似的八連，只是更大和更高。據他們說，這一個比前一個對他們更適宜，因爲在四列建築物的堅硬的地上，他們建築了貫過八連的房屋和街道，每一列建築物，都有一條街道分開。

「建築物是四角形的，有着長的走廊。這個八連也被火所毀掉，因爲那些房屋是用蘆葦蓋的；但是由於主席 (*Audiencia* 主席) 和總督 *Doctor Vera* 的精明，建築了更好的房屋，並用磚瓦覆蓋以

防火災。這個八連大大地美化了本市，使我不猶豫地向陛下確言，沒有其他在西班牙或在本區域中的已知的城市，擁有像它那樣值得觀賞的；因爲在裏面可以找到中國的各種行業，以及來自該國的各種商品和珍物。這些商品已經開始在此製造，而且比中國更快和更精美；這是由於中國人和西班牙人的交接所造成的，這些交接使前者對自身在中國還不大慣於生產的生產品更完善了。在這個八連中，可以找到一個國家所需要的一切行業和手藝的工匠，而每一行都有好幾家。他們製造的產品，比西班牙所製造的更美麗，而且有時候便宜到我都不好意思說起。如果我們干皮臘人如同葡萄牙人一樣小心地和他們貿易，這些商品將會更便宜，而中國人仍舊會從其中賺錢。因爲商品在中國以很低廉的價格出售；而不管他們在那裏的利潤是多麼少，當這些商品在此出售時，他們得到了巨額的利潤。但是沒有辦法對於干皮臘人加上任何約束，他們也不能受管制——結果是一切都要毀滅；因爲生理人並不是生來的傻瓜，開始瞭解西班牙人的氣質，並利用他們的不節儉。如果後者稍爲自行節制一點，他們便不會變得那麼富有。

「這個八連中有醫生和藥劑師，他在他們的店鋪前面，有用他們自己的文字寫的招牌，告示他們在出售什麼。那裏也有許多餐館，生理人和土著在裏面用膳；有人告訴我，甚至西班牙人也去光顧。西班牙人所進行的行業全都倒閉，因爲人們向生理人購買他們的布料和鞋，他們是西班牙時式的，很優良的工匠，非常廉價地製造所有的東西。雖然銀匠不懂得釉製（因爲在中國不用釉製），在其他方面，他們生產令人驚異的金和銀的製品。他們很熟練而且很聰明，只要他們一看到一個西班牙工人的

任何製品，他們便能精確地複製。最激使我驚奇的便是我抵達的時候，沒有一個生理人懂得油漆任何東西；但是現在他們對這項藝術已經很精工了，以至使他們應用刷子和鑿子，生產了令人驚歎的作品，我想沒有什麼會比我所看到過的，他們所製成的一些聖嬰耶穌的大理石塑像更精美的了。這項意見是所有曾經看到過的人所確斷的。教院開始由生理人所製造的聖像所裝飾，這在先前是大為缺乏的；看到這族人民所表現的，複製來自西班牙的聖像的能力，我相信不久我們也不會短缺那些在 *Malindos* 所製的。我對漆匠所說的，同樣地也適用於刺繡，該項藝術不斷地在改進中。

「使我們所有的人都感到愉快的是由墨西哥來了一位釘書匠。他帶了書來，開了一所釘書場，僱了一位願意爲他做工的生理人。生理人祕密地，不讓他的主人知道地，觀察後者釘書；啊！還不到……（原稿空白）……他便離開該作場，說他不願再繼續爲他工作了，並且開了一家類似的作坊。我可以向陛下保證，他成爲了一名很優越的工匠，並且逼使他的主人放棄營業，因爲生理人兜走了他所有的生意。他的手法極佳，因而不再須要西班牙工匠。當我寫這封信的時候，我的手頭有一本拉丁文的 *Nabarro* 是他所釘的；而依我的評斷，即使在 *Sevilla* 也不會釘得更好。

「生理人之中有許多園丁，他們在看來全然不能生產的地方，很良好地生產了多種在西班牙和墨西哥所長的蔬菜。他們使此地的菜市場，如同馬德里或 *Salamanca* 一樣地有良好的供應。他們製造質地很優良的，而且很廉價的椅、馬鞍、和鞍蹬，使得有些商人想要運一船載這一類的商品到墨西哥去。

「許多麵包匠應用他們自中國運入的大麥和精良的麵粉製麵包，並在市場中和沿路售賣。這對本市是很有益的，因為牠們製造很優良的麵包並廉價售賣；雖然本地有大量的米，許多以前不食用麵包的人，現在也食用了。他們是很容易通融的，當一個人沒有錢還麵包錢的時候，他們便賒貸給他並在賬簿上作記號。有許多兵士整年都靠這種方法取得食物，而麵包匠從來不會不供應他們以所需的全部麵包。這對本市的窮人是一種很大的幫助，因為他們在需要時有這一項倚靠。生理人售賣本國所生長的動物的肉類，如豬、鹿、和水牛（一種意大利水牛，它的肉和黃牛一樣。）他們也售賣許多禽鳥和蛋類；如果不靠他們售賣，我們所求的將會缺欠。他們在求生活上是很熱心的，甚至木柴也在八連中售賣。本市由生理人所售賣的魚類，取得它大部份的食料；他們每日都捕得很多，致使剩餘的被丟在街頭，他們的售價極其低廉，一^{peso}便能購得本市的上等家庭供應午飯和晚飯所需的充足的魚類。

「八連的四面的前面是一個大池，水由海經過河灣流入。在池的中央有一個小島，犯罪的生理人在該地受到刑罰，使每一個人都能够看見。這個池美化了八連，而且確實有很大的利益，因為許多船在潮漲的時候，由前述的河灣中駛入，把所有的供應品運至八連，然後再分配到本市的各地去。

「在本市從與生理人的交接而得到的利益之中，全然不是最不重要的還有，西班牙磚石固然是很昂貴而且很難生產的。此地，靠着生理人的勤勞和精明，我們能够用碎成的石塊，廉價地建築很優美的房屋，而且是在很短的時間內；一個人在一年內，便能完成一座全部可供居住的房屋。看到迅速在建築中的許多華美的房屋、教院、修道院、醫院和一座炮台，是令人驚歎的。生理人同時也廉價製造

精良的磚和屋瓦，起初，石灰如同在西班牙一樣是用石塊製成的；但是現在生理人應用一種叫做「白珊瑚」的小圓石，這是他們在這裏的海岸邊找到的；同時也應用大蠔的介殼，這是可以大量取得的。在開始的時候，這些石灰的質看來並不好；但是從該時起所生產的，却是極佳的，並使本市不再應用他種的石灰。它以極廉的價格售賣，我們用四Reals購買一Cahiz（等於十二Kaneegas，或約等於十九又五分之一的Busnels）的石灰，供我的房屋和其他人的房屋應用，又用八Reals買一千塊磚——雖然這並不是固定的價格，價格依自墨西哥運來錢幣的多寡而變化。生理人現在懂得如何利用確切的時間；當他們知道有足够的錢幣在購買的時候，他們便把商品賣得貴一點，但是他們從來未曾把價格提高到不可理喻的程度。他們同意把所有的石灰、磚和瓷磚運至購買者的家中，從而使他免除了大量的勞動。讓生理人建造建築物也有很大的好處；他們講好每一Brasa的價格若干，包括斬石和運沙。如果他們得到石灰的供應，他們將供應其餘所有的材料，於是從來不予屋主任何麻煩地工作和蓋好房子。生理人每日的工資，如果他的工作不是按件計算的，是一Real，他自備伙食，生理人是勤苦的工人，對錢財很有貪慾。他們到本市來數量是很大的，在上述的那一個的旁邊，正在建築另一座大八連，和前一座的形狀相似。許多生理人建築了他們的房屋在裏面，而且在這個時候它應該是住滿了人了，如果不是因為去年Marquis de Villamanrique沒有以墨西哥磚供應我們——根據報告，他們阻止運磚給我們，於是對本市和對生理人，造成不小的傷害和損失。（這位墨西哥總督，於一五八九年被免職。新總督Luis de Velasco於一五九〇年正月廿五日抵達墨西哥。）關於他對此地所造成的

傷害和損失，他應該向陛下作一個報告，而且應該向神作一個更準確的報告。要不是你已經派出了一位很優秀的，他將會爲此地帶來了毀滅，即使如此，他也已經留下了够多的困難和苦難。

「住在八連中的生理人的數目，通常在三千人至四千人之間，不把在船上來來往往的二千或二千以上的人計算在內。這些，以及那些住在敦洛區的人，和那些在附近生活的漁人和園丁，根據負責這些人的道米尼干神甫的估計，數目在六千至七千之間。四名該教派的傳教士，進行對他們的教導並使其皈依。

「我在這裏提到了許多小問題，向像陛下那樣因各種大事而忙碌的人，寫很長的一封信似乎是不大體諒的；但是我極大的熱情應該贏得寬恕。因爲，考慮到這些地區是那樣的遙遠，而這些人民又是那麼地異樣——我們前此對這些事物的瞭解極少，因爲葡萄牙人一直表現出反對我們獲得有關它們的任何知識——所以我寫出一個描述以及關於此一問題較具體的消息給陛下，好像是應該的，使陛下得以知悉在他的領域下所存在和所發生的，並且可以享得他的先輩由報告都得不到的經驗，我如果不是已經向陛下供給了許多在此發生的事件的消息，我現在將不敢漏掉它，就使我會被認爲是煩瑣的。

「這是當道米尼干傳教士於一五八七年五月抵達這些島嶼時，有關生理人的屬世事務的情況和趨向。而我也已經於翌年向陛下作一報告。我報告在道米尼干傳教士負責主持之後，生理人之中所發生的特別變化，以及開始在他們之中收到的效果；他們自願地開始接受基督教，這是他直到現在還很拗執的。不願在這裏再復述，雖然有許多事是值得知道的，而且應該爲此大大地感謝上帝，當祂樂意的時

候，祇便顯出祇的能力是多麼奇妙。還留下來讓我敘述的，是道米尼干教派的傳教士離此到中國去；雖然我們還不知道他們的遭遇，因為他們是最近才出發的，然而這項開始仍舊使我們有理由希望，靠着我主的幫助，他將會非常成功。

『到這些島嶼中來的道米尼干教派的傳教士之中，有四名參加向生理人的傳教工作。這四位中有兩位在聖·Gabriel教堂執行職務，這座教堂和這些傳教士住的地方，都在八連附近。另一座教堂和傳教士的住所，在Baybay海岬，在敦洛附近——由一條河所分開，使它與馬尼刺隔離。這四人中有二人，生理人的話學得很好，二人之中有一個還懂得寫（這是該項語言最困難的部份），生理人因着他們的知識而覺得詫異。這兩位村中的異教徒，諦聽基督教神甫傳教的機會，使他們熟悉了許多與我們的信仰有關的事物，其中有一些冀望受洗禮。但是當他們看到，成爲基督教之後，他們再不被容許回到他們的本國，爲的是顧慮這項信心在一個人人民都是偶像崇拜者的國家所遭遇的危險，說我們的宗教太苛刻了，因爲如果一個人皈依它，便須放棄他的祖國，並奪去了他的父親、母親、妻子、孩子和親戚。他們所作的論辯，好像他們是意欲勸服我們在洗禮的時候，不要把他們的頭髮剪掉，而且不禁止他們回返他們本國。我們認爲依他們的冀望而行是不適宜的，於是還是依循舊例。生理人自己要我們派遣神父到他們的國家去向他們傳教，說他們如果在那邊皈依，便不會像在這裏那麼危險。在對問題加以適當的考慮之後，道米尼干教派神甫和我本人，決定說到中國去是必要的；因爲，如果神容許傳教士留在該地，我們則可在此爲生理人洗禮時，不必剪掉他們的頭髮，或阻止他們回國和他

們的孩子、妻子和財產團圓。生理人對此項決定很感愉快，但是關於傳教士如何前往，則有着不同的意見。（Audiencia的）主席認為他們最好是乘 *Fragata* 與西班牙人同住，但是中國人則說神甫最好是單獨前往，不要與西班牙人作伴；於是雙方都提出許多論辯。兩次或三次，我看到我們的嘗試被阻梗，因為魔鬼正在運用其所有的力量阻撓它。已經購好了一艘 *Fragata*，船長和要帶神父前往的人也已選定了，幾乎一切都準備好了要使他們啓航，但是當計劃被挫敗的時候，我不知道是何故或如何被挫敗。看到我所渴望的遠行隊之被挫敗，以及因為它的執行沒有得到聖神的允許，我感到失望和極大的悲哀，從陛下的特別敕令中，使我想到這是神的意旨；於是我被迫放棄這項嘗試。但是上帝，祂的計劃並不依靠人的意見，把事項調整得比我能期望的更好，因為祂感動了生理人基督徒的心，弗蘭西斯戈·山戈（Don Francisco Zanco），一個基督徒兼生理人的總管，和道馬示·施源（Don Tomas Syguan）。後者是我在二年前替他洗禮的，不過沒有將他們的頭髮剪掉，因為我以為上帝將通過他，完成些巨大的工作，還另有一位——他是本島上最年長的基督徒，也帶着長髮。當這兩個看到西班牙人不要到中國去的時候，而神甫們因為沒有人可以帶他們前往而留在此地，他們去見 Juan Cobo 神甫，他是精通他們的語言的兩位神甫之一，他也是負責八連中的生理人的，他們向他表達他們很不受信任的感慨。他們說神甫們既然因為沒有西班牙人要帶他們前往中國而留下，他們既為基督徒而又是當地的土著，當可更安全地帶他們前往；他們又說，不必因與他們結伴而有何猶豫，因為他們將會在任何傷害落在這些傳教士之前先捨命。我們知道這是由於受聖靈的感動，因為直到這

個時候爲止，我們從來未曾聽到過有一個生理人，胆敢帶任何西班牙人到中國去；是以，我們決定派神甫們與中國人同往。當這事件在八連發表之後，一切友善的生理人，其中有許多是異教徒，都異常歡欣。有一個生理人基督徒，因爲看到我們放棄遠行計劃而悲傷，有兩天吃不下飯，但是當他聽到該事將繼續進行，以及將要如何進行之後，他表現出無限的歡樂，而且說這正是他所期望的。我叫兩名生理人異教徒來——雖然沒有信主，却被賦與一個好人所有的氣質，他希望，靠上帝的幫助，他們不久便要變成基督徒——問他們對這次遠行有什麼意見。他們答以他們很喜歡看到傳教士將要前往的方式，因爲他們如果與西班牙人同往，一切都將失敗。於是我們在他們臨行的時候決定，在目前不派出兩個以上的傳教士：Miguel de Benavides 神甫，他是學會生理人的語言的第一人，和 Juan de Castro 神甫，他以主教代表的身份到此地來，而成爲此地的主管人。我們特選這兩位，因爲一位熟悉他們的語言，而另一位由於他可敬的老態，和受祝福的長年而受到生理人的愛護和尊敬；我們知道在該地，老年人受到很大的敬慕和尊崇。正如我主送下祂的照應，他們除了他們本人，他們的祈禱書和聖經以外，不帶其他的東西，因爲福音應該要用這種方法，而且不隨同敵意的兵士而傳播。

「爲了這項我所極其冀望的遠行，於所能期望得到眷顧之下開始，我大大地感謝上帝；因爲它是在教皇的特別允准，和陛下敕令，以及總督，我本人和此地 Audiencia 的 Auditor（法官）的同意下進行的。這件事業給予所有的教派，和本市全體的居民以極大的喜悅。和由全體的生理人方面所表現的許多明白的愉快。願神聖的陛下能因我們所期望的一切結果而喜悅。在遠行出發時所發生的另一

事件，使我們大為歡欣，而且點燃了上帝真的即將開啓該大帝國之門的希望。前述送兩名弗蘭西斯干教派神甫到本市來的船長接到了一封信，這種信他們叫做*Cartas*（？），是寫給主席的，懇求後者爲帶這封信來的船長主持公道，使他們能够鳩收住在本市的人欠他的一些錢；信中迫切地懇求懂得該言語的兩名偉大的神父*Juan*和*Miguel*幫助該船長，因爲他們在該國中被認爲是親生理人的。他們的名字在該*Cartas*中兩次被提到，這兩個名字的第一個字是用紅墨水寫的，在中國人之間，這被認爲是尊敬的表示。一位在（漳）泉州的生理婦人，寫一封信給*Juan Collo*神甫。感謝他在一宗生意上幫助她的丈夫。這些是使我們知道這次遠行是在上帝的眷導下開始的最初訊號。所以在今年，一五九〇年五月廿二日，星期二，我到八連的教堂去，在那裏做彌沙；在該彌沙之後，兩名要奉獻的生理人，舉行了值得注意的儀式。他們跪在我做彌沙的祭壇前，在那裏經過了約讀兩次經的時間，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彼此交談，並握彼此的手；後來便彼此擁抱，我後來知悉他們在那裏誓結友誼和結拜。神甫由該地前往登船，我和他們同住，有許多生理人陪伴。因爲逆風的關係，他們所乘的船不能啓航；於是派出四艘舢舨將其曳出，這是生理人船上的小船。他們很樂意地將它拖入海—*Leona*外，在那裏把他們置於上帝的保護下然後再回本市。兩艘要跟着同一航程的生理人的船的船長，問我是否有信給傳教士，答應我要親手交給他們，我一定會寫信給他們。

「最後，我必須向陛下宣告，負責八連中的生理人的道米尼干教派的神甫，在他們的住宅的旁邊建造了一所醫院。這所醫院照料患病的生理人，靠着神甫們所募得的慈善捐款，和生理人異教徒所作

的捐款維持。這件事實在中國廣爲傳揚，使全國都對神甫們很感善意，因爲知道他們的同胞在這裏得到友意的接待。約在一年前，有一名著名的生理人皈教。他是一名醫生和卓藥師，他放棄了一切其他屬世的利益，自我獻身爲醫院服務。他治療病人，給予他們以大量的愛和仁慈，他爲他們滌洗並開藥方。簡單地說來，是上帝爲了該醫院的利益而引導他到此間來，並使該醫院的嘉名在全中國更爲廣傳。所以我謙恭地懇求陛下，樂意地命令補助該醫院，使患病者得以有所照料。況且，如果陛下親自注意這件事，這項事實將會在中國大受歡迎，並將比較陛下所命令要送給該國國王的禮物更有利益。

『現任的主席 Doctor Vera，看到這兩名生理人基督徒，弗蘭西斯戈·山戈和道馬示·施源的好意，自我獻身要把神甫帶到中國去，便以陛下的名義，使他們有一條船可以在六年內免稅。我懇求陛下樂意地批准這項特賜，並延期使成爲終身的；因爲他們確實是作出一件大事，這是本市的全體居民，包括西班牙人和生理人，都認爲是極重要的。即使他們沒有得到所期望的結果，他們也有資格得到陛下的寵賜，因爲他們已經儘力作出他們所能做到的。』

『道米尼干教派的傳教士 Juan Cobo 神甫——他正如在前面所說的，懂得生理人的語言及其文字，而且也是最爲他們所尊敬的——寄一本書給陛下，這是自中國帶來給他的書之一。以我們的目標而言，這種在他們和我們之間開始生根的交流，全然不是一個壞的開端。這本書一半是用中國文寫的，另一半是用干戊臘文寫的，而兩相對照。這是一部對陛下有價值的作品，願它能以此而被接納，不是在於它的價格，而因爲它是稀有的作品，先前八連或是在中國國外，從來未曾被看見過。根據我的

評斷，它含有值得思考的內容，由此可以看出人類的理知的力量；因為沒有信仰的亮光，這些（內容）已經和基督教所教導的很接近了。由此陛下可以看出，對教導這些事理的像中國這樣的王國，要求應用武力進入宣傳我們的信仰，是多麼錯誤的事。很顯然的是對這樣的人民，理知的力量是比武器更有力。願我主依照祂的意志指揮這一件事；願祂樂意在陛下的年日內，我們能看到該王國皈歸於信，使陛下能首先在地上，然後在天堂裏獲得這項榮譽。阿們。

一五九〇年六月廿四日馬尼刺

菲律賓大主教 Domingo de Salazar J

這封信是西班牙統治初期有關菲律賓華僑社會的最重要文件，它對這個時期的菲律賓華僑，作最詳細的描述。我想將來如果有人把這封信，和福建廣東沿海的地方文獻互相參照地加以研究，很可能得到一幅這個時期的菲律賓華僑社會更完整的圖象。

必須指出，菲律賓的華僑社會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形成的，西方國家的佔領和統治，是產生所謂華僑社會的歷史客觀的因素。在一個不為西方勢力所左右的南洋羣島中，所謂華僑社會，或所謂華僑問題，是極其難以想像的。

當西班牙侵入亞洲的時候，正處於中國大陸漢民族大遷移的進程中，這次漢民族的大遷移，後來又隨着中國國內女真族的興起和明朝的逐漸衰亡而更大規模地進行着。然而，在數千年來，中華民族曾經進行過不止一次的大遷移，但是從來也沒有產生過什麼華僑社會。

漢民族的移民在菲律賓（當然也在馬六甲），第一次遭遇到文化高度發展的有組織性的政權，而這個剛剛進入亞洲的西方文化，也就是所謂基督教文化，和亞洲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源流和傳統。我說所謂基督教文化，因為西方文化固然帶着一個基督教外殼，但是它的源流仍舊是羅馬和希臘的。

兩個先進的民族，在一個落後的地區中遭遇了，一股是新來的，一股有着長期的歷史關係。新來的移民者有其本國政府的武力作後盾，中國的移民却為其本國政府所遺棄。

西班牙政府在當時所熟悉的統治方法，便是以天主教為工具的統治方法。在當時的呂宋和未獅耶，除了一些原始的宗教以外，唯一有力量的宗教文化要算回教，以及一些印度教佛教的殘餘。不過，蘇祿和峴蘭佬的一些強有力的回教據點，這時還不在西班牙的領域內，呂宋和未獅耶一向是南洋諸島嶼中較落後的地區，回教的勢力可以說並沒有根深蒂固，因此西班牙人沒有花很大的功夫，便撲滅了呂宋和未獅耶的回教勢力。由於呂宋和未獅耶是南洋諸島嶼中較為落後的地區，這個地方的土著文化，在西班牙人看來並不是難以應付的。

由中國而來的影響，在西班牙人看來，是他們鞏固對菲律賓的統治上最大的障礙。當然，到菲律賓來的中國移民，並不是文化水準很高的中國人，因此在這個時候所發生的，並不是一個兩種文化競爭優勢的問題，而是一個西班牙如何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摒除中國的影響，以便澈底統治菲律賓的問題。於是產生了一個他們所憂慮的，中國移民向誰效忠的問題。在當時的形勢之下，中國移民的忠心，對菲律賓人民可能發生重大的影響，這一點是西班牙人所全然不能漠視的。

西班牙人的這項憂慮，是中國的傳統文化背景，和中國當時在亞洲的強有力的地位所引起的。當時只有有在西方國家統治下的南洋羣島，才有可能產生中國移民向誰效忠的問題。

同樣地是強大的封建國家，西班牙經過了蓬勃的文藝復興運動，和明朝政府的萎靡之風比較起來，在精神上的確佔有很大的優勢。

儘管西班牙當局認為由中國而來的影響，對西班牙的統治是不利的，儘管他們應用種種的方法想要減少中國移民。西班牙當局無法否認如下的事實：中國生產者對菲律賓的經濟發展和建設，不但有幫助，而且可以說是不可或缺的；沒有中國商人，就沒有菲律賓的對外貿易，就沒有大帆船貿易。種種的事實及其可能的發展，在在向西班牙人證明，他們對菲律賓的統治，是建築在對中國的依賴上的。

絲毫無可懷疑的，中國移民對菲律賓的發展是完全必要的。不過，如果以為西班牙當局會因此而感激菲律賓華僑，那是全然錯誤的，這種形勢只是使西班牙當局至感不安，他們對中國人只是覺得無可奈何只好加以容忍，不管他們在實際上是如何地憎惡中國人。他們在這種不安和無可奈何的形勢中，制定他們的華僑政策（見第五章）。

對那些來來往往的中國商人，西班牙當局公開表示不歡迎他們居留。而那些對菲律賓的經濟生產建設有幫助的華僑，他們則設法使其皈教，皈教後便要剪掉頭髮，不得再回中國。老實說，他們對這羣在菲律賓皈教的中國人的忠心，是非常懷疑的。於是他們便設法使中國人和菲律賓人民隔離，而且爲了便於監視管理，把華僑集中在一起，八連便隨之而產生了。

本來，歷史上的民族大遷移，商人的比重從來不會太大，因為這些移民，通常是該民族中生活比較貧困的份子，向更落後的區域的開拓；或是在大動亂之中，一般人民向較安全地區的遷移。因此，歷代漢民族的大遷移中，主要的，還是生產者的遷移。明末清初漢民族向台灣的大移民，還是朝着這個途徑。明朝初期西班牙尚未入侵之前，中國人向菲律賓這一地區的移民，大部份也都是生產者，他們把中國先進的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技術，傳到菲律賓來；當時到菲律賓來貿易的中國商人，多半不是中國移民，他們大多是隨船往返的。

西班牙人入侵以後，因為菲律賓的消費力有了巨大的發展，才造成中國商人到菲律賓經商的客觀經濟條件，到了這個時候，中國商人在中國移民中佔有重要的比例。西班牙統治下菲律賓的經濟狀況，同時造成對熟練的中國生產者的要求。

由於中國移民在菲律賓遭逢了一個與中國文化同樣先進的，但是又有着截然不同之源流的西方文化，在當時，要菲律賓華僑接受西方文化的同化是很不可能的。而菲律賓的土著，在西班牙統治者的壓迫下，開始接受並發展了歐洲式的封建殖民地文化。

漢民族在歷史上每一次的大遷移，幾乎在每一次都與土著民族在文化上和血統上相融合，但是中國文化向菲律賓的傳佈並與土著文化交流，被西班牙侵略者所打斷了。和先前漢民族歷次的大移民不同，到菲律賓來的中國移民，在極大的程度上，無法與西班牙式的封建殖民地文化相融合。漢民族在歷史上第一次，移入一個在文化上同屬先進影響下的領域中，漢民族的移民幾乎是史無先例地，遭遇到與土著居民互相

融合上的困難。中國移民在西班牙統治下的菲律賓被孤立起來，世界史上第一次出現了所謂華僑社會。

菲律賓華僑的孤立發展，主要地還是在文化上的，在經濟上華僑社會和菲律賓人民是無法分開，在政治上，全菲律賓的居民都是在西方侵略者的壓迫下。華僑社會的孤立發展是由於各種主客觀的因素所造成的：西班牙人在主觀上設法儘量減少華僑與菲律賓人民之間的接觸，他們害怕這種接觸會阻礙他們對菲律賓人民的思想統治；客觀的經濟環境使中國移民中大部份是商人和熟練的生產者，因而無可避免地會在社會中自己形成一個比較富裕的階層，當時菲律賓的貿易狀況，更使菲律賓華僑握有雄厚的金融勢力。

在這樣的條件下面，形成了菲律賓的華僑社會，更重要的，是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建立了菲律賓華僑社會的經濟基礎。

前面所指的華僑社會在文化上的孤立發展，更具體的解釋是西班牙統治者儘可能隔絕中國文化對菲律賓人民的影響，而且使菲律賓華僑和菲律賓人民，分別地為西班牙所同化。不過，必須指出的是在數百年來，菲律賓華僑，並沒有發展出一種有獨立性格的華僑文化。

歷史上的第一個華僑社會，如果不是建立於菲律賓，便是建立於馬六甲，現在我還沒有能够解答這個問題的充份的資料。不過，一個和土著居民基本上隔離開來的華僑社會，在菲律賓首先出現的，却是沒有多大疑問的。

大主教沙拉利的信，是描述初期的菲律賓華僑社會的最重要的文獻，因此我在討論這封信以前，對華僑社會的形成，在上面首先加以分析一下。

必須注意到沙利拉寫這封信以前，曾經發生過兩個重要的歷史事件，那就是林鳳被西班牙侵略軍所擊敗，和西班牙無敵艦隊的慘敗。必須注意到這位大主教在一五八六年，菲律賓西班牙代表會議所擬定的侵略中國計劃書上，曾經是簽字贊成的重要西班牙領袖。必須注意到這位大主教，在一五八八年六月廿七日還寫信給腓立二世說：「中國人是很不道德的族人，和他們交接不會得到什麼好處，而會得到許多壞處。」必須注意到這位大主教，爲了堅持皈依天主教的華僑必須剪髮，甚至不惜抗拒腓立二世的敕令。雖然無疑地，大主教沙利拉在先前，一向不但不反對以武力侵略中國，而且是此一主張的支持者。

不過，沙利拉是一個敏感的西班牙知識份子，對西班牙文化似乎也頗富自信。在無敵艦隊慘敗之後，他當然看得出西班牙遭此巨變之後，武裝侵略中國在可預見的將來，是無法進行的，於是他便設法建立和平向中國傳教的理論基礎，並且進行實際行動。如果沙利拉對和平傳教真的有成功的自信，那倒是代表西班牙天主教的新方向，自從西班牙橫越大西洋經過美洲大陸到菲律賓，天主教一直是以西班牙的武力作後盾的，即使在西班牙國內，天主教所採取的也是殘酷的迫害的方法。

林鳳被擊敗之後，西班牙使中國的威望在菲律賓人的心中大爲降低了，而且一直在降低，菲律賓華僑又受到集中監視。在沙利利看來，中國文化對西班牙在菲律賓的統治，似乎已經不是一種很嚴重的威脅，因此採取對華僑較寬大的政策，好像已經不太危險。從這封信的語氣看來，他好像是相信天主教有力量可以使菲律賓華僑終於效忠西班牙。

不過，沙利利的這項自信，以及他對菲律賓華僑的一些較友善的觀點，只是代表他個人或者一部份人

的，可以說是完全不能代表西班牙的統治當局。因爲同一時期在別的部門（指統治當局），很難找到同樣的自信和友善。

葡萄牙在到亞洲來的整個旅途中，只是設法建立貿易據點。異常顯然地，儘管葡萄牙人在當時，也和西班牙一樣地打着傳播天主教的招牌，但是和西班牙不同地，葡萄牙人利用天主教作爲建立貿易的手段，而不是統治的手段。從美洲到菲律賓，所有曾經被西班牙統治過的地區，西班牙文化都成爲當地文化的一部份，作爲西方的領袖國家，西班牙人在他們所抵達的一切地區中，都爲西方文化扎了很深的根（後來繼之而起的英語民族也是一樣），這是葡萄牙人所望塵莫及的。

沙拉利寫這封信的時候，腓立二世正兼任着西班牙和葡萄牙二國的國王，但是沙拉利一開始便攻訐葡萄牙人，指斥葡萄牙人在中國人面前，誹謗西班牙人是喜歡佔奪他人之國土的一族。現在看來，這項指斥是可笑而毫無意義，不要去說沙拉利在不久以前還在支持武裝侵略中國，就事實而論，葡萄牙人並沒有誹謗西班牙人，西班牙自從建國統一以後，便一直在佔奪別人的國土。不但是西班牙人有這種癖好，繼之而起的一切西方強國，都喜歡佔奪他人的國土，葡萄牙如果在當時真的向中國作這種警告，實在是很中肯的警告。

由於西歐的基督教文化傳統，西方人大都是基督教徒，不過千萬不要把這種基督教文化和耶穌混淆起來，耶穌在主觀上，和基督教文化的建立是毫無關係的。基督教的傳教士總是自稱爲上帝的僕役，而把他們所反對的一切的人，都稱爲魔鬼的使者，正如大主教在這封信上所寫的。老實說，這是一種毫無意義的

相互指摘，到底誰是上帝的使者，誰是魔鬼的使者，實在是無法判斷的。不過，自從基督教被訂為羅馬國教以後，這種幾乎是未曾間歇的相互指斥，一直是基督教文化發展上的特徵。

在我們正在加以討論的這個時代中，也就是西班牙大帝國正處於巔峯狀態，而且正在自巔峯狀態走向下坡的時代中，歐洲的基督教文化，正在由共同的傳統背景發展出許多不同的支脈。

文藝復興是激盪歐洲思想界的大波，對歐洲文化起了極大的作用，希臘羅馬文化在歐洲的傳統地位，再度被恢復過來，歐洲的各個個別地區，也發展出了他們各別的文化特性。配合了經濟上的發展，歐洲的許多民族在這個時代開始定型化，也就是說，歐洲有許多民族，到了這個時候才發展成爲有獨立性格的民族。因此，便產生了不同地區的人民、不同集團的人民以及由他們所形成的獨立民族，對基督教的教義，特別是聖經，作出不同的闡釋。而這些不同的闡釋的出發點，實際上是以各民族的地方性的特殊的利益爲基礎的。

基督教教會的大分裂，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爆發的，基督教文化依着不同的民族的特性，以不同的方式發展着。西班牙無敵艦隊慘敗之後，英國和荷蘭的新教（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新教派）更加鞏固地成爲獨立的勢力。

後來，隨着生產力的大發展，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下必然發達起來的自由主義，正式承認了基督教不同的教派的法律地位。本來，基督教只是以兩個不同的中心對壘着，一個在羅馬，代表西歐的勢力；一個在君士坦丁，代表東歐的勢力（東正教）。君士坦丁被回教徒攻陷之後，東歐的基督教中心遷到莫斯科

去。到了這個時代，基督教文化的兩大中心勢力都開始衰落，被新形式的基督教文化所取代了。

這個時代的基督教文化的發展，並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內，但是由於派遣傳教士赴華傳教，以及因此一問題而引起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間的矛盾，使我們不能不接觸到這個問題。

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當時完全沒有宗教觀點上的分歧，他們都是痛恨新教的忠誠的天主教徒，天主教國王腓立二世是他們共同的國王。不過，葡萄牙並不是當時的歐洲領袖，並沒有而且也不足以，以西方文化的代表自居，他們主要的目的是在於取得貿易上的利益，他們的傳教，也是以貿易上的方便為出發點的，因此從一般地講，葡萄牙人對基督教教義的闡釋，在亞洲土地（和在他們本國不同）上是非常寬大的。

在大部份征侵的過程中，西班牙人及其傳教士，一直是以救世主的姿態來進行它的侵略的，他們總是強迫土著接受西班牙式的基督教文化，他們的方法又常常是很殘暴的，有許多地方的美洲土著被他們殺盡滅絕。這羣野蠻的西方人常常舉着耶穌作招牌，使得許多受偉大的耶穌所感召的良善的人民亦被他們所蒙蔽。其實所謂基督教文化和耶穌並沒有直接關係，只是把耶穌的名字利用了一下，許多傳教士的傳教行為和目的，也是和耶穌的精神相背馳的。

中國移民在菲律賓，遭遇到一個文化高度發展的民族所建立的政權，這個政權惡意地阻隔了漢民族文化和土著文化的交流，歷史上第一次，漢民族的移民，被迫形成了一個不能與土著民族融合的所謂華僑社會。西班牙在菲律賓，也達到了西班牙帝國向外拓殖的最高峯，哥倫布抵達美洲大陸所激起的西班牙的大規模武裝征服，進抵菲律賓的時候可以說是到了一個強有力的歷史古國的外圍。當他們正在準備進一步

侵略這個古國的時候，西班牙遭逢了無敵艦隊的慘敗。

在這個新形勢下，大主教沙拉利便開始建立和平對中國傳教的理論，然而應該充份地理解到，在像大主教沙拉利這一類的西方高級宗教領袖的頭腦中，接受天主教便是接受西方文化的精神控制。這一點是我在前面分析歐洲基督教文化時一再強調指出的。必須在這樣的基礎上，去理解沙拉利對葡萄牙人的指斥。

從明朝時代的中國典籍起來，中國政府根本把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通通叫做佛郎機，並不知道他們之間有什麼分別或歧見。當時的葡萄牙人縱使有意挑撥中國和西班牙的關係，也不見得會有多大的成就，葡萄牙和中國當時的關係，實在並不太好。住在馬尼刺的天主教大主教沙拉利，我想不會天真到相信葡萄牙人和中國人已經有極密切的關係，而且足以左右中國對西班牙的政策。使他大感憤慨的，必定是因為葡萄牙人只顧在貿易上圖利，而疏忽了甚至阻撓傳教事業。因此，在沙拉利看來，傳教工作只有西班牙人才能負起。

當然，菲律賓的西班牙當局還有一個目標，便是與中國建立直接的貿易關係。但是這不是很重要的因素，因為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世界的條約中，直接的貿易在客觀上將不會予西班牙商人以多大的利益。

沙拉利在這封信中，論及向中國傳教問題時，最重要的是表現出：（一）西班牙過去那種以武力相配合的傳教方法，必須被和平的傳教方法所代替，向中國進行武裝傳教，在可預見的將來，是不可能的；（二）對西班牙式的基督教文化的極大的信心，不但相信菲律賓華僑會接受天主教，而且也相信能够和平地使在中國本國的居民接受天主教。不要忘記所謂接受天主教，在當時的意義上是向天主教當局效忠，當時

的天主教當局是歐洲最重要的政治勢力。沙拉利的這項信心可以說是極其大胆的，不過這種大胆的信心，並不是菲律賓西班牙統治當局中大多數人所共有的。

當時，依我的意見，明朝政府只有兩種可行的政策：一種便是把西方侵略者逐出南洋羣島，並且切實經營，防止西方強國再來；另一種便是深入瞭解闖入亞洲的西方侵略者，與他們進行文化交流，從而制訂應付西方國家的確切的政策。第二種政策是後來的日本所採用的。天主教的傳教士在當時，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說是西方文化的代表，不管明朝政府準備採取何種政策對付西方侵略者，和這些傳教士的接觸都是必要的——不管是如何地無可奈何。

必須非常重視的是：即使在無敵艦隊慘敗之後，西班牙在傳教工作上表現出他們在精神上還是進取的，對他們所未知悉的和未能進入的領域，尙帶着極大的興趣。相形之下，明朝政府表現得很保守而無能。

由於基督教是西方文化所表現出來的形式，所以西方的藝術有許多帶着極濃厚的宗教彩色，甚至有許多藝術品，可以說是純粹爲了宗教的目的而創作的。

當西班牙人把天主教傳入菲律賓的時候，必定要在所抵達的地區，搭建小禮拜堂以便舉行各種崇拜的儀式。這些小禮拜堂常常以茅舍開始，再逐漸發展成爲以石塊和水泥建築的。這種教堂多半都是華僑所承建的，不過經過了年代的腐蝕和頹壞，這些古老的教堂極少數能至今猶存。教堂中的聖像和裝飾，在最初期大部份是華僑的創作，到了後來，才有一部份自墨西哥運入。沙拉利的信中說中國人很快地便學會了雕塑聖像的手藝，這可以說是菲律賓天主教藝術的開端，也可以說是使菲律賓的藝術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

段。先前菲律賓的藝術品，多半是受印度影響的雕像和圖案，後來又有一些回教的藝術傳入（回教的影響主要地還是在蘇洛和峴蘭佬，它對呂宋和未獅耶的影響並不太深。）。

中國人以他們所熟悉的觀音菩薩的形象雕塑聖母馬利亞，把耶穌和他的聖徒都雕塑成爲東方人的模型。這些聖像有許多是用菲律賓的硬木雕成的，如果不是特別照顧保存的，到了現在當然是大部份都已經爛壞了。許多保存在古老教堂中，華僑所創作的雕塑和宗教裝飾品，絕大部份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損毀。

儘管這些宗教藝術品帶着顯著的中國影響，但是它並不是中國文化在菲律賓的複製品，在本質上它是完全屬於菲律賓的一種文化。這些爲天主教堂雕像和裝飾的中國人，並不是中國的藝術大師，他們並不是把中國藝術販賣到菲律賓來。正確地說，他們是在菲律賓創作出一些真正屬於基督教的藝術，因此這些藝術品，可以說是帶着濃厚的中國色彩的，在菲律賓產生出來的基督教藝術。也說菲律賓在基督教文化影響下，最初產生出來的文化結晶。

我不準備在這裏討論菲律賓藝術史的問題，不過有一個菲律賓藝術的民族形式的基本問題，却不能不談到。西班牙統治的末期，產生了許多菲律賓民族革命運動啓蒙時代的藝術作品，這些作品有許多比較上實在是更屬於歐洲的。這個時代的這一羣菲律賓知識份子，包括一些重要的改良主義者，把許多西歐的藝術風格，搬到菲律賓來複製（其中有一些是優秀的，有一些是粗劣的）。從這個時候開始，菲律賓的藝術，便帶着異常濃厚的歐洲色彩。

但是，一個民族的藝術品，如果要充份地表現出其民族的特性，它必須是在民族的傳統根源上建立起

來的。因此，菲律賓藝術的民族形式，必須從土著民族的粗糙的原始藝術品，從三佛齊和滿者伯夷的藝術結晶（這些結晶有一部份保存在今日的爪哇和蘇門答臘，有些已達到了相當高度的水準。），從印度文化和回教文化影響下所創造出來的西方人到來以前的藝術品，從受到濃厚的中國文化的影響的菲律賓基督教早期藝術品的基礎上，再吸收最近三四百年來所受到的西方藝術的薰陶而建立起來的。只有在這種基礎建立起來的菲律賓藝術，才真正地表現出菲律賓的民族形式。

當我們看到許多菲律賓的基督教藝術品，嚴格地說起來實在是舶來品的時候，中國人可以毫無愧色地指出，菲律賓早期的基督教藝術品，是帶着濃厚的中國色彩創作出來的。沙拉利在他的信中所寫的：「我想沒有什麼會比我所看到過的，他們所製成的一些聖嬰耶穌的大理石塑像更精美了。」也許對這些菲律賓的漢族藝術家多少有點過獎，但是從一些現存的記錄和宗教藝術品的收藏考察起來，菲律賓的早期基督教藝術，是漢族移民的創作，倒是完全不成疑問的。可惜在這個基礎上，並沒有發展出菲律賓基督教藝術的民族形式。後來的基督教藝術，在實際上成爲脫離菲律賓民族源流的舶來品的架空點綴。

完全不是說得過份的，這是一項漢民族對菲律賓所作的、有長遠意義的重要貢獻。菲律賓華僑最好能够儘量搜索這些正在迅速消失中的、華僑先代所創作的藝術品，加以整理，精印成冊，也好爲華僑所創作的菲律賓文化遺產，保留一些記錄。在亞非民族運動蓬勃發展的今天，這項工作對建立獨立的菲律賓民族文化，將會是很有意思的。

菲律賓華僑在西班牙統治的最初期，不但是從事菲律賓對外貿易的商人，而且也是菲律賓最重要的生

產者。中國人爲菲律賓帶來了，在當時並不比歐洲落後的，全世界最先進的生產技術。因而使菲律賓成爲當時西班牙極其遼闊的殖民地中最先進的。中國所傳入的生產技術，很可能使當時菲律賓的生產力，站在西班牙美洲的前面。因此沙拉利在信中所寫的：「這個八連大大地美化了本市，使我不猶豫地向陛下確言，沒有其他在西班牙或在本區域中的已知的城市，擁有像它那樣值得觀賞的。」顯然不是沒有道理的。馬尼刺市初建的時候，大部份的建築師和熟練的建築工人都是中國人，中國不但傳入了中國的建築技術，而且也供應勞動力。

當時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先進的中國生產技術的傳入，是在極大的程度上，爲菲律賓人民奠下了有利的發展條件。這種講法，我想，對全南洋羣島都是適用的。如果沒有先進的中國文化的影響，南洋羣島的土著的遭遇，會比美洲紅人好了多少、實在是大成疑問的。

中國移民的先進生產技術，使處於西班牙直接統治下的菲律賓地區，發展出在當時的世界中，可以算是頗爲先進的生產力，同時也爲菲律賓經濟帶來了繁榮。當然，不能否認，除了中國生產技術之外，還有西班牙由美洲輸入的資金的刺激。

西班牙人所帶來的資金，只是花費在消費品上，因此使菲律賓華僑開始集結了菲律賓原始的商業資本累積。這一筆資本累積的不斷發展，使菲律賓華僑一直擁有雄厚的金融力量。這是南洋的殖民地國家共通的特點。

今天，當我們看看黑暗的非洲大陸，想想那些慘遭屠殺的美洲土著；和今日南洋羣島的土著的境况比

較一下，漢民族的移民及其先進的文化，也許不是沒有作用的。

第七章 拉示馬仁迎示總督與華僑英雄潘和五

G·P·拉示馬仁迎示 (Gomez Perez Dasmariñas) 於一五九〇年 (萬曆十八年) 就任西班牙駐菲總督，他是在馬尼刺西班牙代表會議向腓立二世及其殖民地理事會，呈交請願書以後，派到菲律賓來的第一名西班牙總督，他帶來了許多腓立二世根據該請願書而頒佈的敕令和指示，禁止菲律賓華僑經營零售業的敕令，便是由他帶到菲律賓來的。

西班牙和菲律賓的歷史學家，常常把拉示馬仁迎示總督估計得相當高，使他一向被認為是一位有才能的行政者。我當然無法在這裏詳細討論他在菲律賓的政績，但是他的死却成爲中菲關係史上，和菲律賓華僑史上的大事件，他是唯一被菲律賓華僑刺殺的西班牙駐菲總督。因而使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在他執政時期的對華政策。

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智識份子梁啓超在他所著的『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飲冰室專集之八)中，把領導刺殺G·P·拉示馬迎示總督的潘和五列在附錄中，稱他爲「菲律賓寓俠潘和五」。梁啓超所列的八大偉人，主要地都是南洋羣島上漢族移民的領袖，他寫道：

「八君子之見擯於中國歷史，其毋乃即中國民族見擯於今日生存競爭界之表徵也，吾述此，吾有

餘痛焉耳。潘和五不足語於殖民事業，抑其義俠智勇，有足多者焉，冀附於八君子後傳之。」

梁啓超和康有爲譚嗣同皆爲戊戌政變的健將，如果把中國革命在後來的發展暫時擱開不加討論，梁啓超在戊戌政變的時代，畢竟是完成了他一定的歷史事業。帶着「吾國若猶有能擴張其帝國主義以對外之一日」的期望，認爲「海以南百數十國，其民口之大部分，皆黃帝子孫，以地勢論，以歷史論，實天然我族之殖民地也」。

當時的梁啓超是頗有一些帝國主義思想的，他希望中國能步列強的後塵，整軍經武向外擴張，以與列強爭一日之長短。不過，戊戌政變諸君子的思想體系固然存在着嚴重的缺點，但是他們在歷史上所建樹的業績，却是不可無視的。梁啓超在「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中，所表現出來的對南洋羣島的漢族的移民領袖的態度，可以說是相當獨特的，潘和五也在梁啓超的這篇文章中，開始獲得他在歷史中的適當地位。因爲這個原因，在我開始討論到潘和五的事蹟之前，不能不接觸到梁啓超的這篇文章，儘管他的思想中的帝國主義部份，現在已不適宜了。

在直接討論潘和五領導刺殺G·P·拉示馬仁迎示總督以前，我要先涉及G·P·拉示馬仁迎示的一些對華政策。G·P·拉示馬仁迎示於一五九〇年就任，一五九一年年初，他頒下禁止土著穿用中國織物的法令。在討論這項法令之前，我要先把有關此一問題的文件譯出：

禁止土著穿用中國織物 「皇上陛下在這些島嶼的總督和將軍G·P·拉示馬仁迎示致書給你，邦邦牙（Pumpanga）省及其外所屬的地區的省長（Alcaldemayor）Juan de Aicega，以及你

的代表：

「你要知道在數目前，馬尼刺市頒佈一條我所批准的法令，因着該法令上所提及的許多原因，禁止這些島嶼上的番人士著，穿着來自中國的絲和織物。爲了要調查番人是否能自該法令獲得任何利益或好處，某種對神的忤逆及其他的濫越是否得以避免；是否有任何原因可使該法令的施行應暫時停止；所以我現在，在這些人面前，由於前面所述的那些理由，委任和命令你，去向西班牙人和番人的證人搜集訊息，根據所附上的問題審查該法令；以便使皇上能够獲悉所發現和確斷的事實，並得隨其所欲頒發命令。發於馬尼刺，一五九一年四月九日。

G. P. Dasmarinas

奉總督命簽署：Juan de Cuellar

與原文對照無誤：

Felipe Ramirez，公證人」

「由於，馬尼刺市，於本年三月三十日，頒佈禁止土著穿着來自中國的絲和織物的法令，因着該法令上所指的許多原因，這是對在這些島嶼上，建立一般的公益和良好的政府很重要的；我們，馬尼刺市的政府和 Cabildo，認爲該法令必須呈交于皇家殖民地理事會批准，以便使那些原因，及可能存在的其他原因，能獲得皇上的認可。我們請求閣下，根據附上給你的問題供給我們以情報，該情報的正式副本，將與該法令同時轉繳皇上陛下；爲了是項目的，及其他。

「證人應該被問以，他們是不是知道，當西班牙人最初發現這些島嶼的時候，所有的土著除了本島所製造之外，不穿任何其他的衣着，種棉花並織布供他們自己應用，並且於西班牙人在羣島上定居許多年後，仍舊繼續如此；他們是否知道每年來自中國的一兩隻船，是否運布或絲到這些島上來。這些（商品）並未在土著之間售賣；這些船上所運來的，只有陶器、角製品、草藥，及其他不關重要的瑣細之物。同時，是不是到了西班牙人在此定居之後，中國人才開始增加與他們的貿易，才有許多船裝載着布到這些島嶼來，土著才棄掉他們自己在先前所應用的，開始穿這些來自中國的布所製的衣著；這項應用是否已經達到了如下的情況，即土著沒有一年不買二十萬件以上的棉和絲的袍作他們的衣著，在目前，它們可達同樣多的披索（Posos）——而在不上數年中，除非這項（對我）有害（的貿易）被反對和制止，其值將會加倍。因為土著是一個不熱中於聚積更多的財產，以留給他們的遺族的人民，但他們把所賺到的一切，花於食物和酒和衣料上，而且因為每人每年所需的不過是一兩件衣料，他們不管這些衣著的便宜或昂貴，便付了所討的價格；因而使價格漲得太高，一件最初能够以二Reals買到的衣料，現在的售價是十Reals，不久，它將會值二十Reals。」

「同時，他們是否知道，由於前面的問題所列出的原因，造成了對這些島嶼的嚴重損失，並且損害了皇上——中國人先前在他們所運入的布料所得的付款上，僅自這些島嶼帶走三萬披索的錢幣，而現在，由於土著的胡鬧和奢侈浪費，帶走了二十萬披索，這是不是真的。這些錢違背了皇上的敕令，離開了皇上的領域，被帶到外國去；如果這些土著不穿著這些織物，這將是可以防止的。」

「同時，自從西班牙人在這些島嶼上與中國人進行貿易以來，土著是否放棄了對土地的耕作，而且不單是指棉花的耕種，而且也指米、酒、及其他本國的產品；並使自己染上了惡習和怠惰，不願意工作。因為，只要國內有西班牙人帶到此間來的錢幣，由服役的償付及由許多其他的途徑，有一些會流入土著的手中。於是土著們發覺中國人所運入的織物方便可得，而且又有錢可以償付，便不願工作和耕種他們的土地，並變成遊手好閒，男的女的都是一樣——求取西班牙人的歡心，對上帝犯了和作出無數的忤逆。因為土著有偷竊和淫亂的癖好，女人們隨時準備出賣；因為這個原因，男女之間過於親密。

「還有，履行了這條法令之後，上述的罪惡和不法是否便會消滅。因為土著將要工作，於是本國將會有豐盛的果子和供應品，而且與前此一樣地，有很廉的價格，從而本國便可得維持；中國人現在由銷售供應品——如麵粉、糖、豬油及其他——所帶走的錢，將不會再被帶走。況且，土著將穿著自己的織物，那是比那些來自中國的，織得更好而且更經濟的；而除了他們自充衣料之用外，還將有一些是被西班牙人所購用的；另一大批錢幣將會留在國內，現在是因為土著沒有製造這種衣料而被帶走。另一項罪惡也要終止；土著將不再售買生棉花給中國人，他們將它帶回其本國，再製成布料，又運回來售賣給土著們，再用這些貨品奪去他們的錢幣。最重要的是，上面所說的忤逆上帝的罪惡將會至此結束。

「還有，這條法令的施行，是否會使土著和中國人，和先前一樣地，不用錢幣地貿易；因為如果

土著願意在島上進行或貿易易貨（這對他們並不禁止），他們將會如同先前一樣地，以像 *Stigbee*（一種小而白的蝸牛），染料木材，和水牛等貨物換得商品；並使中國適應此種的貿易形式，於是錢幣的外流將會終止。

「同時，這些島嶼是不是全部，或其大部份，可適用於棉花的種植，並會使土著在決定要進行此一事業時，能够生產足以供應一切島嶼的足够的供應品和布料；布料是否可能製得和來自中國的一樣好，或者更好，並且有剩餘可運銷新西班牙，以換得必需品，並有大量剩餘的棉花，可用以交換中國的器皿；是否還會有像現在那樣多的錢被帶離本國。讓證人說出他們對這個問題所懂得的；上面所述的事實是否醜名昭彰或遠揚，是否成爲大眾所討論和報告的事項。

「一五九一年五月十三日，在菲律賓羣島，邦邦牙省的 *Magolor* 村，皇上陛下在該省的省長 *Juan de Alcega* 上尉宣告，由於馬尼刺市的政府，*Cabildo* 和長官，爲了該市的政府及利益，以及爲了國家的利益，除了其他法令之外，因着該法令所指的理由和困難，製訂了一條禁止這些島嶼的土著穿着來自中國的絲和織物；並且因爲在這些島嶼中執行和遵守該法令，是非常公正和適宜的，國王我主在本島上的總督和將軍，仙爹戈的武士 *G. P. 拉* 示馬仁迎示，以皇上的名義批准了該法令。但是因爲 *唐·道明俄·黎·沙拉利神甫*，這些島嶼上的大主教，以作爲土著的保護者的名義，以它將會損害土著爲理由，抗議反對該法令，而將軍代表這些土著，爲了使事實得以確立，在本訓令上作了這些聲言。同時爲了欲確斷該法令的執行，是否將終止上述的困難，抑或是該法的實施，將會如他們的保護者

，上述的主教所說的，損害這些土著，我由是下令進行調查，並根據該Cebildo送來的問題審查證人。

簽署：Juan de Alcega

在我的面前：

Felipe Roman公證人】

證 言

「於上面所指的年份的五月十四日，在該省的Cubao村，該省長爲了上述的調查，使Cubao村的首長和總管 Don Nicolas Ramos來到他的面前——依照合法的方式發誓，並在Domingo Biral翻譯幫忙之下，指着十字架答應要講實話，並依調查的目的向他提出問題，而且作如下的證言：

「在回答第一個問題的時候，這個證人說他知道當西班牙人來到並發現，安定和居住於這些島嶼以前，先前所有的人民，以及自該時起所發現的，該證人所知悉的所有的土著——酋長，Timaguas（自由人）和奴隸不分階層地織着棉布，全是用他們所種的棉花，並自己以它作衣着。在事實上，就這位證人記憶所及的，他認爲他從來未曾知道棉花曾經在本省種植或收穫過，馬尼刺的沿海岸和沿河岸，自甲米地至本省都未曾有過；但是除此以外，所有的其他部落都種植棉花，大量的（棉花）被收穫，並售賣給本邦牙省的居民，以及馬尼刺那些沿河和沿海岸的居民，他們用他們所種植的米交換，有時候也用金；他們爲了紡織而購得棉花，並織供他們製衣裳用的布。這種習慣在西班牙人到來以後

繼續數年；因爲，雖然在那個時候，每年有一二隻船來自中國，這些船並沒有運來布疋或絲，而只是運來鐵、陶器、和 Camanguan。馬尼刺的打加鹿人，和本邦邦牙省的所有的居民，所以從來未曾種植棉花的主要理由，是因爲他們不知道要怎麼樣種；因爲他們除了種米之外從不知道種植其他的作物，他們賴米以爲生。這是他的答覆。

『在回答第二個問題的時候，這個證人說，自從西班牙人到這些島嶼上定居之後，他察出中國人如何每年大量地到此間來，每年至少有八條船自中國來。在有些年份，這個證人曾經看到過廿隻至卅隻，全都載滿了布疋和絲。當這些島嶼上和本省的土著，看到中國人所運來的這一切布疋後，便不很努力去織他們自己的布；爲了要避免這輕微的工作，所有的土著便開始穿着來自中國的織物，完全拋棄他們先前所穿的自己的織物。以至今日已經全部一樣——不分酋長或 Timangua-Timagua 或奴隸——都穿着這種織物，以致無法由衣着看出他們的階層。大量的布疋被如此消耗掉——據這個證人看來，數量比在問題上所提的更多；他確然斷定，如果這項傾向沒有被制止和改變，這些織物的每一樣的價格，將會在數年內加倍；現在，即使那最便宜的也不在一披索以下。因爲這些島嶼上的土著並不聚積錢財，而將它花於食物和衣服上；由於並沒有一名土著，不管他的階層多高，每年所需的不會超過二件至三件衣料，爲了要避免紡織的勞作，以便使他們在閒散中消磨他們的時光，他們寧願向生理人購買，不管貴廉，不猶豫亦不在意地付出所討的價格。結果是每樣東西都越來越貴；因爲一件在最初時平均值三或四 Reals 的衣料，正如已經說過的，現在值十 Reals，而且除非這種升漲被制止，

不久便要值二十Pais——這個原因在問題中已經提到了。這些問題應該被考慮及，而且找出一些改善的方法，以避免更進一步的困難。這是他對這個問題的答覆。

『對第三個問題，他回答說，由於前一個問題所列的理由，已經而且正在遭遇到頗大的損害，除非西班牙人和本國的居民，採取一些制止和補救的辦法，將會繼續使這些島嶼受損害，不管是西班牙人或土著，特別會損害到對皇上陛下的服務；這些損害包括在實際上，中國人以自他們本國所運來的商品所交換的，從這些島嶼至多帶走了二萬至三萬披索的錢幣，而在今日——由於所有的土著都够奢侈地買他們的衣料，因為他們可以不必再製造它——這些商人自本國取去了問題上所提及的全數的錢幣，或甚至更多。他們自皇上陛下的領域取去這些錢幣，而且從不返回。如果土著被禁止購買上述的衣料，並且再穿用他們以前所習慣穿用的織物，這現象是可以避免的。這是他對這個問題的答覆。』

『在回答第四個問題的時候，他說，在西班牙人到來以前，住在他們的村落中的所有的土著都耕種他們的作物，和照顧他們的葡萄園（西班牙文Vino，這是譬喻的用法，應作酒園，菲律賓人以椰子和棕櫚科的植物製酒。）以便釀榨他們的酒，其他的人種植棉花，飼養牲畜和豬，因此所有的人都在勞動着；況且，酋長受到服從和尊重，全國都獲得良好的供應。但是這一切都在西班牙人到來之後消失了。因為自從他們到來以後，番人便染上了惡習和閒蕩，自一個村落飄蕩到另一村落以避免工作，同時縱容他們的惡習——這是因為，看到了西班牙人有許多的錢，他們迫切地要為他們工作。發現只要靠一日的工作，他們便能够得到錢幣，而且還能得到食物和衣料，便再沒有什麼可以誘導他們回到

他們的村落中去耕作田地，飼養牲畜，如同先前一樣地工作。這種情況在這些島嶼中已經是很普遍的了，每當企圖迫使一名土著工作的時候，他便立刻逃匿，而且到處流浪，一直跑到一個可以讓他閒散下來的地方，他才停下來。如此便造成了在問題中所列舉的害處，這是一個需要補救的情況。這便是他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對第五個問題他說，如果該法令能得到恰當的執行，這個問題中所提到對上帝我主的一切的罪惡，困難和忤逆，都會消滅；因為所有的土著將需要工作，這個國家將有農作物和糧食的充份的供應，並且有足够的剩餘以維持全體的土著和西班牙人，正如生理人到來一樣，而中國人現在由這個國家運到他們的國家去的錢將會留在這裏。在事實上，如果這些商人完全停止來此，這些島嶼將不會缺乏供應品；至於衣料，土著可以穿用他們自己的織物，那是比那些從中國運來的三倍好的；除了用以製作自己的衣服之外，他們尚可大量生產以與西班牙人交易；於是將有極大量的錢幣留在本國中，全國將因此而富裕和繁榮。這種情形迄今未能實現，因為土著爲了上述的原因，並不如先前一樣，織造他們的織物。而且除此之外，還會終止生理人收買棉花，再帶到他們本國，織製成布，然後再運入本國銷售的極大的損害。最有利的，是這將終止在問題中提及的一切的罪惡和害處，而一項補救的辦法是對此最重要的。這便是他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對第六個問題他回答說，問題中所講起的，關於西班牙人到來以前的中國人及與他們的貿易都是事實；這些事是這些島嶼上的慣例。在那些沒有像問題中所提到的那些商品的土著，他們以米和金

償付，這是對中國人很有利的。如果他們繼續到此地尋覓與土著的貿易，以問題中所描述的方式，是對雙方都很有利的；中國人將不能再自本國提去他們所逐年帶走的大量錢幣。他對這個問題作如此答覆。

「在回答第七個問題的時候他聲稱，在這些島嶼上所被發現的一切部落，都會種棉花，而土壤也很適合此種用途；但是這些省份和那些長米的地方的土著，都曾經而現在則不願意種棉花，因為他們害怕會毀掉米的種植，這是他們最主要的食糧。但是這位證人確言，如果他們願意，他們都會種棉花，因為它是一種不必像種米那樣操勞的作物；如果至少由打加鹿番人種植棉花，他們可說是最懶惰的，便能夠收穫到大量的棉花。他們可以此為他們自己的衣裳，製造質地極佳的布，甚至還可以製造一些供西班牙人應用，他們初到這些島嶼的時候就是穿用這種衣服；還有許多剩餘的可以運赴新西班牙；而且還會有很大量的剩餘棉花，可用以交換他們所冀望的任何物品。這一切都是大眾所清晰知悉的事實，而且成爲公衆報告的事項。該證人重申他的證言，而且予以堅持。他沒有簽名，因為他不懂得寫字，而看來約有四十歲。

由翻譯員和省長簽署

Juan de Alcega

Domingo Birral

在我的面前

Filipe Roman公證人

「在前述的事項發生後，省長使Cubao村的番人酋長Don Juan Lisin來到他的面前，他依着前述的翻譯員讀誓詞，並依照法律宣誓，並在誓言中，依調查的目的向他提出問題，而且作如下的證言：

「在回答第一個問題的時候，這個證人宣稱，他知道當西班牙人發現並平定這些島嶼的時候，此地所有的土著——特別是那些在本省的，正如這個證人所看到的——除了他們自己織的布以外，不穿其他的衣服，其質地是非常好的；他們也不願以來自其他國家的織物代替。雖然有一二隻船來自中國，這些並沒有織布來，而只是應用碟子、角製品、鐵器、和Camangian，他們用米和金以及棉花交換，那是在此地生長的。他如此答覆這個問題。

「對第二個問題他說，由於西班牙人在馬尼刺市內居住，生理人——他們曾經於各個不同的時代在此地建立殖民區——看見國內有西班牙人，他們帶來了與此地前此所應用的不同的錢幣，便開始增加他們的船，每年都比以前增加更大的數目。其中織有極大量的供應品到這些島嶼（雖然這些是本國所不需要的），以及許多緞布、花緞、和條紋緞、以及其他細緻的絲綢，還有大量的棉布、白的和色的。以至使這個證人知悉有一年中，有多至廿隻的船抵此，他並且知道有一個時期，單單馬尼刺河便有八隻船進入。此外，還有許多到Pinados，他們把那個地方叫做Pan、宿務、蜂牙絲蘭、怡佬戈、和加牙耶。當邦邦牙和這些島嶼其他地方所有的土著——米獅耶人和打加鹿人——看見生理人所帶進來的大量的布料，而且又是很便宜的，他們都不願意依西班牙人到來以前，和生理人運布給他們的

先前的慣例織布。爲了避免這項勞作，即使是很少量的，所有的土著都要買他們的織物作衣料，而完全放棄他們所有的，那是他們先前所穿用的。結果是正如這個證人所知道的，本省的全省都不織布；每當酋長，Timagua 或奴隸需要衣着的時候，他便直接到馬尼刺去，中國人在那裏有他們的市場，向他們購買。此種作爲的另一個結果是這樣的：正如所有的土著——酋長，Timagua，和奴隸都是一樣——穿着這種生理人的衣裳，奴隸和酋長一樣地，不能分辨出他們誰是酋長。有大量的衣料被應用了，在這個證人看來，數量甚至比問題中所指的更大，而不會更小。如果這項罪惡沒有很快地被阻抑和補救，這個數量將會大大地增加。因爲土著們都被迫要向中國人購買，每一塊這一類的布料，不管是多麼沒有價值的，都要值一披索或一披索半。如果容許它更進一步地發展，經驗顯示出衣料的價格每年都要增高——因爲這些島嶼的土著，當他們有錢的時候，便把那些有限的錢花在食物和衣料上；而不保惜他們所已有的衣服，他們購買他們所需要的——爲了不必織造，正如這個證人所說的——付出所討的價格。即使最有地位和最有錢的土著，也發覺一整年只要有三塊布就夠了；他買這些，不管便宜是貴，從來也不猶豫地用他們所討的價和他買賣，而不是加以織造——雖然他們無須多大的勞作便可以輕易完成。如果這種情況被容許，所有的貨物都會如前所述的，逐日升漲。一塊這個證人所知悉的，而且親自買過的衣料，先前以三至四Reals售賣，今日則以八至十二Reals售賣；不久它便將價值廿Reals，如果不加以制止或補救的話。這是他對這個問題的答覆。

「對第三個問題他回答道，正如所列舉的，問題中所指的罪惡。這個證人說，去年生理人帶三千

披索以上的錢回他們的國家，這是他知道離開了這個領域的。這項罪惡應該受到糾正；補救的方法是
在於禁止所有的土著，爲了他們自身的應用購買任何衣料，並要求他們織造衣料，正如依他們先前的
慣例所爲的。這是他對這個問題的答覆。

「對第四個問題這個證人宣稱，他知悉自從西班牙人在這些島嶼上與中國人貿易以來，土著便開
始背離他們的村落——有些人離開他們的稻田，其餘的則離開他們的葡萄園（應作酒園，見前註），
或所種植的棉花，生活在閒散和遊蕩中；其中有些替西班牙人服役，其他的則替中國人。這一切的結
果是使他們的道德頹廢；因爲，他們的服役得到錢幣的償付，正如在問題中所說的，有了生活，他們
便向生理人購買布料，放棄一切的勞動，受到西班牙人的鼓勵和寵幸；如此導致對上帝我主的忤逆，
正如在問題中所提及的——那是數量很大的，因爲土著很多；除非迅速加以補救，這些罪惡將會逐日
增加。這是他對這個問題的答覆。

「在回答第五個問題的時候，這個證人聲稱，他知道如果問題中所指的法令，嚴格地加以執行，
前面所述的忤逆上帝的罪惡，將會全部終止；該法令如受到遵守，所有的人都要工作，正如他們在西
班牙人到來以前所爲的。於是這個國家將會獲得維持，並充份地獲得各種必需品的供應，現在所流出
的錢幣將會留在此間，土著將會富裕；除此以外，土著將會再織許多布，並用它製衣服，而那是比來
自中國的好三倍的。也將會有大量的布可售賣給西班牙人，而且有更多供他們自己應用，正如生理人
開始運商品到此地來以前。於是將有大量的錢幣留在這個國家中。對這個國家是巨大之需要的這一

的利益，因為如此一項對全國有利的公正的法令，不早一點制定而受虧損。同時，本國至此所受虧的另—巨大的罪惡將會終止——那便是中國購買棉花再運到他們的國家中。問題中所提到的其他濫越也要終止。這是他對這個問題的答覆。

「對第六個問題他說，其中所含的建議對這些島嶼的土著和對中國人，是很公正的；如果他們繼續到這個國家來（那是不必要的），並樂意以他們的商品，交換在問題中所列的貨品——而以此為滿足；因此他們在西班牙人到來以前是如此交易的，並且很滿足地離開。於是將終止迄今自本國帶走的外流的錢幣，而且如果不加以補救，將會繼續帶走。這是他的答覆。

「對第七個問題他回答說，這些島嶼的全部，除了本邦邦牙省，以及加俞必和干打掃，和馬尼刺的河岸同海岸——所有其餘的，根據那些探訪過這個證人的人所說的，都適宜於種植棉花；如果土著被誘導以種植它，將可能大量生產，甚至足以供應那些不種植棉花的。於是將有許多布料可為土著所應用，比來自中國的質地更佳；並將有剩餘的可運往新西班牙，以交換其他物品；而且還會有剩餘的棉花，以與西班牙人和中國人交易——雖然，正如已經說過的，禁止中國人運棉花往他們本國並沒有什麼不公。如此他回答這個問題。他在宣誓之下重申證言，說他這一切的證言都是昭彰的事實，而且是最新報告的事項，他簽署他的名字。他看來似乎有三十歲。

Juan de Alcega

Don Juan Lisin

Domingo Pirral

在我的面前

Filipe Roman 公證人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本書第一章中所引的曰諸蕃志麻逸條，便列舉吉貝爲中菲貿易中的主要項目。諸蕃志吉貝條記載曰：

「吉貝樹類小桑。萼類芙蓉。絮長半寸許。宛如鵝毳。有子數十。南人取其茸絮，以鉄筋碾去其子。卽以手握茸就紡。不煩績績。以之爲布。最堅厚者謂之兜羅綿。次曰番布。次曰木棉。又次曰吉布。或染以雜色。異紋炳然。幅有闊至五六尺者。」

馮承鈞校注本中並轉引Hirth和 Rockhill譯注曰：

「本條蓋採自嶺外代答卷六吉貝條。吉貝指草棉，卽 *Cossypium Herbaceum* Linne 是已。de Candolle 植物溯源三三三頁謂原出辛頭 (Sindh)。梵文名 Karpasa。中國載籍初名白疊或白氎。察合台突厥語 (Jagatai Turki) 名棉曰 Pakhan，疑其對音。後漢書一一六哀牢夷傳有帛疊：注引外國傳曰：「諸薄國女子織作白疊花布。」梁書五四高僧傳云：「草質如繭，繭中絲如細繯，名爲白疊子，國人多取織以爲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法顯佛國記作白氎。至六世紀時，又名草棉，曰古貝或吉貝，蓋從馬來語之 *Kapas* 之對音。梁書五四婆利 (Bali) 傳云：「其國人披吉貝如氎，及爲都縷。」大唐西域記卷二云：「其所服者，謂憍奢那 (Kansaya) 底及氎布等。憍奢那者，

野蠶絲也。」唐書二二二下，環王（*Campa*）傳曰：「吉貝，草也。緝其花爲布，粗曰貝，精曰麩。」案古貝亦有名古終者，本草綱目三六木棉條云：「木棉有二種，似木者名古貝，似草者名古終。」嶺外代答謂：「精好白色者朝霞也。」案新唐書二二二下，訶陵（*Tava*）傳云：「以白麩朝霞布爲衣。」殆爲此朝霞之所本。兜羅，乃梵文 *Dra* 之對音，此亦言棉。案棉花之輸入海南，相傳乃一名黃道婆者所爲。」

因此宋代麻逸國的主要輸出品吉貝，就是今日一般人稱爲木棉的貨品。前面引用的文件中所稱的棉花，應該就是這種木棉。就中國典籍考查起來，西班牙尚未入侵以前，菲律賓有一部份地區，進行着木棉和木棉布的生產是全然無疑的，只是不一定如西班牙人所說的那麼普及。

中國の木棉業自宋朝起才開始興盛，木棉的種植甚爲普遍，北自陝西，南至福建廣東，均種植着木棉。但是到了元朝，由於中國經濟中心的南移（參閱第二章），木棉業幾乎完全集中於南中國，至元廿六年（一二八九），忽必烈在浙東、江西、湖廣、福建設置木棉提舉司，由此可見，這些地方是當時中國木棉業的中心。

在西班牙人尚未入侵以前，菲律賓（至少是呂宋）是生產並輸出木棉的地方，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當時的菲律賓人懂得用木棉織布，也是可以確定的。不過，木棉紡織的先進技術，則很有可能是在中國人傳入的。可惜有關這一個問題的文獻記錄，現在已經很少看到。在歷史上有許多中國對南洋羣島所作的生產技術的貢獻，常常在茫茫的、然而實際上並不太長的歲月中消蹤埋沒了。

不過，前面的文件中所謂在西班牙人到來以前，中國商船運來非的商品中並沒有布疋，則完全是偽造的證言。除了前面所譯出的二件證言誓書之外，還有八件證言誓書，從這些證言誓書的幾乎完全相同，可以看出這些證言誓書在實際上是根據西班牙行政當局的意旨作出的。

西班牙佔領菲律賓以前的中菲貿易，在數量上遠遠不及西班牙佔領菲律賓以後，這當然是毫無疑問的。這種現象，我在前面曾經一再地指出過，是由於西班牙佔領帶來的旺盛的消費力所造成的。由墨西哥所運入的大量的錢幣，很容易地便在菲律賓造成通貨膨脹，商品價格的上升，在當時的情況下成爲無可避免的。

一方面是貨幣流通量的增加和消費力的提高，另一方面是西班牙侵略者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促成了人民的不願生產和土地的荒廢；因此菲律賓農村的生產力並沒有隨着消費力的提高而提高，相反地，却在西班牙人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之下退縮了。

農村的勞動力——人口，在西班牙統治的最初十年中，減少了三分之一（扶西·黎利：菲律賓人的怠惰，*The Indolence of The Filipino*）。黎利的這項估計會不會過份誇大，我沒有考證過，不過幾乎全部菲律賓的早期典籍，都證實了在西班牙統治的初期，菲律賓的人口有大量的削減。

勞動力的消滅無疑地會對生產力發生重大的影響，殘酷的剝削更使菲律賓人民失去了努力生產的理由，在當時的經濟關係下，菲律賓人民中只有瘋子才願意努力替西班牙人生產。於是，菲律賓農村的生產力退縮了。

不過，在同一時期中，城市中的手工業生產却是發展了，供應城市消費的捕魚業和茶園也發展了，這些手工業中，有許多是新興的，而且幾乎全部是華僑所經營的（捕魚業和茶園也是一樣），生產技術也大部份是由中國傳入的。

本來，呂宋島在南洋諸島嶼中，要算是比較落後的地區，因此它在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也要算是比較落後的。在呂宋島的較先進的地區中，這個時候大概已經發展到奴隸制度社會的階段，不過菲律賓的社會發展，並不是本書所要討論的範圍，這裏只是稍爲一提。況且，在菲律賓不同地區的社會發展，帶着極大的不平衡性，在當時呂宋島較先進的地區中，固然已經有了奴隸制度社會的出現，但是時至今日，保留着原始氏族社會的部落，仍舊散佈在全菲律賓一切的落後地區中。

由於西班牙佔領以前呂宋島的社會發展的落後性，決定了中國和呂宋當時的貿易，在數量上不會太大，儘管和先前比較起來，這項貿易在這個時候，已經發展到頗具規模的程度了。當時除了呂宋島所出產的少量的黃金外，貿易主要地是採取以貿易貨的方式進行的（黃金在當時也是被當爲一種商品而不是被當爲貨幣）。我在這裏專指呂宋島（應該包括未獅耶羣島的一部份），因爲蘇祿和眠蘭化在當時還沒有被征服，而且這些地區在西班牙人入侵以前，要算是比呂宋更先進的地區，更因爲這些地區與中國（及中南半島）有較悠久的關係，已經有頗大數量的中國錢幣在該地流通，使這些地區與中國的貿易，帶着比較先進的性質；這是西班牙人一抵達菲律賓就立刻發現的事實。呂宋島雖然曾經發現一些明朝的錢幣，但是數量有限，還沒有成爲流通的貨幣。

西班牙侵略者所運入的錢幣，使呂宋島上物物交換的貿易制度完全改觀；土地的圈封更不但是在基本上改變了菲律賓原有的土地制度，而且根本使菲律賓的經濟結構發生變化。西班牙式的封建殖民地經濟開始在菲律賓建立起來，西班牙的征菲功臣和權貴，以及天主教會，開始成爲菲律賓大片土地的領主。

菲律賓社會發展上的一項特色是菲律賓的封建制度，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外來侵略者強制建立起來的，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外來的侵略者，不是一個亞洲國家，而是一個西歐的國家。一個封建制度社會的經濟，不但是以土地爲財富的主要形式，對在這片土地上的勞動力的剝削，更可以說是封建經濟的基本特徵。土地的所有權，是封建社會的一切政治權力的泉源，即使是在精神具有極大之影響力的天主教會，也是將其權力建築於對大片土地之擁有上的。

由於這羣西班牙侵略者，不但在政治上是外來統治者，而且在經濟上是土地所有者，因此他們毫無顧忌地對菲律賓人民作最殘酷的剝削，他們在廣大的菲律賓人民中普遍地徵召役夫充當苦役和划船手，他們使在土地上耕作的菲律賓農人過度操勞以致早死，這便是西班牙統治菲律賓最初十年間，菲律賓人口大量減少的主要原因。菲律賓人民對如此野蠻的剝削，已經開始覺得無法忍受了，在西班牙統治的最初二十年中（一五七一——一五九〇），菲律賓至少發生三次大規模的武裝反抗，另有一次敦洛區大暴動的計劃被破獲。農村中的怠工，成爲西班牙統治下的一般生活現象，這種抗議性的怠工，在三四百年的異族統治中一直持續着，直到後來，甚至成爲帝國主義者誹謗菲律賓人民的口實。

與誹謗菲律賓人民天性怠惰同樣陰險而無恥地，西班牙行政統治者在菲律賓人民怠工抗議的初期，無

理地把這種現象歸罪於和平的中菲貿易，強詞奪理地指摘中國織物的輸入，是造成菲律賓人怠惰的原因。西班牙侵略者和地主，奴役和剝削菲律賓人民的殘忍和兇暴，不但受到了菲律賓人民合理的反抗，而且也為較有遠見的西班牙人所反對。這些主張採取較合人道的剝削方式的西班牙人，包括當時在菲律賓的重要神甫，其中最著名的為一向主張侵略中國的 *Martin de Rada*，和菲律賓第一任天主教大主教沙拉利。不過他們對西班牙的殘酷手段的批評，當然完全不是基於對西班牙統治制度的反對，他們的出發點完全是為了鞏固和強化這個制度。

一五八三年，大主教沙拉利寫了一件致西班牙國王及皇家殖民地理事會的備忘錄，這件備忘錄可以和前面那個禁止土著穿用中國織物的文件對照一下：

「首先，當西班牙人來到這些島嶼的時候，便有極豐富的供應品，都是在國內生產的；那便是：米、豆、禽鳥、豬、鹿、水牛、魚、椰子、香蕉和一些其他的果子、酒和蜜。這些都是可以用極小量的錢幣，向土著大量購買的。雖然在他們之間有一些黃金，他們利用它以交易和運送，然而直到西班牙人把錢幣的應用介紹進來以前，他們通常還是以食物換米的，（錢幣的傳入）對本國造成不小的損害。酒和米是用 *Gantas* 量的，這等於我國的度量衡中的 *Celamin* 的四分之一。

「在西班牙人傳入銀幣之後——一般地是 *Toston*，每個值四 *Reales*——貨品購買的價格為：（1 *Toston*）可買（四？）百 *Tantas* 的米，另 1 *Toston*，可買 1 百 *Gantas* 酒；再一個，可得十二、十四、或十六隻家禽；其他的可依比例而得。這些價格維持到一年半或二年前。這些產品在本國中

開始變得稀少了，先前在街上叫賣的貨品，現在達到了很高的價格，而且稀少得現在沒有人能獲得它們，即使他們到番人的村落中去搜尋亦得不到。因此四十或五十 *Gantas* 米 | *Toston*，或八至十 *Gantas* 酒 | *Toston* 成爲很普通的價格：家禽貴得每隻值二 *Reals*，雖然通常的價格只是 1 *Real*... 一隻豬依它的大小，值四至五或六至八披索。先前很便宜地買到的麻油、椰子油、和牛油，現在已經無法獲得了——雖然價格視市場數量的多寡而有所不同。

「我設法查考這項巨大變化和糧食昂貴的原因：在我充份地獲得知悉的人向我報告，及經過我親眼觀察之後，我發現如下的各種原因。第一：在 *Don Gonzalo Rongullo* 至此任總督的時候，這個國家中所有的地方，都有米、酒和家禽的供應。許多番人到怡佬戈的礦場中去，並在他們應該播種五穀的時間中留在那裏。其中有許多死在那裏，那些回來的人已是很疲勞了，他們需要休息而不能工作。結果，在緊接的一年，米極度缺乏，而由於它的缺乏，大量的邦邦牙的番人死於飢饉。單單在 *Luvao* 一個地方，*Guido de la Yaoures* 的封地上，便有千人以上死亡。

「第二，關於西班牙人徵用番人的許多職位中，如派他們充當總督和官員們因各種任務派出的帆船和 *Fragatas* 中的划船夫，這種位置是從不缺乏的。有時候他們到很遠的地方，以致有四個月至六個月不回家；有許多去的人死在那裏。有些人逃走藏匿在山中，以逃避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勞作。有些西班牙人徵用他們到森林中去伐木再運到本市來，又用其他的番人作其他的勞作，以致他們無法休息，也無法照管他們的田地。結果是他們種得少而收穫更少，而且沒有機會參加宗教的教導。有時候遭

些可憐的生物被教導要去洗禮，西班牙人強迫他們去作我前面所提到的工作；當他們回來的時候，他們已經忘掉了他們所學的；因為這個原因，許多番人直到今日還有待洗禮。在有些場合我到鄉村中行堅信禮的時候，我沒有爲任何人行堅信禮便回來了，因爲番人並不在該地，他們奉省長的命令工作去了，我沒有辦法使他們集合在一起。爲了要證明這一點，我夾上一件敦洛副官的命令。（當時我親自在該地，所有的人都不在，忙於作那委派給他們做的工作；村中所僅留的番人，是那些被教導要受洗禮的。）這件命令，命令該村所有的番人要去伐木，僅有那些要受洗可獲特免。

第三，在Don Gonzalo Ronquillo總督到來以前，這些島嶼一共只有不超過三名或四名的省長；而現在有了十六名，其中大部份是和他一同來的。由於他們來的時候很貧窮，而且由於薪水很少，他們在收割米的時候將番人帶走——這一切是證實了的，是一般人在講談的；然後他們購買所有其他的糧食，並在再售賣的時候大獲其利。這樣地使所有的東西都變得很貴，因爲他們禁止番人交易和運輸，他們以隨心所欲的價格售賣。先前番人把他們的產品帶到門口，並以廉價出售；他們得到小額的利潤便滿足了，但西班牙人却不是這樣。……

加諸土著身上的損害

「第一，每當進行長期的遠征的時候，他們便要遭受許多的虧損。其中之一便是派遣番人去充大帆船上或三桅船上的划船夫，船上的水手既不虔誠又沒有基督的情感。況且，盡人皆知的，是不問

番人已婚或未婚，他的妻子是不是在生病，他的兒子是不是沒有衣服穿，都一樣地被帶走。有一個丈夫曾帶副官去看他的妻子，她是有孩子的，並且流着眼淚哀求讓他留下來，因為沒有人可以照料她，該水手用短棍打她使她離開，那可憐的丈夫也受到同樣的待遇，儘管他反抗。在其他的情況下，他們的妻子在臨終前被撒下，而那丈夫被迫去划船。番人在大帆船上被縫起來，而且如同大帆船的奴隸或囚犯一樣地被鞭撻。還有，他們所得的報酬是很少的；因為每個人每個月僅可得四 *Reales*——而且這項支付是很不規則的，其中大部份從未見到餉款。那些徵得划船夫的村中的（官員）自行分贖，或者支給那些他們指為划手的人。這句話是完全確實有據的，因為當 *Don Gonzalo Ronquillo* 總督派人到 *Vitis* 和 *Lobao* 的礦中工作時，他們便自行分贖應該屬於番人的三千披索；當他派人到渤泥去的時候，在 *Bonbon* 地方，他們分贖了二千元以上。他們在全邦邦牙取得了五千至六千披索，在一切他們得到徵役者的社鎮中也一樣。

「有時候，他們並不在收穫的季節，去徵購據他們說是屬於陸下的米，而等到價格很貴的時候，他們再去要求他們以收穫季節的價格出售。有時候番人要以五六 *Toston* 購回他們以 *1 Toston* 售賣的。去年，當番人因為缺米而吃棕櫚筍和香蕉，且有許多番人因飢餓而死亡的時候，他們被迫以收穫季節的價格，出售所剩下的米。有時候番人的米被全部取去，不留下一粒穀讓他們吃。有一個貧窮的寡婦，看見他們帶走她所有的米，不留一粒穀讓她吃，便儘她所能做到的，裝滿兩籃的米藏在聖殿後面，因而得以保存；但是如果給徵收者知道了，他們無疑也要自該地將它帶走。

「另一件利用陛下名義，而加諸這羣窮苦人民身上的損害，於是使你的聖名在他們之間被憎惡，有如下述：先前，當米很充盛的時候，四百 *Cantas* 值一 *Toston*，陛下在邦邦牙的官員，依其所值的價格供應我。去年，總督下令爲陛下自邦邦牙徵收一萬二千 *Fanegas* 的米，並以每 *Toston* 三百 *Cantas* 的價格支付番人。許多番人死於飢餓。他們以一 *Toston* 支付的三百 *Cantas*，後來值六 *Toston*，而且想要買的人都無法買到。今年，因邦邦牙穀物太少而有大的飢荒，西班牙人很可以派人到其他地區去買米，到比較充盛的地方——雖然他們到遠一點的地方，而不致使番人受到損害。然而西班牙人並不採取這個辦法，却寧願再由邦邦牙取得。而且當番人之間的價格是每 *Toston* 五十 *Cantas* 的時候，他們要他們以每個二百五十 *Cantas* 的價格售予陛下。當這次徵購的時候，我剛好在邦邦牙巡訪，我看到在米被取掉的可憐的番人之間，有很多的哭泣和悲訴，這使我大感隱惻——而且因爲我沒有辦法提供補救而更感如此；雖然我寫信給總指揮，當時他是副總督，我並沒有因此得到什麼效果。

「至於徵購這些米的方法，是省長或他的副手在土酋之間分配了二、三、四或更多兩的金，並命令他們以每 *Toston* 多少 *Cantas* 的價格購米。後來，他們再派那些不虔誠的人去徵收這些米；他們用叱責、酷刑和囚禁強迫依命以每 *Toston* 二百五十 *Cantas* 的價格徵購；還有，在去年可買一百，今年可買六十 *Cantas* 酒，這項事實是確定了的，因爲我從那些徵購人獲悉，購者常常發生番人沒有所指的那麼多的米，便被迫要以每 *Toston* 五十 *Cantas* 米，或十五 *Cantas* 酒的價格購買；而他們自他徵購了每 *Toston* 二百五十 *Cantas* 米或六十 *Cantas* 酒。如果這件因米的問題而發生的事，是陛下在

本市的開支所必需的，它將只有一半的錯誤，雖然我不知道有什麼法律，容許他們爲陛下訂一個價格，再爲他人訂另一價格。……我知道有許多省長，接到總督的命令，向該社每名獨身的番人徵購三百 *Funogues* 的米，向已婚者則徵購五百，以前述的價格徵購，他們徵購的數量超過他們所被容許的，然後再以時價售賣。我知道他們也以爲陛下而定的價格，替他們本身和他們的朋友，徵購了大大地超過命令中所規定的米的數量。關於森林的採伐也是一樣。」

封建制度下，主要的剝削形式通常是稅貢和徵役，但是這種剝削方式是菲律賓人民先前所未曾理解過的。麥哲倫被擊斃之後，他的部屬在羣島中綁架一名土著的酋長，然後要求一些食物充贖金，這位土酋不但如數付贖，而且再贈送他們以其他的食物。當時和善的菲律賓人民，不大能够體會瞭解西班牙侵略者兇暴的強盜性格。

一五七三年菲律賓濱奧古斯丁教派的神甫們，向西班牙國王及其皇家殖民地理事會呈交一份備忘錄，裏面說：

「我們西班牙人在這個國家中成爲一種恥辱，我們的名字成爲可厭惡的，就使救主最神聖的名字也是如此，我們被認爲是他人的財產的僭取者，是無信義的海賊，是使人類流血的人，因爲我們苛待我們的朋友，蹂躪並難爲他們；對他們的家庭，他們的妻子，女兒和所有物作出許多強暴的行爲，而他們本身受到行動上和語言上的苛待。」

對西班牙人的殘暴，菲律賓人民只能喊道：

「西班牙人呀！我們的祖先對你有什麼虧負，讓你們這樣地來掠劫我們。」

結果是：

「許多島嶼和村落荒廢了，或幾乎被摧毀，部份地是因為西班牙人，部份地是因為飢荒，而這些飢荒的原因，或在這開始時的原因，都是西班牙人；不知是爲了恐懼或是爲了要驅逐掉西班牙人，土著疎荒了他們的耕作，當他們想要耕作的時候，便有苦惱到來，結果是許多人死於飢餓。」

由沙拉利和奧古斯丁教派的備忘錄中，充份地可以看出在西班牙統治初期，菲律賓農村中所受到的剝削的殘酷程度。加上這個時候的西班牙，又是一個正在開始腐化沒落的王國，西班牙的行政當局一開始在菲律賓建立之後，貪污賄賂便立刻隨之產生。除了前面的引文中所列舉的，西班牙行政當局在徵購米穀時所暴露的非法行爲以外，奧古斯丁教派的備忘錄又寫道：

「所有的，或大部份的西班牙人，當他們到村落中去的時候，都充當法官爲土著解決訴訟和爭端。他們因此而得到報酬，他們常常作不公正的審決，而袒護付款較多的一面。」

西班牙當局的貪污腐敗，不但是盛行在八連華僑區中（參閱第五章），而且也普遍地表現在對菲律賓人民的管理上。這是根據前面各章中所引舉的文件檔案，完全可以加以證明的。後來常常聽見有人指摘華僑導使菲律賓政府貪污，這是全然惡意的誹謗，歷史文獻完全證明了，西班牙侵略者在菲律賓所建立的，一開始便是一個貪污的政權。歷史上一切沒落的封建王朝都是貪污腐敗的，中國也沒有例外，中國政府的貪污腐敗，使到菲律賓的中國人，對腐敗的西班牙當局能够應付自如倒是真的。

誹謗華僑導使菲律賓政府貪污，是挑撥離間中菲關係的陰險手段；諸如此類的挑撥離間的手段，是西方強國一佔領菲律賓以後便開始使用的。西班牙侵略者在兇暴地剝削菲律賓人民之後，使他們不但操勞過度，而且飢餓而死以後，還要無恥地妄言中國運走菲律賓大量的財富。

黎利在「菲律賓人的怠惰」一文中寫道：

「在歐洲人到來以前，馬來種的菲律賓人，不但在他們之間，而且也與所有的鄰國有活躍的貿易。一種爲H. H. 博士所翻譯的 (Quionus, 一八八九年九月)，十三世紀的中國文獻，我們在將來還會談到這個問題，提及中國和這些島嶼的關係，純粹商業上的關係，書中說到呂宋商人的活動和誠實，他們帶着中國商品，到全羣島去銷售，經過九個月，再回去誠實地付款，包括那些中國人所記不清楚是否交給他們的物品。」

黎利在這裏所指的，無疑是諸蕃志的麻逸國條。宋元的典籍中，對菲律賓這一地區的記載一向很友好，中國人對當時的麻逸國是頗有好感的。

黎利在同一篇文章中又寫道：

「簡單地講，一切早期的史籍，都冗長地記述土著的工業和農業：開礦、淘金、織布、耕田、交易、造船、飼養牲畜，紡織絲綢和棉、釀酒、製造鎗械、採珠、磨貓業、角製和皮革業等等，都步步可以見到，考慮那個時代和島嶼上的狀況，證明那裏有生命、有活動、有行動。」

這個在勞動中發展生長的人民，在西班牙統治的初期，人口便因西班牙的壓迫摧殘而大爲減少。黎利

接着寫道：

「如果這還不足以解釋人口減少，以及工業、農業和商業因何被棄置，那麼再加上：「那些被處死的土著；那些留下他們的妻子和孩子，而不滿地逃入山中的；那些因為加在他們身上的稅而被售為奴隸的。」正如 F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 所說的。除此以外，再加上腓立二世譴責大主教沙拉利所說的：「有些由封地領主（Encomenderos）傳賣給別人的土著，那些被鞭撻至死的，那些因重荷而被壓死的婦女，那些在田地上睡覺和生養他們的孩子而被毒蟲所咬死的，許多被處死的，那些死於飢餓的，和那些吃毒草而死的……以及那些在生育的時候殺死她們的嬰兒的母親，」你便會瞭解為什麼在不到卅年中，菲律賓的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一。」

這裏道出了菲律賓生產衰退的實際原因，西班牙當局爲了要掩飾他們在菲律賓的罪行，強迫菲律賓人的地方領袖，作出偽證書。這些證書文件，一方面是爲了阻撓和平的中菲貿易，企圖由此刺激菲律賓的生產，以便自菲律賓人民之間，奪取更多財富；另一方面是要製造中菲之間的摩擦，激起菲律賓人民對中國的仇恨，從而緩和菲律賓人民對西班牙的反抗。禁止土著穿用中國織物的文件，可以說是西方強國挑撥離間中菲民族關係的第一件罪證，也可以說是他們在菲律賓人民之間散佈對中國的仇恨，以圖掩飾他們的罪行的第一件明確的證據。

儘管西班牙當局極其陰險地在散佈對中國的誹謗，菲律賓人民的怠工抗議却繼續下去，其實這是很自然的。黎利繼續寫道：

「在這許多災難之中，他不知道他能不能看到他所種下的種子的發芽，他們的田地會不會成爲他們的墳墓，他們的作物會不會被用來贖養他們的殺害者，於是，在菲律賓的居民的精神中被灌注了沮喪又有什麼奇怪呢？當我們看到當時那些虔誠而無能的神甫，爲了使他們那個教區的教徒自封地領主的肆虐中釋放出來，勸告他們停止在礦中工作，放棄他們的商業，打毀他們的紡織機，向他們指出天堂是他們整個的希望，替他們預備死作爲他們唯一的安慰，會覺得這又有什麼奇怪呢？

「人們是爲了一個目標而工作的。把這個目標拿掉，他便會懈怠。世界上最活動的人，一理解到令自己發奮便等於發瘋，工作會替他造成麻煩，並使他在家中受逼害，在外面面對海賊的貪婪的時候，他便會交起臂來。這個念頭好像從來就未曾進入那些叫喊菲律賓人怠惰的人的頭腦中。」

是的，菲律賓人民的怠工抗議是沒有什麼奇怪的，而且是完全合理的。令人感到奇怪的，却是今日菲律賓的所謂「民族主義」，並不是在尋找一個可以使自己發奮工作的目標，却正在遵循着菲律賓人民的逼害者挑撥亞洲民族關係的途徑，繼續使菲律賓人民理解到「令自己發奮便等於發瘋。」

對菲律賓的苦難的責任者，黎利在同一篇文章中寫到：

「我們曾經正確地說過，當一個家庭變得紛亂和無秩序的時候，我們不應該責斥最年青的孩子和僕役，而要責斥家長，特別是那個有無限權力的人。那個不能自由行動的人不應爲他的行動負責，而菲律賓人民並不是它的自由權的主宰者，不應爲它的不幸和厄運負責。」

企圖控制澳門 腓立二世承繼葡萄牙王位，兼任西班牙和葡萄牙國王之後，遠東的西班牙勢力，便

常常企圖取代葡萄牙在澳門的地位。在西班牙人看來，腓立二世始終是位西班牙國王，而事實也是如此。

葡萄牙人盤踞澳門與中國內地通商，並且利用它作為中國與印度和歐洲的貿易站。葡萄牙人在這項貿易中獲得巨大的利潤，這是前面所已經提到過的。腓立二世兼任二國國王之後，葡萄牙人便企圖使澳門的貿易擴展到墨西哥去。一五九〇年，曾任葡萄牙駐澳門總督的João da Gama，親率一艘六百噸的船自澳門橫越太平洋至Acapulco。但是當他的船抵達墨西哥的時候，他本人便立刻為西班牙當局所逮捕，船上的貨品全部被當為違禁品而加以沒收。不過在同年的七月，菲律賓總督也派遣一條船赴澳門通商，澳門的葡萄牙人也同樣地不歡迎由菲律賓派出的商船，至澳門進行貿易。

拉示馬仁迎示總督是以西班牙國王特派官員的身份，派遣商船赴澳門進行貿易的，同時攜帶他親自簽署的，交給澳門葡萄牙當局的書信文件。文件的第一部份是腓立二世所簽署的委任狀的副本，該委任狀規定拉示馬仁迎示總督的明確權力。拉示馬仁迎示就是要用這封委任狀，來向澳門的葡萄牙當局證明他此種貿易活動的合法性。由他本人所簽署的文件中說：

「指示的條款。國王、我主、委派我以是種權力，由聖上的手所簽署的聖諭敕令和指示的命令，其原件不能附夾在此，因為它被夾在與為皇上服務有關的其中重要敕令及秘密命令之中。有關的命令如下：「無論何時，只要你認為容許該羣島的居民，赴日本、澳門、及其他王國，或葡萄牙人的殖民區，或不信教者的地區進行貿易是最有利的，你便可以這樣做，不過要首先詳細調查在旅途中是否有什麼障礙或危險。」由於，為了將會在下面述及的原因，皇下陛下在即將出示的二項其他聖諭敕令中

所表達的願望，我們在此夾上一些文件的原文，其依次如下：

「國王致交 Don Gonzalo Ronquillo de Peñalosa，我在菲律賓羣島上的總督和將軍，或者於你不在的時候，致交主持政府當局的人或諸人。根據我在去年，一五八一年四月四日寫給你的信，以及你所已看到的同年六月十三日赴新西班牙的艦隊所遞送的書信，你必定已經聽到，由於最尊貴的，最有權力的，最高尚的國王，我的叔父 Don Enrique 之死（願他安息），我承繼了葡萄牙的王位；於是他的王國和我所已擁有的其他王國結合。由於這個原因，這些所有的人都成爲同一的人民，而你和葡萄牙人都是我的臣屬；而由於爲了更好地維護對我的服務，所有的人的一致及和洽是應當的，特別是在這些地區中——該地，由於它與此間的極大的距離，人們必須努力補救因每日所發生的事而造成的損失，不必再等待此間的命令，因其由就延所可能造成的困難——我命令你在每一個場合，不管是在一起或是各自分開的，你在你們之間維持友善的運系和一致，正如我所寫的，細心地彼此在一切的需要上，以至大的和洽和友誼，互相幫助，支持和保護，正如你們所應當做的。我提醒你要在一切的事項上，依着我對你的信任行事，以使在委交給你的事項上，不會有什麼疏忽，因爲這應成爲你最主要的目標。里斯本，一五八二年三月卅一日。」

國王

遵奉皇上的命令

Antonio de Herasso

國王致交 Don Gonzalo Ronquillo de Penafosa，我在菲律賓羣島上的總督和將軍，或者於你不在的時候，致交管理政府當局的人或諸人。你自我先前寫給你 and 現在所寫的信中瞭解，你以及在那些島嶼上居留的你的人民，和我在東印度的總督，及我在馬六甲的總督和將軍與其葡萄牙人之間，爲什麼應該有密切和友善關係的原因和理由；由於你們都處於同一地位上，由於你們都是我的臣屬，如果你們彼此交接、通訊和做朋友，並且在有必要任何場合互相幫助，將會使我得到多麼良好的服務。向你提醒這件事是很不必要的；然而，鑒於做到這一點是很重要和很合理的，我決定以這件事勉勵，向你保證我將會因此而極感喜悅。不論在馬六甲的總督和將軍，寫信求你派人去援助他們，你必須自那些島嶼上派出你所可能派出的人員，以便使他們得以安寧；當你有須要的時候，也應這樣做以爲預防。不管在何種情形下，你應該對這件事念念不忘一般地，而且知道什麼是可以而且應該做的，發出命令。因爲我信任你和你的智慧，並允准你在類似的情況下，派出一些軍隊和軍曹，你應該要求他們服從並執行他們所幫助的那些人，不管是書面上或口頭上的命令，以該族人（葡萄牙人）所習慣的良好的紀律和服從爲他們服務，不論是在進行遠征或軍事探察的時候。里斯本，一五八二年三月卅一日。

國王

遵奉皇上的命令

Antonio de Erasso

「知悉國王我主在事實上，樂意於在這些島嶼上的居民，和居住在澳門、日本及其他地區的葡萄牙人之間，有和洽、友善的關係，商業和貿易——這是爲了保持他的這些王土，和他的臣屬的利益和繁榮，以及高舉我們神聖的天主教所需要的；由於符合對聖上的意慾的實踐，並提供友善的交接，商業、貿易、和許多其他與對聖上服務有關的事，正因我需要彈藥供應此地的軍營，而被迫派一個人到澳門市去——他名叫Pedro de Brito，一位馬尼刺市的Regidor——我命令他自這些島嶼乘船到澳門市，船名是Nuestra Señora de Concepcion（也叫做San Pedro），由Pedro de Solorzano任軍曹，船長是Antonio Diaz Delaleres。我給予他以航行的許可，而且在必要時，讓這張文件，充當旅行和回返本市的許可證。嚴格地遵照我一切的指示和命令：所以在國王我主的名份上，我以自己的名字請求，上述的澳門市主要的軍曹、財政官員，以及該市的推事和長官；在皇上陛下下的名下居在該市的任何總督、軍曹、法官和推事；以及在該地和王國的其他王土與領域居住的貴族和其他人——我向所有的這些人請求，只要出示此文件，他們便檢視上述的聖諭敕令並服從和執行，我請求他們讓該Regidor, Pedro de Brito與該船及其船員進入港中，容許他們登陸，與居民和土著交易他們所意慾和需要的一切的東西，不加以妨礙和阻撓；而相反地，保護他們並幫助他們成功，並協助各種必要的準備，因爲他們是爲皇上陛下服務的。當我接到類似的請求的時候，我也會同樣地做。馬尼刺市，一五九〇年七月三日。

Gomez Perez Dasmariñas

遵奉總督的命令：

Gaspar do Azevol

但是拉示馬仁迎示總督的貿易使者，到了澳門之後不但沒有得到葡萄牙人的歡迎，而且大受反對。在澳門為中心的貿易上，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各種不同的矛盾中，有一項對立是很基本的，那便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各別的經濟利益立場上，企圖壟斷控制亞洲和歐洲之間的貿易。在這項對立中，葡萄牙是完全佔優勢的。腓立二世繼任葡萄牙王位以後，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間，在澳門貿易上的基本矛盾對立，如果不能說更加尖銳化，至少可以正確地說是沒有緩和。葡萄牙人一直提防着西班牙人會利用這個機會，排斥葡萄牙人在亞洲的地位，控制自澳門、馬六甲經過印度、好望角與歐洲之間的貿易航綫。在這項對立中，葡萄牙始終沒有讓西班牙取勝。在另一方面，菲律賓的西班牙人也堅決反對澳門與美洲之間的直接貿易，他們也可以說是勝利地堅持了以馬尼刺為中國與美洲的貿易轉運站。

不過有一點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所共通的，或者說是沒有很大的對立的，正如一張一六一七年不註月日，無人簽署的關於「新西班牙和遠東之間之貿易」的文件所說的：

「爲了防止中國人的到來（馬尼刺），陛下可以命令澳門的居民，運來漳（泉）州人所運來的絲、青銅、及其他菲律賓濱人所需要的貨品。如果命令中國人不得傳賣澳門的居民所售賣的貨品，一切都會更安全，利潤也會更大些，而且全部歸入陛下的臣民的手中。」

這項建議在當時當然無法實施，不過菲律賓濱與澳門之間的貿易，仍舊是時斷時續地進行着。在實際上，葡

葡萄牙人所恐懼的是西班牙人奪取澳門與歐洲之間的貿易。

然而由於前面所提到的那位拉示馬仁迎示總督所派遣的商業使節，在澳門不但得不到方便，而且受到阻撓。馬尼刺的西班牙當局於是便把這個問題呈交腓立二世，他們向馬尼刺的居民徵得證言誓書以支持他們的觀點，要求腓立二世支持菲律賓居民與澳門的貿易，這項觀點在事實上也代表了馬尼刺的西班牙人的一般願望。爲了徵求證言誓書，西班牙當局提出下列諸問題：

「第一條：讓他們作證說，他們是不是知道在澳門、馬六甲、及印度其他地方居住的葡萄牙人，與這個城市和這些島嶼的西班牙居民，有貿易和商業上的交接；葡萄牙人在此中，是不是沒有受到很大的損失或損害地，便得到了或正在得到許多收穫、利潤和利益。證人由於他們曾經到過澳門、馬六甲、和印度的其他地區，並曾親眼看到它，因而知道這些事情。

「第二條：讓他們作證，他們是不是知道比以前的任何年份，有更多的船和更多的錢，自果阿（Goa）市及印度的其他地方，流入澳門市以購買中國商品。該地先前和現在，都有可供所有的人的充足的布和商品，並不因對印度的輸出而造成缺乏。

「第三條：讓他們作證，他們是不是知道，正如前一個問題所說的，葡萄牙人不但不會受到什麼損失，而且相反地，如果西班牙人更經常地進行此項商業，把赴澳門的旅程，作爲其貿易的特徵，他們將會進入偉大的中國，因爲中國人大大地冀望這項貿易。這將會是對上帝及對陛下的一項巨大的服務，因爲福音將可自此地傳給中國人。

「第四條：讓他們作證，他們是不是知道沒有船或商人，曾經到過或正在前往印度作買賣，或阻礙他們（指葡萄牙人）的貿易。證人們知悉這件事，因為他們親眼看到並檢察過；要不然，他們將知道，看到，和聽到這件事。而且還會不止於此，如果他們繼續到這個城市來並與印度貿易。」

「第五條：讓他們作證，他們是不是知道根據前面的問題，葡萄牙人在本市與澳門之間的商業上，不但不受損失或傷害，而且大獲其利，通過貿易而進入中國，在使這些島嶼的繁榮和富庶上，將會有巨大的利益，對在它上面的公民和居民也是一樣。在一個很短的期間內，本市和海港，在皇上陛下所擁有的殖民地中，將成爲最富有之一。」

「第六條：讓他們作證，他們是不是知道，去年，一五九〇年，當G·P·拉示馬仁迎示，這些島嶼上的總督和將軍，派一隻船到澳門港去，帶着皇家的錢去爲本市和本島的堡壘和要塞購買彈藥，並答應在澳門的軍曹，作爲同一國王和主上的臣屬，將在他一切的需要上贊成他和幫助他。本市的一些居民，由該船送出一些錢，以使用以購買商品，這些被在澳門上船的葡萄牙人所沒收。如果不是因爲該總督擁有皇上陛下的指示，該船將不會被派出。我們在本市確知，負責的軍曹沒收該船和錢幣，因而對該等公民帶來損失和毀壞。如果他們不知道，讓他們參考該總督所寄上的，該項指示和公文。」

「第七條：讓他們作證，他們是不是知道是項損失和毀壞，對那些並不擁有其他財產的公民是很嚴重的，使他們無法自我維持，或進行直至今日他們所爲的，在需要的場合上幫助對皇上陛下的服務。」

「第八條：讓他們作證，他們是不是知道前面所述的，乃是一般人所知悉並爲所有的人所宣告的。」

在回答上列各問題的證言誓書中，現在譯出一件如下：

「證人：Poyatos軍曹。於一五九一年五月廿七日，在馬尼刺市，為本市的辯護師Melchor de Baeca，以本市的名義舉為證人。Hernando Muñoz de Poyatos，一位本市的公民，依照法律，在一個十字架的徽誌上，並在使自己受限制於要講實話的允諾的責任下，向他宣誓。由前面所指的Melchor de Baeca根據調查質疑提出問題之後，他作出如下的宣告：

「一、對第一個問題，證人作證說，澳門市的葡萄牙人，與本市和這些島嶼上的西班牙居民，有貿易和商業往來；他們由此得到了，而且正在得到很多的收穫和利潤，他們從來也未曾因來到這些島嶼上貿易而遭遇到，也永不曾遭遇到什麼損害。這是因為這位證人到過澳門而獲悉的，而且看到過事實正如問題上所說的一樣。而他相信如果馬六甲和印度其他地區的居民，將繼續在這些島嶼上貿易，情形必將繼續如此。這是他的答覆。

「二、對第二個問題，該證人正如上述的曾經到過澳門市，作證說雖然自果阿，自這些島嶼及其他地方的船隻的數目更多，並比前此以更多的金錢投資在中國商品上面，仍舊有足够的布料和商品供應前往的人，而且還將有許多剩餘。這是該證人所回答的，因為他在該澳門市作此發現。

「三、對第三個問題，證人作證說，他深信如果在這些島嶼上的西班牙人到澳門市去，與該地的居民貿易和交接，將是朝向在中國人之間傳福音的可能跨進一大步，這是對上帝我主，和對皇上陛下作重大服務的事項。對向他提出的此一問題的其餘的部份，他一點都不知道。這是他的答覆。

「四、對第四個問題，該證人作證說，他在這些島嶼上住了十六年以上，在這一個期間內，他從來未曾看到過或聽到過，有任何船隻會因貿易的目的，被由這些島嶼派到印度去，如果並非如此，該證人將會知道；也不會有不同，因為他已經在這些島嶼上住了許多年了。這是他的答覆。

「五、對第五個問題，證人作證說，答案和前面所提出的一個問題相同，便是據他所知，如果商業在澳門和這些島嶼之間建立了，在短期間內，這個城市，它的居民和這個羣島，將大為富有。這是他的答覆。

「六、對第六個問題，證人作證說 G·P·拉示馬仁迎示總督自這些島嶼，派出一艘大船至澳門市，問題中所列舉的派遣該船的目的，是衆所周知的。關於該問題的其餘的部份，他參照總督在派遣該船時所發出的敕令及其他文件。他聽到說問題的其餘的部份是事實。這是他的答覆。

「七、對第七個問題，他作證說，這些島嶼上的某些居民，送錢到澳門去，因為直到現在還未獲處理而感手頭拮据。這是他的答覆。

「八、對第八個問題，他作證說，他的答案和對前一個問題所作的相同，這是根據他的宣誓所作的實話。他簽字承認，並宣佈他已經超過卅五歲，是一名有資格的證人。

在我面前：

Fernando Muñoz de Poyatos

Gaspar de Azevedo

此外尚有六件回答這個調查的證言誓書，不過全部大同小異。

其中有一位名叫 Juan de Argumedo 的軍曹，在答覆第三個問題的時候說：當他和澳門主要的中國官員交談的時候，後者對他說，「讓西班牙人到這個地方來交易，因為你的國家的居民，不和葡萄牙人一樣地，到這裏和中國人交易。」這位證人回答道：「我們受到葡萄牙人的阻撓，他們不願意我們來。」於是該官員變得很惱怒，大聲向葡萄牙的主要軍官說：「這是什麼話，難道這片土地不是屬於中國皇帝所有嗎？葡萄牙人不得管這種事。」再由一個翻譯員向證人說：「干系臘人，從今以後到這裏來進行你的貿易，這與葡萄牙人不相干的；我們會供給你所需的一切，包括通行證。」這位證人回答道：「先生，最好是在廣州附近撥給西班牙人一小片地，使他們得以移殖。」該官員略加躊躇之後回答道：「如果你能跟我到廣州來，我將向巡撫取得一張 Chupa —— 當地所用的通行證，並將努力在短期間內使西班牙人獲一片殖民地。」因為證人沒有進行此事的權力，同時也忙於他自己的事務上，他沒有到廣州去，他沒有作再進一步的爭取。

還有一位名叫 Joan Bordo 的證言更加狂妄，他作證說，他相信中國人將會歡迎西班牙人，還引用一句話，據說一個中國人對他說：「干系臘人呀，你們要到什麼日子才進入中國呢？因為這些（中國）官員壓迫我們，致使我們期待這個日子。」

當這些文件呈繳腓立二世的時候，拉示馬仁迎示總督附上了他本人的意見：

「檢視了本市的 Cabildo, Magistracy 和 Regimiento 爲了要使陛下贊成馬尼刺的居民與澳門的

居民進行貿易的調查之後，考慮到葡萄牙人僅會由此得到很少的損失，我的意見是：如果陛下樂意，便可予以贊成，因為隨之而來的麻煩極少。況且，這將對此間有利，因為我們將可能由澳門市取得彈藥，供應品和其他的物品；因為，關於彈藥方面，與中國的貿易是關閉了，沒有中國人敢運它來。」

這個時候，拉示馬仁迎示總督正在準備向摩鹿加（香料）羣島用兵，這是他一就任以後便開始籌備的。爲了這項軍事行動急需彈藥，中國在這個時候，大概是嚴禁彈藥出口，因此拉示馬仁迎示便派船赴澳門要向葡萄牙人購買。他在一五九二年六月廿日致書向腓立二世報告道：

「我派一隻我在此地發現的船到澳門去，它是Marques de Villamanrique自墨西哥派來的（據他說是要到澳門去）——由其船上取得價值非幣一萬五千元的保證，保證往返澳門備回彈藥之後。我同時派出一個名叫 Pedro de Brito 的 Regidor，帶着一張陛下頒給我的，授權使我可以這樣做的命令的副本；但是直到現在他還沒有回來。有些來自該地的中國人說，該船爲葡萄牙人所截獲，並送到印度去。我很難維持我的地位，因爲彈藥的缺乏是很嚴重的——從來也沒有像現在那麼嚴重過，來此的廿二隻中國船中，沒有運來一磅的銅、硝石、或火藥；他們說他們在性命危險的威脅下，他們被迫將它們棄掉。」

可見直到拉示馬仁迎示寫這封報告書的時候，他派赴澳門的那條船仍舊沒有下落，儘管這條船赴澳門的目的是爲了購買彈藥。但是平心而論，由前面所譯出的文件考察起來，拉示馬仁迎示送往澳門的敕令，實在是頗有上司的口氣。

反對中菲貿易及排華 雖然澳門的葡萄牙人表現出對西班牙人的提防和畏懼，而從歷史考察起來

，葡萄牙人的畏懼並不是沒有根據的。不過這個時候在菲律賓濱的西班牙當局，一方面固然是爲了要購買彈藥，另一個較主要的目的乃是要利用澳門控制中菲貿易，減少中國商人的來菲，削弱閩南在中菲貿易上的重要性。拉示馬仁迎示總督在一五九二年六月廿日致腓立二世書中，明白地表現出他對中國商人和中菲貿易的態度：

「爲了這座炮台和王城，我已經提高了所有來自中國的商品的關稅，如胡椒及其他等物。同時，（賭博用）紙牌也從陛下之名義加以沒收。」

「在陛下之允准之下，我必須表達我對與這些中國人貿易的遺憾，因爲在我看來，它似乎是有損的。它可以因爲有大量的錢被由這些島嶼帶赴外國爲根據，而加以禁止。貿易項目中最大量的是棉織品——首先它由這個國家取得原料，再運回去織造。土著如果選擇要這樣做，便可以用他們自己的棉花織造，甚至織得比那些來自中國的更佳。他們可將它們輸出到墨西哥，並可達到四十萬菲幣的貿易額。這將導使在生產和種植棉花方面得到更大的照料，因爲將不再有生理人充中間人。他們所運入的其他商品是絲，質極劣而輕弱，除了一些運入時是生絲或被紡爲線的。這後者，我恐怕會超越自西班牙王國所運入的數量；而將會妨害陛下在Granada、Murcia和Valencia的絲的皇家入息，這將是最不適宜的。除此之外，還有另一點是值得加以不含糊的考慮的——那便是，他們（中國人）可以自由到這些島嶼上來售買他們的產品，甚至在此定居，而且常常在此結婚。然而，他們不容許我們到他們

的國家，西班牙人也不可以到該地去投資一 *Real*——完全違反貿易自由的慣例。所以，爲了要避免其他不良的結果，我命令中國商人不能藉口作商人而在此居留；只有一些充機械匠的工人可以留下；當他們的商品售完的時候，他們便可以回家。主教及一切的神甫說，他們不能被剝奪掉來此並定居於此的自由，對他們作出這種命令不能說是合乎良知的。在教壇上他們說，總督要到地獄去，因爲中國人有他們的法律，我們不能命令他們，除非我們首先根據在這個國家的番人之間，所建立的法律和習慣加以統治，因爲它先前是而現在還是他們的。關於我在前面所說的與這些中國人的貿易，我只有有一點懷疑——那便是——如果這項貿易被放棄，陛下將喪失得自這項商業的，商人抵達和離境時的皇家關稅。這每年必達三萬至四萬非幣，缺乏它，陛下將要由你在墨西哥的皇家財庫或其他來源供應，以維持此地的軍隊，及其他迫切的開支。我把這一切提出在陛下的面前，以便在權衡雙方的輕重之後——陛下能够通知我以你的意慾。」

腓立二世在一五九三年正月十七日致拉示馬仁迎示總督的信中，對他的作爲表示支持：

「在對中國商品所徵得的關稅，並專營紙牌以應用於該市的城牆上，你作得很好；同時也因爲你爲了同一的目的，對祕魯和墨西哥在該地貿易的商品，以及公民的財產徵百分之二的稅。雖然你報告說百分之二的財產稅只要徵收一次，你應該繼續徵收此稅，和關稅以及對紙牌的專營，直至該城完成之後。」

由此可見，有名的馬尼刺王城，主要地是靠提高中國商品的關稅所徵得的錢建築起來的。這可以說是

在中菲關係上的一項重要的掌故。

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西班牙統治時期，第一條最嚴酷的排華法令，便是腓立二世於一五八九年八月九日所頒下的，禁止華僑經營零售業的敕令（參閱第五章）。這條敕令是由拉示馬仁迎示總督帶到菲律賓來的，並在他的任內（他在一五九〇年就任）開始實施。不過在執行該敕令的時候，與禁止土著穿用中國織物一樣地，受到菲律賓天主教當局的反對。他在一五九二年六月廿日向腓立二世報告道：

「於是，如果依照陛下的命令下令給公民們……同時如果依照陛下的命令，下令要以劃一的價格購買中國商品，傳教士宣佈無法由下令進行此事。如果下敕令禁止土著穿用中國織物和絲綢，以便使他們種植和紡織他們的棉花，因它在本國極其繁殖，他們便說沒有什麼會比此更壞的了。」

在這個問題上，腓立二世在大體上堅持他所頒發的禁令，他在一五九三年正月十七日寫給拉示馬仁迎示總督的信上說道：

「正如我所已知悉的，傳教士所進行的反對，以及在執行禁止購買中國商品敕令的途中所佈置的困難——除了通過那些指定的人以他們所規定的適當的價格，整批地加以購買，然後再分配那些商品——我正在寫附夾在此中的信，給各教派的主管，命令他們不要在這些問題上加以反對。你應該將它們送給各主管人，並依照你的命令行事。」

就當時的情形而論，不管阻止中國商人來菲，或者是禁止華僑經營零售業，都是沒有可能加以實施的。不過，由前面所譯引的文件中，總可以看出拉示馬仁迎示對這些問題的態度。當時的菲律賓天主教當局

，採取一種比較現實的立場，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向中國傳教的宗教熱忱所驅使，另一方面應當也是意識到與其明知其無法實施而蠻幹，不如採取比較現實的政策。但是在整個西班牙的統治時期，基本上一直是一種不合實際的，實行高壓和歧視的華僑政策佔優勢。

以澳門為中心控制中菲貿易，在當時也許是一個比較可行排華的政策，西班牙人便企圖用這個辦法，來排斥由閩南而來的中國商人。不過在這個政策的執行上，有兩項實際困難。第一便是葡萄牙人的猜忌，當時的葡萄牙人一方面是以澳門為中國與歐洲貿易的中心，另一方面又以澳門為他們與亞洲其他國家，包括當時南洋羣島的一些獨立小國以及日本，進行貿易的商業中心。因此他們極不願意西班牙插足其中。爲了這項困難，西班牙也曾經在中國大陸的邊沿，盤據過一個據點（這個問題我還會詳細論及），但是却無法像葡萄牙人那樣地使它成爲一個商業中心。第二是西班牙佔領菲律賓以後，便圈封土地實行封建剝削，並使西班牙文化在菲律賓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影響。然而，在商業貿易上却很少有表現，甚至在其佔領統治下的菲律賓，西班牙人在這一方面也沒有很大的作爲。因此不但是在澳門，甚至當一些較有雄圖的西班牙人，在中國土地上盤據一個據點之後，西班牙人也不能有所發展，而結果終於撤退。

當然，前面的這段話，必須與前數章關於當時的歷史背景，歐洲國家東來的航路，以及西班牙的統治政策等等，互相配合起來，才能得到較正確完整的概念。

與墨西哥貿易 一五八六年馬尼刺的西班牙人舉行代表會議，向西班牙國王及皇家殖民地理事會遞呈請願書，請願書中有許多涉及中菲關係的問題，在前面已經論及（參閱第五章）。其中關於菲律賓與墨

西哥貿易的問題，還有一點是前文所未曾提及的，當然我已經指出過，菲律賓輸往墨西哥的，大半都是中國商品，因此菲律賓與墨西哥的貿易問題，與中菲關係有很密切的連系。

該請願書的第三章第一節寫道：

「不得自墨西哥把錢幣委托交菲律賓。首先應該向皇上陛下講述的，是使本國毀滅的各事項之一，乃是居住在墨西哥的有錢人，把大量的委托款項寄此。這引起了兩項損害：第一，這使所有的中國商品漲價，致使本島嶼中的貧窮人和一般平民，無法購得或僅能以極高的價格購得這些商品；第二，由於要運往（墨西哥）的商品數量多體積大，而船隻很少——有時候（在事實上幾乎一直是）不超過一艘，而且，由於旅途之長及困難，使船上需要大量的供應品，這些船只能載少量的商品，而使（本島的）公民和一般平民無法輸出任何商品。我們要求皇上陛下頒發敕令，並批准本Royal Audiencia所已經發下的命令——那便是，不得再自墨西哥寄來這種委托款項，墨西哥的份子或貿易公司，也不得來到這個國家進行此種貿易；而只有這些島嶼上的公民，才被准許購買本地的產品和外國產品並出口到墨西哥去。如果有任何其他的人想要這樣做，他必須成爲本地的公民，並在此居住了至少三年；他必須只動用他個人的財富而不動用他人的（財富）進行貿易，不然則課以重罰。這些（罰則）應該包括沒收這些商品以及他私人的財富；同時不許他攜帶任何財富到墨西哥去，而且也不得自該地帶來現在由中國人取去的錢幣，使得他們的商品可以更便宜地購得，本地的產品也是一樣。」

由此可見最初移居菲律賓的西班牙人，一直想要壟斷菲律賓的對外貿易。一面企圖利用澳門控制中菲

貿易排斥中國商人，一面又要壟斷與墨西哥的貿易，排斥居住在墨西哥的商人。因為菲律賓是一片新征服的土地，西班牙政府必須加以鞏固發展，同時爲了這项目的，也要鼓勵西班牙人移居菲律賓，所以在這一個問題上，腓立二世是支持移居菲律賓的西班牙人的。他在一五九〇年七月廿三日頒下敕令：

「由於我接獲菲律賓羣島上馬尼刺市的通知，自新西班牙的有錢人寄往投資於中國及其他國家之商品的巨額委托款項，造成了該國的毀滅；同時因參與該項貿易的份子及其他人，以批發價格購買該等商品時，提高了一切商品的價格，致使該羣島上的貧窮人和一般居民無法購買它們，或者以很高的價格購買它們；更進一步，因爲該等被委購的商品的數量和體積，以及船舶的數量之少（事實上，有時候和通常只有一隻，而且頗裝滿了墨西哥人的該等商品），沒留下供（菲律賓的）公民和一般人民運送他們的商品之餘裕；所以，正如他們所向我懇求的，作爲對該可厭的問題之補救，命令不得再由新西班牙寄送委托款項到該羣島去，只有該羣島的公民可以購買和輸出本地和外國的產品到新西班牙；還有，如果有任何其他的人要至該地貿易和交通，他必須先成爲該羣島的公民，並且至少須在該地居住十年，或者依我的意欲規定；因爲我的意志是要使該羣島得到優待，以便使該地的情況得以繼續改善，並使該地的居民獲利，我在目前允准，只有他們，而沒有其他的人——不管是在新西班牙，或者任何其他部份的殖民地——可以和中國貿易，同時在第一艘運載商品赴新西班牙的六年內，（只有他們才）可以輸出、運送或售賣各王國和中國大陸以及該羣島的商品至新西班牙。我禁止所有其他的人，不管他是誰，不論他的地位和勢力，在前面所規定的六年內，與該羣島及與中國貿易，違者罰

以沒收在該宗貿易上的商品。我命令把這條法例在墨西哥市公佈，而我在該地的皇家官員將它記錄在案。那些在該羣島上的也要這樣做，他們要在這條法規的後面，依照第一艘運載商品啓程的船，規定該律生效的日期。他們也應該送給我一件證明書，使我得以知道何時是該六年生效的期間。沒有任何人可以作與此令相背馳的事。一五九〇年（留下一個空白以填寫月日和地點。）

「所以只有在六年內，只有菲律賓羣島的公民和居民，而沒有新西班牙或任何其他地方的人，可與中國貿易和交通。」

西班牙皇家殖民地理事會的成員，全體簽名在這件敕令的背後，表示他們對這件敕令的贊同。

這件敕令也是由腓立二世頒給拉示馬仁迎示總督，在他的任內開始執行的。在這件敕令尙未正式簽署之前，一五八九年八月九日腓立二世致 G. P. 拉示馬仁迎示總督的指示，便已把該敕令的全部內容，包括在指示之中。可見這是西班牙政府在研究西班牙代表會議，派遣亞俞樹·山齊示神甫呈交的請願書之後，所作出的一項謹慎的決定。

菲律賓從這件敕令生效的時候開始，成爲中國和美洲貿易的唯一合法的轉運站，也只有菲律賓的公民（指西班牙移民）才能合法地經營中國和美洲之間的貿易。這是中西關係史的重要事件，也是中國對外貿易的經濟史上的重要事件。在菲律賓歷史上，這是主張在菲律賓鞏固發展的西班牙人的勝利，予移居菲律賓的西班牙人一種鼓勵和刺激，對西班牙人在菲律賓的地位的確立，是很有作用的。當時在菲律賓流通的貨幣，有極大的部份是由這項與墨西哥之間的大帆船貿易流入菲律賓的。在經濟上，這是對菲律賓有極大

的意義的。

鑿斷菲律賓與墨西哥之間的貿易，是非律濱的西班牙居民的長期願望。一五八八年六月廿七日，大主教沙拉利在寫給腓立二世的信上說：

「裏面敘述總督（指墨西哥）派遣San Martin輪到澳門去所造成的巨大的損害。作為一名洞悉是項損害的人，對其作出證言，在這件事上，沒有更有資格的證人。我同時也爲了派遣San Martin輪到中國去，對這個國家所造成的損害，寫信給新西班牙的總督——雖然上帝由使該船喪失而提供了補救。我告訴他如果該船被派到本市來，將會有一個比投資者所預期的更厚利的旅途，因爲在今年有許多中國商人來到本市，而商品便宜得不得了；如果San Martin輪到此間來，可能會得到一個令人滿意而便宜的貨價，也許在數量上還會比澳門所有的更多。不但不會使本市受到損害，那些由於貪婪而看不見對我們全體所造成的損害之人，反會致富。於是上帝懲罰他們全體，取去了他們的利潤，就是因爲對它的企望，使他們看不見他們的責任。」

「他們又說Santa Ana輪被以三萬披索的代價出售，並奉命作澳門之旅。這些進程也被上帝所攪亂，應用那使他們付出很大的代價的方法，那便是使該輪喪失。……正如我寫給陛下下的，由馬六甲寄發的信中所說的，由墨西哥到澳門的船，將會毀掉該地和本國，因爲中國人把他們的商品的價格，提高到使葡萄牙人和干系贖人無法生活的程度。願陛下樂意於命令總督，對這些土地有較高的估量，因爲陛下認爲他們（而且是公正的）值得受到不斷的注意。」

西班牙的殖民地政策，在文化上可以說是成功了，西班牙文化在其過去的殖民地中所留下的印跡，在今日仍舊是異常鮮明的。但是在經濟貿易政策上，西班牙當局却表現得異常紛亂，各殖民地之間，常常互相傾軋，使力量互相抵消。一五九〇年七月廿三日關於菲律賓與墨西哥之間的貿易，腓立二世所下的敕令，固然是爲了要鞏固和發展西班牙在菲律賓的地位，增加移居菲律賓的西班牙人，但是似乎並無法取得墨西哥方面的諒解。

一五九三年六月二十日，G·P·拉示馬仁迎示總督寫信給腓立二世抱怨道：

『本市關心着，而我相信我也曾經爲墨西哥最近向來自本國的商品，征課百份三十的關稅寫信給陛下；雖然除了在這個急需的時期，找出一個供應陛下迫切需要的方法以外，我沒有什麼太多的冀望，然而，在陛下的允准之下，關於這一點我仍舊要說一下，雖然由這些商品所得的利潤，如果昔加經營，是足以繳納這項關稅的，這是事實。然而本國的公民都是貧窮的，錢幣和資本都是很有限的，這片土地是新的；在開始的時候，獲利比現在更大，由於開支的增加，所獲的純利大爲減少了。這句話對土著似乎也是同樣適用的，他們深切的感到許多負擔，而他們正在懷疑我們正在逐漸增加它們。所以他們說，干系臘人講好話，但是少做事，而且都是壞的。那些較適宜於作這項負擔的是中國人，因爲他們在很短的期間內，在此獲得了巨大的利潤。但是我同時恐怕，如果他們覺得討厭，他們便不再來，而且要放棄這個國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貿易。我只是把這些因由提供在陛下面前，以便使你能對你最有利地，向各方面頒發敕令。願我主依基督教之所需，爲陛下保守許多快樂的年份，正如我們，

陛下的臣屬和僕役所冀望的。馬尼刺，一五九三年六月二十日。」

菲律賓和墨西哥的貿易畢竟是有厚利可圖的，從這項貿易的發展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出西班牙人在菲律賓的資本，便是在這項貿易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起來的。由於當時在菲律賓的諸鄰國中，只有中國才能供應較上等的消費品，因此儘管菲律賓的西班牙當局一再指責中國商人在這項貿易中大獲其利，另一方面又害怕中國人真的放棄這項貿易。這段期間的中菲貿易，在菲律賓的經濟發展上，的確是發生過重大的作用的。

一五九三年二月十一日腓立二世又頒佈了一件關於這項貿易的敕令：

「由於我們曾經頒佈法令，禁止在西印度和中國之間進行貿易，同時又限制與菲律賓的貿易，我受到通知，在這事項上的執行很疏忽；同時由於，在我千系臘王國與印第安（美洲）之間進行貿易的北海商人及其他人等，在過去數年中曾遭受很多的損失，而那些與中國進行貿易的則獲利甚豐，後者的數量大為增加，而我的王國商業却退縮了。因為這樣，這些王國以及我的皇家入息，受到很大的損害。所以，由於我的這些王國與（美洲）之間的商業的維持和增進是非常重要的，同時由於在它們之間應有頗為經常的交通和貿易，我已經，在我的皇家殖民地理事會的同意之下，決定下令禁止在將來，不論在何種情形下或以何種方法，任何船隻都不得爲了貿易或交通或爲了任何其他的目的，自祕魯、Terra Firme、危地馬拉、新西班牙、或我屬西印度的任何其他部份駛往中國。它們也不得到菲律賓羣島去，除了自新西班牙外，那是爲這同一個日子所頒下的另一敕令所准的。我們命令如果有人

這樣做，該船及其所有的錢幣、商品和其他的貨物都要被沒收。其中的三分之一歸入我國的財庫，第二個三分之一給告密者，而另一個三分之一歸作判詞的法官。更進一步，我們禁止任何自菲律賓羣島運至新西班牙的商品，再轉運至祕魯和 *Tierra Firme*，即使是已經付清了關稅了。我們的目的和願望，是不再讓祕魯和 *Tierra Firme* 使用來自中國和菲律賓羣島的商品，除了那些現在已在該地的，我們容許在本敕令頒佈之後再繼續使用四年。爲了這項目的，每一個人都應該向他所居住、或他作爲公民的市、社或村的法官面前登記他現在的所有物。此後，任何運入前列諸地的上述商品，或任何未經登記且在期限結束後，被發現爲任何人所擁有的，我們命令要加以沒收，並如上述地加以分配。但是我們容許他們把前此所擁有的上述商品，在上述的四年內運到這些王國來。我命令我在祕魯和新西班牙的總督，我在菲律賓的總督和將軍，我的殖民地 *Royal Audiencias* 的主席和法官，及其中的其他官員，嚴格地、無違地和迅速地奉行和實施我的此一敕令；他們應毫無寬恕和寬宥地執行此中的罰則，正因爲這是我的意志，在爲我服務上所適宜的。他們應該在一切必須和應有的地方佈告此令，使得所有的人都會知道，而沒有一個人可以推托不知。在馬德里頒發，一五九三年二月十一日。」

這是一件嚴格限制中國商品輸入美洲的敕令。西班牙商品在競爭上顯然是失敗的，於是西班牙便使用政治上的權力，來阻止中國商品的競爭。這件敕令的內容所表現的，基本上是一個沒有進取性的沒落的封建王朝的招架。在這個時候，這兩個亞洲和歐洲最強大的封建王朝都在開始沒落中，不過中國已經顯然地表現出，她是具有更大的潛力的。

十六世紀的末期至十七世紀，落後的美洲西班牙殖民地，是中國商品的市場，西班牙政府極力阻止中國商品的輸入，以減少墨西哥白銀的流入中國。中國在當時擁有全世界最巨額的財富。西班牙本國生產的商品，表現出沒有能力在美洲與中國商品競爭。西班牙政府之所以願意容許中國商品有限度地輸入墨西哥，在很大的程度上還是爲了要鞏固它對菲律賓的統治。

貿易政策的檢討 當拉示馬仁迎示任菲律賓總督的時候（一五九〇—一五九三），恰好是西班牙在呂宋島上的據點相對地穩定下來了。於是，拉示馬仁迎示的工作，一面是對菲律賓作進一步的經營，另一面是使西班牙的勢力向亞洲的其他部份發展。

要進一步地經營菲律賓，當然是要使菲律賓的經濟有進一步的發展，而在這個地方，意味着菲律賓西班牙移民的經濟力量的增進。西班牙政府顯然是很清楚地看到，要鞏固它對殖民地的統治，便必須使西班牙移民在該殖民地地上，據有雄厚的經濟勢力。因此，西班牙一佔領菲律賓之後，便進行土地的圈封，奪去了菲律賓人民所擁有的最基本的財富，並將它置於西班牙移民的手中。加上了墨西哥銀幣的大量流入，使西班牙移民的財富激增。他們很迅速地便形成了一股強有力的政治力量，不但幫助西班牙政府鞏固對菲律賓的統治，同時也自覺地保衛着本身的權益，坦白地表達他們的意見和願望，並積極地爭取西班牙國王予以支持。

這是中國移民和西方國家的移民一點基本上很不相同的地方。雖然在當時，中國和西班牙一樣地是強大的封建王國，而且有很多方面在事實上佔有絕對優勢，在客觀上又處在極有利的形勢下，在這段漫長的

歷史中，中國移民不僅是在菲律賓，而且在整個的南洋羣島，從來也未曾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

西班牙移民的這股力量，在一五八六年的代表會議中正式體現出來，於向西班牙本國政府呈遞的請願書中，公開表示他們的意見和主張。腓立二世也顯然地蓄意要培養這股力量，在極大的程度上接受他們的意見，儘可能授給他們以一些特權，讓他們的經濟力量得以迅速發展。

西班牙的政治經濟勢力，中國先進的生產技術及其生產品，菲律賓人民的勞動力，是當時促進菲律賓經濟發展的三大因素。我在前面本章各節中所討論的，實際上便是具體地表現出這三大因素的相互關係。顯而易見的是當時西班牙統治者的政策，對中國僑民加以排斥和歧視，對菲律賓人民則施以明目張胆的剝削和虐待。

首先是西班牙當局儘量設法減輕中國商品在菲律賓經濟中的比重和地位，雖然他們對中國先進的生產技術不能不表示歡迎。這一點具體地在禁止土著穿用中國織物的命令中表現出。西班牙當局企圖利用掌握先進生產技術的中國人，和菲律賓人先前所掌握的生產技術，在菲律賓生產消費品，供應菲律賓本土的消費，而且儘可能向墨西哥輸出。

如果表面地單從這一點上看，這個政策似乎是對菲律賓有利的；但是如果對當時的菲律賓經濟生活加以全面的考察，便能夠發現這項政策的目的，是爲了加深對菲律賓人民的剝削，而且是一項全然不合實際的政策。

菲律賓這一個地區，在西班牙侵略者尚未入侵之前，是南洋諸島嶼中是一個比較落後的地區。它當時

的生產力不但無法輸出消費品供應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甚至也無法供應有高度生活水準的西班牙移民以充足的消費品。同時，西班牙的統治當局又缺乏一個發展菲律賓經濟生產力的全盤方案，對中國移民的排斥也嚴重地阻礙了這項生產力的發展。

一般地說來，菲律賓的西班牙封地領主是一羣殘酷而又毫無遠見的剝削者，黎利在「菲律賓人的怠惰」一文中，描繪當時的西班牙地主對菲律賓勞動力的瘋狂榨取，這種榨取達到了近乎虐殺的程度。甚至使西班牙統治的初期，菲律賓的人口大量減少，嚴重地摧殘了經濟發展所需的勞動力。

從前面所引舉的，那些與行政當局對立的宗教當局的書信，可以明顯地看出當時的菲律賓人民，並沒有得到他們的勞動所應得的代價，連那低微的、全然不夠的報酬，也受到貪污份子的剋扣。於是在農村中引起了普遍的怠工，成爲發展生產力的另一困難。因爲菲律賓人民意識到，生產的增加只會使西班牙統治者更加富有，不會使菲律賓人民得到什麼利益。

西班牙統治初期的各種文件顯然地證明了，在這個時期的菲律賓經濟生產力不但沒有發展，而且衰退了。一般地說來，這應該意味着消費力的減退。但是，由殖民地搜刮而得的財富，從美洲源源流入的資金，使這羣西班牙侵略者，作爲全歐洲最富強的國家的移民，仍舊維持着全世界最高的生活水準。他們大量地需求着中國的生產品。

這是一個矛盾。西班牙統治者一方面需求中國生產品，以維持他們的高度生活水準，另一方面又不願使西班牙銀幣流入中國。於是，西班牙的行政當局下令禁止菲律賓土著購用主要的輸入品之一——中國織

物。這實在是一條很怪誕的禁令，菲律賓是西班牙統治下的地區，如果他們認為菲律賓的織物生產，確實可以供應全羣島的需求，他們何不禁絕中國織物的輸入？這裏顯然意味着西班牙當局不願意菲律賓人民與他們爭購中國織物，而要讓西班牙移民有購用中國織物的特權。同時，他們爲了這一事項向菲律賓領袖所索取的證言誓書，也正如我已經指出過的，意味着對中菲兩國人民之間關係的挑撥離間。

因此，在當時的實際條件之下，禁止土著穿用中國織物的法令，無論從什麼角度看來，都是一件無法實施的禁令。不過，可以通過這件禁令，看出菲律賓當時的經濟狀況，以及在這種狀況下，西班牙當局中國及華僑的政策和態度。

西班牙當局雖然對中國的熱練生產者，表示歡迎——更正確地說是較大程度的容忍，企圖利用他們先進的生產技術，來促進菲律賓經濟的發展。但是，西班牙一般性的排斥和歧視華僑的政策，並沒有造成使中國生產者大量移入的有利氣氛；從前面我們所談到的，關於菲律賓農村在當時的一般情況，更使中國的農業生產者沒有可能大量移居菲律賓。這對菲律賓經濟的發展上是不利的，同時也使西班牙當局所謂發展生產力，生產供應美洲的商品的經濟政策無從實現。

由於這種種因素的交錯發展，直到歐洲的工業革命以前，西班牙當局始終無法削弱中國生產品在菲律賓經濟生活中的地位。

其次，是對中國生產品的需求在經濟上既然如此重要，菲律賓的對外貿易在基本上就是對華貿易，因而使墨西哥的白銀源源流入中國。於是西班牙人便企圖控制中菲貿易，以便一面減少中國商人所得的利潤

，一面防止中國商人的大量移入。

對中非貿易的控制分兩方面進行：一方面是企圖直接參加中非貿易，派遣商船到澳門去採購商品；另一方面是整批購買中國商人所運來的中國商品，禁止中國商人直接經營零售。這兩個政策，都是當時所無法切實施行的，我在前面已經加以討論，它的發展在將來還會陸續提到，所以現在不再詳論。

不過，有一點是必須強調指出的：菲律賓對當時的中國人最大的誘惑，便是這項貿易上的利潤。這項中非貿易是使菲律賓華僑形成爲一個特殊的商人階層的歷史根源，菲律賓華僑所擁有的龐大的商業資本，也是這個時候開始累積下來的。我認爲這一點的正確把握，對理解菲律賓華僑社會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運到菲律賓的中國商品並不是專供菲律賓消費的，而且也運銷美洲大陸。菲律賓與美洲之間的貿易是有厚利可圖的，移居菲律賓的西班牙人，取得了這項貿易的合法壟斷地位，這是前一節中已經詳論過的。

無論是中非貿易，抑或是由菲律賓轉口的中美貿易，都使墨西哥白銀大量地流入中國。其實錢幣外流是西班牙帝國達到巔峯再走向下坡時期的一般現象，墨西哥銀幣不但大量地流入中國，而且也大量地流入歐洲的其他國家。西班牙的墨西哥銀幣不但是在全世界通用的貨幣，而且可以說是國際貿易上最主要的貨幣，是全世界的國際貿易者最歡迎的貨幣。

墨西哥銀幣的流入中國，是中國對外貿易史上的長期現象。墨西哥銀幣不但經過菲律賓流入中國，而且在一個很長的期間中，也經過歐洲的其他國家流入中國。有一段很長的期間，中國與歐洲之間的貿易，

幾乎一直是單方面的出超，在這一段期間內，歐洲差不多沒有爲中國所需要的生產品，只好運銀幣來向中國購買中國商品。這種現象一直到歐洲發生工業革命以後才完全改變，並且在一二百年之中，使中國由一個全世界最先進最富有的國家，墮爲一個生產力最落後最貧窮的國家。

因此，在工業革命以前，墨西哥銀幣的流入中國，可以說是國際貿易上的一般現象。不過，菲律賓的西班牙當局一開始便儘量設法消滅墨西哥銀幣經菲律賓流入中國的現象，西班牙本國政府對這項努力也是全力加以支持的。西班牙當局的貿易政策，便是企圖消滅這種現象的具體步驟。菲律賓的西班牙移民，企圖使由墨西哥流入的貨幣，大部份留在菲律賓。要達到這項目的，無疑地需要提高菲律賓的生產力，使菲律賓能夠供應本地所需的消費品，並且能夠生產可運銷美洲的商品。但是菲律賓在社會經濟發展上還沒有達到這種水平，西班牙本國的封建制度以及它強加在菲律賓的封建制度，只是壓抑着而不是刺激着生產技術的發展。西班牙統治對菲律賓勞動生產者殘酷榨取，更無法爲菲律賓的生產力提供有利的發展條件。這是這個時期菲律賓社會的基本矛盾，外來的封建統治者和土著勞動生產者的矛盾；西班牙封建統治者在這項矛盾中佔有壓倒優勢。西班牙當局的貿易政策便是爲了要鞏固這項優勢而訂定的。

這個時期菲律賓經濟生活及其發展的另一主要因素——中國的先進生產技術及其生產品，在菲律賓社會的這項基本矛盾中成爲次要的附屬的因素，雖然它在這個時期中對菲律賓經濟生活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在菲律賓社會的基本矛盾的發展中，始終處於從屬的地位，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幫助西班牙鞏固對菲律賓的統治。

除了西班牙統治者與菲律賓人民之間的對立矛盾以外，這個時期的菲律賓經濟發展上，還存在着西班牙移民內部的——具體地體現為行政當局與宗教當局的矛盾，西班牙移民與澳門的葡萄牙商人的矛盾，美洲和菲律賓的西班牙移民之間的矛盾；不過，這些矛盾都是西班牙統治者內部的矛盾，這些矛盾具體地體現於美洲、菲律賓和澳門在貿易上的紛亂和自私上，它們常常把各自的力量作不必要的互相抵消，正如一個瓦解中的社會所常有的現象——各種不同權益的集團不顧一切地互相傾軋。

但是更微妙的是西班牙當局與菲律賓華僑之間的關係。西班牙當局有許多方面，存在着對菲律賓華僑無可奈何的依賴，中國移民是熟練工匠唯一的來源，華僑商人在菲律賓建立了一個人口和分配的體系。但是它們始終對中國存有畏懼，老實說，中國是當時唯一可與西班牙在世界上爭霸的封建強國。於是西班牙當局便對華僑加以限制和排斥，同時挑撥離間中菲人民的關係。西班牙當局與華僑之間的矛盾，是一項比西班牙統治者內部矛盾更重大的矛盾。不過和西班牙與菲律賓人民這項基本矛盾比較起來，西班牙與華僑的矛盾仍舊是從屬的，西班牙當局之所以排斥華僑和挑撥中菲人民的關係，主要地還是爲了要鞏固它對菲律賓的統治。

然而，由於這項矛盾的重要性，菲律賓西班牙當局所訂定的貿易政策，在實際上是一系列的，阻止墨西哥白銀流入中國、限制菲律賓華僑各種商業活動的政策。因此，所謂華僑控制菲律賓經濟從來就是荒謬絕倫的謊言。數百年來，菲律賓華僑一直處於菲律賓外來統治者的排斥和歧視下，菲律賓所有的貿易政策都是外來統治者所制訂的，而這些政策的主要內容又都是對華僑的限制和排斥，菲律賓華僑在數百年來，

從來也沒有控制過菲律賓經濟。華僑社會所擁有的巨額的商業資本，是菲律賓依賴中國商品的必然結果，而嚴格地說起來，單靠菲律賓華僑的主觀願望，絕對沒有可能形成如此巨大的商業資本累積，這是菲律賓殖民地社會歷史發展的特殊性所造成的必然結果。只有在西方侵略者的殖民地上，中國移民才有可能形成爲一個特殊的商業階層；而在一個封建式的殖民地經濟體系上，握有巨額的商業資本全然未能意味着對經濟的控制。

西班牙當局對菲律賓華僑依賴和排斥的雙重政策，同時造成了菲律賓華僑傳統的矛盾性格。一方面是華僑和菲律賓人民同樣地受到外來統治者的迫害、虐待和屠殺，因此他們和西班牙侵略者之間的仇恨，與菲律賓人民所感受的一樣深沉；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們畢竟不是下層的勞動生產者，他們是熟練的工匠和手工業者，以及各項貿易上的商人；和一般的菲律賓人民比較起來，他們畢竟是能够享受到較高生活水準的一羣。這個時候的華僑社會的繁榮，事實上在建築在西班牙對菲律賓統治的基礎上的，而西班牙統治者則依賴中國商品和熟練生產技術鞏固它對菲律賓的統治；因爲受排斥而對外來統治者所產生的仇恨，和在經濟上與外來統治者的利益的極大的一致性，形成了菲律賓華僑社會傳統的矛盾性格。

日本威脅呂宋 豐臣秀吉統一日本並派兵侵略朝鮮的事件，發生在G·P·拉示馬仁迎示任菲律賓總督的時候，我前文提到過，豐臣秀吉曾經寫信來威脅呂宋（參閱第五章）。一五九一年豐臣秀吉致書呂宋國，信中說：

「日本在一個君主之下已經一千餘年了。在這個期間中，我國的統治者之間有許多戰爭和衝突，

甚至連由一個地方寄一封信到另一個地方也是不可能的；現在，上天的主宰已經使這個國家在我的時代中統一，並且對我臣服。在完成此一事業時，每一件事都是對我有利的。直到現在我還未曾打過任何敗仗，在十年來無戰不勝。同時，我征服了不在我的支配下的琉球島和高麗（朝鮮）；甚至連印度東部也遣使來朝。現在我正要侵入巨大的中國，以便將其征服，這不是我的軍力所能為，而是天意屬我。我因為呂宋國沒有遣使入朝而極感詫異，要不是因為一名日本貴族 *Yoshida*（原田孫七郎？），告訴我到這些島嶼中去的我的臣屬，日本商人受到優渥的待遇，我早已想要在赴中國的途中，以我們的艦隊進攻馬尼刺。當我問他：該國的統治者是不是我的朋友，他回答我並向我保證，如果我能夠寫一封信給總督，他就會派一個使節來。而如果他這樣做，由於我已經在我的王國中鞏固建立了，我的力量極強，我有人員能够征服任何國家。雖然，這位使者不是一個地位很高的人，我因為其良好的表現而委任他。同時，由於我並沒有派遣我想委派出的軍隊，我將於二個月內，自我現在所住的這個地方，駕臨我的海港名古屋，該地駐紮着我的軍隊；如果那些島嶼派使節來朝見我，而我能確定該總督是我的朋友，我將降下我的旗以作友誼的表示。如果沒有派使節來，我便要捲起我的旗，並派遣軍隊以衆多的人征服該國；使該國會因為不派遣使節而後悔。爲了要成爲西班牙的朋友，我於（大正）十九年在 *Mitsuo*（京都的日本古名），派遣使節自日本國到呂宋國。」

這封信的日本原文或中國譯文未見，不過西班牙譯文已知的則有三種，英文譯文有一種。這封信恐嚇的氣氛甚重，甚至在信中誇稱已經征服琉球朝鮮，其實當時豐臣秀吉尙未向朝鮮用兵。除了這封信之外，

還有一封御前大臣 *Uchida* 的信：

「我們雖然從來未曾通信，我現在是用一切的儀禮寫這封信。明年，我們偉大的關白就要與中國戰爭；除非與其他一切的王國（不管離此多遠），向他臣服並向他朝貢，他便要派出他的軍隊去佔領他們的土地。因此，所有的隣邦都向他臣服並服從他的調度。他也正在想要向你們這個富庶的王國作戰；但是原田向一位大臣報告，他再轉告關白以戰爭是不必要的，如果你受到關於日本國宮廷的意慾的通知，便會派人朝貢，而且一定會這樣做。在他的這項建議之下，我寫這封信給你，讓我們迅速彼此商議。我是本王國的一個大公。爲了使你的王國能够安穩，你不必懼怕或躊躇；而只要與這位我所派出的親信的人，討論一切秘密的事項。帶着一切應有的禮儀。大正十九年九月十一日。Saulynquin（小琉球？）。」

這封信的發出地的地名讀音似乎是小琉球，小琉球是台灣當時的中國名稱，日本當時稱台灣為高山國或高砂國，現在姑誌存疑，以待將來考證。

日本是當時亞洲新興的國家，豐臣秀吉統一日本之後，便立刻計劃向外擴張，以朝鮮爲第一個目標，並計劃在侵略朝鮮的陰謀得逞之後，便要向中國進軍。中國史籍對日本在豐臣秀吉的時代侵略朝鮮這個事件的意義，一向沒有予以充份的估計，即使有所記載也總是把這件事孤立起來，沒有適當地理解到它對中國隣邦所起的影響。如同前面所引譯的恐嚇信，以即將進攻中國標榜，威脅其他亞洲國家，是當時日本的外交特色。豐臣秀吉的恐嚇信甚至遠達印度。以菲律賓而言，日菲關係從這個時候開始，便一直成爲菲律

濟整個殖民地時代的外交史上的重要項目，而且從這個時候開始，日本政府和菲律賓的日本僑民，便一直對中菲關係和菲律賓華僑的地位，直接或間接發生過其相當的作用。因此要研究中菲關係和菲律賓華僑，孤立的探討是絕對無法全面理解的，它一直是為世界和亞洲形勢的變化所影響的。

在西班牙派到菲律賓來的總督中，拉示馬仁迎示要算是最積極準備對外用兵的一個，他一就任便立刻着手準備侵略摩鹿加羣島，但是對豐臣秀吉的這封恐嚇信，却似乎是極其容忍，他在回信中說：

「致書最崇高和有權力的王子和君主關白，在一切合宜的致意之後，希望你康健和永遠快樂。一位你的日本臣屬，並且是一位基督教徒，*Furanda Mango Schiro* 抵達本市，帶來了閣下給我的訊息，這使我極其愉快；由於你的偉大，以及上帝加諸你身上的才德和明智，我對你非常敬愛。數日前，*Furanda* 交給我一封信——雖然它帶着其應有的程式和權柄，即使其詞句的格式和重量，也像是一位極偉大的君主所發出的文件——然而，由於該使節的官階和品格，低於那發信人的尊名所應有的，這是我對這個使節的重要性的疑慮；另一點，是因為他是一個很普通和貧窮的人，乘一艘普通商船而來，這艘船是為售賣供應品及其他商品至此的。因為他需要長途跋涉才能抵此，我懷疑這封信是為某種私人目的，由他本人或其他人所寫的，想由這種方法，使他在這受到較大的重視。況且，因為沒有同時精通日本文和西班牙文的準確的翻譯者，正如該信和該使節所對我說的，我也懷疑信中所用的字眼的真實意義。我想如果日本國主要寫信給我，因為在他的國度中有耶穌會教派的神甫及其他西班牙人，他可以通過他們的幫助，他至少可以給我一封他的信的我所應用的語文的副本。我可

以誠實地說，我甚至無法全部讀出或瞭解該信，或這個人所傳給我的訊息；所以，爲了使他不能對閣下，或對我作出任何欺詐或隔騙，我想最好是將他留在此地，直到我能確知事實和日本國王的意欲，以及他將作出什麼決定和願望。而在這項懷疑中，因爲我覺得在外表上有點像是你的使節和信，我遵守了關於此一事項上的禮儀，根據我對你的信所瞭解的小部份，那是不超出 *Faranda* 選擇以爲我翻譯的，寫這封回信給你。我已經派遣主督神甫 *Juan Cobo*，他是很善良而極有德行的人，在這些島嶼中受到很高的尊崇——因爲他的智慧和才德，我常徵求他的意見，並把最重要的問題委托他——他將以我的名字，向你崇高的身份，表達完全的敬意。至於關於那位使節，假使他是真正的，我便對你至表感激，並向你保證，我是而且將繼續是你的朋友；於是，以世界上最大的王國，我的國王和國家的名義，我將爲你的幸福而愉快，爲你的不幸而悲哀（願天上的王爲你把它擋開）。讓你姑認我以我的國王和國家的名義，期望你的友誼，由於你尊貴的手施於西班牙人，和經過東印度及該等地區到日本和亞洲去的我的國王的臣屬的良好接待；因而對你在此地的臣屬也施以最大可能的良好待遇，並將予他們以同等的愛護。如果這個人所帶給我的訊息是真實的，我的國王將會樂於獲告。如果確實如此，那麼我將對一個很偉大的君主的友誼作適當的回報，而又不疏忽我對我的國王和國家的責任和義務，我將立刻以此事向他報告，以便確知他將作出何種命令。我相信這件事的結果，將會使兩個極偉大的君主，我的國王和日本國王頗感滿意；而這些有關真正友誼和聯盟的討論和會議，將大大地有助於世界的和平和康樂，和萬王之王，全能的上帝的榮耀。因爲最近日本送給我一些大有價值的禮物，我

也要回送一些我們西班牙的稀有價值的產品；但是，由於武器是兵士之間最重視的物品，我現在送給你一打劍和匕首。它們是我們所有之中最精美的，你要當作是一個希望你幸福和偉大的私人所送的加以接受，它帶着友善和愛護和象徵（我也要送給你這一點）。」

這封信是一五九二年六月十一日由馬尼刺發出的，Juan Cobo 是當時道米尼干教派的重要神甫。西班牙當局的外交手法在這封信中表現得很明顯，他們在接到豐臣秀吉的恐嚇以後，對可能由日本方面而來的進攻，有了極大的警惕。他們立刻着手準備馬尼刺城的防務，在一個向馬尼刺市的作戰當局提出的，關於加強防務的文件中說：

「依我們看來，我們對日本敵人的恐懼，在各方面都獲得證實，再加上日耳曼海賊（指荷蘭人）在實際上，每日都在沿岸騷擾。看來似乎是，如果要消除我們對本市中許多日本商人的關懷，在首先取去他們所有的武器之後，再在市外劃一個區域讓他們居住，將是很適宜的；他們可以在該地生活並售賣他們的所有物。」

這個文件中指出了菲律賓附近的海上，已經受到了荷蘭海賊活動的威脅，這裏所謂海賊活動實際上是對付西班牙的半公開的軍事行動。除了荷蘭之外，英國在這個地區的活動也在增加中。「無敵艦隊」慘敗之後所造成的歐洲均勢的變化，不上幾年，便在亞洲體現出來。從這個時候開始的歷史發展中，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我們能夠看到荷蘭、英國以及後來的日本的力量膨脹發展。不過，無論是荷蘭、英國或日本，在這個時候都只是一個正在開始興起中的國家，他們都只能予西班牙以側面的威脅，他們中間沒有一

個國家能够在這個時候，予西班牙在亞洲的勢力以決定性的打擊。

可以說在這個時候只有一個國家，能够予西班牙的亞洲勢力以決定性的打擊，那便是中國。西班牙當局對中國和中國移民的戒備，似乎是從來未曾鬆懈過，他們曾經一再地表現出要聯合日本侵略中國的念頭，但是即使當馬尼刺在他們看，已經是受到日本的嚴重威脅的時候，他們也從來未曾有過要聯合中國以抵抗日本的想法。在同一文件中寫道：

「在這裏所說出的我們對日本人的恐懼，應該被理解爲是對中國人也同樣適用，因爲我們對他們極少有信任。」

除了上面所引的備戰文件之外，宗教當局另有一件也是同一時期爲了提防日本侵略而作的文件：

「同時，應該研究把所有的生理人的財產，儲在商品可安全儲藏的，本市的石建倉庫中，再讓生理人到市外去建築他們的住宅，因爲有重大的危險。只要有些許的放火惡謀，他們便能焚毀八連和本市的大部份。」

從前面的兩個文件可以看出，西班牙當局在接到豐臣秀吉的恐嚇信之後便切實備戰，拉示馬仁迎示那封極具含蓄的回信，主要的還是作爲緩兵之計，再派出 Juan Collo 神甫到日本去試探虛實。這時候的日本對天主教徒還採取着極大的容忍態度，豐臣秀吉對天主教徒尚未施行大規模的驅逐和屠殺，耶穌會教派在日本具有相當大的勢力，葡萄牙商人仍舊受到日本的歡迎，這些情況當然是拉示馬仁迎示總督所瞭解的。

遠征與被殺 前面各節概述了 G. P. 拉示馬仁迎示任總督的時候，菲律賓的一般形勢和大事。

論述菲律賓的西班牙早期名著——Morga的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記載道：

「在他（拉示馬仁迎示）的任內，他增加了與中國的貿易，爲與新西班牙之間的航綫，訂下最佳的條例，同時沿着這一方面派出船隻。

「從 G. P. 在西班牙受命的時候開始，他便懷着要自馬尼刺，率領遠征軍去征服摩鹿加的 Torremale 港的冀望，由於此一事件極大的重要性，它的結果將有許多在其他場合下所無法達致的成功。他爲了這項遠征，不斷地進行必要的準備，但是他極守祕密地未曾向任何人宣佈，直到一五九三年，看到了他爲了這項目的所作的準備，已經顯得足够了，他宣佈他的目的，而且準備親征，帶着九百名西班牙人和二百艘船隻，包括 *galleys*, *gallicots*, *frigates*, *vireys*（西方當時的各種船式的名稱）及其他船隻。他把馬尼刺及本羣島的作戰事務，以少數的軍隊——雖然對本市的防務是不足够的——交予總指揮 *Diego Ronquillo* 負責；而把行政和司法的工作，交給 *Licentiate Pedro de Rojas*。他同時派出他的兒子，唐·L·拉示馬仁迎示以將軍府的副官的資格，與其餘的艦隊同往 *Pintados* 省（今未彌耶地區），以便由該地出發，而他本人留在馬尼刺作最後的準備，並武裝一艘他將親乘的大帆船，他以獲得報酬的，優良的中國划手爲該帆船划槳（*San Agustín* 和 *Argensola* 的書上說有二百五十名中國人——黎利註），他爲了要贏得他們的誠意，他們不容許他們被扣上鎖鏈，甚至對他們的擁有某種武器伴裝不知。約有四十名西班牙人搭在大帆船上，大帆船本身有些 *Frigates* 和小船隨伴，這些船上也搭有一些人。總督於一五九三年十月自 *Cadix* 港出發，赴 *Pintados* 省，以便與

在該地等待他們的艦隊配合，再前往摩鹿加。在該旅程的第二日的下午，他們抵達Caca島（Marikaban——黎利），該地離馬尼刺廿四 Leguas，並靠近呂宋島的海岸，在一個叫做Puerta del Acufre（琉黃岬）的地方遇到暴風。大帆船企圖靠划槳而繞越該岬，但是因非到風勢稍止之前，無法進航，他們下了錠，展開遮帆，同時在那裏過夜。有些與該大帆船同航的小船，駛至大帆船所能見到的海岸的附近，並在該地等候。

「總督及與他在一起的人，在船尾嬉玩消夜，直到第一班守夜輪值時間後。當總督到他的房中休息之後，其他的西班牙人也為同一目的到他們自己的艙中，只留下在舷門、船首和船尾的例常的守衛。中國人的划槳手，他們在三日前已陰謀一逢有利的時機，便要佔奪該大帆船——爲了要避免在此項遠征上划船的操勞，以及他們對船上的錢幣、首飾和其他的價值的財貨的貪婪——認爲他們不應失掉他們這個機會。有了臘燭的供應，以及他們所穿着的白上衣，並委派執行的首領，他們在該夜晨曦前，最後一個守夜輪值的期間發動他們的計劃，他們認爲在這個時候西班牙人都在睡覺。當其中有一個人發出訊號之時，他們全體同時穿上上衣，點燃他們的臘燭，手中握着Cutan（一種東方式的刀子），襲擊守衛和睡在船艙中的人，使他們受傷並把他們殺死，他們佔奪了大帆船。有少數的西班牙人逃生，有的靠游泳上岸，有的躲藏在船尾。當總督在他的房中聽到噪鬧的時候，以爲大帆船正在被拉曳，船員們正在降下遮帆開始划船，他由房間的艙口，光着頭無備地趕出去。若干中國人正在那裏等着他，用一把Cutan將他的頭劈開。於是受了傷，他自樓梯上跌下，跌進他的房中，在那裏侍候他的兩

個僕役把他扶到床上，他便立即死掉。僕役因被刺殺而遭遇同樣的命運。大帆船中倖存餘生的西班牙人是總督的祕書 Juan de Cuellar，弗蘭西斯干教派的神甫 Montilla，他們在船腹的艙中睡覺，他們一直留在那裏沒有出來；中國人也因為還有更多的西班牙人，直到隔日才敢進去，把那兩個人帶出來，然後將他們置於怡佬戈岸上，該地同樣地是在呂宋島上，這是爲了要使土著容許他們上岸取得他們所極其急需的水。

「雖然在附近也有一些西班牙人在其他船上，從他們的船上看見大帆船上的光亮並聽到噪聲，他們以爲是有一些工作正在進行中；而於不久之後，當他們那些游泳逃生者獲悉發生了什麼事時，他們除了鎮定之外不能作什麼援助，因爲一切都已喪失了，他們的人數少，沒有足夠的力量。他們等到天亮晨熹初現的時候，他們看見大帆船已經在張帆行駛了，列好了炮位，風在後面將它送往中國，使他們無法追逐。

「該大帆船直到駛離本島之前，沿途有好風吹送。它在怡佬戈取得一些水，祕書和傳教士在該地被棄置。中國人設法要駛向中國，但是無法抵達，他們在交趾支那泊岸，東京國王沒收他們的貨載，和兩門準備使用於摩鹿加的遠征上的大炮，皇家的標誌，所有的首飾、錢幣、和有價值的財貨；他讓大帆船在沿岸漂流，中國人分散逃入各省中。G·P·總督遭逢不幸之死，總督正在進行中的摩鹿加的遠征和事業，也隨之而中止。於是在他統治約三年多以後，結束了他所主持的行政當局。

「……………」

載：

「如果G. A. 拉示馬仁迎示總督之死是一個不幸的事件，在他本人的喪失以及征服Terrenate的極其良好的機會的喪失上，而且在成功完全可以確定的時候。不過，艦隊的返國和軍隊的抵達本市，無論如何是一項機運的事件，因為不到數日後——可以預期其航運通常的時間——許多中國船抵達馬尼刺，載着許多人和少量的商品，還有七名帶着他們的官衛的官員。這件事充份激起了，他們聽到艦隊開往摩鹿加，本市的防務缺乏，所以他們利用這個機會要求佔奪本國的懷疑。但是當他們發現本市有比任何時候更多的軍隊的時候，他們斷了作這項嘗試的念頭。他們沒有顯露促使他們到來的任何其他動機之前回到中國，而雙方都沒有表現出瞭解他們的動機，除了唐·L·拉示馬仁迎示的提防注意之外。他採取適當的措施，特別是那些與中國人，他們的居住地及八連有關的。」

Licentate Bartolome Leonardo de Argensola所著的摩鹿加征服史，對這段史實也有詳細的記載：

「除此之外，還有四百多名其他的，在全羣島中散居各地的中國人；其中有許多是到此間貿易的，他們受付款雇用——其中的大多數是受徵召而不是志願的。在大帆船上有大量供艦隊應用的食物。總督委任他的兒子唐·L·P·充任艦隊的副官，並且正如上述地命令他使它們在宿務聚集。他本人乘搭旗艦，有二百四十名中國人划槳，有八十名西班牙人乘搭在上面。他們抵達甲未地，他們於十九日自該地出發，還在若干自費隨同總督的，載着一些私人的船隻。它們沿馬尼刺（呂宋）島的海岸行駛，直到他們抵達Palawan；然後他們分開，小船一直沿可以望及的海岸，而總督則在大海上行駛。

在廿五日，他單獨在馬尼刺島上，Caca對面，Azufre海岬（琉璜岬，位於掃東岸南部）過夜，該地的海流很強，海中多浪。因為正起着風，大帆船無法前進。它在海岬的可受遮蔽處下錨，由於海流很強而稍為被拉曳。爲了使它歸回遮蔽處，中國人無間斷地被留下划槳。在事實上，他們划船的力量很小——不是因爲他們是不慣此項勞作的人，而又是被暴力強迫划船的；便是因爲他們精疲力竭了，又受到指揮他們的人的虐待。逆風向他們進襲，進一步阻礙這項旅程。爲了要確留在海岬中，便須要划槳，而且對划船手施行在大帆船上一般通用的嚴酷和刑罰。他們認爲那是很嚴酷的，而且違反了總督的保證，他答應過他們，要使他們受到友好的待遇。但是不論是鞭子或威嚇，不論是爲了要與海流對抗而使他們的四肢所流的汗，對他們都沒有像他們聽到由總督的口中所出的嚴峻而苛酷的話，命令他們要以丈夫氣概那樣地划船，要是不，他便要用鎖鏈把他們鏈上，並且剪掉他們的頭髮，那樣地無可忍受和傷害。在中國人之間，這種侮辱和死相等，因爲他們把他們所有的尊嚴置於他們的頭髮上。他們很細心地照顧，而且修飾得很華麗，並且像歐洲婦女那樣地看重它；而且由它的修飾，表示他們的修養和社會地位。他們決定要造反，以免遭受這種侮辱和羞恥。他們規定翌夜（卽便是十月廿五日）起事，當西班牙人疲倦地躺在長檯上，以及船上的其他地方時，中國人也同樣地做。然而他們很狡猾地自行分配，每個中國人躺在一個西班牙人的旁邊，而且佯裝睡覺。剛在晨曦前一個鐘頭，那是他們認爲是對所有的人最安全最適宜的時間，當看見西班牙人睡得很熟時，中國人在尖銳的笛聲下（那是他們公訂的暗號），全體在同一個時間起來；每一個人都最快捷地穿上一件白色的外套或上衫，以

便在黑暗和紛亂之中能够彼此辨認，並辨別出什麼人應該被殺。然而，爲了要使此事大爲安全，他們也點燃了相當多的臘燭，他們將它們藏在白外套裏面。然後他們取得他們的 *Casillas*，它比西班牙短劍更彎而且更尖，每一個中國人不聲不響地，着手進擊與他相隣的西班牙人，再於他們增進的狂亂中，切掉所有在睡眠中的人的頭。有六十多人乘搭那艘旗艦，其中有總督的僕役及其他。他們因整夜地賭博而非常疲倦，因爲很熱而赤身睡覺，有些人睡在船中的通路上，其他的睡在長橙上，那些獲得較多照料而有特別艙房的人睡在船尾。總督進到他的房間裏去睡覺。中國人進行殺戮那些毫無疑慮而又正在睡覺的人；這件事進行得很迅速，以至有些睡在船尾的人醒來的時候，其他的西班牙人都已經死了。守衛沒有發覺這件事，他們的疏忽是無可寬恕的，他們在事前獲得充份的警告，而且已經有過一些先例。有些人醒來，但是發現身上受傷，在迷惑中跳入海裏，他們多半都在那裏被淹沒。有些——極其少數——在受傷以前跳入海中，但是他們也被淹沒，儘管他們已靠近海岸，海流的力量使他們無法抵達陸地。十二人逃生，有許多屍體在海灘上被發現。這時候中國人變得更大胆，取出他們藏在長橙下的槍矛，在喧嚷中完成他們的陰謀。睡在艙門下的總督，帶着一盞燈或臘燭醒來。爲了使他醒來，中國人自己故意地作出很大的嘩聲；他們叫喚他，求他出來解決一件 *Casillas* 之間的吵架，這是他們叫喚西班牙人的名稱。他不知是爲了這個原因，或者是如同在其他時候一樣，感到大帆船受到曳拉，穿着襯衫起來，打開艙門，望望外面，伸出半個身子。與此同時，中國人以短劍擊他，使他致命地受傷。他們割裂他的頭，用他們的槍矛刺穿他，並超越野蠻的兇暴刺殺他。看到他就要死了，

他便退回，拿起一本他總是帶在身邊的他的教派的祈禱書，和一個聖母的肖像。在這兩種後來即將溶在他的血中的慰藉之下，他放棄了他的生命。然而他並沒有立刻死掉，因為他們後來發現他在他流而至死的床上，緊緊地握住那肖像。……（與他同死的僕役的名字）……——都是他的僕役——旁邊有四個很勇敢的奴隸的身體，也得到同樣的結局。這項結果一直到天亮才知道，因為沒有一個中國人敢在當晚進入總督的房間，害怕在八十個西班牙人中，有一部份躲在那裏面，他們的罪惡使他們變得很懼怯。大帆船中僅有的餘生者是 Francisco Montilla 神甫，一名弗蘭西斯干教派的傳教士， Juan de Orellana，總督的祕書，他們睡在甲板下面——那些中國人因為很懼怯，一直有三天不敢下去到那個地方看看，一直等到他們第一度攻襲的狂暴消退之後。然後，他們被置在信佬戈沿岸的岸上，在同一個呂宋島上，以便使土著讓他們取水，同時因為該神甫和祕書與他們訂有約言，在對他們不加傷害之下投降。中國人被保證以沒有其他會長期奉教的基督徒存活，大聲歡呼其事業之完成，說他們現在可以無所顧忌了。

『在靠近陸地的其他船上的西班牙人，雖然看到了亮光，並且聽到自旗艦傳來的不清楚的聲音，假定那是因為有一些與大帆船有關的意外的工作，或者是諸如此類的事項。當他們在經過長期間隔之後，從那些游泳逃生者獲悉了發生什麼事，他們已經無法援救了，因而終於保持鎮定。他們是力量不夠的少數，他們的事業已經被毀了。他們一直等到天亮，在破曉時他們看見大帆船已經揚帆，朝着中國駛去，後面有風吹送，而他們無法跟隨。』

拉示馬仁迎示總督的這一次遠征，發生於「無敵艦隊」慘敗之後。英國和荷蘭的軍事力量開始伸進亞洲，並且已經在觀摩摩鹿加羣島的時候。英國和荷蘭當時的力量還是極有限的，尙不足以攻佔土地作長期的盤踞，西班牙還是把他們的活動視爲海賊活動。不過在摩鹿加羣島的地區中，英國與荷蘭已經開始在利用土著統治者之間的對立以從中取利，當時的英國和荷蘭支持着「Orang Utan」島的統治者，對付「Sipah」島的統治者。在這種自相殘殺的情況下，南洋諸島嶼的統治者，不止一次地與更可怕的西方侵略者勾結，Sipah 島的統治者因爲對方獲得英國和荷蘭的支持，便向馬尼刺的西班牙當局求援。拉示馬仁迎示總督是一向處心積慮要向摩鹿加羣島用兵的西班牙統治者，得到了一個這麼好的機會，不願當時日本對呂宋的威脅，派遣在當時堪稱雄厚的軍力向摩鹿加進軍。這一次遠征並不是西班牙當局以菲律賓爲根據地，向摩鹿加羣島所作的第一次軍事行動，而且也不是最後一次，然而却是規模最大，軍力最雄厚的一次。南洋諸小國之間的對立矛盾，在歐洲國家侵略亞洲的初期，常常予西方侵略勢力以有利可乘的機會，亞洲大陸上強大的中國，在這個時候又缺乏一個有遠見的政策，沒有成爲一股强有力的亞洲領導力量。這種現象使歐洲國家力量均勢的消長，竟然也能够在亞洲體現出來，使歐洲霸主地位的爭奪，發展成爲世界霸主地位的爭奪。

明史卷三二三呂宋傳對這件史實的記載如下：

〔萬曆〕二十一年八月，酋郎雷傲裏系勝，侵美洛居（Molucca），殺華人二百五十助戰。有潘和五者，爲其哨官，蠻人日酣臥，而令華人操舟，稍怠鞭鞭，有至死者。和五曰：「叛死、筆死、等死耳；否亦且戰死，曷若刺殺此酋以救死，勝則揚帆歸，不勝而見縛，死未晚也。」衆然之，

乃夜刺殺其酋，持酋首，大呼。諸蠻驚起不知所爲，悉被刃或落水死。和五等盡收其金寶甲仗，駕舟以歸，失路之安南，爲其國人所掠，惟郭惟太等三十二人，附他舟獲返。時酋子郎雷貓吝、駐朝霧（Cobu）。聞之，率衆馳至，遣僧陳父寬，乞還其戰艦金寶，戮仇人以償父命。巡撫許孚遠聞於朝，檄兩廣督撫，以禮遣僧，置惟太於理，和五竟留安南，不敢返。初酋之被戮也，其部下居呂宋者盡逐華人於城外，毀其廬。及貓吝歸，令城外築室以居會。有傳日本來寇者，貓吝懼交通爲患，復議驅逐，而孚遠適遣人招還，登乃給行禮遣之。然華商嗜利，趨死不顧，久之，復成聚。」

這段記載的最後一節，不但與前面引譯的西班牙對日備戰文件相符，而且更加詳細。當時豐臣秀吉侵略朝鮮的軍事行動已經開始，明朝政府也已經決定要派兵渡過鴨綠江去援助朝鮮。明朝政府方面對着一個正在興起中的日本，不但是已經派兵侵略朝鮮，威脅中國的東北角，而且已經使南洋一帶開始感覺到日本的威力。所謂「有傳日本來寇者，貓吝懼交通爲患，復議驅逐。」這段記載更是令人驚心動魄。即使就明史上簡陋的記載，也已經足以使人看出，中國的邊沿自與朝鮮半島接壤的國境，一直到南方的沿海各省，隨時都在敵意勢力的威脅中，任何較負責任的統治者，對這種不利的形勢都不能無視無睹。但是明朝政府表現出他對這些形勢，連最基本的連想力都是缺乏的。明朝政府這個時候的對策是對日本夜郎自大地，封豐臣秀吉爲日本國王，結果反而自取其辱（參閱第五章）。對菲律賓只會譴責「華商嗜利，趨死不顧」，助長歐洲侵略者的氣燄。這些對策爲中國人民伏下了可怕的災難。

李長傳所著中國殖民史中記載曰：

「另有華人二百五十人，專司駕駛大木艦之職，以高尙爲把總，魏惟秀、楊安頓、潘和五、洪亨五等爲哨官，劉振岳爲參事。」

這是當日被徵役的華僑的較詳細的名單，其餘的人名大概都已無法稽考了。這裏再把這名字錄下，也許將來還有人可能自中國南部沿海各省的家譜中，再找到多一點關於此一事件的線索。

李長傳的中國殖民史還記載曰：

「其子郎雷氏貓吝繼爲總督。明年遣教士至閩。致書訴父室。書云：「郎雷氏敵裏系勝是貓吝弟氏。奉干系蠟國主命，鎮守東洋呂宋等處。蒙差官來探日本消息。招回唐人。日本近雖稱兵入境，然彼國有征伐之兵，敵國有備禦之固，况日本熟知敵國士卒精壯，遇敵無不爭鋒，何足以懼。前革回唐人，係久居不安生理。今之革者，因敵國狹窄，米穀稀少，糧食不給，別無他端，伏望尊慈鑒察。其被害戰船，乞追軍器，金銀寶貝，并究殺父之人，償命以警後人，以正法紀。從兄巴禮厚遣歸國，感佩圖報。又訴詞一紙，駕船往貴省，奔訴父冤。萬里懸情，惟冀秉公嚴追究治。從兄巴禮厚遣歸國，感佩圖報。又訴詞一紙，爲辯明父冤事。緣父守國，欲討美洛居，時有湖內唐民，願充助敵者二百五十人，自備行糧，立功給賞。時父與兵同船，聞駕到交逸地方，有佛郎人，與唐兵言談。父責番人，吊在船艙懲戒。原船裝載金銀莫計，同船番目各帶寶貝銀錢數多。船進合萬門灣泊。父令唐人牽罟捕魚，共煮而食。臥至半夜，唐人心貪財寶，陰謀不軌。將父并番目四十餘命，盡行殺死，僅存巴禮書記二人報息，將本船寶貝駕逃。僕時奉命帶兵駐劄湖霧，各屬聞變，共議報冤，將城內舊湖拆卸。僕聞計回國勸諭，不許生

端報怨，復議設新湖城外。慮及番兵橫爲擾害，着頭目四人，逐日在湖看守，以便唐人生理。不想起蓋未完，而日本報警。番目思見湖地接邇城郭，兼之唐人每有交通之情，恐招蕭牆之禍，再議移湖。此非本心。革回唐人，每船給米五十包資助，想來人必能道其詳者。激切含冤，伏望作主轉達施行。一聞撫許孚遠具疏以聞。略曰：「我民往販呂宋，中多無賴之徒。因而流落彼地，不下萬人。番酋築蓋鋪舍，聚割一街，名爲湖內，受彼節制，已非一日。去秋彼酋抽取我民二百餘人爲兵，刑殺慘急，遂致激成此變。夫以番夷犬狼之性，輕動干戈，不戰自焚，固其自取，而殺其酋長，奪其實貨，逃之交南，我民狼毒亦已甚矣。」

L·P·拉示馬仁迎示爲他的父親G·P·拉示馬仁迎示的所謂申冤書，大概是由菲律賓濱華僑代筆的，不然，當時的西班牙人大概沒有能力可以寫這樣的漢文信。從這封信中可以知道西班牙當局的一個短期間內，至少有兩次驅逐菲律賓華僑，這是其他典籍不大記載的。當時驅逐菲律賓濱華僑的詳細情形如何，現在還不很清楚。但是從這些史料一再地證明了，西班牙當局雖然老早便有意要聯合日本以侵略中國，然而當本身受到日本威脅的時候，却對中國仍存同等的畏懼和敵視。在準備對付日本侵略的時候，他們同時排斥華僑。

菲律賓偉大的改良主義者扶西·黎利曾經對這羣起義的划船手表示同情。

「據他（黎利）說：「並沒有什麼法律可以強迫這些中國人在大帆船中划槳，」他說，這些中國人一到馬尼刺來做買賣，或作手藝，或進行他們的業務，拉示馬仁迎示總督並沒有合法的權利，可以

逼迫他們充大帆船的划船手。」(Gregorio F. Zaide: Rizal the Sinologist)

明史卷二八三許孚遠傳，記載着福建巡撫許孚遠在這個時候的政見：

「(萬曆)二十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倭陷朝鮮，議封貢，孚遠請敕諭日本禽斬平秀吉，不從。呂宋國酋子訟商人襲殺其父，孚遠以聞詔戮罪人，厚犒其使。」

在對付日本的問題上，許孚遠的主張似頗澈底。但是在潘和五起義刺殺拉示馬仁迎示這一事件的處理上，許孚遠的疏文可以說是中國政府的僑務史上，第一件最可恥的文獻。

明朝政府明明知道是因為西班牙當局「抽取我民為兵」，而且「刑殺慘急」，「稍怠輒鞭撻，有至死者」，而「遂致激成此變」。不但不想為菲律賓華僑伸張正義，改善他們的處境，反而指「我民往販呂宋，中多無賴之徒」。當中國僑民無理被迫服役，因為不堪辱殺而被迫反抗自衛的時候，竟被中國政府認為「我民狠毒亦已甚矣」。中國政府對這個一向仇視中國和華僑的西班牙當局不但不加抗議，反而「以禮遣僧，置惟太於理」，使「和五竟留安南，不敢返」。

這是何等可恥的作為呀！

西班牙執政者在菲律賓虐待被徵役者的罪惡行為，不但使他們在歷史上永遠醜名昭彰，就使在當時也已經引起了較為明智和有遠見的西班牙人的憤慨，天主教大主教沙拉利便曾經嚴詞責斥過西班牙虐待划船手的野蠻暴行。黎利在「菲律賓人的怠惰」一文中寫道：

「昂貴的戰爭，無收穫的遠征，每一次都記錄有無數千的土著射手和划船手上船，但是從來未曾

提及他們有否回到他們的家鄉……：菲律賓青年爲了遠征而登船，對他們的國家永遠道別：在他們的視線內是暴風浪的海，無終止的戰爭，幽莽的遠征。」

無論在那一個時代中，統治者對人民基本權利的壓抑，並不是以種族爲界綫的。菲律賓的土著居民在當時所受到的壓迫，實際上比漢族移民所受到的壓迫更大。反抗外來統治者的壓迫是殖民地時代的菲律賓全體居民的共同點，這一個共同點可以在無數的菲律賓歷史事件中發現。但是由於外來統治者的挑撥離間，也由於漢族移民的社會是在殖民地經濟中發展起來的，因此這個共同點在許多時候，都沒有明確地體現出來。以潘和五爲首的這一羣划船手的起義刺殺拉示馬仁迎示總督，在反抗暴力壓迫的意義上，和菲律賓人民反抗西班牙統治的無數次武裝起義是完全一樣的。許多歷史學家企圖在被壓迫的羣中，劃下了種族的界綫，這種觀點是極錯誤的。

西班牙當局爲了拉示馬仁迎示總督被殺的事件，派遣使節前往中國交涉，在西班牙史籍中也有所記載。Diego Aduarte 神甫所著的 *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o Rosario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一六四〇年在馬尼刺出版），第四十五章中記載道：

「……於是，在 G·P·拉示馬仁迎示總督死後，決定要派一個使節到中國去。他爲一些中國叛徒所殺，他們後來乘大帆船逃逸，船上載有皇家的標誌，許多很好的炮，及其他財貨。使節的目的便是要要求依法究辦這些叛徒。鑒於 Juan Cobo 赴日使節的成功，便決定要選擇某些教派的神甫，充當此項使節。於是，選出了 Luis Gandullio 神甫，並任命 Juan de Castro 神甫作爲他的助手。俗人

的使節有 Don Fernando de Castro，派遣該使節的總督的表兄弟，已死的總督的外甥。一陣暴風將他們吹離赴漳（泉）州省的航程，那是他們所欲往的目的地，而將他們吹至廣東省，這是中國版圖所分割而成的十三省之一。由於該地的中國人與馬尼刺的居民沒有交接，他們沒有依使節們的官階所應獲得的尊重接納他們，也沒有予他們以在暴風浪的海中受難的人所應得的仁慈。他們被指控為海賊而受逮捕，但是在交出兩名人質之後，他們得到了稍為良好的待遇。他們終於被容許到澳門去，然後再赴漳（泉）州，但是找不出一絲他們所欲尋的大帆船的痕跡。叛徒仍沒有返回他們的本國，而是到一個較不開化和較無法理的鄰近王國中。其中有一些，以為不會被認出，後來冒險到馬六甲去，並在該地被處死。最後，使節們得不到該使節團所預期的任何效果而返回。然而，神甫們至少把基督教的甜蜜的氣息帶到這些地區。在歸途中，他們遭遇暴風，喪失了船舶，船上的人們游泳以自救。JUAN DE CASTRO 神甫，被自發生破船的務里佬海岸，用木板載到一日程外的蚌牙絲蘭海岸。』

文中所指的有些參加起義的菲律賓華僑在馬六甲被處死，到底詳情如何，只有將來參照馬來亞方面的史料檔案之後，才能有一個確定的瞭解。

本來，在拉示馬仁迎示總督尙未被殺之前，菲律賓的天主教會便有一個要派遣神甫赴華傳道的期望，當然，這個期望是一向就有的，不過是在這個時候表現得更加具體積極。前面所引的西班牙史籍的第七十三章中記載道：

「雖然要到中國去的困難，由於這項不忠的行爲的結果（拉示馬仁迎示被殺），而大大地增加了

，在事實上，主要是把它作為派遣路易（Luis）神甫至該地的方法；因為他被任命為使節，以伴同 Juan de Castro 神甫。使節們抵達廣東，而不是漳（泉）州，他們因此被縛，被當為海賊受逮捕。於是，路易神甫有機會在中國人之中使一名棄教者再皈教。他也發現有許多在該國中棄教的，來自澳門的奴隸；並以極大的熱情向他們傳教，但是懂得很少的收穫。這是一個使他們大受苦難的旅程，特別是對除了他的衣着之外別無所有的路易神甫；他們被曝露在超量的雨和寒冷之下。廣東巡撫對他們很忿怒，因為他們對他表示根據該國的習俗，他所應得的儀禮，威脅他們，並命令他們要在十五日內離開該省，只能帶不超過廿五担的米。當他們返回海港的時候，他發現了一羣棄教者，但是無法使他們恢復信心。

「中華王國有一條法律，規定任何貧窮的外國人，只要他在該王國中，便要受到公費的維持；但是如果他要離開，他便要償付（中國）官員他的衣服的價格及一些小費。每日的津貼是十二Maravedis，這是足供三餐的，因為該國的東西很便宜。由此很明顯地表現出，中國沒有不准外國人進入的法律。相反地，那裏有一條法律吸引他們並使他們留下。知道了這一點，葡萄牙在澳門的奴隸逃往中國，他們在該地可獲自由並得到良好的待遇。路易神甫使一二人皈教。不論是在漳（泉）州，或是在廣東，他們都找不到他們所要找的大帆船的一絲痕跡，因為他們到交趾支那去。當神甫們要求容許傳教士自馬尼刺到他們的國家中去的時候，漳（泉）州的官員愚弄他們。佯裝允許他們，官員們給他們一塊上面有一些中國字的銀牌，他們以此得到很大的酬報。神甫自與他們同往的西班牙人中取得這筆錢；

但是當他在馬尼刺現示這塊牌的時候，被發現它只是允准可在該地不受阻撓地購買糧食。」

除了派遣使節到中國之外，西班牙當局還派遣使節到中南半島去尋覓刺殺拉示馬仁迎示的中國人。同書第四十八章記載道：

「不願說服他多留幾天的一切努力，他決定要立刻離開；因此我們爲了要取得糧食駛往交趾支那。在這裏我們起初得到很好的接納。於是，Callinato派遣Gregorio de Vargas 軍曹作爲使節往見國王，並向他索回皇家標誌、大帆船和大砲，以及刺殺拉示馬仁迎示總督的叛徒所帶到該國的其他東西。國王對他的要求很不滿，他想要殺死該使節，他倖幸逃脫，僅免身死。」

同書第五十六章又記載道：

「有些船舶來自交趾支那，其中的船長之一，是刺殺菲律賓總督（拉示馬仁迎示）的生理人之一；他佔奪西班牙大帆船而成爲海賊。他在這個時候，有着交趾支那國王之使節的官階。」

這兩段有關交趾支那的記載，是關於潘和五及其起義同伴的現有的最後記載。潘和五及其同伴的下落，也許還有可能在中南半島的史料整理研究中發現。把西班牙史籍和中國史籍對這件事的各別記載比較一下，便知道兩國之間的隔膜。在西班牙當局方面看來，他們的使節團是一無所成而歸，在明朝政府方面看來，則認爲繼乃父任西班牙駐菲總督的L·P·拉示馬仁迎示爲父仲寬的案件，已經得到合宜的處理。前面所引譯的西班牙史籍，是根據 Blair and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第卅一、卅二卷上的英文節譯本譯出的，刪節的地方也許不少，故宜在此聲明，有意作進一步深入研究的人最好設法參考原

文。西班牙當局的文件中提及此事的，有L·P·拉示馬仁迎示一五九五年十二月六日致腓立二世書：

「關於中國人的事務，我曾於今年致書陛下，說我正在想要派遣我的表兄弟Don Fernando de Castro，同聖Domingo的神甫，帶着一些禮物和書信去見（中國）國王。我想這是合宜的，因為神甫（或，更好是說神）疏忽了該地的工作；在這件事和藉口的掩護下，我希望他們會設法，在這一次，如果有可能會見到國王，並同書信一起地獻給他一些禮物。這封信是用很大的熱情、尊重、敬意和力量寫成的，我在頭腦中儘最大的可能記得，陛下欲使該偉大王國皈依的神聖的熱忱、目的、和冀望。在最後的部份，它提及了過往的事件，使兩個問題都能獲得討論。這項工作依序進行。我購買和搜集一些東西——那便是兩把鑄得很好而且很奇特的、並美麗地飾着金和銀的劍；一些金和寶石的製品。這些，以及一些我們所能够找到的東西，根據對它的評估和價值，約值八千披索左右。這筆款項的全部，連同旅途所需的費用，我成功地不必動用皇家財庫的分文而取得；因為該處已無款可動用。我相信陛下將會認為這件事是爲了對你的服務而作的，並將命令償付該款，特別是它似乎是很適宜，而且具有最大可能的重要性的。」

從西班牙行政當局的這封正式書信看來，這個使節團的實際目的和西班牙史籍中所寫的並未盡相同。在當時的情況之下，購買那麼貴重的禮物去送給中國皇帝，更是耐人尋味。L·P·拉示馬仁迎示總督在同一封信中的另一個地方又寫道：

「因爲我極爲實際需要所迫，我懇求陛下命令支付出旅途的開支和禮物的價值。後者不能由本財

庫支付，因為我恐怕它無法付這筆款，於是便要迫我償付，上帝才知道這怎麼做得到。」

接下去又繼續向西班牙國王解釋購買這項禮物的合理性，儘管購買如此貴重的禮物有違慣例，但是中國是一個如何如何重要的國家，因此這項破例仍舊是合宜的。這位小拉示馬仁迎示總督這種不厭求詳的態度，不免令人直覺到這個執政者的腐敗性格。

這封書信中有關派遣赴華使節的部份，着重點和西班牙史家的着重點不同，老實說，L·P·拉示馬仁迎示總督派遣這個使節團的動機是很可疑的。西班牙史家不願揭穿西班牙當局的腐朽性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拉示馬仁迎示對購買送給中國皇帝的禮物這件事上所持的態度，不能不意味着貪污和濫用公款的嚴重性的存在。

Antonio Morga 的 *Los Sucesos* 對這件事的記載如下：

「當唐·L·拉示馬仁迎示執政的時候，對日本的恐懼和懷疑繼續着，再加上中國人的問題，使人們繼續處於不安中。總督派遣他的表兄弟 Don Fernando de Castro 帶着致廣東和致漳（泉州）巡撫的信，該地是被認為可能找到佔奪大帆船和殺死 G·P·總督的許多中國人的地方。如果他們乘大帆船到那裏去，總督要求中國政府交出犯人以便受處罰，同時交還皇家標誌、大炮，及他們所佔奪的其他東西。這沒有達到目的，因為該大帆船到交趾支那去，中國人向各方面散開來，因而不能被捕到。然而，在數日後，有些犯罪的中國人被從馬六甲帶到馬尼刺，他們在該地為主要軍曹 Francisco de Silva de Meneses 所捕獲。由這些人，得到了關於大帆船的被佔奪和總督之死的更正確的消息

，並置他們於理。」

中外史家一致指稱潘和五逃往安南，但是這種講法到底源自何處，似乎並沒有人提到。會不會是中國政府捉不到潘和五，以此爲搪塞西班牙人的口實？如果西班牙人老早知道潘和五逃往安南，應當會不會再派使節到中國去找他。如果逃往安南的事是赴華使節返菲後，再由西班牙當局發現，則明朝政府不見得會知道，明史上當然也不會有所記載。

更令人難解的是西班牙史料文獻中，只有L. P. 拉示馬仁迎示提到致中國皇帝的信，却沒有提到中國史籍上的所謂仲冤書，這是很奇怪的。不過，我確認這封信是菲律賓的華僑所寫的，因爲該信中提到日本威脅及當時菲律賓的情況，不可能會是身居中國的文人所偽造的。

一個華僑的供證 前面已經提到過，一五九二年拉示馬仁示總督曾經派遣Juan Cobo 神甫赴日，這位使節受到日本政府的接待。一五九三年豐臣秀吉又派遣Faranda Quiemon 爲使節到菲律賓，本來，一五九二年豐臣秀吉派到菲律賓來的使節也就是這位Faranda 但是他在九州地方生病，因此另派其副手使菲。所以，雖然這兩次受任赴菲的日本使節都是Faranda，他却在一五九三年的四月至五月之間才真正抵菲。

日本第二次赴菲的使節本來是要和Juan Cobo 同行的，但是不知道爲什麼，Juan Cobo 神甫一直不願與日本使節同乘一條船。同時值得注意的是Juan Cobo 神甫派遣一位菲律賓華僑與Faranda 同船，這位華僑是一個基督徒，他的原名不得而知，他的西名是安頓紐·羅昂示(Antonio Lopez)。Juan Cobo

神甫在其所簽署的，安頓紐的身份證件中說：

「願耶穌永遠與閣下在一起。我認爲安頓紐·羅昂示，中國人，需要與 *Faranda Quiemon* 同船離開，雖然我先離開日本海港，但是在海洋中的遭遇不同，而他可能會先我抵達。……這封信的目的是要使它成爲持有人的通行證，並作爲安頓紐·羅昂示的許可證，除了向閣下建議假如他在我之前抵達，予他們以友善的接待之外，我不再說其他的，因爲我們受到天皇良好的接待。爲了皇上的利益，閣下運銅和麻到此地來是值得的，我將會在我抵達後向你報告。……」

這封信是一五五二年七月四日在日本簽署的。*Juan Cobo* 和他的船後來都不知下落，據測是在海上遇到暴風。安頓紐·羅昂示在馬尼刺宣誓作證，向西班牙當局報告他在日本所見所聞，下面是他所作的證言誓書：

「一五九三年六月一日在馬尼刺市，爲了作上述各問題的調查，根據適當的法律程序，在上帝和十字架之前，由安頓紐·羅昂示，一個中國人基督徒，一名通譯，接得一件誓書。他宣誓，並答應在誓言之下，講出實話。當被問到該問題的時候，這位證人宣告，他曾於去年與 *Cobo* 神甫同往日本。他看到該神甫在抵達的時候，得到天皇很有禮的接待；他看見 *Cobo* 神甫進入（宮中）去會見天皇。他看見 *Cobo* 神甫顯得很歡樂和愉快，並聽到他說，再過幾天他便要回去，並且很好很快地辦理他的工作。他看見該神甫很康健並快樂地登船，帶着天皇要送給菲律賓濱總督的禮物，一把 *Catana*，或劍。*Cobo* 神甫給該證人一封信，他把該信帶交總督，因爲他奉 *Cobo* 神甫的命令，乘搭該使節的船。該證人知道天皇對西班牙人是很友善的，使節 *Faranda Quiemon* 要來談一件和平條約。後者與他所看

見的，和 Cobo 神甫進入（宮中）去見天皇的是同一人。Quejdon 並不懷敵意，而是友善的。這是他誓言中所講的事實，而且只含事實。他約有四十歲。他依照慣例，簽名在上面。

在我的面前：Juan de Quejdon

下面是安頓紐·羅昂示的詳細證言：

「安頓紐說他聽到說，日本天皇把征服這些島嶼的工作交給根原（Kunigata）。他又聽到根原屬下的兵士說，他們想要到這些島嶼來；他們問他以加牙耶（Cayayan）的人民是否已被征服。當安頓紐回答說：「有」的時候，他們說：「沒有」，而且他們知道。他聽到說日本國王把征服台灣的工作，交給一個日本人；當他們要到這些島嶼來的時候，他們將逐島而來，而且他們已經出發。任何這些島嶼之間的最大的距離，是約二日與二夜或一夜的海程。當他們聽到安頓紐說這些島嶼上有四五千名西班牙人的時候，日本人發笑。他們說這些島嶼的防務，只是一種笑話，因為一百名日本人，抵得我們二三百人；所以，要征服這些島嶼並無困難。他們說加牙耶的土著對我們很不滿，日本人一加牙耶登陸，土著便會將西班牙人交給他們。安頓紐進一步聲稱，日本正在建造三艘巨船；而他不能瞭解其為何，因為除了爲了這些島嶼，他們不會有其他的需要。

「安頓紐·羅昂示進一步聲稱，他在日本聽到說，國王命令使節帶回呂宋的人民是否會歸順的訊息。如果他們不願歸順，那麼他將命令不准任何此間的日本人回日本，他將殺掉那些回國的，因為他期望他們留下。安頓紐認爲對此間的日本人應該繼續保持警惕，依我所知，此間有三百名或更多的日

本人，隨同使節之船而來的有一百五十名。根據安頓紐的意見，不能信任不信教的生理人；因為其中有許多曾經到過日本，那些對中國人最有罪行和最懷敵意的，就是這些中國人本身。他聲稱有一位名叫唐·Baltasar的日本人，在叛亂的時候與唐·Agustin陰謀串通。這是一名基督徒生理人在Firando向安頓紐·羅昂示說的。他聲言有許多日本人在七年前到加牙那來，剛到的這條船的駕駛員，也到加牙那去搶劫。他有許多次聽到日本人說，他們要到Cinco，然後再到加牙那；而且日本國王命令Lingai的居民，不要再入貢中國。該國一向是，當在朝的國王死後，他的繼位者要得到中國的批准。日本所有的樹木都歸國王所有，不得到他的許可，沒有人可將它砍下。安頓紐聲言，對八連中的生理人只能予以極少的信任；因為其中有許多，得到日本臣屬的默許，正在準備反叛。在日本一級人都在說，本島上有極多的金。因為如此，兵士們正在熱望來此；而且正要來，因為他們不願到高麗（朝鮮）去，那是一個很貧窮的國家。那些自高麗返回的人說：「先前當我們前往搶劫他們的國家（指中國）的時候，中國人立刻和我們結合在一起；但是在高麗，沒有一個人掛意我們的友誼，他們全體都至死愛中國。」

【安頓紐也認為不應該不信教的生理人到末獅耶（Visaya）去，也不應如同慣例，讓一名基督徒與許多其他不信教者同去，而只能讓基督徒去，因為中國人在日本人的唆使之下，可能有陰謀反叛的作爲。他進一步聲言，三四百名日本人在國王的廷中斷言，如果他們到馬尼刺去，土著會自行交出已死的西班牙人。據他所知，由於這些及其他的事項，Juan Cobo神甫說當他返回此地時，他將與

總督會談，可否不讓一個日本人留在這個國家中。安頓紐聲言 Juan Cobo 神甫在不利的季節中，迅速離開日本，因為他害怕日本人；而他先前曾與安頓紐·羅昂示商量好，要利用他將回中國作藉口，將他送至 Hironoyaga，但是又再指示他改取海道，再回此地。

「安頓紐聲稱 Juan Sami，一名隨同 Juan Cobo 神甫的中國文專家，讀過日本天皇給這位 Paranda 的信，裏面含有鎮服這些島嶼中的居民的訓諭，並迫使他們承認他為主子。如果西班牙不趕快這樣做，他（天皇）不久就要來；如果不是因為行程有一半很危險，他早已經來了。」

「Juan Sami 聲言他看到和讀到一封日本國王致這些島嶼上的總督的信。它的內容如下：「先前我是一個很少為人所知悉的人。現在一切住在天空之下的人都知道我，並成為我的臣屬。我命令高麗國王向我朝貢。當他拒絕的時候，我派我的軍人去和他作戰，佔領他的土地，一直到遼東的邊界。遼東是一片有許多中國兵士的土地，中國皇帝就住在附近，我佔領了 Partho（平壤？）堡壘，並使其馴順，它對我很忠誠，因為我愛該堡壘中的人民，正如父母愛他的子女。那些承認我的權力的人，我並不虐待他們，但是我派軍人去和所有拒絕向我降服的人作戰。我正在寫這封信給你，它將成為表徵、徽號和提醒物。你應為這些事趕快寫信給干戈臘國王，使他能獲得通知。不要延遲，而要立刻寫信。我送給你那把叫做 Quithogan 的劍。」他聲言這封信是在朝中交給神甫的，而當神甫快要離開的時候，他再接到第二封語氣相同的，比前述之信更晚寫成的。在該信中，天皇宣佈他派遣 Paranda 作使節。」

「關於高麗的問題，他聲言日本人在開始時實在征服了該王國，但是有許多兵士由遼東而來，大地使日本人困疲。在許多日本人死於刀劍和疾病之後，中國人再恢復了平壤（？）堡壘及其他地區。」

「他更聲言道，Juan Cobo 神父問他：「你爲什麼害怕派日本人到中國去？」他回答說，中國人不怕他們，因爲那裏有許多兵士；即使日本人在開始的時候可能殺死很多人，許多其他的人還要隨後而來。當他問神甫以他是否害怕他們到呂宋來，他說，神甫回答道：「不，即使有無數百的日本人到來。」他聲言教堂是在神甫與國王談論以後被毀的。

「安頓紐·羅昂示宣稱 Juan Cobo 神甫向日本國王指出在一個地球儀上的我國國王的王土。他將它送給國王，用中國文字書寫各王國的名字，以及各國之間的距離。這件事的發生，是因爲當日本國王談來自這個國家的信以後，他看到許多王國，於是要求詳細向他指出，並說明它們的大小以及它們之間的距離。神甫告訴他，葡萄牙是在干成臘王的統治下。神甫把這件事寫信告訴 Hinguin。安頓紐·羅昂示說他不知道到底是當 Hinguin 問神甫，他爲什麼不歸順的時候，或是在其他時候，當神甫說他帶給日本國王禮物，並不是以我國國王的名義送的（因爲他不承認任何上司）；然而當他和國王接談後，回來的時候便發現教堂被毀。

「他又說，在本月間，Luis，一名 Joan de Solis 的僕役，將到這裏來。這個人是神甫，日本國王和 Hinguin 之間的通譯。

「安頓紐又稱，有一天，當他和 Juan Cobo 神甫在一起的時候，他問神甫道：「神甫，呂宋今

年是否會發生戰事？」神甫回答：「不，不會的。」神甫說他今年要到干戈臘去討論一些在那裏才有辦法討論的問題，他本人是這樣看；而在今年派遣聖·佛蘭西斯教派的神甫們到日本去是好的，因為這些神甫不想錢。日本人在氣質上是易受指導的，而且極企望這些神甫。神甫說，繼續轉移他們的視線四年是好的，到那個時候，馬尼刺的炮台將已完成；到那個時候則可能有戰爭。

「安頓紐稱：當他問一位帶來一些棉織品的日本朋友，他為什麼要為 Faranda 服役的時候，這位日本人回答說，Faranda 是他們的統治者，如果他不離開，便沒有一個人可以回到日本去。如果 Faranda 今年得不到有利的訊息，那麼他將不回日本去；但是，如果他們好好待他，他就會回去。安頓紐說，所謂好好待他的意思，便是服從日本國王。」

「況且，他說 Faranda 的兄弟告訴他，從墨西哥到呂宋需要四個月，從呂宋到墨西哥又要四個月；因此，只有很少數的兵士可以從墨西哥來。日本只有不到廿天的航程，所以最好是讓我們瞭解這項事實的意義。安頓紐稱，他向 Juan Cobo 神甫和 Janos 軍曹談過這件事。」

「他說那些與 Faranda 同來的人確言，後者是要任馬尼刺總督來的。船上所有的人都這樣說，他在日本也聽到過同樣的話。他不知道 Farande 是僅僅要管理日本人，或是打加麗人，或包括西班牙人。他又斷言 Faranda 的僕役告訴生理人要當心他們的作爲，因為他們的主子 Faranda 也要在馬

尼刺這裏管理他們。

「他說據他所知，Faranda 的目的是後者答應日本國王，他將計劃如何使這些島嶼向該國王臣服。他意慾要帶去一些貴重的禮物，以便他可以在日本說，他帶來了歸順。但是現在，因為神甫還沒有來，而他相信他無法得到他所欲得的禮物，他很悲哀；於是和先前比較起來，他的情緒很沮喪。」

「他又說，當一位敦洛的打加麗人，唐·Augustin，和一位日本人，唐·Rafaelzar 在一起陰謀要佔奪馬尼刺時；唐·Augustin 送給後者一頂帽，而唐·Rafaelzar 送給該唐·Augustin 一頂盔和一些胸甲。這個安頓紐又說，Juan Cobo 神甫和他討論，以如下的方式聯合中國以對付日本的可能性：如果日本將襲擊中國，我們將援助後者；如果他們襲擊這些島嶼，那麼中國應援助我們。」

「他確言神甫有一次告訴他，Faranda 失掉了他的財產，即將到這些島嶼上來和總督會談，使他用兩條船經營這些島嶼和日本之間的貿易。當安頓紐對神甫說：「你要小心不要透露這個人的計劃，那便是要自你們西班牙人奪得馬尼刺。」神甫回答說，Faranda 不敢這樣做。安頓紐說他不知道神甫有沒有把這些事告訴 Faranda 以試探他，不過，神甫知道日本人設法要使馬尼刺的人民向他們臣服。」

「Miguel Onte 說，他聽到說四十年前，日本人到中國去貿易。那個時候他們很和平，而且佯裝很謙遜。但是當他們熟悉了道路、河流和入口處後，他們便到中國去搶劫；在卅四年前，他們搶劫了他及許多和他在一起的其他人。」

「他說當 Santiago de Vera 在任的時候，中國人對後者說：「閣下小心，不要允許日本人到這

裏來；因爲如果現在有些許人來，而且得到有禮貌的待遇，明日，他們就會有更多人來，而且有更多繼續來，直到在我國所發生的事會發生在西班牙人身上。」

「他說他聽到說，這位 Faranda 的父親，在很多年前便向日本國王要求要征服這些島嶼。爲了這項目的，他要求有五千人，而日本國王答應他一萬人。他已經伐木，準備枕以造船。」

「進一步，他聲言現在有兩艘其他的船即將到這裏來。在今年的日本人到來以前，此地有四百名日本人。這兩艘船運來了約三百名，另有三百名乘客即將到來的船隻。所以，必須進行許多的防備。」

「他又說，許多隨 Faranda 來此的生理人說，這位 Faranda 要取得這些島嶼的一部份，並且使他向他歸順。Mignol 說，除此之外，他不能瞭解 Faranda 要在此地得到什麼。如果他無所獲，他將不回日本，而將要求派兵來。」

「他進一步聲言，當日本人第一次在中國進擊的時候，他們在當地和平地居住。有一天晚上，他們在他們所居住的社鎮放火，並俘捕和搶劫他們所找得到的所有的人。許多生理人害怕此地也要發生此等事。如果不是爲此，Faranda 爲什麼要到馬尼刺來？據說他正因爲軍隊沒有抵達而憂愁。」

「他進一步聲言，他對中國人的瞭解是當戰爭爆發的時候，如果西班牙人和中國人協議，給他們以金錢和所有爲他們所殺掉的日本人的頭——予每一個頭以一定的賞金，然後再允許他們帶許多回中國去——中國人將會以極佳的勇氣戰鬥。將會有二三千名勇敢作戰的兵士。」

「他說可以到 Palau 和暹羅去取得硝石和鉛。基督徒生理人將乘他們自己的船去做這件事。他進

一步聲音，在必要的時候，他們可能自 *Astarrayas* 之中，他們的居住區由此地一直展延至巴蘭迎計，取得卅多担的鉛。

「安頓紐說他在日本自 *Hunguin* 的家族聽到，十 *bagas*（萬？）的兵士（十萬日本人）要到此地來。當這位安頓紐告訴他們說，這些島嶼上只有五六千名兵士，而在馬尼刺的兵士，還不到三四千名，日本人說那麼多的軍隊是不必要的；所以只要一萬就足够了。

「他進一步斷言他的客人約在三天前說，只要有五六千人到馬尼刺來就夠了。

「他又說，*Faranda* 以及船上的書記（他在昨日被捕），當他在今日和 *Pablo Roman* 講話的時候對後者說，廿名日本人抵得過我們廿人（？）。

「……………」

「這位安頓紐又說，當他在 *Faranda* 家中的時候，*Faranda* 命令 *唐·Pedro Icen*，一位日本人，請一位在場的西班牙人和他舞劍。該西班牙人舞劍，*Faranda* 說他很熟練。這是他對我們的諷刺的話語，由他說話的態度可以感覺到。

「他又說，與 *Faranda* 的船同來的生理人抱怨說，*Faranda* 不願讓他們取下他們的所有物，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願意再和他們回去。

「他又說，由日本至 *Lintue* 之間的距離，是三百日本里，這約等於二百千成騰里（*Jeguas*）依他的意見；而他說神甫也這樣想，十個日本里約等於八個我們的里。

「他又說，日本人威脅一名基督徒生理人 Antonio Maio，說如果他賣掉他自日本所購得的船，他便要告訴關白，他將把生理人釘十字架（？）。」

「他又說，只要人們自 Luiteni（琉球？）駛往台灣島，他將觸及 Sinbuetabo，該地的人不穿衣服。如果氣候良好，這個旅程須經二日又一夜，要不然，則所有的港口均在上述的 Luiteni（這個字在這兩段中至少出現了三種不同的拼音法，現依原文照寫。）這個 Luiteni 含有七個島嶼，他在日本問得這件事。」

「他進一步聲言，說他的客人告訴他，如果今年不派神甫到日本去，明年將有戰事。如果總督送一項禮物給關白，Faranda 和關白都將很愉快，要不然，便要有戰事。Juan Cobo 神甫曾經與這位安頓紐討論過這件事。」

「安頓紐進一步斷言，他在日本的時候便懷疑 Manquin 將不許 Juan de Solis 的船行駛。他對他的同伴，一位基督徒的生理人 Juan Sami 這樣說，他和他及 Juan Cobo 神甫一同赴日本。……………」

「他又說，他的主人告訴他四五千人將乘大船來征服這些島嶼，這個數目是足夠的。只要有十艘船就足以進行這件事。」

「他聲言依他的意見，如果總督計劃要遣送一些日本船，而不告訴 Faranda 他將給他一些禮物，或派任何神甫和他一起去，那是不好的。……………」

「他又聲音，他的客人告訴他，船將不由這個海灣進入；而兵士將由陸路到來。」

「Miguel Onto 聲言許多生理人想要買 *Catanas*，但是他們不敢，因為害怕總督將要把它取掉。他說中國人想要比日本人早五日啓航。」

「安頓紐·羅帛示說船中的舵手告訴他，他們和船長商議能够在最短期間內抵達馬尼刺的路程，並且說他們將取道琉球而來。他聲言他也認爲日本人把 *Pedro Solis* 的船和另一條船扣留住，它們即將啓航：因爲如果他們沒有被扣留，他們必已到達。他又說舵手們不願意回去的原因，是因爲他們知道日本人將於明年到來，而他們將被迫帶他們來。因爲這樣，他們想要留在此地再回中國。他也說，應該極謹慎；而依他的意見，最好是把日本人留住，不讓他們回去。因爲他們確然想要征服我們；但是如果這些人不回去，在日本的日本人將會和瞎子一樣。他進一步說，*Faranda* 昨天告訴他，關係轉變得很好，而他們和我們將成爲朋友；總督請了他，那是很好的。他又說，因爲高麗的居民拒絕了他們的友誼，而且努力自行防禦，日本人後退了……」

因爲等不到 *Juan Cobo* 神甫，拉示馬仁迎示總督後來又派 *Pedro Baptista* 神甫爲使節，和 *Faranda* 再到日本去。

前面譯出的這一個華僑的供證，雖然主要地是關於日本和菲律賓的關係，但是却相當體現出日菲關係和中國及菲律賓華僑的相互作用，當時菲律賓的任何對外關係，都無法完全不涉及中國。

日本的興起及其對朝鮮的侵略，已經在第五章中討論過，豐臣秀吉對呂宋的威脅恐嚇，一開始使用這

一事件或計劃標榜。菲律賓的西班牙當局對這一個正在興起中的亞洲國家，一直表現出頗大的重視，而且常常表現出不願與之為敵，和這一事件也許不會完全沒有關係。

中國沿海倭寇之患剛剛平息不久（參閱第三章、第四章），日本與中國的直接通商，受到極大的限制。明朝政府雖然有一個時期，也把最初侵入亞洲的歐洲人列為倭寇海賊，但是後來畢竟能够分別出佛郎機人和日本人。同時又讓葡萄牙人盤踞澳門，與他們進行大量的貿易。因此，當時日本和中國的貿易，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由澳門和呂宋轉口的，西班牙時代的菲律賓史料，有不少關於這項轉口貿易的記載。當時日本和菲律賓的貿易，主要地是運來日本產品，交換一部份的菲律賓產品和大量的中國商品，所以有許多菲律賓的華僑商人，與日本有商業關係，有的還到過日本。

該供詞同時也涉及在歷史上屬於中國的島嶼如琉球，現在仍屬中國的土地台灣、亦在其中被提及。這是值得注意的，特別是台灣在中菲關係史上，有好幾個時期，曾經佔有獨特的地位。

隨伴赴日的使節 Juan Cobo 神甫的菲律賓華僑安頓紐·羅昂示，無疑是與西班牙當局特別接近而且是處於特殊地位的華僑，他在證言中竟說：「不能信任不信教的生理人」，「認為不應該不信教的生理人到未獅耶去」；「對八連中的生理人，只能予以極少的信任」，誣指「中國人在日本人的唆使之下，可能有陰謀反叛的作為。」雖然他也頗有自知之明地說：「那些對中國人最有罪行和最懷敵意的，就是這些中國人本身。」

安頓紐·羅昂示是另一個在西班牙統治初期罪證昭彰的華僑敗類，可惜現在還找不出他真正的漢文名字。

豐臣秀吉再來信 一五九三年奉 G·P·拉示馬仁迎示之命赴日的弗蘭西斯干教派神甫 Pedro

Bautista，於一五九四年返回菲律賓，他帶來了豐臣秀吉致西班牙總督的信：

「從 Pedro 神甫帶給我的信中，我得悉了你們的國家的習俗，同時也得自 Ocho 神甫先前所說的，特別是 Pedro 神甫所說的。當我出生的時候，日光照在我的胸上；這是一項奇蹟，預兆着我注定要成爲日出和日落之間的一切土地的主子，所有的王國都要成爲我的臣屬並在我的門前下拜；除非他們這樣做，我便要用戰爭將他們毀滅。我已經征服了整個的日本王國和高麗，我有許多軍官要求我容許他們去佔領馬尼刺。Faranda 和 Funguen 知道了這件事，告訴我以船舶在此地和該地之間來往，以此看來該地的人並不是敵人，所以我便沒有派軍隊前往。我和高麗戰爭，並征服至遠達 Mesco，因爲他們不守他們的約言。後來我的兵士殺死了許多中國人，及許多來幫助高麗人的貴族。這種情形使他們比較謙遜，並派出一個使節要求我們派一些人到高麗去，並說中國期望與日本王國建立永久的友誼。我已經派許多我國人到高麗去，以佔領該地的堡壘並等候使節。如果他們再度失約，我便要親自前往和他們作戰；到中國之後，呂宋便在我力所能及的範圍。讓我們永遠做朋友，並將此事寫信告知干系臘國王。不要因爲他在很遙遠的地方便輕視我的話。我從來未曾見過這些遙遠的土地，但是自我所聽到的，我知道那裏有些什麼。你的立刻派人來此是很謹慎周到的，使我大爲愉悅。我受到你的禮物。我將永遠保持我的友誼。那些來自你的國家的人將會安全地由陸地和海路抵達，不會遭遇什麼損害，他們的財產也不會被偷竊。你可以相信那個和神甫來的人所說的所有的話，因爲他看見過我的國家

和我對他的有禮款待。寫信給干戈臘國王，因為他在那裏等待着。告訴他派一個有地位的人來，使得我們的友誼得以加強。其餘的事我委托給Funguen。」

西班牙當局收到這封信的時候，G·P·拉示馬仁迎示總督已死，繼任總督的L·P·拉示馬仁迎示召集會議討論這封豐臣秀吉的信，當時的西班牙當局對這封信的措詞甚感不滿，但是仍舊由小拉示馬仁迎示回信表示友善，這封信中同時也提到潘和五刺殺拉示馬仁迎示總督的事件：

「閣下寫給我的父親的信由我收到，因為我是在他死後主持這片土地上的人，這件事發生於他赴摩鹿加的途中。他是一個晚上睡覺的時候，無意中不提防地被陰險殺掉，正如一個做夢也沒有想到有敵人或叛徒跟他在一起的人。這些叛徒是他所帶往在他的大帆船上做工的生理人。正因為他們是不可名狀的下賤、卑鄙和懦怯的人，他們殺掉我的父親，由於他相信他們，爲了使他們舒服而放鬆他們。我在離開這件事很遠的地方，得到此一事件的消息，我當時正和艦隊及軍隊在一起等待他以便出發。……」

這是G·P·拉示馬仁迎示任內所留下的，菲律賓與日本最後一次的外交往來。和先前一樣，這一次的往來，仍舊涉及中國及菲律賓華僑。無論如何，日本和菲律賓西班牙當局的關係，對今後正在發展中的中菲關係及西班牙的華僑政策，不會沒有直接的影響。細心地考查菲律賓的歷史，便不難發現菲律賓的日本僑民，一直受到比華僑更優渥的待遇。西班牙當局對華僑施行大屠殺的時候，便常常利用日本僑民作幫兇。當西班牙當局對中國商品施行批發採購（Paracada）的政策的時候，這項政策並沒有施行在日本商品上面。

拉示馬仁迎示執政期的總結

G·P·拉示馬仁迎示任總督的期間內，是西班牙對菲律賓的統治達到了相當的鞏固，並準備繼續發展的時代。菲律賓的西班牙移民在這個時候，形成爲一股真正的政治經濟勢力，西班牙政府當局也努力培養這一股力量的長成。這股力量在西班牙對菲律賓的統治發展上，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直到今日，這股力量仍舊保持着顯著的勢力。

西班牙侵略者在鞏固其對菲律賓的統治的時候，它所採取的華僑政策在基本上是一種排斥和限制的政策。在拉示馬仁迎示總督的任內，西班牙當局制訂了一系列的排華政策，其中最顯著的有：（一）禁止中國人經營零售業；（二）禁止中國織物輸入；（三）企圖控制與澳門的貿易，從而減少中國商人到菲律賓貿易；（四）限制中國人的入境。由於西班牙本國在政治經濟上的弱點，由於西班牙統治者在菲律賓對中國商品和先進生產技術的依賴，這些排華政策在當時都沒有辦法嚴格切實地施行。

西班牙移民在發展成爲一股真正的政治經濟勢力的過程中，一方面是靠土地的圍封而成爲土地主要的擁有者；另一方面是依靠菲律賓與美洲的貿易吸收墨西哥白銀，而形成爲強有力的金融勢力。在拉示馬仁迎示總督的任內，馬尼刺成爲亞洲和美洲之間貿易的唯一合法轉運站，菲律賓的西班牙移民成爲亞洲和美洲貿易的合法的壟斷者，這項政策大大地加強了菲律賓西班牙移民的金融力量。

我已經在前面一再地指出過，當時亞洲和美洲的貿易，主要地是中國商品交換墨西哥的白銀。爲了減少墨西哥白銀的外流，西班牙當局在拉示馬仁迎示總督任內，頒佈敕令限制中國商品的輸入美洲。西班牙內部不同集團的政治經濟力量之間的矛盾，在這個時候已經相當表面化地體現出來。在當時的菲律賓至少

可以看到四股不同的西班牙勢力在互相傾軋：（一）西班牙本國內的經濟力量；（二）菲律賓西班牙移民的勢力；（三）美洲西班牙移民的力量，這股力量是以墨西哥為首的；（四）澳門的葡萄牙勢力。這些力量的對抗和互相抵消，常常使西班牙政府的貿易政策表現得很紛亂。但是在這些矛盾對立之中，有一點却是西班牙內部各種不同勢力集團所共同一致的，那便是限制中國商人的活動，減少墨西哥白銀的流入中國。

西班牙侵略統治菲律賓的政策，當時是對中國人加以排斥和限制，對菲律賓的土著居民（我們把馬來——印度尼西亞族的移民也列為土著居民）採取高壓和明目張膽的掠奪和剝削，這種高壓的政策不斷地引起土著居民的武裝反抗。由於西班牙統治者和菲律賓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是當時菲律賓最基本的矛盾，更鑒於中國在歷史上對南洋羣島的傳統影響，雖然因為菲律賓這一地區（特別是呂宋）的落後性，中國的影響比較上是較輕微的，但是在林鳳征非的事件上，菲律賓人民普遍的親中國的態度，仍舊使西班牙侵略者感覺到中國的影響，可能構成對西班牙統治菲律賓的嚴重威脅。因此，挑撥離間中非關係，在菲律賓人民之間散佈對中國和對菲律賓濱漢移民的輕蔑和仇視，成為西班牙統治政策的重要內容。這種挑撥離間在拉示馬仁迎示執政的期間，發展成爲一種表面化的政策。

挑撥離間落後地區不同民族之間，及不同地區的人民之間的感情，利用不同地區的土著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是歷史上一切侵略者都使用過的手段。西班牙無敵艦隊慘敗之後，英國和荷蘭在亞洲外圍的島嶼上，開始進行半公開的軍事行動，由於他們還沒有力量盤據一個固定的據點，與西班牙勢力公開對抗，他們便應用這種挑撥離間的手段，利用土著統治者之間的矛盾以取利。當時的西班牙當局對呂宋島及未獅耶的

某些島嶼的統治，已經達到了某種程度的鞏固，拉示馬仁迎示總督一就任便開始準備作進一步的軍事侵略。因為英國在摩鹿加羣島上當時的土著統治者之間造成一個對立的形勢，使西班牙當局認為是一個難逢的可圖良機，便立刻準備對摩鹿加羣島進行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大批的艦隊和軍力在宿務集中候命出發。

在赴宿務與西班牙軍主力匯合的途中，拉示馬仁迎示總督所乘旗艦中，被無理強徵充當划船手的菲律賓華僑，因為不堪虐待，以潘和五為首起義反抗，刺殺拉示馬仁迎示總督並使西班牙的這次軍事遠征無法繼續。潘和五等人的反抗行動，在抵抗暴力壓迫的意義，和菲律賓人民無數次的武裝起義是無法分別的。明朝政府在此一事件的處理上，表現得非常可恥，不但不能為菲律賓華僑伸張正義，反而誣蔑斥責。

潘和五等人刺殺拉示馬仁迎示總督的事件，是菲律賓漢族移民對西班牙侵略者的統治政權，第一次較具規模的有組織性的反抗行動。此一事件不但是菲律賓華僑史上的大事，而且也是菲律賓民族革命運動史上的大事，潘和五等人的事蹟，和一切反抗西班牙殘酷高壓統治的菲律賓民族英雄的事蹟，是同樣可歌可泣的。可是，一方面也許是由於漢族移民的民族優越感，另一方面也由於外來統治者的挑撥離間，在歷史上，漢族移民在一個很長的期間中，都沒有自覺地把他們自身的命運和菲律賓廣大人民的命運連結在一起。每當漢族移民遭受慘無人道的迫害和屠殺的時候，他們錯誤不向廣大的菲律賓人民之中，爭取遭遇同樣悲慘命運的友軍。

在這一個時期，有一股新的力量開始在亞洲出現，那便是日本的統一和興起。日本在這個時候，實行對朝鮮的第一次軍事侵略，歷史上第一次，一個有組織性的日本政府向中國在亞洲大陸的傳統地位挑戰。

日本的統治者豐臣秀吉因此而自引以爲榮，並以此標榜來威脅呂宋。當然，這個時候的日本還是一個新興的國家，在實際上還不能有多大的作爲，但是他畢竟已經開始在亞洲國際政治舞台上出現，成爲一股不可忽視的正在發展中的力量。從這個時候開始，日本對中菲關係及菲律賓濱華僑，便一直有着直接間接的影響。

日菲貿易也在這個時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馬尼刺成爲中日貿易的轉運站之一，大量的中國商品經過菲律賓轉運日本。明朝政府在東南沿海平定倭寇之後，日本與中國的直接貿易，如果不是完全終止也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因此日本爲了要滿足其對中國商品的需求，日本商人便向菲律賓和澳門採購所需的中國商品。

總之在拉示馬仁迎示任總督的短短的期間內，上述一連串的大事都是對中菲關係和菲律賓濱華僑有深長意義的，西班牙當局的華僑政策在這個時期開始定型，這些政策在今後一個很長的期間中，實際上是西班牙當局對華的基本方針。

